

中央财经大学六十年史

上 编

中央财经大学校史编写组 编著

总执笔：王 强
定 稿：李玉书

顾 问：王万有

编写组成员：
王 强 李玉书 陈 明 嵇召海 申晓若
刘树勇 王晓乐 张 辉 胡 郁 吴颜芳
刘 飒 龙 阳 彭 欢 陈妮娜 刘 星

中央财经大学六十年史编纂说明

一、本校史正史部分分为上、下编，以“文革”时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被解散为界。

二、本校史每章后有小结，结合年代与专题的政治、文化背景，略述学校史象与相关语境，以期观校史而能知天下事，观天下事而知学校何以如此运作。

三、本校史正史之后有“附录”三，有“附表”三。附录为：“史实考论”，“校长小传”，“校史访谈录”；附表为：“历届校长任职年表”，“教授任职年表”，“历届院系、处、室正职任职年表”。

四、本校史原拟附录中财历年大事记，后因档案馆正在编写《大事记》拟别册刊印，故不再附录于此。

五、本校史原拟附录中财校友记事，因校友会编有《校友风采录》已分册刊印，亦不附录于此。

六、因有对校史起始年、“文革”中学校解散具体年份、复校后校址选择等方面的一些不明确、有异议之处，故于附录中设“史实考论”一节略加考辨。

七、为修校史采访学校耆宿数人，相关学校发展部分整理编为“校史访谈录”于附录中，以期与正史有互见之效。

八、正史文中有附表若干，其数据多采于档案馆所存资料与历年年鉴。

九、附录中有“校长风采录”，然非历届校长之全录，故附“历届校长任职年表”以足之；附录中有“教授风采录”，亦非教授之全录，故附“教授任职年表”以足之。

十、学校发展中，中层干部多予力焉，正史中不能一一叙列，故附“历届院系、处、室正职任职年表”以标其功迹焉。

十一、附录中“文革”前“校长小传”附上编之后，余附下编；“史实考论”相关“文革”及以前事，列于上编，余列下编；“教授风采录”皆附于下编；“校史访谈录”相关校史前期之事者附于上编，余皆列下编。附表皆列于下编。

目 录

引子	1
第一章 初创时期（1949年11月—1953年8月）	3
第一节 中央税务学校（华北税务学校）的创建（1949年11月—1952年6月）	4
一、与共和国同年，与共和国同体，在财经风云中诞生	4
二、华北税务学校正式成立	6
三、学校所在地——“天子脚下”西皇城根的陈家大院	7
四、第一任校长	10
五、第一次开学的日子	11
六、红色理财家管理的学校	12
七、政务院通令与新校名	14
八、校歌嘹亮	18
九、财税干部培训的主阵地	20
十、学用结合的办学风格	22
十一、有特色的教学经验	25
十二、文化补习学校——为了“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受到高等教育”	27
十三、朴素而多彩的学校生活	29
十四、制度建设	31
十五、关于中央税务学校（含华北税务学校）性质的考辨	36
第二节 从中央税务学校到中央财政学院	38
一、筹办中央财政学院	38

二、大学正规化过程中的第一次提升	39	九、规章制度建设情况	100
三、中央财政学院院址	40	十、培训干部学员的情况统计	103
四、中央税务学校光荣地完结	42	第二节 中央财政干部学校的政治生活	105
五、院系大调整对中财意味着什么	43	一、政治活动日益频繁	105
第三节 中央财经学院（1952年8月—1953年8月）	45	二、政治运动中的中央财政干部学校	108
一、中央财经学院的筹办	45	本章小结	112
二、三个校址，两处办学	45		
三、精英荟萃，名士云集	47	第三章 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时期（1958年12月—1972年3月）	115
四、办学理念和任务	51	第一节 合并前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干部学校	116
五、学院制度建设	52	一、从一般培训到总行干部学校成立	116
六、管理严格的文化补习学校	53	二、总行干部学校的教学工作	121
七、组织、人员概况	55	第二节 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时期	124
八、刚性化与人性化结合的人事管理	56	一、干校合并	124
九、教学概况	58	二、干校性质和教育方针	125
十、中央财经学院解散	61	三、干校机构设置	126
本章小结	63	四、教师深入农村调查，为教学做准备	127
		五、“反右倾”运动中的干校一期	128
第二章 中央财政干部学校时期（1953年4月—1958年12月）	67	六、暂时无“运动”的干校二期	134
第一节 中央财政干部学校的组建	68	本章小结	135
一、精干的管理者与逐渐充实起来的教职员	70		
二、具有鲜明“部门办学”特色的机构设置	75	第四章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时期（1960年1月—1978年3月）	137
三、机构设置的大变化	77	第一节 一波三折的1960—1962年	138
四、有计划的短期轮训培养目标	78	一、本科教育的开局之年	138
五、六年的“干训”教学历程	79	二、遭遇挫折的1961年	147
六、“干校式”师资队伍的建设	90	三、峰回路转的1962年	152
七、教材建设	92	第二节 曲折发展，初显辉煌	158
八、求“用”务实编教材，向科学研究进军	98	一、构建、强化领导体系，建立、健全组织机构	159

二、政治部的设立	161	十、自古多情伤别离——教职工陆续离开学校	262
三、教职工队伍建设	163	十一、复活的种子——友谊楼留守处办公室	268
四、一份没能实行十年的教师培养“十年规划”	173	本章小结	268
五、实践教学，学以致用	178	附录	271
六、专业教育的现实性和时效性	182	【一】史实考论	272
七、文化基础课的创新	184	一、中财建校源头考	272
八、1960至1965年招生人数、专业概览	185	二、中财“文革”停办时间考	275
九、小荷才露尖尖角——留学生教育	189	【二】校长小传	278
十、教育大计，德育为本	191	【三】校史访谈录	286
十一、图书馆及硬件建设	196	一、凌大珽访谈录	286
第三节 政治风云中的中央财政金融学院	197	二、王万有访谈录	298
一、“四清”运动升级，教师学生下乡	203	三、俞天一访谈录	309
二、时代特色凸显的党委会	208	四、钱中涛访谈录	322
三、参与政治运动的得与失	212	《中央财经大学六十年史》表格目录	337
四、半工半读	213	中央财经大学六十年史上编编后记	339
五、桃李芬芳	215		
六、那个时代中财的科研	225		
第四节 “文革”岁月——风波里的中央财政金融学院	235		
一、政治大气候	235		
二、“文革”前夕的中财院	237		
三、财政部、总行工作组进、出中财院	240		
四、“全国动乱”中的中财院	242		
五、“夺权风暴”和“军宣队”派驻中财院	245		
六、林彪“一号令”与学校的迁徙	250		
七、学校真的“下马”了	251		
八、在河南“五七干校”的日子里	253		
九、在“文革”中离别母校	259		

引 子

有一本书上有这样一句话：“任何涉入一条新的河流的人都想知道这里的水来自何方，它为什么这样流淌。”对历史的关心有时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一个外国人曾经说过，不知道你出生以前的事，意味着你还没有成熟。无论出于何种动因，当我们居于某个空间，我们就总有一种对时间的关注，这个空间的过去就是历史，我们现在所居的空间在过去是个什么样子？这引起我们的好奇，当我们去寻找这个空间的过去时我们就进入了历史，当我们在历史中寻找出一些我们并不知道的、并不理解的东西，我们就发觉在我们眼里现在所居之空间变得与以往不同了，这个空间因时间的介入而厚重、而丰满，我们甚至觉得自己宽容了许多，也从容了许多，我们不会妄自尊大，也不会妄自菲薄，我们开始对我们所居的空间有了一份感情和一份尊重，因为我们有一种反思，面对过去，我们好像成熟了许多；而面对未来，我们也许还十分幼稚。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穹庐之下，我们的空间何其大也，而我们的视角在教育；教育的空间又是何其大的空间，而我们的视角在大学；大学的空间又何其大也，我们的视角在中国的大学，在新中国的大学，在共产党自己办的大学——中央财经大学。

每一个新来中央财经大学的人，无论是考来的莘莘学子，还是来此执教的教师和管理者，都渴望了解这所大学的初创，以及它历史上的人物、事件和种种的故事。当我们究诘它的来历、探究它的历程，就会发觉它的源头和现在有着那么的不同，它的流程，也真是十分的曲折。这让我们想起长江与黄河，荡荡江河，朔流求之，当其涓滴之时，它是什么样子？在汇入大海的途程中，它都经历了什么呢？当其势成江河，它又涵涌着何种的精神？形成了何种的传统？

一部大学的历史，我们应该怎么去读呢？

第一章 初创时期 (1949年11月—1953年8月)

研究历史，最基本的是探源疏流。中国在上古时有一首诗中写道：“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源求之，道阻且长；溯流从之，宛在水中央。”¹这里传导着一种追寻的渴望与一种诗意的迷茫。当我们在追溯中央财经大学的历史时，也或多或少有这样一种感觉，这更使我们增加了探寻的兴致，也有一种让它走出迷宫的使命感。这好像是一种诗意的探究，但更是历史的溯源，我们总愿意尽其所能地把那模糊的久远复其原貌，使人如临其境，如见其人。

中央财经大学出身于1949年成立的华北税务学校，该校旋即更名为中央税务学校。那么，这所学校为什么开办？在它之前是否还有办学的端倪？它又是怎样发展成今天的中央财经大学的呢？

¹ 参见《诗经·秦风·蒹葭》。

第一节 中央税务学校（华北税务学校） 的创建（1949年11月—1952年6月）

一、与共和国同年，与共和国同体，在财经风云中诞生

公元1949年，在对“蒋家王朝”普遍失去信心的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应是令人振奋的一年，也是激动人心的一年。这一年的10月1日，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时，一个崭新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人民的欢呼声里，进入了世界民族之林。

共和国建立了，但是国家仍然面临着许多棘手的问题，被战争破坏的经济遭受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折磨，中国根本的经济和军事落后性给社会精英争取国家富强的目标造成了巨大的障碍¹。

1949年3月5日，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并宣称“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²但是技能和人员的缺乏显然使党在1949年不能对城市进行全面而有效的控制，所以进一步开发人才资源以确保政府和公共事业能顺利运转，成为当时的迫切的需要。

人才的匮乏，或者说干部的匮乏，使新中国的教育在建国伊始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1949年9月21日—30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会上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称《共同纲领》），是年10月1日毛泽东发布政府公告指出，《共同纲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在《共同纲领》第五章“文

化教育政策”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们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还指出：“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适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这里特别强调的是：教育的任务是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人民政府要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等内容写进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言》中，而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就一定需要大批的搞经济建设、懂经济建设的人才和干部，这在当时确实是个大问题。在建国前后，共产党就通过解放区的旧大学或自办的高等学校大量地培训干部，同时一些政府部门也在自办的专科以上的学校培训本部门的干部。

共和国的需要，党和毛主席的关注，使新中国教育的诉求指向建设人才，特别是对大批经济建设人才的培养。中央财经大学的前身——中央税务学校（初名为“华北税务学校”）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着手筹建的。在中央税务学校创建的过程中，一些有识之士的建言献策也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中财大税史方面的专家凌大挺先生早在1949年北京解放初期就提出过类似的建议，并得到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千家驹的响应和支持。非常幸运的是，在凌先生去世前几个月，我们曾经采访过他，已经是95岁高龄的老先生回忆说：

北平一解放，税收问题日渐突出，特别是要养活数量激增的脱产人员，当时税种和税收征管机构不统一：有直接税，归直接税税局；货物税，归货物税税局；还有地方税等等，令人感觉头绪太复杂了。为了保证税收，北京城里就贴出布告，布告在宣传必须缴税的同时，后面还罗列许

1 R.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9页。

2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多杂七杂八的税：有城防税，防守城墙用的；马杆税，就是服务于军队的马，养马，等等。这些其实都是钱，是费用啊！马杆税，这个字眼太刺激了，会影响政府形象。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几个大学教财政学，感觉这个不像话，就给华北局交了一封意见书，稍微就说了说哪些应该是保留的，哪些应该是取消的。华北局把这个意见书打了六份分别转给财政部、税务总局了。意见书里，我特别提到，最要紧的是税收制度和税务人员。意见书送走后不久，税务总局就召开了一个临时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马寅初、千家驹，和在各个学校里面教课的人，也包括我。在座谈中，大家建议：是不是成立一所税务学校？有关部门接受了这个建议，决定成立一个税务学校，由华北税务总局筹办¹。

经济领域知名学者的建言与中央的教育宗旨相合，1949年7月中旬，在中央的关怀下，华北税务学校开始筹办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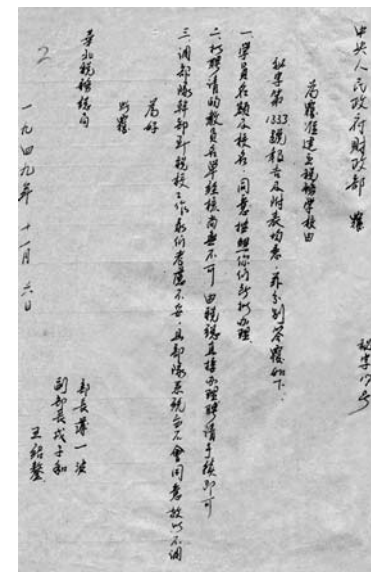
二、华北税务学校正式成立

1949年10月27日，在学校正式建立之前，经当时的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批准，华北税务总局既已发布《华北税务学校组织章程》（以下称《章程》），对华北税务学校的成立、招生、教学、管理、分配等作了详细规定。

《章程》第一章为“总则”，明确规定：“本校定名为华北税务学校，受华北税务总局之领导，本校以培植新民主主义的税务干部为任

务”。¹其中，第三条规定：“学生来源：招考新生；调集在职干部轮训。”《章程》第五条至第十三条规定：全校设置校长、教育长、秘书、教务、总务等机构，以学科性质及教学需要分编班次等等。²《章程》一经公布，更加快了学校的筹建工作。

至1949年11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以秘字17号文件，正式批复建立华北税务学校（见附图）。从此，11月6日，既是中央财经大学前身华北税务学校的誕生日，也成为中央财经大学的校庆日。



这所在共和国开国之初的财经风云中应运而生的学校，创造了共和国史上的许多第一：新中国第一所以培养财经专门人材为主的学校；第一所红色理财专家管理的学校；第一所普通教育和干部培训相结合的学校；第一所短平快培养人才、学之能用、用之能胜的学校；在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中，培养和输送人才最快、最多的学校……

三、学校所在地——“天子脚下”西皇城根的陈家大院

北京有个天安门，天安门西侧有个中南海，中南海西有一条南北向大街，叫西皇城根南街，中南海西还有一条东西向胡同叫灵境胡同，西皇城根南街和灵境胡同交汇处有一个院落，叫西皇城根22号。这个深宅大院，是一座有几进院落的四合院（当时院内只有礼堂是新建的），华北税务学校就设在这里。

1 采访时间：2007年7月17日。地点：凌大挺先生家中。

2 《1949年华北税务学校工作总结》，材料见中央财经大学档案馆：新制作校史档案光盘，第一盘。

1 中央财经大学档案馆：新制作校史档案光盘，第一盘。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史长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53页。

说起西皇城根22号院，颇有些来历，这里最早是一所尚书宅第，由清末邮传部尚书陈璧（字玉苍）¹所建。又名陈家大院。尚书宅第是一所几十亩地、二百几十间房子的大宅子。抗战前，院子的主人为尚书公子陈绵，他早年以世家子弟、尚书公子的身份就读于北京大学，毕业后留学法国，入巴黎大学艺术学院，攻读戏剧导演，其艺术博士学位就是以导演《茶花女》一剧和写研究此剧的论文而获得的。回国后，从事话剧艺术工作，22号院就成为他排练话剧的场所。北京有一位文化老人，名叫邓云乡，在他的《文化古城旧事》一书中写到：“尚书公子陈绵博士指导‘中旅剧团’在他家偌大的客厅里排文明戏（话剧）。西皇城根22号的陈家大院，是最时尚的地方，常有艺人记者出入，镁光闪闪。……这平和的日子，像古董瓷瓶，到卢沟桥炮响，就碎了。”

华北税务学校选中22号院时，院子的主人仍然是陈家后人，陈家虽然是旧官僚绅士阶级，22号院又是私人住宅，但当时人民政府并没有无偿没收，而是付费购买。学校在购买该处院子时，花费人民币11500万元（旧币制），由于物价波动，比一开始商谈价格时，多2000多万元。11500万元在当时折合实物，相当于7000袋面粉，以这样的价格，买了一处30余亩的院子，200间房舍，是划算的。当时的22号院，陈家除了自己居住外，还出租房舍。学校购买院子后，首先安排院内的60余家租户搬迁（搬迁也费尽周折），学校又花费8000多万元进行了修补，到1949年底，面貌焕然一新，已成为能够容纳500人的校园。²

中央税务学校二期学员邹大牧回忆：

1 陈璧，字玉苍，南通镇苏坂村人。光绪元年中举人，3年后进士及第，随即授内阁中书，从此仕途通达，历官礼部铸印司员外郎、湖广道监察御史、太仆寺少卿、顺天府尹、户部侍郎等数十职，累官至邮传部尚书兼参与政务大臣。任户部侍郎期间，整顿省属铜圆局，为造币定色，有“铜币大臣”之称。

2 《1949年华北税务学校工作总结》，材料见中央财经大学档案馆：新制作校史档案光盘，第一盘。

1949年时，中央税务学校校址在北京西城区西皇城根南街南口路西的一处大宅院内，它不像清代王爷府。朝向东方的大校门对面，1950年还残存有清代以前的古代皇城的西墙。即由西单北大街进路东的灵境胡同，由西口向东走快到东口（可见到府右街中南海的西红墙）向北一拐，再走100多米，路西的大红门便是本校。进入校门，对面偏南是个独立的小院，由副校长李永江及五班班主任张明（女）一家人（有子女二

人）居住。校门南部（院内）靠东院墙建有学员的大伙房。进校门后的西北方有个大花园，中部有个土山。副校长居住的小院隔一通道的西侧便是南北向的两进式的四合院。北四合院较小，南四合院房间大，结构较讲究。五班学员住在北四合院的东、西、北房内；五班班主任张明（女）及王干事（男，退伍军人）在北房西头的两小间内办公。南大四合院北房的西部几间是六班学员室，北房东边几间是七班学员室，南大四合院的东房（较北房小）是八班学员室；南大四合院的南房（较大）是全校学员雨天听课、听报告的场所，房内东南角还放有一硬木架古董式的大镜子，大南房的西头是储藏室。1950年北京刚刚解放，学校条件虽说简陋，但比起老解放区的学校来，风雨无碍，……全校集中活动（听报告、上大课）时



在南四合院；遇风雨时在南四合院的大南屋（多功能）进行。¹

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机构在北京城里找个房子也很不容易，如成立于1949年7月2日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中财委”），是新中国成立前经济决策的大本营和神经中枢，在筹建的过程中，就因为房子费尽周折，据《陈云传》一书记载：“找租房屋，这在当时即将成为全国首都的北平也绝非易事，尽管北平军管会所属的物资接管委员会已接收了一批原国民党政府及资本家的财产，但远远不能满足即将成立的全国性的众多领导机构的需要”²。中央税务学校（亦即华北税务学校）选址西皇城根也是很不容易的，能够顺利找到办学场所，反映了国家领导人对学校的重视。从学校的地理位置看，它位于市中心，距中财委主任陈云的住所不远（陈云住在与中南海一街之隔的北长街71号），中财委的地址开始设在东交民巷一座西洋式的两层楼内（后迁朝阳门内大街“九爷府”），学校离“财经决策中枢”最近，这是一所名副其实的建在“天子脚下”的学校，其在决策者心目中的地位和重要性自不待言。

四、第一任校长



李予昂

新中国建立之后，大学校长主要由两个不同群体构成，一是前辈教育家和学者，如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等；另外一批是党的高级干部，大多是党内的大知识分子和学者，如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吉林大学校长匡亚明、山东大学校长成仿吾、

复旦大学校长杨西光、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北京大学校长陆平等。对这两个群体，由于是大学校的缘故，关注度比较高，人们往往津津乐道，围绕他们，或褒或贬，有数不清的文字，然而，人们不自觉地忽视了另外一个群体：他们同样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事业心，勇于进取，朴实而无华，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前后由新政府的部门官员所主持之专业学校的校长们。事实上，这一群体也属于上述“高级干部”系列，华北税务学校第一任校长李予昂，既是一名出色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时任税务总局局长，又是一名精通书画、温文尔雅的文人雅士，是公认的高官中的才子。¹

五、第一次开学的日子

华北税务学校1949年11月6日批复成立，仅用了两周时间，做了紧张的准备和招生工作，到18日，第一批新生就入校了。又不到一个月，在12月15日正式开学。开学典礼上，首任校长李予昂作了激情洋溢的讲话，他号召同学们团结一致，互相学习。他特别解释了校训“忠诚朴实、廉洁勤能”八个字的涵义：“第一要忠诚，就是对人民事业无限忠诚，对革命一条心；第二要朴实，这是革命优良传统，我们必须发扬下去；第三要廉洁，税收工作是与各阶层相接触的，而且与钱相联系，很容易犯错误，所以必须廉洁自守；第四要勤能，必须勤恳工作，提高效率，这样才能贯彻政策。”²这是学校对学员的要求，也是党对学员的要求。可以看出这里体现着一种革命的纯洁性，没有“八股”的东西，比如我们看不到后来那种非要把领袖的话作首要标准和第一要求的现象。大学依靠梦想、依靠希望生存下去——这是大学的历史。那个时候，就

1 校友邹大牧2007年8月6日写的《大学回忆录》，文章见“中财校友网”，2008年10月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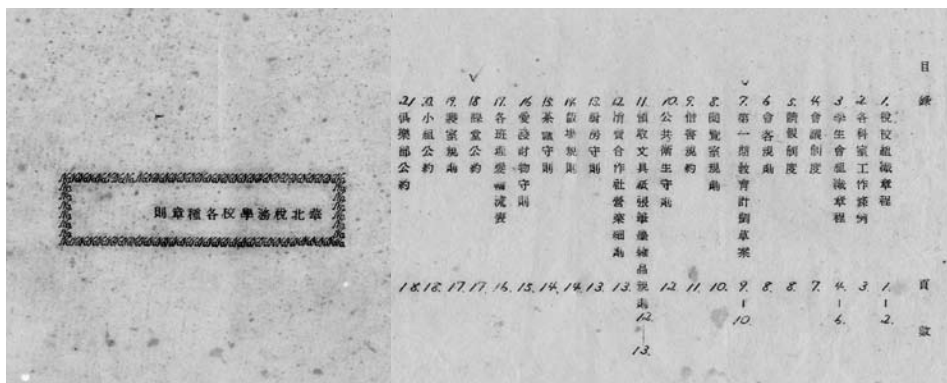
2 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07页。

1 见后“校长风采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税收史长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53页。

是把献身于人民作为革命的梦想，把建设好社会主义新中国当作我们的希望。税校的学员入校伊始，校长就把这梦想与希望传导给他们，并把对经济工作的道德要求和态度要求传导给他们，可以说这既是税校的第一课，也是中财历史上的第一课。这是奠定中财传统的第一课，也是奠定中财培养特色的第一课。

华北税务学校成立后，先后制定了《华北税务学校各种章则》，内容包括：税校组织章程、各种科室工作条例、学生会组织章程、会议制度、请假制度等，共计21种（见附图）。



第一期学生共计470人，学生分为4个班，即第一期学员编为第一、二、三、四班；第二期学员也分为四个班，编为第五、六、七、八班，依此类推。学生来自两个方面：华北大学的毕业生；华北地区抽调的税务干部，主要是县级以上税务部门的领导干部。

六、红色理财家管理的学校

同人民政府接管的其他高校相比，华北税务学校是在党的领导下一手创办的，没有旧时代遗留的思想文化问题，是红色理财家管理的学校。

除了第一任校长李予昂外，还有许多经济领域的领导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后来长期在学校工作，担任过中财几任领导职务的张光三同志，也有着光荣的革命史，是标准的“三八式”干部¹。1949年10月—1952年10月，张光三担任中央税务学校秘书，是学校的创办者之一，在后来的中央财经学院、中央财政干部学校、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他一直是政治理论教员并且担任领导职务。1938年9月张光三是八路军一二九师的一名宣传队员，后到抗日军政大学第六分校学习，还到十八集团军（原八路军）总部无线电教导大队学习过，并在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任情工科科员4年。1947年2月开始，张光三从事根据地的经济工作，担任过晋县工商管理局会计、藁正获县税务局会计股长、冀中禁烟办事处支店经理。1949年4月—10月，在华北财政部工作。不久张光三即来中央税务学校工作。

还有长期在中财工作、时任中央税务学校组织科科长康民同志，1941年参加工作，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冀热辽禁烟局股长、冀中办事处商店副经理。

据校友回忆，华北税务学校成立后，缺少专职教师，在政治课的学习方面，主要请老领导、老前辈讲课，例如，在学习《社会发展史》课程时，1950年主要由中央有关首长讲课，如：田家英、范长江、箫三、何长工、谢觉哉等，他们皆青史有名者也。

在业务课程方面经常请业务部门的领导和著名经济学者讲课，聘请他们为临时教员，这也成为学校的一个传统。在这些教员中，有二人是不得

¹ 所谓“三八式干部”，按《陈云文选》第三卷注释里的解释，“三八式”是对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干部的一种习惯性称呼。有人认为，“三八式”干部的称谓来源于中国共产党1938年做出的决议。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抗战初期的两年多时间发展的党员数量巨大，影响最大。

不提的，一是千家驹¹，二是马寅初²。

千家驹对学校的贡献，一是积极支持学校的创建，二是亲临教学一线。

马寅初先生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为陈云所倚重。1949年9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时，陈云为主任，薄一波、马寅初为副主任。前已述及，马寅初是华北税务学校创建的积极推动者，在学校成立后，也多次来校讲课，传授经济学知识。

七、政务院通令与新校名

华北税务学校成立后，不到3个月时间，随着华北税务总局成为中央财政部的一个总局，1950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财人字第103号文批复：“将原华北税务学校改名为中央税务学校”（见附图）。其实建国前，华北人民政府即中央人民政府的雏形，也可以说华北政府即中央政府

1 千家驹（1909— ）浙江武义人，193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35年兼任北京大学经济系讲师。1946年后任香港达德学院教授，并创办“经济服务社”，出版《经济通讯》周刊。1949年5月，陈云奉命从东北到北平组建中财委，千家驹就是陈云最早注意到的人才之一。1949年9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时，千家驹是财经委49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千家驹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兼中央私营企业局（后改为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1955年，千家驹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现在的院士。改革开放后，又致力于研究中国货币史，与郭乔岗合著有《中国货币发展简史和表解》（1982）和《中国货币史纲要》（1986）二书，并担任《中国钱币》杂志主编。千家驹主张经济科学应该研究客观的经济规律，而不应以宣传或阐释政府的政策法规或领导人的讲话为满足。

2 马寅初（1882—1982），回族，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人口学家。1901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选学矿冶专业。1906年赴美国留学，先后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先后在北洋政府财政部当职员、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1919年任北大第一任教务长。1929年后，出任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兼任南京中央大学、陆军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1949年8月，出任浙江大学校长。解放后，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51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60年1月4日，因发表《新人口论》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1979年9月，平反后担任北大名誉校长。



准备期，中央政府即华北政府脱胎而来，华北政府的一些建制，就是建国后中央政府一些建制的前身。所谓“华北税务学校”，就是“中央税务学校”。由于当时中央财政部的税务总局还没成立，还没有从原华北政府转过来，还叫华北税务总局，所以一开始隶属于华北税务总局的税务学校只能称“华北税务学校”。其实这个学校的所在地已经就在中央所在地的北平市了，所以这次所谓“改名”，未若说是“正名”。

一所学校在命名时，冠以“中央”二字，是不多见的。就当时的背景看，这是由两个因素促成的：

一是如上所述，华北人民政府1949年10月底即因中央人民政府已成立而在名称上取消，各部门转换成中央政府的机构。1949年11月28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复函财政部，同意以原华北税务总局为基础，组建全国税务总局。同年12月16日，政务院任命曾经担任过华北税务总局局长的李予昂为财政部税务总局局长，任命担任过原国民政府财政部直接税署署长的崔敬伯为财政部税务总局副局长。1950年1月1日，财政部税务总局正式



1950年中央税务学校第一期税政三班全体同学毕业合影

成立。因为华北税务学校属于华北税务总局，总局成了中央政府的，税校也就随之成了“中央”字头的了。

二是中央高度重视税务干部和人才的培养、教育。

在1949年11月24日至12月10日召开的首届全国税务会议上，研究了税务机构和税务干部队伍建设问题，并拟定了《全国各级税务机关暂行组织规程（草案）》。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在会议上的讲话中就税务干部问题作了重要指示。朱德副主席指出：建立新税制是一件大事，干部不足以后还会提得力干部到税务部门来，税务部门也要办训练班。

陈云副总理指出：税收任务加重、应该增强干部的意见是对的。其途径有四条：一是从上边调动，二是在下边要求党政部门给予配备，三是收集、使用旧职员，四是吸收青年学生。

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薄一波在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税务机构问题时提出：“财政部税务总局的工作是检查各级税务制度、任务、政策，交流各地经验，培养税务干部。”

中央领导同志都十分关心经济建设方面的人才培养问题，人才匮乏导致人才的急需，正是由于对税务干部的急需，1950年1月30日，政务院以通令发布的《关于统一全国税政的决定》中，一共提了五条，其中有条是关于税务机构和税务干部队伍建设的规定的，特别是在第五条中提到：

“中央税务总局，除扩大税务学校，积极培养干部外，应再注意督促各区税务管理局及各省市税务局，开办短期训练班，注意补充缺额人员，提高干部政策与业务水平。”

在政务院的通令中要求财政部税务总局扩大税务学校的办学规模，这是学校莫大的荣幸，也是学校发展的一个机遇，更增强了学校为国家大量地、快速地培养经济建设方面人才的责任感。

通令发布后十几天，财政部指令学校更名，于是中央税务学校的名就通行天下了，这对后来的中央财经大学而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以后的岁月里，校名几经变化，如中央财政学院、中央财经学院、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中央财经大学。尽管各个不同时期的校名多有变动，但是，“中央”二字始终保留。这一方面反映了学校在全国经济人才培养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中央”二字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增强了中财人的自豪感，也增强了中财人的使命感。中财在其前身的创建初期，就表现出鲜明的与国同体之特质，是培养经世济用之人才的摇篮。

在华北税务学校即中央税务学校成立前后，全国其他地方也建立了几所税务学校，它们都是以中央税务学校税务分校的名称出现的，如：中央税务学校华东分校（上海商学院的前身）、中央税务学校中南分校、中央税务学校西南分校、中央税务学校西北分校，根据现有资料分析，这些学校和中央税务学校并没有组织之间的关系，中央税务学校只是起业务上的指导作用。前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曾担任西南分校的校长，后来到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学习过，这也是中财人把他称为校友的原因。

八、校歌嘹亮

中央税务学校“正名”后，随即确定了校训、校歌并设计制作了校徽（见附图）。

校训仍然为华北税校时的“忠诚朴实、廉洁勤能”。八字校训印制在学

员的结业证内（见附图），也嵌入校徽之中。校徽：为圆形，右边缘有齿轮，左边缘有麦穗，中以蓝为底色，像蓝色天空，有红旗飘扬其间；上方为校名，底边是校训，入校后发给每个学员佩带在左胸前。为了节约，校徽是“接力”使用的，即第一期学员结业时，留下校徽，后面的学员接续使用。

校徽亦印制在结业证之封底（见附图）。



中央税校校徽



1951年学员结业证



1951年学员结业证封底

国有国歌，军有军歌，市有市歌，厂有厂歌，校有校歌。各行业各地区各单位的歌，都是为了塑造和展示自己的形象，大学校歌也不例外。校歌是一种宣示，宣示着自己的立校宗旨和传统，也是一种号召和承诺，对

于学生的成才，对于学校的建设，校歌犹如学校的精神图腾，与校徽、校训等相得益彰。其作用概括说来有二：对内，以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对外，以展现风貌，广告天下。

同时，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内容之一，为了继承文化传统，发挥礼乐文化的功能，中央税务学校极为重视校园文化建设，学校成立不久，就制定了由阿真作词、陈方千¹谱曲的校歌。歌曲雄壮愉快，弘扬了时代主旋律，鼓舞了莘莘学子的士气。校歌的歌词是：

伟大的人民的力量
有谁敢来阻挡
新的中国放出万丈光芒
经建大业落在我们肩上
我们有钢铁意志
接受财政的重担
我们有合理税制
推动社会的生产
我们是忠诚的人民公仆
我们是廉洁勤能的税工人员
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
向着建设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奋斗向前
我们团结起来
奋斗向前

歌词写好后，在选择曲作者方面，学校极为重视，找到了当时北京电

1 陈方千（1920—1985），北京电影制片厂著名电影导演、演员、音乐工作者，参加编导并执笔了《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洪湖赤卫队》等多部电影作品；艺术片《欢天喜地》电影音乐的创作者。

影制片厂的陈方千。陈方千在为学校谱写曲子时，并不像后来那样出名。当时，他的成名作品《洪湖赤卫队》等尚未问世。让陈方千谱曲，反映了当时学校领导的独具慧眼。

中央税校校歌

F 2/4 (雄壮愉快)

阿 真词
陈方千曲

5 1. 1 | 3 1.3 | 5 . 6 | 5 0 0 5 | 1 5 |
伟大的人民的力 量 有 谁 敢

3 1 | 5 - | 5 0 | 6 . 7 | 1 | 1 7 . 6 |
来 阻 挡 新的 中 国 放 出

5.5 6 5 | 3 - | 1.5 1 2 | 3 6 | 5 5 5 2 3 |
万丈光 芒 经建 大业 落 在 我们的 肩

1 - | 5 5 | 1 - | 3 . 2 1 2 | 3 2 . 3 |
上 我 们 有 钢 铁 意 志 接 受

5 6 . 6 | 5 3 | 2 - | 2 0 | 6 6 |
财 政 的 重 担 我 们

6 - | 1.6 5 6 | 3 2 . 3 | 5 6 . 6 | 1 5 |
有 合 理 税 制 推 动 社 会 的 生

6 - | 6 0 5 5 5 | 1 7 | 6 5 . 5 | 6 . 5 4 3 |
产 我 们 是 忠 诚 朴 实 的 人 民 公

2 6 6 6 | 2 3 | 4 6 6 | 5 . 5 2 3 | 1 0 0 1 |
仆 我 们 是 廉 洁 勤 能 的 税 工 人 员 在

1 1 | 1 . 6 | 5 3 | 3 5 . 5 | 1 2 |
毛 泽 东 的 旗 帜 下 向 着 建 设

3 3 2 | 1 2 . 3 | 5 6 | 1 . 6 5 3 | 2 5 5 |
新 民 主 义 的 道 路 奋 斗 向 前 我 们

1 . 2 | 3 5 (渐慢) 6 . 5 | 6 7 | 1 - | 1 - ||
团 结 起 来 奋 斗 向 前

九、财税干部培训的主阵地

统一全国税收之后，加强税收工作的关键是要提高干部的政治和业务

素质。当时，各级税务机关干部人数迅速增加，新干部比重极大，训干工作迫在眉睫，中央税务学校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了这一重任。在财税干部培训的过程中，中央税务学校发挥了主阵地的作用，始终处在一个主导和指导的地位。可以说它是全国财经战士的“黄埔军校”。中央税务学校的重要地位从以下事件中可见一斑。

第一，全国税务总局局长李予昂兼任校长。

第二，全国税干教育会议由中央税务学校组织。

1951年3月20日至4月6日，财政部在北京召开第三届全国税务会议。财政部副部长戎子和、财政部税务总局局长李予昂在会上讲了话。会议总结了1950年税务工作的基本经验，提出了1951年税务工作的基本方针。会议建议：“由税务总局协助中央税务学校召集全国税干教育会议，以便讨论分层训练税干教育方案、课程内容及教学方法等问题”¹。经过中央税务学校的积极策划和紧张筹备，1951年6月第一次全国税干教育会议顺利召开。

第三，确立了中央税务学校的业务指导地位。

第一次全国税干教育会议通过了《关于全国分层训练税务干部的方案》，明确指出：“中央税校与各分校（其他地方税校）及分校与各级训练班，均为逐级业务指导关系”²。

第四，中央税务学校的课程内容由全国性会议制定。

第一次全国税干教育会议通过了《关于税务学校及训练班课程内容的规定》，在课程内容规定方面，对中央税务学校课程内容单列条目，课程内容分三大部分：政治政策课、业务课、专题报告。

第五，从全国税务干部训练分工看，中央税务学校训练对象层次最高（见表1-1）。

1 《税工研究》，1951年第8期，第7页。

2 《税工研究》，1951年第8期，第13页。

表1-1 全国税务干部训练分工表

训练机构	训练对象
中央税校	专区局长级，省、市科级、华北县局级干部，并培养专业技术干部。
各区分校	县局长级，重点所、股长级和省市、市股长级干部，并培养专业技术干部。
直（区）辖市训练班	本市干部。
省（区）局训练班	专区、县、所、股长级干部。
省辖市训练班	本市一般干部。
专区训练班	一般干部。

十、学用结合的办学风格

中央税务学校在办学过程中，有着鲜明的办学风格，对中央财经大学凝重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的形成，开了良好的先河。这种鲜明的办学风格可以用三句话概括：学以致用，活学活用，速学速用。

首先，学以致用。这是学校一以贯之的办学思想。我们可以从学校课程的设置中看出，在政治政策课程设置中，除了“社会发展史”和“中国革命问题”这些理论课程以外，学校还开设“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财政税收政策”、“全国税收实施要则”这样的课程，既宣传学习了党的方针政策，又有针对性、时效性。

业务课程的开设更是如此，税收班课程有：各种税法（工商业

税、货物税、印花税、地方税），税务会计，税收计划概论，税务检查概论。

会计班课程：税法，会计学，税务会计，查账实务。

专卖班课程：专卖政策和法令，专卖实务，专卖会计，专卖计划和统计。

统计班课程：统计学与税务统计，税源调查方法等。

其次，活学活用。灵活教学、教学互动、教学相长是基本的教学特色，中央税务学校在探讨教学规律，寻求科学的教学方法方面，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时至今日，仍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例如：在政治政策课程的教学中，教学原则有二：一是少而精，重点突出；二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特别是结合自己的思想认识。

同时，学校规定了政治政策课程的五大教学步骤。

第一，预习。每一单元学习前，校部先召开教学准备会议，通过提纲，明确重点，逐级布置，使学生先了解本单元的重要性及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第二，上课。注意把学生思想状况、学生情绪和内容相结合。

第三，自学。要求学生精读文件，联系实际，大胆怀疑，反复思考，互相启发，交流心得，汇集问题。

第四，讨论和解答问题。学生互教、互学、互助，自由辩论，明辨是非。

第五，复习和小结。

业务课程的教学也始终贯彻活学活用的教学思想。学校规定了业务课程的四大教学步骤。

第一，讲授。一种是先由教员作启发式发言或一般讲课，后进行讨论，最后解答疑难问题；另一种是课前布置有关参考文件，提出问题，最后进行讲授解答。在一般情况下，前者适宜于新生班，后者适宜于调干及研究班。

第二，经验介绍。这是一种总结工作、交流经验、互教互助的学习方

式，报告前学员拟出报告提纲，报告后大家漫谈、讨论，指出优缺点，最后主讲教员总结。

第三，作业。由小组互阅或教员抽阅。

第四，实习和参观。

再次，速学速用。开国之初，百业俱废，百业待兴，人才是最宝贵的。为了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税务总局规定，学习时间不宜过长，除招收新生及以会议方式训练时间得酌情自行规定外，干训均以两个月至半年为限。《中央税务学校一年半来教学工作概况介绍》提到：

“1949年受命筹办税校任务时，是处在无干部，缺经验，少地址的情况下进行的。11月18日迎接新生407人入校（不含调干生，一期调干生67人，新生一部分为华北大学毕业生），于12月15日正式开学，原定计划3个月，重点为政策、业务学习（学员在华北大学已上6个月政治课，学员思想获得初步改造），后因干部需要过急，只上2个月，即于1950年2月底分配工作（大部南下）。”“二期学员是一期毕业前在寒假中招考的新生，有311名，另有调干生152名，共463名，新生中大部分是失学、失业者，或伪军官、职员等。……于10月底毕业。三期学员计有9月招考10月入学的新生212名，调干生211名。……原定一年毕业的，由于工作需要，缩短2个月。”¹

四期学生中，新生238人，调干生210人，经过严格的培训，也很快走上工作岗位，奔赴财经前线。

中央税务学校总共培养学生1800多人（在统计学生人数时，由于当时学生流动性相对较大，造成入学人数和毕业人数不一致，也由此造成校史材料中数字的差异——编者），这些学生都成为新中国税务工作的开拓者、骨干力量和业务工作者。

1 《税工研究》，1951年第8期，第22页。

表1-2 中央税务学校毕业生人数表¹

学习时间	毕业人数		
	新生	调干生	合计
一期	403	67	470
二期	272	152	424
三期	213	214	427
四期	238	210	448
合计	1168	640	1808

十一、有特色的教学经验

当时国家税务人才匮乏，税务教育人才也奇缺，由财政部税务总局直接领导的中央税务学校，管理者的配备还是较具强势的，比如校长由总局长李予昂兼任，第一、第二期的专职副校长是李永江，以后是张靖。学校还设正、副教育长各一人，分别为何方明、宋明祥。校部设秘书室、教务科、组织科、总务科、教研室、图书馆。校部下设税政、专卖、研究等班次，各班有班主任和干事。1950年下半年在91名教职员中，专职教员仅2人，教学辅助人员11人（包括各班教育干事及教研室人员），²仅有两个专职教员的一个国家级的学校，如何办学呢？

在办学经验不足、缺乏师资的情况下，学校不但办起来了，而且还办出了成效，这是因为中央税务学校师生在党的关怀与指导下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经过艰难的探索，走出了一条有特色的办学道路。国家税务总局局长兼税务学校校长李予昂在1951年6月21日第一次全国税务干部

1 光盘 1950-JX13.11-0002 1951-JX13.11-0002。

2 档案资料：4-XZ-1957-7-2。

教育会议上，总结中央税务学校的办学经验时指出，我们之所以取得初步的成果，主要在于：

第一，加强政治教育（阶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品质教育），改造思想，这是使税务干部提高觉悟，决心为人民服务的关键，同时亦是决定教学好坏的基本因素。

第二，课程少而精，是办好短期的速成的专业训练的最有效办法。经验证明，凡是课程定的繁多，教学双方的必然结果总是费力大，收获少。

第三，明确教学步骤，是保证学习深入的必要措施。教学步骤有6点：课前预习，课堂讲授，整理笔记，阅读材料，思考，辅导。

第四，一切工作围绕教学，面向同学，是办好学校的主要环节。

第五，发动与组织学生，自我教育，互助学习。组织形式有：学生会，互助组（小先生组），留学制（到其他院校学习）。

第六，加强教育工作者的学习，聘请适当教员与小组长，及培养辅导、研究、助教等人员，是达到深入教学目的的不可偏废的重要工作。

这个办学经验的总结，首先提到的、也是李校长认为最为成功的关键要素是“加强政治教育（阶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品质教育），改造思想”。国初《共同纲领》中就提到：“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适应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几乎和李校长作这个总结的同时，甫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先生也提出要在北大发动一次有组织、有系统的学习运动，通过思想改造来推动学校改造。李校长这个报告后五个月的11月30号，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到1952年的1月，全国各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便广泛地开展起来了。¹由此可见，税校的成功要素和办学要素，是与党的办教育理念完全一致的，这种同质同

构的特点，愈加表现出中财之办学与国同命运，与党共呼吸的特征。

“课程少而精”被认为是专业教育“最有效办法”，这是与当时经济人才急需的社会现实分不开的。人才的快速培养，必然要减少教育环节，所以那时的教育，特别是税校这种教育和培养专门人才的地方，就不可能有后来“宽口径、厚基础”的诉求。

“一切工作围绕教学，面向同学”的提法和对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视，是最具教育学意义的表述；同时，为了以科研促教学，在学校刚刚起步的时候，中央税务学校也开始了最初的科学研究工作。1951年，学校由狄超白主持编写了《统计学参考资料》；朗朗天主持编写了《会计系基础知识》；学校还翻译了苏联库参佐夫的《苏联的财政与税收》。教材建设成为学校最初研究工作的主流，以苏联为师，与实际结合，这种教材建设的宗旨，也成为与旧大学划界，摒弃旧教育思想、改造旧知识结构之文教改革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十二、文化补习学校——为了“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受到高等教育”

设立文化补习学校是当时特定背景下的产物。1949年12月，教育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教育部长马叙伦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总方针，他指出：“代替旧教育的，应该是作为反映新的政治经济的新教育，作为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斗争工具的新教育。这种教育是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¹为了贯彻这一方针，在这次会议上，教育部决定创办新型的以吸收工农干部及优秀产业工人为对象的文化补习学校或工农速成中学。当时有个说法，就是“使成千

¹ 朱建华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纪事本末》，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70—173页。

¹ 文辉抗、叶健君主编：《新中国第一代开国部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0页。

上万的工人农民受到高等教育”。

中央税务学校附设有文化补习学校，校长由税校校长李予昂兼任，陈健为副校长，教导主任是张光三，副教导主任是吴新智。

中央税务学校文化补习学校的办学宗旨是：对参加革命或参加产业劳动一定时期的优秀工农干部及优秀工人，施以中等学校的文化科学基础知识的教育，使其能升入高等财经院校；对不能升学者分配工作。

文化补习学校的教学指导方针着重于理论联系实际，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力求切合国家财政经济建设的需要，并且照顾工农干部的特点和要求。

文化补习学校设有三年制的中学部，相当于高中；还有二年制的初级班，相当于初中。

文化补习学校有教工22人，学生158人。

史称，这种被称为“工农速成学校”的文化补习学校，“1950年入学的许多学生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他们现有的知识是通过自学学到的，但是据说他们完成新的速成中学3—5年课程后就能进大学。教育部长马叙伦宣称在‘新制度下’，‘条条道路通向高等学校’。正规中学的毕业生不再是有资格入大学的唯一候选人，所有阶级中参加过各种短期学校和业余学校的人们这时都可以进大学。”¹中央税校的“文化补习学校”是响应国家号召建设的。这种学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补习学校，颇类于大学的预科班，这是有别于我国任何时期教育模式的、在“向工农开门”教育方针指导下的全新的教育模式。这种把工农速成学校附设在高等学校里的模式，在1951年11月教育部《关于工农速成中学附设于高等学校的决定》中被确定下来，在这个决定里明确提出，速成中学的毕业生一般即可直接升入本高等学校继续深造。

十三、朴素而多彩的学校生活

新中国建立之初，共产党自己办的大学里，物质生活是素朴而清苦的；政治生活却是丰富而多彩的。

以1952年10月为界，中央税务学校学生的生活待遇，前期实行供给制，后期实行人民助学金制。

资料显示，1950年的时候，税校第二期的学员统一享有“供给制”待遇。比如服装方面：在校期间免费发有棉服一套（蓝色中山装衣、裤、帽）、单服一套（灰色中山装衣、裤、帽），此外还发过单鞋。在伙食方面：免费享有相当于“大灶”标准的伙食。1950年这个标准的伙食结构，比起北京普通老百姓来说，已经算是较高档的了。每日青菜中都含有荤肉食，而北京百姓只有过年过节时才能买得起一点肉馅包顿饺子。当时的粮食、副食尚未实行计划供应制。最初，尚未建食堂，就在南大四合院内的方砖地上自带碗筷用餐。大食堂用木桶盛饭、搪瓷大盆盛菜（当时市场上没有铝、不锈钢、塑料等容器）。四个班各用一套饭菜容器分食。在日用品方面：发过肥皂、牙粉等等。每月还发过零用现金。

20世纪50年代初期，学生都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参与各项活动，各项政治活动精彩纷呈，校友邹大牧回忆：

1950年的五一劳动节及五四青年节，校方组织全体学员参加了北京市天安门的庆祝活动。当时天安门前长安街上的东西三座门尚保存完整，学校在青年节那天，根据大会庆祝游行的安排，从东三座门进入天安门前时，打着有“中央税务学校”校名的红布横幅，高呼“毛主席万岁”，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通过音响也喊出了“中央税务学校同志们万岁”

¹ R.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7页。

(至少有两次)来回应我们,使大家感到无比兴奋¹。

邹大牧还回忆,1950年初夏,在个人总结及自传基本审查通过后,根据上级指示,学校公开宣布了在校的共产党组织由秘密状态转向公开化的决定,张明班主任宣读了本班(五班)的党员名单,这又是一次生动的政治历史教育。

校友李天淑回忆说:

1951年8月,我考入中央税务学校税政十三班,被分配在第十学习小组学习。还是一名17岁的中学生,我就非常幸运地走进了中央税务学校这个革命大家庭。因为全国刚解放不久,我对新中国的了解很有限,对学习的目的也很模糊。在学校,除了专业课以外,首先要学习的是社会发展史和辩证唯物论,通过对这些革命理论的学习,我们逐渐明确了学习的目的是为新民主主义建设和为人民服务;学习的方法是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学习形式则保留了部分延安时期的学习传统,除上课以外,学习讨论以小组为单位,每人发个“马扎”,大家围坐在宿舍或院子里进行热烈地讨论。那时我们实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冬天每人发一套棉衣,夏天发两套单衣,每月还有六元钱的生活费,这些钱已完全能够满足个人的生活和学习必须品的开支。

学校的学习生活是丰富多彩的,除上课和讨论以外,经常出黑板报,大家都踊跃投稿,记得我写的一篇题为“祖国”的散文曾刊登在第一期的黑板报上。每个周末都要举办舞会,师生都参加;不定期地组织看电影等活动。学校也很注意让我们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如1951年9月在天津举办华北地区物资交流会,学校组织全校同学前往参观,使大家很受鼓舞,让我们感受到解放后短短的时间内,在党的领导下,全国生产力空前高涨,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当年十月一日国庆节全校师生参

加大游行,通过天安门时,我平生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主席,他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起帽子向游行群众问好,我们的心都沸腾了。晚上,我们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大学生狂欢,望着天空中的朵朵焰火,真是天上人间连成一片,很晚很晚我们才回到学校。学校还经常组织我们参加一些报告会,如当时的税务总局副局长崔敬伯和时任周恩来总理的政治秘书焦若愚都给我们做过专业教育和政治形势的报告,鼓励大家努力学习,改造世界观,以后为祖国的税收事业贡献力量。在沙滩原北大红楼广场,我们还参加了朝鲜战场的战斗英雄张积慧的英雄事迹报告会。1952年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同学们参加了北京市税务系统的运动,被分配至北京市各区税务分局协助工作,我们参加会议、刻钢板、整理材料等,通过这些革命实践活动,我们认识到解放初期阶级斗争的严酷现实,大家同时也提高了自身的政治觉悟¹。

十四、制度建设

1951年6月7日,学校公布《中央税务学校暂行章程(草案)》(原件保存在中财档案馆),供大家讨论。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1951年10月8日,学校制定、公布了《中央税务学校暂行章程》,章程分为总则、组织、学制、会议、奖惩、附则六大部分,共计32条款。主要内容是:

学校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学方针,在加强政治思想认识的基础上,一面提高税务系统(包括专卖)在职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一面改造青年知识分子与留用税工人员,以培养新民主主义税务、专卖的专业干部为宗旨。本校着重训练全国省(市)税务局科长级,与酒业专卖公司分厂长、分销处主任、股长级在职干部及具有相当技能的

1 邹大牧:《大学回忆录》,参见“中财校友网”,2008年10月8日。

1 李天淑:《母校,我人生启航的港湾》,参见“中财校友网”,2007年7月2日。

专业税工人员，同时也招收城市青年知识分子，培养华北区与没有税校的大区所需一般税工干部。

章程规定学校设正、副校长，正、副教育长，下设各科、室、馆等，组成校部。部下设研究、税收、会计、统计、专卖等班次（必要时分为若干系），并设文化补习学校。

学校各专任与兼任教授、教员各若干人，均由校长报请中央税务总局聘任，并呈报中央教育部备案。

学习期限：研究班（3—6个月）；税收班（新生一年、调训半年）；会计班（一年）；统计班（一年）；专卖班（半年）；附设文化补习学校（分为甲、乙、丙三班，期限二年）。

校友邹大牧回忆了他考入中央税务学校的经历：

当时校方要求要有两名先进人士的书面介绍函及有关证件方可报名、领取准考证应试。1949年11月党团成员尚未公开，幸好我找对了介绍人，后来经报名考试才被录取。在这之前的1949年夏，我曾因找错了介绍人，而被当时校址在正义路路东的某外国语学院拒绝。报名后持准考证于1949年初冬的一天（具体日期记不清了）在北京东城区沙滩原北京大学红楼二楼西头教室进行考试。入学考试科目有：政治常识、语文、数学等。1949年12月收到学校发出的录取函，原录取函中规定入学日期为1950年1月，但因为第一期学员结业期限推迟，故而被通知延期。正式入学日期为1950年3月初。我们是中央税务学校第二期学员。第二期学员共分四个班，即第五、六、七、八班，我被分在第五班，每班约有学员35人。显然第一期学员共有一、二、三、四班¹。

关于学生的管理。学生报到时，其未能交验证件（除有正当理由者外）或证件不合，或像片不符者，取消其入学资格；新生入学时，应填写

志愿书、注册表、调查表等，并填交保证书。保证人须具有正当职业并担负学生在校期间之一切责任；新生所交证明文件，如有伪造、假借、涂改等情况，一经查明，即取消其入学资格；如于毕业后始发觉有上述情事者，取消其毕业资格，追缴毕业证书。本校学生必须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政治认识，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残余，树立科学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及革命的人生观，发展为人民财政税收事业服务的专业化思想；本校学生必须积极学习，认真钻研有关政策业务的理论与技术；本校学生均应自觉地遵守学校纪律与学校管理规则，并树立“忠诚、朴实、廉政、勤能”的优良作风。据邹大牧回忆，对学生的管理，的确如此。学生入学后，要写个人简历，写个人政治、思想、历史总结。个人总结及自传要经班、组及校方审查通过合格才行。还要进行政治审查，包括是否参加反动党团组织¹。

关于教学。章程规定：（1）理论与实际一致。课程设置必须切合工作需要；教学内容必须贯彻爱国主义与科学精神；教学方法必须适合对象；理论的教学必须与自修实习相结合，并且注意联系实际思想与实际生活。（2）本校为提高教学效能，发扬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并使其在实际生活中能运用所学的知识，采用下列教学方式：教员讲授；指导学生自学、参观、实习、讨论及总结；研究班以自学辅导为主，讲授报告次之，着重政策业务学习及总结工作经验；税政、会计、统计、专卖等班次，政治课以讲授辅导并重，业务课以讲授为主，结合作业参观实习；为加强集体生活的锻炼及进行政治与业务的学习，各班学生得依课业性质分编为若干学习小组。

关于课程设置这一问题，章程的具体规定如表1-3。

1 邹大牧：《大学回忆录》，参见“中财校友网”，2008年10月8日。

1 邹大牧：《大学回忆录》，参见“中财校友网”，2008年10月8日。

表1-3 1951年中央税务学校课程设置情况一览表

教学环节	具体规定
教学时间	每年为四十周，每周六个学习日，每日学习不得少于八小时（包括实习、参观及固定的自修时间），亦不得超过九小时。
研究班必修科目	实践论、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财政税收与财政税收政策、全国税政实施要则、苏联税制介绍。业务课有：各种税法及稽征办法（以工商、货物、地方、印花等税为主）。
会 计 班 、 统 计 班、 专 卖 班 必 修 科目	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问题（包括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财政税收与财政税收政策、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业务课有：会计学原理、查账实务、税务会计、税法、税务统计、专卖政策、专卖法令与实务、专卖会计、专卖计划与统计。
税政班必修科目	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问题（包括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财政税收与财政税收政策、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业务课有：各种税法（以工商、货物、地方、印花等税为主）、会计学基础知识、税务会计、税收计划工作、税务检查工作、苏联税制介绍。

续表

教学环节	具体规定
会议（备注：各项会议，必要时均可召开临时会议。其他各组织团体之会议及活动，一般均可占用晚上时间，尽可能不占白天学习及办公时间）	校务会议每半月一次，议决学校有关行政教学之重大问题。月初（1至3日）会议，着重检讨总结上月工作，计划布置本月工作；月中（15日）会议，着重工作检查，解决问题、纠正偏向等。会议由校长或副校长主持，出席者为正、副校长，正、副教育长，正、副科长，班主任，学生会主席，必要时可以请税务总局有关负责同志参加指导。
	教务会议：每十日一次。
	科（室）务会议：每周一次。
	班务会议：每周一次。

除了学校办学的根本大法《中央税务学校暂行章程》外，1951年11月，学校将各种制度汇集成册，制度、规定共计23种，名列如下：

《办公守则》、《会议制度》、《工作人员请假规则》、《油印工作制度》、《会客规则》、《出入制度》、《医疗规则》、《礼堂使用借用暂行办法》、《礼堂守则》、《自行车出入制度》、《电话使用守则》、《教室规则》、《爱护财物规则》、《勤杂人员管理教育》、《汽车使用暂行办法》、《领发经费制度》、《经费财务批报制度》、《包干制人员家属招待办法》、《灯、水、电管理办法》、《茶炉守则》、《领发制度》、《食堂灶定饭办法》、《学员大灶伙食管理办法》。

这一年，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根据政务院规定的《公文种类》，学校还通过了《中央税务学校公文处理办法（草案）》。

管理规则之多，内容如此之详尽，表明学校的管理工作有着一种很强的规范化和可操作性的诉求，细读这些规则，会有三点突出的印象。第一，学校当时的管理具有强烈的准军事化色彩，比如在《教室规则》中规

定：“学员上课前，以班、组为单位，整队进入教室，按指定地点就坐，进入教室必须脱帽，教师进入课堂时，听主持人口令，一律起立，表示对老师的尊敬，讲课毕，经主持人宣布下课，俟教师离开课堂后，再依次出教室。”第二，学校与税务总局的隶属关系表现得十分鲜明。比如《中央税务学校工作人员请假规则》，依财政部及税务总局的“请假规则”而制定，校长、教务长请假一天者，报税务总局批准；科长级干部和教授教员请假三天以上者，报税务总局批准；各单位设专人负责考勤，每季度由学校组织科汇总，填具“请假动态季报”，报请总局备查。第三，从总体上看，颇觉繁冗细密。一方面表现出学校管理者对学校结构稳定的考虑；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探索中的制度建设的求大求全。

十五、关于中央税务学校（含华北税务学校）性质的考辨

中央税务学校到底是否属于高等学校？这是有必要考辨一下的。我们说中央财经大学之前身的中央税务学校是新中国自己创办的第一所财经类高等院校，这有充分的依据么？在一些相关史料及晚近的资料中，鲜有详细论证，这有时引起好事者的质疑，为了“正名”，廓清物议，有必要在这里做一点考辨性的工作。

中央税务学校显然不是民国时期的大学性质，如果从归类角度说，它应该属于“解放区的大学”一类，日本学者大塚丰在《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形成》一书中有专章介绍解放区大学的体系，他认为解放区大学可分为两种形态，一种是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为代表的专门培养军事干部的机构，他称之为“抗大型”大学；还有一种是与军事无关、培养掌握各种专业知识技能的干部的，这以延安大学为代表，他称之为“延大型”。他说：“不论哪一种类型，都是学习期短，强调‘学以致用’，‘教育同边区的各种实际活动相结合，为抗战和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

建设服务’。”他说这类大学“与新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形成有重要的关系。”¹中央税务学校从建制上看，显然属于“延大型”的学校。

中央税务学校在其《章程》中的“总则”部分中写着：“本章程……参照中央教育部专科学校暂行规程而制定。”这说明它是按大专的规程办学的。

从当时对入学生源的要求来看，它主要是招收具有高中以上学历或高中以上同等学力者。如章程规定：(1)研究班调训生，由中央税务总局抽调各地省市税务局科长级在职干部或具有相当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年龄40岁以下者。(2)税收班招考生，年龄在17岁以上27岁以下，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曾经在公（私）立高级中学毕业，有毕业证书或升学证明书者；曾经在公（私）立高级职业学校及其他相当于高级中学毕业，有毕业证书或升学证明书者；具有以上程度之失学知识分子与失业店员有证明文件者；具有高级中学毕业的同等学力有下列证明者，即县级人民政府或人民政府教育行政机关之证明、县以上工会或解放军团以上政治机关之证明。(3)会计班、统计班招考生，须具有高中程度或同等学力，曾从事税务工作或会计统计工作满二年，具有相当税收专业知识（如会计、查账、统计、各种税务等），身体健康，年龄在40岁以下者。(4)专卖班调训生，由专卖事业总公司统一抽调各地分厂长、分销处主任以上在职干部。²

当时（1949年10月）华北人民政府颁布了《华北专科以上学校一九四九年公共必修课过渡时期实施暂行办法》和《大学专科学校各系课程暂行规定》，分别规定各年级必修“新民主主义论”³等课，在中央税务学校的课程设置中，“新民主主义论”是重要的政治理论课之一。

由此可见，1949—1951年的中央税务学校虽不能说是正规的高等院校，但完全可以说是共产党主持之高等教育逐步正规化阶段的、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财经类学校。建国初期它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财经

1 （日）大塚丰：《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形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

2 参见《中央税务学校章程》。

3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页。

干部，而在解放区“延大型”大学逐渐走上正规化道路的同时，我们也逐渐过渡成为“全日制大学”。

第二节 从中央税务学校到中央财政学院

一、筹办中央财政学院

正当中央税务学校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事业如火如荼之际，学校又面临着一次新的发展机遇。为了加强高等财经教育，1951年7月，财政部开始筹备建立中央财政学院。凌大珽先生参加了当时的筹划工作，他说：

1950年税务学校成立一段时间后，这个财政部啊，薄一波是我们财政部的部长，但薄一波基本上在财委办公，他很少到财政部来。当时副部长戎子和选了三个人，一个叫李涉，他是军需学校毕业的；一个叫张靖，好像在中国大学学过几个课；一个就是我，组织一个三人小组，负责筹备财政学院。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开小会，地点就在财政部，他们两个人就对我说你不是在学校里面呆得时间长吗？那你就起草一个计划吧。起草计划呢，我的脑子里就只有旧大学的办法，我想那就只好起草一个组织计划吧。之后呢，当时全国政协参加全国的土改，他们政协让我去，我就去了广西，一去就是一年……

凌先生去广西之后，中央财政学院还是办起来了。

1951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1951年第56次部务会议正式决定建立中央财政学院，此次会议正式通过《筹办中央财政学院方案》，方案规

定：中央财政学院暂设财政、税务、会计三系。¹

中央财政学院在一无场地、二无师资的情况下，自然想到了财政部属下税务总局直属的中央税务学校，筹建中央财政学院的重任就历史地落在中央税务学校的肩上，《筹办中央财政学院方案》规定：中央财政学院以中央税务学校为基础，扩充筹设之（须增设教授、教员、助教及行政干部），一俟筹备就绪，即更名为中央财政学院。本年招生计划，除按照中央税务学校1951年招生的计划，继续招收300名至500名学员外，并再招收200名学生，进行专业训练。中央财政学院由中央财政部领导，并受中央教育部之指导。²于是从这一年的9月开始，西皇城根22号院也成为中央财政学院的校址。

因为时间紧，中央财政学院一面在西郊四道口兴建校舍，一面在22号院内建筑楼房200间，作为临时校舍。³从1951年9月到1952年6月中央税务学校正式并入中央财政学院为止，西皇城根22号院门前悬挂两块牌子，飘扬两面大旗，两校学生同时在一个校园生活、学习。中央税务学校一身两任，这对中央税务学校来说，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拓展。



罗青

二、大学正规化过程中的第一次提升

中央财政学院于1951年9月开学，最初只设企业管理系和会计系，由教育部招生委员会分配了72名高中毕业生，其中企业管理系54人，会计系

¹ 《筹办中央财政学院方案》，材料见中央财经大学档案馆：新制作校史档案光盘，第一盘，1952年。

² 《筹办中央财政学院方案》，材料见中央财经大学档案馆：新制作校史档案光盘，第一盘，1952年。

³ 档案资料：4-XZ-1957-7-2。

18人,当时学院只有干部24人,无专任教授。¹不久,学院设立财政、税务、会计三个系,招生对象为年龄在18岁至25岁,高中毕业或具有同等程度者,或参加革命工作三年以上的县科、局长级财政、税务干部并且有相当于初中文化程度年龄在20岁至35岁者。

学院共招收学生482人,学院教工159人。

学院院长暂缺,副院长由财政部物资管理局局长罗青兼任。学院设党支部,隶属财政部机关党委,凌先生采访录中提到的李涉同志²任党支部书记。

三、中央财政学院院址



1952年税政班同学在西皇城根22号校址合影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39号,如今中央财经大学的校园,就是中央财政学院当年选择的校址,这里是众多中财人魂牵梦绕的地方。地方虽然不大,但“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一批又一批中财人走进校园,留下青春的脚步,挥洒着辛勤的汗水,播种着美好的希望;一批又一批中财人走出校园,收获着硕果,成为祖国建设的栋梁。今天,当我们置身美丽的校园,不少人可能不

知道她昔日的苍凉。据校友介绍,学校刚刚建设时,校址周围都是农科院的试验田或农民的农田。校东有京包线(南北向)及元大都土城岗。校北面铁丝栅栏外,隔农田不远处,有松树合围成的大清御膳房厨师墓地,1953年时为原貌,尚未拆迁。南校门外,东西向道路南边,当时有大片农田及简易坟地、空旷的草地,偶有几棵大树。1955年5月,崔敬伯教授有五首《采桑子》写“财院剪影”,其中一首的下阕是这样写的:“凭高教室临郊野,槛外田园,窗外青山,开拓胸襟眼界宽。”¹诗中的财院如田园居,远离市廛,野旷气清。当时北京铁道学院(现北京交通大学)及居民小区均尚未建设。从西直门到学校不通汽车,节假日进城,学生都是沿着乡间小道步行约半小时至西直门,到动物园也是步行往返。学校门前有条窄马路与魏公村一条南北公路相连,但没有公共汽车。

后来随着校园的不断建设和周边环境的不断改善,面貌大为改观。据中央税务学校一期毕业生王万有先生回忆说:

中央财政学院选址西郊四道口(学院南路39号),当时这一带全是农田,按照北京市的规划,这一地区为教育区,新建的高等学校主要在这个地区,中央财政学院是这一地区最早建校的,因为这一片地,地势最高,就选了这块地。校园占地280亩。中央财政学院校园1952年开始兴建,1953年暑假后建成。当时的主要建筑有四合院,教学楼,礼堂,友谊楼,第一教室。校园幽静、美丽,特别是东楼、西楼、南楼、北楼围成的四合院,是花园式建筑,楼体建筑为俄式风格,房间高大、宽阔、木地板,四幢楼格局为中国北方庭院式风格,温馨、静谧,1954年《北京日报》曾经以一个整版的版面介绍了四合院的全景。

到了60年代,校园愈发漂亮,会计系62级校友易仁萍回忆说:

1 档案资料:4-XZ-1957-7-2。

2 1951年2月—1952年8月,李涉为新成立的中央财政学院党支部书记。在此以前,李涉曾经从事过税务干部培训工作。

1 《静泊诗词选》,第14页。

当年的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校园是一个漂亮的四合院。当时只有财政、金融、会计三个系，校园面积显得不大也不小。校园里只有东西南北四个楼，……校园中央（也就是今天的主教位置）有一个大水池，水池里有假山，那里是学生们经常去玩的地方。水池周围都是风景别致的花园。一到春夏，花园里的花朵竞相绽放，蜜蜂蝴蝶相约起舞，煞是一幅喧闹的鸟语花香之景。¹

许多80年代在学校学习和工作的中财人还会记得，校园的主要建筑那时还在，基本格局未变，虽然历经风雨，但是风韵犹存，只是后来由于建设的需要，受校园空间的限制，不得不把“四合院”拆除了。

四、中央税务学校光荣地完结

早在1952年3月，中央财政学院就决定与中央税务学校合并，并一直在酝酿、准备中。

1952年6月27日，对中央税务学校和中央财政学院来说，都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两块牌子共存的局面宣告结束，财政部决定中央税务学校正式并入中央财政学院，并将这一决定送中央教育部和北京市文教局备案。²至此，中央税务学校的历史划上了完美的句号。但是，学校的历史没有结束，它又踏上新的征程。中央税务学校虽属高等学校，但名字还不像正规大学，中央财政学院则可谓“名”也“至”矣，“实”亦“归”之。古语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可是共产党不依旧例，先不一定“正名”，但“言”不可不发；“事”不可不做。因为顺民心，则所发之“言”一定“顺”，所做之“事”一定“成”！言已

1 中央财经大学校友总会：《春华秋实》，第一辑，第69页。

2 《1994年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校史资料汇编》，第74页。

顺，事已成，则“名”就自然“正”过来了。中央税校完成了它的使命，这就是“事”已“成”；中央财政学院就是“正名”，“正”了“大学”之“名”。

五、院系大调整对中财意味着什么

中央税务学校和中央财政学院合并后，当师生们还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蜜月”还没有度完，就赶上了1952年全国范围内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

院系调整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教育史上的大事件。早在1950年6月1日，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我们要在统一的方针下，按照必要和可能，初步调整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或其某些院系，以便更好地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同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

1952年教育部按照中共中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¹的方针，拟定发布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1952年的调整设置方案”，仿照苏联高校模式，以华北、华东和东北三区为重点，实施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这次调整的特点是：除保留少数文理科综合性大学外，按行业归口建立单科性高校。部门办学与单科办学几乎成了新中国高等教育的一大特点并因此而形成传统。关于这个问题及其对中财的影响，将在本章小结中再作详述。

从1952年4月开始，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被全面调整。调整的内容包括院系合并、院校增设、专业调整等；私立大学全部改为公立；教会学校

1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46页。

一律撤销；由中央统一调配师资、校舍和设备；整顿综合性大学，发展专门学院，其中首先是高等工业学院和高等师范学院；对政法、财经院系予以适当合并集中。到1952年末，全国3/4的院校完成了调整工作，其中以华北、东北、华东三个地区的调整较为彻底，形成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

经过这种调整，虽说改变了旧中国高等教育中工科过于薄弱、师范缺乏的状况，但也确实造成了“高等教育长期文理、理工分家，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相割裂，给培养的学生带来了思维方式的缺陷和知识面的偏颇。”¹

但是，不管怎么说，在这次全国范围的院系大调整中，中财还是获益的。根据调整方案，由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经济系财经部分与中央财政学院各系科合并成立了中央财经学院。

至此，1952年6月27日才与中央税务学校整合的中央财政学院，到8月23日，又重组、重建，并且有了新的名字：中央财经学院。

中央财经学院成立后，其隶属关系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财政部主管，变为高教部主管。由此可见，在历史上，中央财经学院曾经直属高教部，因此，2000年中央财经大学由财政部直属改变为教育部直属，从严格意义上说，是重新归教育部直接管理。

当然，财政部对一手创建的中央财政学院，难以割舍，当时与高教部商定，新成立的中央财经学院每年要为财政部轮训干部600人。

中央财经学院的成立，应该说是院系调整给中财带来的益处，至少可以从几个方面看出，第一，它使中财成为教育部所属的单科性全日制高校；第二，它使中财汇聚了一大批著名的学者专家；第三，专家治校带来了“大学化”的制度建设；第四，它使中财暂时地做到了“去干校化”。

第三节 中央财经学院（1952年8月—1953年8月）

一、中央财经学院的筹办

中央财经学院建院之初，首先成立了筹委会，筹委会主任委员是著名的经济学专家陈岱孙，副主任委员是罗青，委员有楼化蓬、董锄平、孙揆一、李秋野、严仁赓、郑林庄、赵承信、陈达、赵锡禹、杨治安。

1952年8月23日，在中央教育部，由曾昭铨副部长主持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讨论并且决定了筹委会的任务是：研究并拟定专业系科的设置、学制和教学计划，以及人事、房舍、设备的调配等工作。

筹委会下设办公室，主任是后来在中财长期任领导职务的秦穆伯同志。

筹委会成立后，随即进行了紧锣密鼓的合并、重组工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经济系财经部分的人员陆续到达。辅仁大学校史大事记记载：“1952年9月15日，北京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正式合并，北京辅仁大学中文、西语、史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教育、心理9个学系53个班1123名学生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哲学、西语2个学系并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社会学系劳动组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经济学系合组成立中央财经学院。”

与此同时，中央财经学院的领导也逐步确立。学院设党总支，隶属于高教部党委，党总支书记秦穆伯，副书记何方明。学院院长暂缺，由副院长陈岱孙，罗青主持工作。

9月份，准备工作告一段落，学生正式开学。

二、三个校址，两处办学

¹ 周远清：《挑战重理轻文，推进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载《中国高教研究》2002年第1期。



1952年10月28日，北京日报第二版刊登的中央财经学院开学的消息。



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四合院 1956.06摄

现在的中央财经大学，多年来一直处于多处办学格局中，这可能是历史的巧合。中央财经学院成立时，也处在几处办学的状态。当时的校址有三个，一是西直门外四道口，一是西皇城根22号，还有一处是北京东城区的骑河楼。

西直门外四道口校址，也就是现在中央财经大学的所在地，因为当时尚在建设中，无法使用。到1953年10月新校舍能使用时，中央财经学院又被撤销了。新校舍归中央财政干部学校使用。新校舍能够使用时，将一部分房屋借让给人民大学，他们的马列主义研究班就设在此处，当时常有苏联专家坐轿车来教学大楼，给人民大学学生上课，许多干校学生感到很稀奇。整整两个学年，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学生和人民大学研究班的同学住在一起，直到1955年暑假，才彻底完成了人民大学的搬家工作。在学校保留的50年

代初期的档案中，我们经常看到学校的教师、学生旁听人民大学课程，人民大学与中央财经学院联合举办联欢晚会等记录。¹

当时中央财经学院的办学场所实际上只在两个地方：

一个是西皇城根22号，就是最初中央税校的校址，可以算作中财的发源地。另一处校园是在北京东城区的骑河楼，那里原来是北京大学三院（法学院）的校园。关于这处校园当时的状况，可在北京大学教授、学者张中行的一篇文章中约略相见：

出（北大）红楼东行，到汉花园东口改为南行，过骑河楼东口外，过孟公府东口外，路西墙角立个高一米上下的石碑，上刻译学馆三个大字，是第三院的东北角，前行不远就是坐西向东的拱形院门。拱形大门上有房屋，不多，可是开了个银行，名北京大学学生储蓄银行，因为行长是马寅初，据说还颇有名气。进大门，左方是一座两层的口字形楼，其时用作学生宿舍；右方是操场，记得有平整的网球场，至少是二个；操场尽头，即西端，有坐西向东的两层楼，是教室。教室南侧，地势高起，上立个柱形的大理石碑，是三一八纪念碑。其南还有一座两层的楼房，推想也是教室。这两座楼后面还有空地，只记得靠南部有一个坐北向南的宽大建筑，是体育馆，五四运动时，曾因禁被捕学生一千多人，长达三日。²

三、精英荟萃，名士云集

新成立的中央财经学院，一时之间，群贤毕至，名士云集，既有富有丰富管理经验的政工干部、老革命，又有学术造诣很深的学者，还有一些

1 档案资料：4-XZ-1956-7-3。

2 张中行：《流年碎影》，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页。

人,当时默默无闻,后来成为学界的风云人物。

中央财经学院档案馆保留的一份合并后的中央财经学院人员统计表显示,当时在学院工作的著名学者有陈岱孙、余肇池、赵人俊、戴世光、吴景超、陈达、周作红、罗志兴、姚曾荫、赵承信、郑林庄、张伟弢、饶毓苏、袁方、徐卜五、赵锡禹、杨承祚、崔书香、孙昌湘、董浩、李景汉、魏重庆、陈文仙等人。

在中央财经学院的教师群体中,有四类人尤其引人注目:

一类是已经享誉全国的经济学家。如时任中央财经学院第一副院长和财政系教授的陈岱孙¹先生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还有经济学家魏重庆²等。

第二类是大名鼎鼎的社会学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取消了社会学系,大批学者开始研究经济学,因此许多著名社会学家被调整到中央财经学院工作,如陈达、李景汉、吴景超、赵承信、戴世光、陈文仙、全慰天等。其中中央财经学院筹委会委员、后任中央财经学院教授的陈达是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³还有中央财经学院筹委会委员、从燕京大学来学院任教的郑林庄教授,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工业化与农业化的大论战中,独树一帜,提出中国应该走既非农业化,亦非立即工业化,而是由乡村工业内生



陈达

1 见后“校长风采录”。

2 魏重庆(1900—?)原名震声,号西山。浙江诸暨人。1924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26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研究社会学。1933年回国,1934年到北京,历任辅仁大学社经系、中国大学经济系教授。1946年至1948年兼任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教授。1947年至1948年兼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1952年任中央财经学院教授。

3 陈达(1892—1975)是现代中国人口学的开拓者之一。1912—1916年在北京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学习。1916—1923年在美国留学,192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长期执教于清华学校。1928年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后,负责创办社会学系并任教授兼系主任。抗日战争时期随清华南迁昆明,兼任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和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所长。1952年任中央财经学院教授。

工业化的“第三条道路”,名噪一时。¹又如从清华大学来学院任教的吴景超²教授、从北京辅仁大学转入学院任教的李景汉教授³都是中国著名社会学家。

第三类是一些默默耕耘、厚积薄发、大器晚成的学者。例如:郑必坚,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1952年在中央财经学院工作。后调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期从事宣传工作;曾任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1979年参加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1980年后调到胡耀邦同志处工作7年。20世纪80年代后期,任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1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世界性经济危机波及中国,中国经济发生严重恐慌,农村经济日益向下沉沦,为了挽救迫在眉睫的经济危机,国民政府发动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和地方政府领导人发动了乡村建设运动。围绕着如何进行国民经济建设和乡村建设,尤其是“如何救济农村”,再次发生了工业化与农业化的大论战。以吴景超、陈序经等人为代表的《独立评论》派强烈主张发展都市工业以救济农村,但不反对发展农业,不过认为光靠发展农业是救济不了农村的。而乡村建设派的梁漱溟主张振兴农业、建设乡村文明,刺激民族工业兴起,以期建设自给自足的乡村工业,走独特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郑林庄提出中国应该走既非农业化,亦非立即工业化,而是由乡村工业内生工业化的“第三条道路”。还有相当部分学者主张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复兴农村,振兴农业,救济农民;第二步是工业化与机械化。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任务未先完成,既谈不上乡村建设,也谈不上工业化。

2 吴景超(1901—1968),安徽徽州(今歙县)人。1915年考入清华学校,1923年赴美入明尼苏达大学就读,获学士学位。1925—1928年入芝加哥大学,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任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1931年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并进行城市经济调查。1935年在国民政府行政院任职,1947年返回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1952年任中央财经学院教授。

3 李景汉(1895—1986)北京通县人。1917年赴美国留学,专攻社会学及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先后在珀玛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获学士、硕士学位。1924年回国,任北京社会调查所干事。1926年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社会调查部主任,兼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1935—1944年历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国情普查研究所调查组主任,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教授等职。1944年赴美国国情普查局进修,曾实地参加美国农业人口普查。1949年开始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专家室工作,曾以专员身份赴东南亚各国进行考察,并兼任东南亚许多国家的农业普查顾问。1949年以后,任辅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主任。1952年任中央财经学院教授。

副总干事。90年代初，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分管研究世界政治和经济的7个研究所，参加了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选集、文选和文集的编辑与宣传工作。郑必坚后来致力于研究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中国如何重新加入世界、适应全球标准、为全球秩序做出积极贡献。他也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的整理执笔人，参与了1982年后历次中央大会文件的起草，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著名专家之一。1992年中共十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97年中共十五大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再比如：中国近代史专家尚明轩，1952年在中财工作，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任北京大学孙中山思想国际研究中心顾问、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及其研究中心顾问、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会顾问、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顾问等。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和对孙中山、宋庆龄等人物的研究。主要著作有：《孙中山传》（有日、朝鲜、蒙、维吾尔、哈萨克等文译本）、《廖仲恺传》、《宋庆龄传》（合著）、《何香凝传》、《孙中山与国民党左派研究》、《孙中山及辛亥人物论丛》等等。

第四类是在应用经济学科方面，对中财日后的教学科研产生重大影响的学者。例如：中央财经学院筹委会委员、从北京辅仁大学转入中财任教的著名会计学专家赵锡禹教授¹；从1952年就来中财并长期在中财任教的

1 赵锡禹（1901—1970），河北乐亭县人。1921年以优异成绩考入燕京大学英语系。1924年毕业后被燕京大学新闻系录取为研究生。1927年，赴美国留学，第一年在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攻读工商管理研究生学位，1928年9月转入纽约大学商学院学习，1930年，获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1930年回国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研究专员任务。1932年，回到北平，接受了辅仁大学的聘请，在经济系任教授、系主任，直至1952年院系调整，任中央财经学院教授、会计系主任兼企业财务系主任。赵锡禹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会计学家，在中国会计学界素有“南潘北赵”之说，前者是指我国著名会计学家潘序伦教授，后者就是指赵锡禹教授。1953年转到中国人民大学任财政系主任，并继续从事会计教学工作。1960年后，他在人民大学任图书馆馆长和校工会主席等职务。1955年至1965年，他连续四届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并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北京市第二、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文革”期间，受到迫害，1970年逝世。

统计学专家崔书香教授¹等。

四、办学理念和任务

中央财经学院成立后，根据高教部关于“高等学校宗旨”的规定，结合实际，确立了学院的任务：

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教育为指导，结合各种社会活动和实际生活的锻炼，树立学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

根据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结合中国具体情况，授予系统的“学用一致”的、财政经济的专门科学知识，培养学生善于掌握国家财经政策和熟悉业务技术的能力。

以富有爱国主义、劳动生产教育意义及养成集体观念的文娱、体育活动进行身心教育，健全学生的精神体魄，丰富学生的革命情感，使其毕业后能愉快地胜任祖国建设的艰巨任务。

表1-4 中央财经学院本科设置情况一览表

系别	专业及专门化
财政系	财政专业、税收专业
统计系	工业统计专门化、贸易统计专门化、农业统计专门化
会计系	工业会计专门化、贸易会计专门化、国家预算专门化

1 崔书香（1914—2006），河北省固城县人，1935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商学院；同年入清华大学经济系作研究生。1937年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系获硕士学位。1939年获哈佛大学瑞德克利夫学院经济学系硕士学位。1940—1945年任重庆大学教授。1947—1948年任北平燕京大学教授。1947—1952年任北京辅仁大学教授。1952年先后任中央财经学院、中央财政干部学校、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续表

系别	专业及专门化
企业管理系	企业管理专业、企业财务管理专业；工业财务专门化、贸易财务专门化
贸易系	对外贸易专业、国内贸易专业

表1-5 中央财经学院专修科设置情况一览表

科别	组别
贸易专修科	对外贸易组、国内贸易组、会计统计组
银行专修科	
劳动专修科	
保险专修科	
备注	修业年限2年

五、学院制度建设

中央财经学院虽然历史不长，但是在学校发展史上，它是具有启蒙意义的重要阶段，它教会我们什么是大学，什么是高等教育，什么是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如何办好高等教育。这也是共产党探索办高校在中财体现出的一个意外收获，是原有“延大”式大学正规化、“大学化”的一个标志。

学贯中西、极有学术造诣的陈岱孙院长，不仅是著名的经济学家，而且是富有办学经验的教育家，他的办学风格和人格魅力影响了学院，使后来者受益无穷；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人民大学调整过来的教师们，各有各的特点，带来了不同高校的办学理念和教学风

格；再加上中央税务学校的优良办学传统，三者合一，为后来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以至中央财经大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比如在制度建设方面，中财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这一时期，中财的规章制度无论从结构上，还是在内容上，甚至是遣词造句上，都有了飞跃式的变化。

中央财经学院成立后，即制定了《中央财经学院院章（草稿）》，共分为总则、学生、学生组织、会议制度、社团组织、奖惩、附则等九章。又制定了《中央财经学院学期成绩检查与升降级暂行办法》。

1952年10月26日，制定《中央财经学院附设文化补习学校章则（草案）》，作为中央财经学院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补习学校，至此也有了详细的细则。

六、管理严格的文化补习学校

在中央税务学校时期，我们就办过文化补习学校，中央财经学院成立后，制定了《中央财经学院附设文化补习学校章则（草案）》，中央财经学院撤销后，文化补习学校全部转给中央财政干部学校。文化补习学校存续时间比较长，不少人误以为它是一所夜校，或者是挂靠学校，实际上，它是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类似学校的预科班。

中央财经学院附设文化补习学校是依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以及教育部“工农速成中学暂行实施办法”设立的，“招收参加革命或产业劳动一定时期之优秀的工农干部及工人，施以中等学校的文化科学继承者适当教员，使其能升入财经学院继续深造，培养成为新中国工农高级知识分子及财政经济建设之骨干，其不宜升学者予以分配工作。”

文化补习学校面向工农，贯彻“速成的、联系实际的，但又是正规的

教育方针”，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力求切合国家财政经济建设的需要以及工农干部的特点和要求。学校在录取时规定：“凡年龄在18岁以上35岁以下，具有一般高小毕业文化程度，身体健康并具有下列条件之一者，不分性别、民族、宗教、信仰，由原机关、工厂、部队等部门选送，考试及格者，均得入学。条件为：工农家庭出身或本人是工农成份的干部，参加革命三年以上者；非工农家庭出身，本人又是非工农成份的干部，参加革命五年以上者；工厂、矿山、农场等产业部门的青年工人，三年以上工龄者；参加革命三年或五年以上，政治质量较高，有培养前途的警卫员、通信员及个别公务员；有特殊情况的烈属、军属，经上级批准者。”这个招生对象的要求，也是严格按照国家要求制定出来的。至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高教部、教育部联合发出的《关于1953年工农速成中学招生工作的指示》中附录的《关于1953年工农速成中学入学条件的规定》中，这个要求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¹

文化补习学校的领导、组织管理人员，都是中央财经学院的教职工。学校设中学部、初级班，学制分别为3年和2年。学校有严格的教学管理制度，制度规定细化到“先提问题，再叫学生；同学回答问题后，指明优缺点当场记分；学生提问，不经教师允许没有发言权”这样的程度。学校实际授课时数，每学期20周，每周6个学习日，每日学习不少于8小时，不超过9小时。开设课程为：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生物、物理、化学、政治、俄文、体育。学校有严格的学籍管理制度。

文化补习学校特别规定“凡本校学生一律实行人民助学金制”，“本校毕业学生，一律考升财经学院，不宜升学者，予以分配工作”。²现在没有当时中财文化补习学校毕业生升入本校的人数统计，但是有资料显示，当时国家第一届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的升学率高达96.55%。

1 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办公厅编：《高等教育文献法令汇编》（第一辑），第223页。

2 档案资料：3-XZ-1952-7-1。

七、组织、人员概况

1952年12月2日，政务院第160次会议任命陈岱孙、罗青为中央财经学院副院长。秦穆伯任党总支书记（学院当时没有设党委，学院党总支隶属高教部党委）。

组织机构：

院长办公室，秦穆伯兼任办公室主任，下设人事科、秘书科。

教务处，下设教务科、注册科、图书馆、体育室。

总务处，下设总务科、会计科、生活福利科、校产管理科、工程科、卫生科、医务所。

各系及专修科为教学行政基层单位，设主任一人，干事若干人。

学院教研室分为直属教研室和系属教研室，前者受教务长直接领导，后者受系主任领导。

学院社团，受中国共产党财院支部领导，如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财院委员会、教育工会财院基层委员会、各民主党派、学生会等等。

关于中央财经学院教职工人数，由于学院教职工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人数统计只能反映某一时的情况。

表1-6 1952年12月教职工人数统计

职别	人数
教授	24
副教授	11
讲师	20
助教	40

续表

职别	人数
职员	110
文化补习学校教职员	10
医务人员	6
炊事员	44
技工	5
警卫	20
勤杂	66
总计	356

从统计数字看，当时学院的最大问题是人员缺乏，教学人员尤为不足，这与学院刚刚组建，院址分为三处有关。为了尽快解决这一矛盾，学院人事部门采取内部适当调整、上级配备、有关单位的组织介绍、家属申请、私人介绍等方法，多渠道引进人才和工作人员，经审查录用的人员，分配的重点首先是教学，其他部门次之。

到1953年1月份，学院教职工达458名。（注：当时实有学生1768名，比例为4：1，国家规定的比例为3.2：1）由于当时中苏关系密切，1952年底，学院花名册上还有多名苏联籍教师，如彼斯库娜娃和库次涅佐娃等，都在俄文教研室。

八、刚性化与人性化结合的人事管理

中央财经学院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人事管理工作逐步开展起来。

1952年底，大部分人员建立了档案袋，进行了编号，特别是建立了教学人员的学术思想卡片。

人事部门还建立了全体人员的较详细的卡片、人员登记表、考勤名牌。

在严格管理的同时，学院非常关心教职工的切身利益，按照国家的要求和规定，1952年10月29日至11月15日，用了18天的时间，学院进行了调整工资工作。这次工资调整是在院系调整不久，迁校尚未结束、教职工人员相互不太熟悉的情况下进行的，为了保证工作进行，学院采取“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充分准备，多协商，少开大会”的原则，分为准备、讨论、定案三个阶段。学院专门成立了工资调整评议委员会，吸收了各方面代表人物，包括民主党派。调整标准兼顾德、才、资历，特别指出：在“德”的方面，资产阶级观点很浓，在“才”的方面，多半是旧的一套，在“资历”方面，是以金钱买的学位等，就不应该照顾。¹

这次调整工资工作基本顺利，教职工工资平均增加40.7%，高于全国高校教师工资增加18.6%的水平。²学院总结认为，学院取得的经验是：

“一是领导负责，亲自动手，与陈（岱孙）院长、秦（穆伯）主任的亲自动员和掌握分不开；二是通过党团及群众大会和个别交谈，充分进行了宣传教育，强调处理好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关系；适当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所谓‘适当的’是不能搞的太激烈，否则就会丧失调整工资的意义，不利于团结。”³

学院还专门设立福利评议委员会，1952年第四季度，就有47人获得补助。

如何对待教职工中的高级知识分子，是一个现实问题。总的来看，学

1 资料来源：档案3-XZ-1952-7-1。
2 这个增长率参见金铁宽主编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一卷，第122页。
3 资料来源：档案3-XZ-1952-7-1。

院坚持了原则，掌握了政策，学院强调必须执行党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和统战政策，要做到改造，必须把团结搞好。学院认为，高级知识分子是在党的领导下将学校办好的主要力量，因此必须适当地照顾他们，使他们发挥积极性。例如，在调整工资中，有人甚至提出不承认教授们有任何德和才，主张把这些人一脚踢开，但学院还是坚持了原则，做了大量说服工作。¹

九、教学概况

1952—1953学年第一学期，教学工作是在完成院系调整的基础上和继续进行教学改革的过程中进行的，教学面临的一大问题是师资缺乏，这一学期共开设33门课程，其中19门课程是校外教员兼任的，学生方面也存在程度参差不齐的现象，再加上教学改革经验不足，难免会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仍然有很大的收获，一份现存档案资料记录着当时总结的三个收获。

1. 在学习苏联、学习人民大学的办学过程中，为今后如何办新型大学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2. 稳定了院系调整以来学生的不稳定情绪，端正了学习态度。

3. 进行了生产实习，在实践中验证了学校的理论教学。²

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后，就中国的高等教育而言，都存在着教学探索的问题，处在新旧高等教育的转型期，中央财经学院的探索者们不可能目光如炬，一下子就看准了今后行之有效的教学之路。以下是当时学院对第一学期教学的反思。

其一，学院认为，新民主主义教育是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学方法，培养德才兼备、体魄健全、具有高度共产主义觉悟水平的国家建设人才。一般说来在思想上是明确的，但是，1952—1953学年第一学期，对于如何培养，考虑得是不够充分的，尤其对德、才、体三方面的有机联系是认识不足的，因为偏重业务学习，致使政治教育不能经常化，尤其是对学生的政治教育未能成为所有教学人员共同的责任，因此，在今后的政治思想教育方面，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组织所有教学人员和社团组织，密切配合，通过以教学为中心的各种形式，加强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

其二，学院认为，我们在教学改革方面，是肯定的、勇敢的，并且确定了学习苏联、学习人民大学的具体方向，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成绩的，但是也存在一些缺点，主要表现在：改革面比较广泛，没有采取有计划、有步骤地“稳步前进”的方针，没有结合我院的实际情况，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具体计划，重点试验、由点到面、逐步推行，今后需要改进。

第三，学院认为，对教学改革是思想改造的继续和深入，认识不足，对于学习苏联和人民大学的过程，就是无产阶级的、新的、进步的学术思想与资产阶级腐朽的学术思想进行尖锐而又复杂的斗争认识不足。这是今后领导上应特别注意的。

第四，对于制订教学计划的精神原则，如：广泛科学基础上的专门化原则；专业中各课程理论体系的完整和内部联系的原则；专业课程缩短时间集中学习的原则等等，掌握不够。在教学内容上，未能贯彻少而精的原则。

第五，尽管在培养师资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如：教研室集体备课、教员到人民大学学习、旁听等等，但是对培养师资工作仍然重视不够，必须加强。

这份档案资料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新整合起来的大学，中央财经学院在办学中，是一边磨合，一边推进的。这个总结性的资料有这样一些话比较耐人寻味：“因为偏重业务学习，致使政治教育不能经常化”；“对

1 资料来源：档案3-XZ-1952-7-1。

2 在“中苏友好月”运动中，出现了我院的所谓反动标语事件，有人将“中苏友好万岁”改成“中美友好万岁”，还有人在苏联画报上画美国旗子，一直未查出。

教学改革是思想改造的继续和深入，认识不足，对于学习苏联和人民大学的过程，就是无产阶级的、新的、进步的学术思想与资产阶级腐朽的学术思想进行尖锐而又复杂的斗争认识不足”；“在教学内容上，未能贯彻少而精的原则”。这里面透出来的消息是值得分析的：首先是政治与业务的矛盾；其次是教学改革与思想改造的关系；再次是对“苏联模式”的认同度；最后是对“教学内容少而精原则”这种明显“干校化”速成教育模式的消解。这是当时办学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基本结束、对旧大学的改造全面铺开的时候。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改造旧大学的院系调整以及所谓“教学改革”（实际上就是推广“苏联模式”），是一脉相承的，即改造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进而改造知识分子的生态、改造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使知识分子完成由体制外向体制内的转化，改变天马行空的自由性格，去除“自满自负目无余子”的习性，一心一意、忠贞不渝地跟党走，为人民政府服务。但思想的转换与生态的改变是需要逐渐适应的，在这个并不应该很短的适应期里，就难免暴露出一些问题。院系调整后的中财，主持工作的实际上是民国时期已经名闻天下的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而学校又云集着众多民国时期的、有着欧美教育背景的学者和专家，在办学上就难免出现欧美教育理念与苏联教育模式的冲突，民国时期正规大学的办学方式与新中国的教育诉求和“延安式”办学思路的冲突。尽管这种冲突并非表现为对立的水火不容，但在适应期或磨合期，却也暴露出来上述总结中列出来的问题。

1953年3月16日，第五次办公会议扩大会议制定了1952—1953学年度第二学期教学方针与任务。

1. 教学方针：根据教育部1953年对高等学校所提出的“整顿巩固、重点发展、保证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我院必须改进领导，深入地学习苏联、学习人民大学，本着加强团结、办好财院的精神，发挥高度革命责任心、创造性和积极性，群策群力，实现教学计划。

2. 具体任务：加强师资培养；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等等。¹

资料显示，这一学期的教学基本顺利。这一学期的办学目标与评价标准也比较单纯，那就是“深入学习苏联”。这是扩大的办公会议制定的方案，应该说是集体的决议，从这里看，至少表面上大家的思想比上一学期是统一了。

十、中央财经学院解散

还没来得及在第三学期更进一步地把学校办好，1953年的8月份，高教部（53）综财马字第30号通知下来，决定撤销中央财经学院，学生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我们只知道这是进一步院系调整的结果，没有资料显示一所大学为什么只办了一年就把它撤消了。从过来人的口述中我们至少得到两种无法证实的说法：一是说国家可能出于北京地区高校布局上的考虑；一是说院系调整来财院的一些教授们不太愿意在这里供职，因为这里的办学条件与他们心目中的大学相去甚远。

根据国家政务院、高教部关于全国院系调整的有关精神和具体决定，当时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学院、山西大学财经学院²三校调整委员会”，三校调整委员会会议决定，1953年8月中央财经学院正式解散，师资分散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钢铁学院、石油学院、林学院等院校。原财政学院、税校人员大部分留下承办中央财政干部学校。³

中央财经学院解散后，原中央财经学院所有之房舍，以及图书之一部分，划归中央财政干部学校所有。中国人民大学代中央财经学院颁发毕业

1 档案资料：3-XZ-1952-7-1。

2 山西大学财经学院也同时被合并到中国人民大学。

3 中央财政干部学校成立于1953年4月，挂靠中央财经学院。

证书，亦得使用中央财经学院院章及副院长的印章。

关于尚在建设中的四道口校舍的归属问题，有一番周折，现在看来，稍有不慎，可能失掉学校现在的家园。在建设新校舍的过程中，曾经成立“中央财经学院建校委员会工程处”的组织，并且刻有公章，但是中央财经学院撤销后，中国人民大学不愿接受该工程，所以一批熟悉工程情况的领导人员都被中央财政干部学校接收。同时，1953年8月31日，中央财经学院撤销后，陈岱孙副院长和罗青副院长曾经向高教部及高教部部长马叙伦请示过善后处理事项，该文件以（53）院办字第76号发出，请示内容是：“由中央财政干部学校代为领导该单位（工程处），并且代管中央财经学院及副院长印章，在建筑工程范围内使用，至工程竣工后，代为报部撤销”。¹

然而，1953年10月9日，高教部给人民大学和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发来马叙伦部长签名的批复文件，文件明确指示“中央财经学院并入中国人民大学后，其建校工程机构亦由中国人民大学接收，因此，你院院章、副院长公章及建校委员会工程处印章等，均应移交中国人民大学。”

收到文件后，中央财政干部学校的领导表现得极有远见，没有立刻行动。10月12日，学校有关领导在批阅文件时，指出：“在西郊产权未具体确定归属以前，该项印章暂不移交。”

10月21日，戎子和副部长兼校长，致函高教部有关领导，提出该工程已接近完成，11月底即可全部竣工，现在交接，会影响工作。

11月16日，高教部回函，明确“仍由财政干校继续负责迄工程结束为止”。²

由于人民大学没有接，中央财政干部学校没有及时交，使得西郊四道口的校舍有惊无险地保留了下来。

1954年3月28日，中央财政干部学校与人民大学签订了关于四道口

校舍房屋的分配原则，由中间直分，各住一半。7月26日，政务院要求中央财政干部学校让出二部校舍，初步决定：学校在8月10日前，将房屋空出，在四道口校部拨给另建9000平方米建筑的计划。8月1日至10日，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在10天内突击搬家，将二部家具全部搬至西郊四道口校部¹；11月5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将政务院拨给的9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计划与人民大学在西郊四道口所占一半校舍相互交换，并签订了协议书。²1955年暑假，彻底办理了人民大学从四道口搬家的工作。

中央财经学院撤销后，原划归中央财经学院的文化补习学校，全部转给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图书馆藏书9.6万册之一部分转给中央财政干部学校。

本章小结

1949年到1953年，是学校初创时期，可以说是应时运而兴起，随时变而赋形。四年之间，校名三嬗³，学校的正规化、“大学化”的速度和程度都是可圈可点的。这是学校“大学性质”确立的时期，是办学思想确立的时期，也是办学传统形成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经验，对后来学校的发展，无论在积极抑或消极的意义上，都有着深重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校应时运而兴，为国家培养了大量急需的经世济用之才，可以说是彪炳史册，功在千秋。人才的急需，使得“百年树人”的教育无法那么从容，教育的志趣已经不是人格之塑造、学养之修为，而是人才之速成。知识理性被工具理性很自然地替代了，所以活学活用、速

1 档案资料：4-XZ-1954-7-1。

2 1996年编：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大事记，第6页。

3 严格地说校名有四次更换，但华北税校和中央税校实际上是一回事，又据当时知情人回忆，华北税校并没有挂牌子。所以这四年学校实质上的改变是三次，即中央税校（华北税校）、中央财政学院和中央财经学院。

1 档案材料：4-XZ-1956-7-6。

2 以上参考资料：档案4-XZ-1956-7-6。

学速用、因用而学、以用为高，成为当时用人者与育人者共同的诉求。同时加强政治教育，统一思想，不使旁骛，成为培养新社会建设人才的有效路径，这既是适应时事的政治需要，也是解放区大学传统的自然延展，人或谓：“解放区大学对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中最大，也可称之为中国‘高等教育灵魂’的部分，也许是有关马列主义或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内容，……而这些正是解放区大学教育内容的精髓。”¹

中财是新中国办的财经类高等学校，是中央业务部门主管的学校，与新中国其他高校一样，政府是唯一的办学主体，这在当时为了一个共同的建设目标——培养国家急需的人才，可以说是非常有效的制度形式，从政府到高校，对办学自主权的问题没有异议，或者说是处在一种“集体不意识状态”²。当时的确是上下如一体，呼吸若一气地为建设新中国不遗余力地快速培养人才，求“用”务实，成为当时教育的特色，中财在当时表现得尤为纯粹与突出，由税校而财政学院而财经学院，如此快速地提升，与当时的需要有关，也与其成绩突出、运转有效有关。

这一阶段最值得一提的是院系调整。院系调整在新中国高教史上是个较有争议的话题，无论中外，无论从何种角度，在当下的学术论著中谈到院系调整时，完全肯定的并不多见。但是从中财发展史上看，院系调整为其带来了很好的机遇，使中财的“大学化”、正规化程度向前迈了一大步。虽然因院系调整而创办的中央财经学院只有一年光景，但是这一年却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学者治校，制度规范，使中财由干训式办学模式向全日制本科专业教育迅速转型，尽管是一种单科性办学，而且“苏联模式”的烙印鲜明，但这是当时政治、文化大背景下的通病，无关中财办学宏旨。

“苏联模式”的影响是深远的，这在当时中财的教育教学中印记深刻。

在当时“以俄为师”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苏联模式”的公行，也是一种“集体不意识状态”。刘少奇在建国后不几天的一篇讲话中说：“我们要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我们只有在苏联才能学到这些科学知识，例如：经济学、银行学、财政学、商业学、教育学等等。”¹中财在那时的教育教学模式以及教材建设诸种教育行为，不能不以苏联之马首是瞻。其实，当时学校的单科办学、部门办学、专业细分、组织形式、管理形式都不同程度地照搬“苏联模式”。当时不可能向欧美学习，也不可能接受民国方式，所以高等教育的养成，一方面依赖“延安经验”，一方面仰仗“苏联模式”。无论现在对“延安经验”和“苏联模式”怎么评价，这两方面的影响都铸就了中财求“用”务实的办学传统。

1 （日）大塚丰：《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形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2页。

2 雷晓云：《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及其文化透视》，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7页。

1 见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第4页。

第二章 中央财政 干部学校时期 (1953年4月—1958年12月)

第一节 中央财政干部学校的组建

在中央财经学院还没有解散时，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就开始组建了。1953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任务顺利完成，我国进入了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财政工作也进入一个新阶段，国家对财政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财政战线急需大量具有较高政治觉悟，掌握财政、税收专业理论知识的较高级专门技术人才和财政经济管理干部。

然而当时情况是：自开国到1953年，财政干部增加到29万人，1953年各省、市、自治区税务干部约14.77万人¹，其中经过培训的只有5万—6万人，大多数财政干部没有经过培训。在中央财政干部学校组建以前，财政部尚无一所培训财政干部为主的干部学校。为了彻底改变干部培训工作的落后状况，提高财政系统干部的理论和技术水平，培训大批德才兼备的财政干部，适应过渡时期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于1953年4月13日发文（即财经干字第44号文）批准开办中央财政干部学校。

4月17日，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以（53）财戎21号发出由薄一波签名的通知，正式宣布：“开办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学校规模1000人，以有计

划地轮训全国财政系统专区级科、局长干部和一部分主要科员，及中央级各企业、事业部门的财务干部。兹决定由戎代部长兼任该校校长，秦穆伯同志为该校副校长，并自本年4月20日正式成立。”¹

1953年4月21日，我国第一所财政干部培训学校——中央财政干部学校隆重举行成立大会。财政部副部长吴波参加大会，宣布财政部代部长戎子和兼任校长，秦穆伯为副校长，并且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有关负责同志也参加了典礼仪式。

吴波在讲话中说：

“我们在这里（西皇城根）办学校，已经有了比较长的历史，自从税务学校以至财政学院，直到去年又合并为财经学院，今天我们又在这里办财政干校，虽然学校多次变更，但在坐的同志们都是老同志了，也就是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今天我们担负起了新的任务，就是要轮训全国的在职干部，所以我们与高等教育部联系，在财经学院抽调30名干部，在西皇城根校址，先成立财政干部学校，下期再由财经学院抽调70名干部，并在西郊地方，充实和扩大财政干校。目前学校的主要任务是轮训财政干部，开国4年来，财政部门在任的干部，已增加到29万人，而经过训



1953年5月4日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国家预算执行业务研究班开学典礼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史长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

1 档案资料：4-XZ-1953-7-1。

练的才5万人，20多万干部未经过轮训，有些同志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有实际工作经验，但是理论基础差，文化比较低，必须学习，打下理论基础；有些同志是青年知识分子，工作热情很高，有培养前途，但业务还不熟悉；有些同志有一定的业务水平，但还须继续钻研，还有一些旧（社会）的行政工作人员，旧的东西须批判，政治和业务急待提高，所以必须有一个机会回一下“炉”，重新学习。我们提出‘五年计划’，把22万—23万名干部轮训一遍，财政干校必须和其他学校共同承担这一任务。财政干校不仅是以上的任务，另外还有二个任务：一是所有中央机构和银行企业的财务会计人员，也必须进行一次轮训，建立新的财务制度，7万—8万人，这是需要我们帮助轮训的；二是各大区、省市有相继开办财政干校的，但是缺乏经验，而我们的学校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收集材料方便，而且有办学经验，所以我们要对大区、省市的财政干校起指导作用，供给教材，相互交流经验，及时总结出大量新东西来。¹

讲话中提到，学校的学习期限为半年至一年，学校当时房舍是1000人规模，首先办预算研究班，接着办会计训练班、税务班、基本建设投资班、财政监察班等。

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刚刚成立的1953年5月4日，财政部就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举办“银行执行国家预算出纳业务研究班”。7月29日，研究班全体学员结业，本届研究班培养财政系统、银行系统干部386人。²

一、精干的管理者与逐渐充实起来的教职员

为了使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尽快实施招生、教学计划，经财政部和高教

1 档案资料：4-XZ-1953-7-1。

2 档案资料：4-XZ-1953-7-1。

部协商，1953年3月31日，高教部复函：同意调秦穆伯等30名干部到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工作，他们是：秦穆伯、康民、胡屏之、高景斌、阎德珍、巫昌友、杨遗謨、孙也平、于香九、韩雪清、杨轸、高钧、王乃藩、侯志兴、查平彦、王哲如、李淑萍、崔敬伯、张秉文、张俊卿、韩九鼎、戴雪英、张思超、王钢、乐俊之、邱光信、金渭然、喻惠忠、张磊。8月，又从中央财经学院选调70名教师和职工到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工作。

1953年10月27日，学校教职工共计136名，其中行政人员44人，教学人员31人，一般工作人员61人。¹

据不完全统计，1953年12月中财干校的工作人员是：

校长：王绍鏊（戎子和已不兼任校长）

副校长：秦穆伯

校长办公室：张靖、荆子裕、巫昌友、刘士元、吴荣。

秘书科：杨遗謨、孙也平、于香九、汪友竹、赵欣余、韩雪清、郭肇起、周润桂、栾孟馥、傅乃镇、王相哲、喻惠中、冯荣合。

组织科：陈健、胡屏之、高景彬、吕增、吴晶华、阎德珍、吴雅荣、杨德祥、何学仁。

党团办公室：唐文范、王静海、董连蔷。

教务处：何方明、刘迈迁。

教务科：高一民、章态浓、王乃藩、惠佩秋、江云、柴景昌、尤大韶、王林生。

当时及以后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历任领导是：

表2-1 1953—1958年行政领导一览表

姓名	职务	任职期限	说明
戎子和	第一任校长	1953年4月—1953年12月	财政部副部长兼

1 档案资料：4-XZ-1957-8-4。

续表

姓名	职务	任职期限	说明
王绍鏊 ¹	第二任校长	1953年12月—1955年8月	财政部副部长兼
胡立教 ²	第三任校长	1955年8月—1956年9月	财政部副部长兼
安志诚	第四任校长	1957年9月—1958年12月	
秦穆伯	第一副校长	1953年4月—1958年12月	主持日常工作
崔敬伯	副校长	1955年9月—1958年6月	主管教学工作

其他主要领导干部有：教务长何方明；先后主管行政事务工作的秘书长张靖、武冠英；副秘书长吴荣。

表2-2 1953—1958年党务领导一览表

姓名	职务	任职期限	说明
秦穆伯	总支书记	1953年4月—1957年10月	总支直属财政部党委
武冠英	总支副书记	1953年4月—1957年10月	

1 王绍鏊（1888—1970），江苏吴江人，1908年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精通日语。青少年时受康、梁变法和“新学”的影响，思想激进。早年投身推翻清王朝的活动，参加过讨袁护法斗争。五四运动时，他在江苏第一甲种商业学校任教，热情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并奔走呼号，发起组织“外交大会”，揭露和抗议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又投身反蒋斗争，参加了1930年4月冯玉祥、阎锡山发动的联合倒蒋运动。事实上，王绍鏊在1933年10月就已经秘密入党，入党后被安排在中央特科工作。在国统区的民主运动中，他的公开身份是民主人士，实际是一名坚定的党员。“九·一八”事变后，王绍鏊在上海参加发起组织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八一三”事变后，在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工作，并参与“华东人民武装抗日救国会”的领导工作，联系各界力量组织抗日游击队，参与太湖游击队的组织领导工作等。为宣传抗日，他还与徐铸成等发起创办了《文汇报》。王绍鏊最辉煌的成就是发起创办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成为爱国民主运动中的“中坚人物”。新中国成立后，王绍鏊先后担任财政部副部长、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70年3月31日在北京逝世。

2 胡立教（1914—2006），1955年担任财政部副部长，并兼任中央财政干部学校校长。七千人大会以后，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组书记、代行长，成为中国央行历史上第三任行长。

续表

姓名	职务	任职期限	说明
秦穆伯	党委书记	1957年11月—1958年12月	1957年11月建立党委
安志诚	党委副书记	1957年9月—1958年12月	



戎子和 王绍鏊 胡立教 崔敬伯



秦穆伯 安志诚 武冠英

其他主要党务领导干部有：1957年11月，建立党委后，康民任组织委员；武冠英、张光三任宣传委员。

马列主义教研室：康民、李文范、高鉉钧、吕云鹤、李皓、邵铮、张光三、吴新智、毕斯基、王万有、卢鹏、董乃秀、徐忠廉、王赓舜、凌慧言、沈康南、刘昉、王廷辅、车文珍、贾永正、申润秋、赵春新。

统计教研室：徐坚、伍仪伟、胡家忠、吴春澧、陈启昆、李耀森、崔书香、刘明樾。

会计教研室：张伟弢、查平彦、鲍学曾、王珺、侯志兴、侯迺民、吴荣祖、霍稻泉、唐秀芬、王天一、卢元扬、孙昌湘、雷乐民、余顺智、吴克俭。

财政教研室：凌大珽、刁开智、张淳、钟山、孙邦治、毛宝瑞、陈延业、杨轸、吴平、胡中流。

保险教研室：李进之、陈继儒、王效文、王化南、陶声汉、吴汉林、彭载、姚达人、阎达寅。

基建班班部：耿志、黄涉、顾少康。

税训班班部：吴裕民、王嘉元、孙宝兴、赵振合。

保专班班部：苏鸿伯、程里昌、温玺。

储备班班部：方辰、薛贵福、姜国学、焦世文、张哲。

文化班：阎岱林、王宝阁、陈鸿秋、杨志成、李宗涵、徐善基。

在这个名单中，我们看到了很多熟悉的名字，他们为中财贡献了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现在他们中的有些人已经作古；健在的也都离开了工作岗位，他们年事已高，解甲归田，安享晚年。

一年以后的1954年，教职工人数已增至162人（见表2-3）。

表2-3 1954年1月教职工统计表

校 长	行政人员					教学人员							总 计
	处长	科长	科员	医务	小计	教授	副教授	讲师	助教	资料员	教员	小计	
1	3	12	67	4	87	6	7	15	37	2	8	75	162

当时的教授有：徐坚（统计学）、崔书香（统计学）、张伟弢（会计学）、凌大珽（财政学）、李进之（苏联国家保险）、王效文（苏联国家保险）。

副教授有：刘明越（统计学）、吴荣祖（会计学）、卢元扬（预算会计）、雷乐民（工业企业财务计划）、孙邦治（查账实务及工商业税）、杨轸（财政学）、陶声汉（人身保险）。

讲师有：康民、张光三、张明、李耀森、孙昌湘、刁开智、陈延业、

张淳、胡中流、王化南、阎呈祥、高世民、吴新智、张大炜、赵素娟。¹

到1955年10月，中央财政干部学校有教员83人、行政人员79人、勤杂人员70人，共计232人。

1956年9月25日统计，学校的教授和副教授有：张伟弢、崔书香、徐坚、凌大挺、孙邦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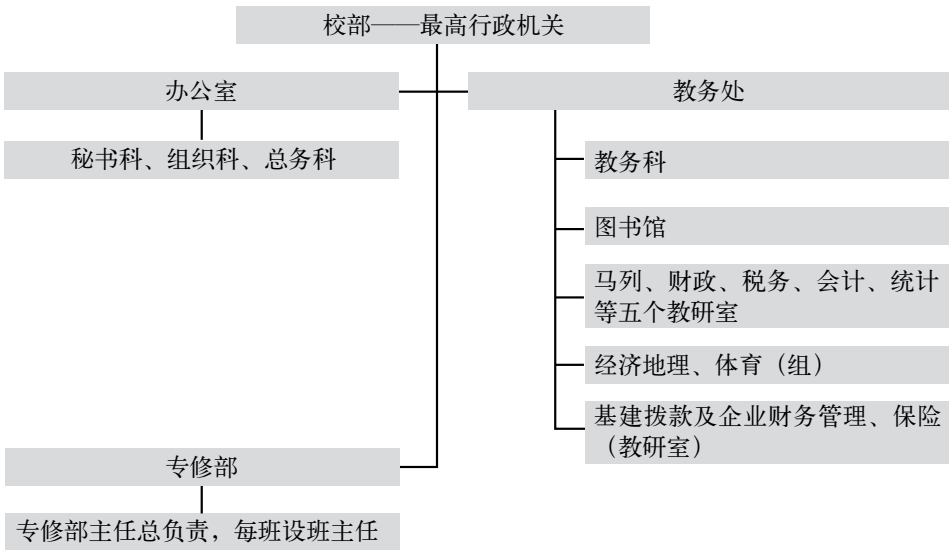
1957年，教工173人，其中教授4人，讲师6人，教员44人，助教43人。²教工人数已较建校初建时的31人增加了5倍还要多。但是1954年与1957年比较，教授、副教授人数有所降低。如果没有增加，则与国家已经多年不评职称有关；但是有所降低，则与高职称教师流失有关。

二、具有鲜明“部门办学”特色的机构设置

中央财政干部学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直属单位之一。学校校长等领导干部的任命直接归属财政部。据学校档案馆的档案显示，1953年12月29日，王绍鏊接替戎子和担任财政干部学校校长，任命通知的签名者为当时的财政部部长邓小平。1955年8月4日，财政部又下发通知，由胡立教副部长兼任中央财政干部学校校长。³

学校组织机构和组织单位始终处于变动之中。1953年，学校是校部和职能部门二级结构。校部为最高行政机关，设校长和副校长，主管全校行政教学工作。校部以下设办公室、教务处、专修部三个次级单位。（类似今天的处级单位，负责人为办公室主任、教务处处长、专修部主任）具体的组织结构模式如下：

1 档案资料：4-XZ-1958-2-1。
2 参见《1994年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校史资料汇编·吕增回忆录》。
3 档案资料：4-DQ-1956-1-6。



今天看来，专修部类似今日之学生处，直接对校长负责。1953年10月17日，学校在关于“学校编制”的说明中专门解释说：“由于学校是在训练全国财政干部长期规划下成立的训练机构，它在五年计划中要担负一定的训练干部任务，因而就不同于普通短期训练班，必须进行严格分工，即以班部人员为例，在普通短期训练班是可以不占编制名额的，但学校各班训练期间为一年或半年，而班的行政事务又是经常的、繁杂的，如果让学员兼任班部干部工作，势必妨碍学员的学习，预算执行业务研究班就已经反映出了这个问题，影响班部行政的效果，所以把班部行政人员纳入正式编制之内是极端必要的。如果以每班部设主任一人，干事二人，经常保持8个或6个班部计算，共主任8人，干事10多人。”¹

1955年机构设置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校长之下设教务长和正副秘书长分别负责学校教务和行政事务工作。

教务长领导教务科。教务科为教务长的办事机构，主要负责教学工作。秘书长领导校长办公室。校长办公室为学校的办事机构，又是行政事

1 档案资料：4-XZ-1953-7-1。

务部门。

班部即专修部：班部负责人为正、副主任（大班还设有秘书）和干事。

班主任直接对校长和副校长负责，并且在秘书长和教务长指导下工作。

专修部（班部）是主要管理行政事务的一级组织，不是教学机构。当时设有：财政专修班、税务专修班、基建专修班、保险专修班、储备专修班、文化班。

教学机构是班部所属的教研室和教研组，在当时也颇类似于今天的“系”或“院”，当时设有：财政教研室、会计教研室；税务教研组、基建教研组、保险教研组、储备教研组、语文数学教研组。各教研室、教研组均设有主任或组长作为基层负责人。¹

上述资料表明，这一时期中央财政干部学校组织结构有这样两个特点：一是二级组织机构，这种结构形式至今没有本质上的变化；二是教研室、教研组不独立，教学机构没有放在应有的位置，在结构上显示行政大于教学，这种行政权力统摄大学，教学自主空间狭隘的现象是所有大学概莫能外的。

三、机构设置的大变化

1956年，学校办学思路有了变化，开始重视教研室和教研组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机构设置相应地发生了一定的调整，一些教研室、教研组升级为学校直属。这一年学校直属教研室、教研组为：哲学教研室、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党史党建教研室、财政教研室、保险教研室、会计教研室、统计教研室（注：1956年10月23日，财政部对学校关于机构调整的请

1 档案资料：4-XZ-1957-8-3。

示作出专门批复，同意财政教研室和税务教研室合并为财政教研室，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改为哲学教研室，政治经济学教研组改为政治经济学教研室）。¹这时的教研室和教研组至少从结构上看已经颇类似于现在的专业教学的“系”或“院”了。

1957年，学校规模有所扩大，成立了由17人组成的校务委员会，成员是：安志成、秦穆伯、崔敬伯、武冠英、陈健、苏鸣伯、康民、张光三、张伟弢、崔书香、阎达寅、孙邦治、渠慎谟、方晨、孙辉、耿志、高功福。委员会里，教授占有一定的比例。同时也开始建立处级单位。

1957年2月22日，第一次校务委员会决定撤销财政专修班、保险专修班、基建专修班、储备专修班、师资专修班等5个班部，成立学员科，各学员班以党支部的形式存在。由于学校的学员工作和干部工作统一由组织科办理，学员科成立后，组织科改为人事科。班部改为学员科，这应看作是后来主管学生的学生处的雏形。

1957年，学生人数是970人。

1958年1月28日，财政部党委下文：“党委已于1957年11月23日批准撤销财政干部学校总支部委员会，并根据党章第48条规定和学校工作的需要，建立学校党委会。”

这一时期学校结构上的变化有三方面值得记录：一个是教学机构的教研室、组在学校的位置凸现出来，一个是学校成立了校务委员会，一个是学校党的组织获允由党总支提升为党委会。

四、有计划的短期轮训培养目标

中央财政干部学校设置保险、税务、储备、基本建设拨款、会计、预算、企业财务管理等专业，学制为1年制的专修班或半年制的专修班。其

中大部分修业期限都是1年，实际为45周（包括寒假3周在内），分为2个学期，每学期21周（包括总复习和考试），每周21—26学时不等。

学校培养目标是：培养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具有高等学校专修科业务水平或具有中级党校干部领导水平、掌握财税工作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身体健康的专门人才。

“学校的任务就是要在国家的过渡时期内，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财政工作发展的迫切需要，有计划地以较短的修业期限轮训在职干部。学校的培养对象是全国财政系统的中层和一部分基层领导工作人员。教学目的在于提高他们的政治理论和专业知识水平，使他们明确政策观点和立法精神，以统一工作认识，充实其独立的工作能力。”¹

五、六年的“干训”教学历程

（一）1953—1954学年

本学年自1953年9月开始，到1954年8月底结束，在学校学习的学员共有1464名，其中：1年制的税务专修班102人；1年制保险专修班179人；1年制储备专修班80人；半年制的税务训练班一期264人，二期194人；半年制的基建训练班一期291人，二期194人；会计训练班89人；文化班71人。

在制定1953—1954学年教学计划时，提出了三条原则，可以看出这一学年教学计划的思路，即一要符合本校的培养目标；二要体现学习苏联，学习人民大学；三要结合本校的条件和学员的实际。在学习苏联、学习人民大学的问题上，虽然也提出“不要照搬”，但实际上在制定教学计划时，不论在课程设置、课程比重、课程顺序、学时分配以及考试和测验等方面都仿照了人民大学专修科的教学计划。当时人民大学是新中国办高等教育的“工作母机”，在1954年4月召开的“全国高等财经教育会

1 档案资料：4-XZ-1957-8-4。

1 档案资料：4-XZ-1956-7-3。

议”上，高教部副部长黄松龄作的报告中，提到培训在职干部问题时，还特别强调“中国人民大学应继续发挥‘工作母机’的作用”¹，不仅师资培训是“母机”，教学大纲的制定、教材及教学参考资料的使用也是“母机”。当时的高等教育，是远师苏俄，近随“人大”，以冀颠覆“旧”的高等教育，重构“新”的高等教育。

关于课程设计这一问题，学院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制定了如表2-4的规定：

表2-4 1953—1954年课程规定一览表

课程环节	具体规定
每周课时数	28—30学时，全年总学时为1000学时。
基础课	财政学、会计学原理、统计学原理，占总课时的近30%。 税务专修班除专业统计、会计以外，还设中国现行税制和查账实务。
专业课	保险专修班除专业统计、会计以外，还设人身险、火险、运输险、苏联国家保险等四门业务课。
政治课	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约占总课时的30%。
备 注	各班普遍开设体育课。

1954年，又在教学计划上作了一些调整，因为从1953—1954学年教学计划执行情况看，突出的问题是课程不衔接和学员负担过重，因为自学时间太少，同学们普遍提出精简课程的要求。为此，学校在制定1954—1955学年度教学计划时，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如减少课时，学年总课时由 1000减为900，每周从28—30学时减为22—26学时。同时精简了一些课程，把性质相同的课进行合并，如“运输险”和“火险”合并开“财产保

1 高等教育部办公厅编：《高等教育文献法令汇编》（第二辑）。

险”；“会计学原理”与“专业会计”合并，减少考试课程的分量；调整了课程顺序，如专业课开在共同课之后。

1953—1954学年是开局之学年，通过一学年的教学实践，已经初步了解调干学员的学习特点，积累了一些为适用这些特点而进行教学的经验。在财政部的直接领导和有关业务单位的支持帮助下，教学人员在理论和业务水平上，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汇集了许多有益于教学的宝贵资料，培养了新开课的教员35名，初步改进了各个教学环节的方式和方法，并根据学校的培养目标和学员的接受能力，编订了26种教材与讲稿的初稿，为提高教学质量奠定了初步基础。这一学年教学工作的成绩和经验，据现有档案资料显示有如下几个方面。

- 1.在教学实践中逐步总结了学校的工作方针和任务，通过传达高等财经教育会议精神和传达人民大学教学经验交流会的会议精神，澄清了干训教育的模糊认识，明确了在国家过渡时期训练在职干部的重大意义。
- 2.由于是开局之年，在教学计划的制定方面，几经调整，数次变动，因此，只有采取更严肃、更慎重的态度，更细致、更周密的手续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加强各方面的联系，然后才会获得顺利执行的效果。
- 3.协调、理顺教学各个环节的关系，如课堂教学、课堂讨论、课后辅导等等。
- 4.在组织领导方面，由于第一学期许多机构是新成立的，因而工作关系不够紧凑，第二学期作了某些必要的调整，并且制定了具体的工作条例，从而提高了工作效率。
- 5.在对外的工作关系方面，一开始，学校对外联系不是很主动，与业务部门联系渠道不畅通，财政部107次部务会议通过了“本部各单位协助财政干部学校解决教学工作上若干问题”的决议后，联系工作随之加强，解决了派教员参加专业会议和随同到现场实习、检查，以及接洽需用资料等问题。

这是这一学年办学经验的总结，也是落实1954年4月“全国高等财经

教育会议”精神，特别是落实高教部黄松龄副部长《关于全国高等财经院系方针任务》报告精神的经验总结。

这一学年学员们的学习状况是怎样的呢？1953年9月考入保险专业专修班的校友邹大牧同志在其回忆录中有着较为直观而具体的反映。

中央财干校1953年秋季入学的学员学习期限为1年，与中央税务学校不同的是有上下（秋、春）两个学期，春节有两周左右的假期。关于课程设置与师资：中央财干校显然在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周学时、师资方面都已正规化并安排妥善了，特别是师资已专职化了。而中央税务学校的主讲老师大都是由中央负责干部、首长兼任。第一学期开设课程有：(1)马列主义基础，主要内容是讲授“共产党宣言”“联共（布）党史”等内容，笔者还保存着1951年莫斯科“外国文印刷出版局”出版的中文《联共（布）党史》等原版书一册，周学时为4学时，教师有康民、李文范，为“考查”课程；(2)政治经济学，主要讲授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周学时为4学时，教师为王廷辅，为考查课；(3)中国革命史，以胡乔木编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为主线，由王庚舜（中央税务学校第2期8班学员结业后）任教，周学时为4学时，为考试课；(4)财政学，有苏联参考资料，由中央财政部前综合司中层干部凌大挺及预算司张淳共同讲授，周学时为4学时，为考试课；(5)会计学原理，有苏联参考资料，由侯志兴、王琚共同讲授，周学时为4学时，为考试科目；(6)统计学原理，有苏联参考资料，由崔书香（女）讲授，周学时为4学时，为考查课程；(7)保险学，已有中文教材，由阎达寅、李进之讲授，周学时为4学时，为考试课程；(8)体育，在南四合院东侧大院上课（我记得有学习“晃板”（平衡）等内容，多年来没有体育课，挺新鲜的），周学时为4学时，为考查课程。第二学期（1954年春季在西直门外校舍开学）。开设课程有：(1)马列主义，为考试课程，余同第一学期；(2)政治经济学，为考试课程，由王廷辅、沈康南共同讲授，余同第一学期；(3)火灾保险，为考试

课，周学时为4学时，由姚达人讲授；(4)人身保险，为考查课，周学时为4学时，由刘尧卿讲授；(5)运输保险，为考查课，周学时为4学时，由柏子久讲授；(6)保险会计，为考查课，周学时为4学时，由谈通老师讲授（以上参见原“记分册”实物）。关于考试与考查的成绩分数等级，第一学期：考试课程由中国革命史、财政学、会计学原理及保险学四门，成绩按优良中差四等级记分；考察课程有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统计学原理及体育四门，成绩按及格与不及格记分。第二学期：考试课程有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火灾保险三门，积分方法按优良中差四级记分；考查课程有人身保险，运输保险和保险会计三门，记分方法按及格、不及格两级记分。我的考试课程成绩全为“优”，考查课程全“及格”，当时被称为“全优生”。

关于考试考察的运作方法。(1)考试。按苏联式（当面口试，时称“习明纳尔”）方法进行，即每门考试课程主考老师题匣中有数十道考题签，老师手中有教研组商定的标准答案（要点提纲），由参加考试学员分别依次当场抽签，参考学员按抽到的题目，独自准备（在考场）15—20分钟，然后到主考老师处，当面口述自己的答案，回答完毕后，由主考老师当场在学员记分册上签名并注明成绩。(2)考查。按苏式方法执行，即考查课程上课听讲课时数，有符合要求的笔迹、作业等等，按“及格”评分，并在记分册上由主讲老师签名并登记成绩。(3)听课时数。1953年、1954年的学员，除因病、因事假批准外，一律不存在缺课现象。¹

（二）1954—1955学年

这一学年，学校在教学方面做了积极的探索。6月，全校师生学习了“第四次人民大学教学经验交流会传达报告”，并且进行了讨论。

部门负责人来校讲学仍然是中财的特点。7月7日，税务总局李予昂局长来校给税务专修班的学员作专题报告；7月8日，税务总局崔敬伯副局长

1 邹大牧：《大学回忆录》，参见“中财校友网”，2007年10月11日。

来校给税务专修班的学员作专题报告。

这一学年在教育教学上的主要事件如下。

10月11日和11月2日，教务处召集全体教员举行“讲授方法研究会”，讨论改进讲授方法问题。

1954年11月8日，学校公布了《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关于教研室工作的暂行规定》，其主要内容是关于如何搞好教学工作，强调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均应起积极主导作用：借以通过各个教学环节，掌握学员学习情况，检查改进教学。该规定对教学中的主要环节提出了具体要求，内容包括讲授、辅导、课堂讨论、实习、考试与测验等方面。规定还详细提出了教学方法：(1)根据教学计划和学员水平，参考苏联及人民大学的有关教学大纲或业务部门提出的要求，应在每学期初，编订统一的教学大纲，教学大纲应明确规定各讲的要点、时间分配、课堂讨论题、实习题及参考书的章节页数；(2)准备教材；(3)教研室要组织对教员讲稿的讨论；(4)试讲；(5)教员之间相互听课；(6)考试准备。

1955年1月15日，财政部召开中央财政干校、西北财政干校、华东财政干校三校有关负责人会议，研究统一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问题，会议在中财举行。1954年高教部和教育部就组织统一教学计划、统一教学大纲的工作，也不断召开教学计划的审定会，财经院校自不例外，干训类的学校亦复如此。

3月16日，教务处召开扩大教务会议，对1955—1956学年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进行审查。

4月8日，教务处召集全体教员举行教学方法座谈会，讨论关于辅导和课堂讨论的问题。

5月16日，财政部又一次在学校举办三校审定教学大纲会议。

这一学年，对学员们来说，是紧张而有序的一年，是要求严格而又受益匪浅的一年。1954年秋考入物资储备专修科的校友易溪亭回忆：

现在一提起干校，人们总以为学习和生活都是松懈的。实际上当时的学习很紧张，一年两个学期的课程，都安排得较满。主要课程有政治经济学、哲学、中国革命史、财政学、会计学原理、统计学原理、储备会计、计算技术和俄语等，每个学期都有五六门主要课程，每天课程都不少，没有半天不上课的情况，尤其是考试课，每学期有三门，都是采取苏联五分制的口试方法。会计和统计学课程作业多，很费时间；俄语难学，要死记硬背；珠算、手工计算机和计算尺的计算技术课，剪操作性强，要经常练习。《政治经济学》是刚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新版教科书，第一次在国内发行，学起来颇为艰辛。《中国革命史》是胡绳和何干之主编的教材，内容非常丰富，哲学中一些革命经典名著也要学习。同学们都感到学习任务繁重，自觉地投入时间和精力，积极性很高。上课很少迟到，更没有早退的。晚上到阅览室复习的人很多，总得早去抢座位。当时学校对教学安排很重视，工作也很规范。如学期课程表安排得很及时，什么时候上什么课，同学们都很清楚，老师的辅导时间和地点也有详细说明。上课的主讲教师要求非常严格，都是理论和实践上有造诣的人，年青老师只能当辅导老师。政治课大多是上大课，有时还能听高级干部的报告，如学革命史时，何长工部长就给我们作了“我接毛主席上井冈山”的报告，他只用一张小字条作讲稿，讲了半天，异常生动精彩，同学们为他的革命豪情所感染，多次报以热烈的掌声。后期，陈毅外长在人民大学作“周总理出席亚非会议”的报告，我们是从分会场听的，也很受教育。每个班都有自己的专用小教室，专业课都在专用教室上。考试非常严格，开考时教室是封闭的，只有主考（即主讲）老师在场，当第一次五名同学进入后，按秩序抽签，即抽考题，然后准备20分钟，第一位同学开始考试，向老师答题，同时从外放入第六位同学准备。第一位同学答完后，老师依据情况再提出一道附加题，学员答完，老师当即评分，接着第二位同学开始答题，又将第七位同学放入教室准备，如此依次进行，直到考试完毕。由于每个考题都不相同，又在老师面前解答，因此，学生完全没有作弊的机会和可能，保

证了成绩的真实性。¹

(三) 1955—1956学年

这一学年的工作按照中央“全面规划、加强领导、整顿提高、逐步正规”的培训要求,本着“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政治与业务相结合,提高思想水平、增强工作能力”的教学方针,遵循“少而精、重点而有系统”的教学原则,按照已经制定的教学计划进行。从1955年9月1日开学到1956年7月22日结业,共开设了预算、企业财务、会计、税务、保险、基建拨款、储备等几个专修班和一个文化班。文化班这一学年共有学生55人,由于不适合学校性质的要求,文化班一年内正式结束。专修班报到时学员人数906人,其中调出工作的42人,因病和其他原因退学的35人,结业时人数829人。

学校共计开设课程25门,其中7门课程一年开设,18门课程半年开设,全年承担教学任务的教师57人,教学任务比较繁重,尤其是政治理论课的教师,人数少而显得格外紧张。

1955—1956学年的教学计划,基本上保持了1954—1955学年教学计划的框架,但也有一些变动,如税务专修班取消了“查账实务”,增添了“工业会计”;预算专修班取消了“国家银行执行预算出纳业务”,将这部分并入“预算会计与分析”;企业财务专修班取消了“工业企业组织与计划”和“国家银行执行预算出纳业务”,将“工业企业财务收支计划”改为“国民经济各部门财务”。

这一学年,除了执行教学计划外,学校还召开多次会议,讨论教学。1956年5月5日,胡立教校长亲自主持讨论下学年财政研究班教学计划。5月10日,学校举行教学经验交流会,并进行三次大讨论,至6月6日结束,武冠英作了“备课工作是教学工作的根本”的总结。6月7日,崔敬伯副校长(1955年5月16日调入中财,仍然兼任税务总局副局长)亲临教学一线,给税专人员和有关教员作了“关于周转税若干问题”的报告,6月15

日,又作了“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后有关商品流通税、货物税问题”的报告。相关事件还有:

10月14日,崔敬伯副校长主持召开教务会议,研究“教师每周工作计



1956年中央财政干部学校第三期税务专修班毕业生合影



1956年财政研究班全体同学在陶然亭合影

¹ 易溪亭:《忆当年的中财干校生活》,参见“中财校友网”,2008年10月10日。

李先念副总理和部行领导接见我院首届毕业生与全院教职工同学合影, 1964年7月25日



1964年7月25日李先念副总理和部行领导接见我院首届毕业生与全院师生合影

划执行情况表”。

10月26日至11月2日,学校举行了教学经验交流会,全体教员和全体班部工作人员参加。

12月6—12日,财政部召开的“三校税务课程教学大纲统一审定会议”在中财举行;15—17日,财政部召开的“三校预算会计与分析课程教学大纲统一审定会议”在中财举行。

(四) 1956—1957学年

1956年9月1日,新学年开始,学员报到人数为933人,上午举行开学典礼,财政部、税务总局、保险总公司的领导出席了大会。

1956—1957学年的教学计划又做了较大的变动。实行“三学段制”,增加政治理论课的时数,政治课时数占到了总课时的40%,比此前增加了近10个百分点,并将“马列主义基础课”改名为“哲学课”。

“三学段制”实行以后,产生了很多问题,如教师备课的时间不足,准备不及;学生反映“一段紧,二段松,三段大歇工”。事实上在第一段

时,学校就不得不减少了政治课的教学时数,专业课也不得不临时作了变动。这一年又加进了学习八大文件和参加整风运动。而且这一年发生了较大范围的流行性感冒,学校被迫停课20多天,教室改作了临时病房。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致使该学年的教学计划没有完成。

1957年中共中央财贸部对财贸系统中央级干校在制定教学计划的原则上作了指示,指示的要点是:全年单课独进或双课交叉;周学时16学时左右;全年不超过6门课;政治经济学必须开课,

有条件的要开哲学课,内容以《实践论》、《矛盾论》为主;多开业务政策课,少开业务技术课;干校以学习政治理论和业务政策为主。

学校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制定了1957—1958学年的教学计划,但是,因为要进行整风运动,遵照财政部的指示这一年暂停培训学员。

同以往几个学年一样,这一学年,学校多次召开会议,讨论教学工作。1956年9月5日,上海、西安财政干校和中财共同讨论了国家预算、国家收入、工业统计和统计学三门课程的教材编写。11月9日,学校专门召开办公会议,研究教学中存在的问题。11月23日,学校召开扩大办公会议,研究考试改革问题,特别是政治课考试,最后决定,哲学采用写思想总结、政治经济学采用写学习心得作为考试方式。

这一学年仍然延续了校内外领导上课的教学特色。1956年9月18日,崔敬伯副校长给税专同学作了“税工同志向科学进军”的报告;10月31日,又向财政专修班学员作了“试论财政科学中的百家争鸣”的报告。11月9日,税务总局李予昂局长来学校向财政专修班税务班的同学作了“税收工作”的报告。1957年5月22日和30日,崔敬伯副校长先后作了“从历

史价格的形成谈税与价的关系”和“税务研究方法”的报告。5月25日，戎子和来校向全体学工人员作“财政制度三大平衡”的专题报告。

在这一学年的档案资料里，“学习苏联”“学习人大”的字样明显减少了。1956年4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5月，毛主席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5月28日到6月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部分省市宣传（文教）部长会议，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会上较温和地批评了照搬苏联模式，甚至提出苏式的“工农速成学校”在中国行不通。¹在1956年初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在苏共二十大上的报告）后，中国高等教育照搬“苏联模式”的现象也逐渐降温。

（五）1957—1958学年和1958—1959学年

由于1957年夏季普遍开展整风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跃进”运动，加上全国财政金融机构的调整，财政干部学校和总行干部学校于1958年12月合并，1957年下半年至1959年上半年，学校不得不中断开学。在此期间，学校教职工除去用一年多的时间进行整风以外，从1958年9月上旬至11月中旬，还组织了大部分教学人员和一部分行政人员深入到8个省的20多个人民公社实习工作，比较细致地研究了人民公社的财政、财务工作，为以后的干训工作做准备。

六、“干校式”师资队伍的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是新建学校的头等大事，特别是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具有特殊的校情。当时的学员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并且直接从事财政、税

务和其他经济领域的工作，大都有一定的工作经验，他们把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带到学校来，要求教师作出科学的、令人信服的解答。如果教师没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经验，是无法满足学员要求，顺利完成工作任务的。一开始，学校的业务课程，大部分由业务部门的有关人员讲授，采取上大课的方式，应该说，这是学校的一大教学特色，也有它的优点，但这毕竟是一时的权宜之计，长此以往，教学不规范，教学质量也是不能保证的。为此，财政部和学校领导非常重视师资队伍的培养，财政部吴波副部长亲自指示：“业务课学校还拿不起来，除暂由业务部门派人上课外，学校要准备并培养教学人员逐渐接替。”

学校师资队伍培养和提高的方式多种多样，有效的方式有：

第一，到兄弟院校进修。学校要求教师要系统和正规地学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哲学四门政治理论课，同时又要对自己担任的专业课进行深入钻研。对于专业课的学习，采取短期突击与长期培养相结合的办法，抽调部分教师到兄弟院校进修。如有的教师到人民大学或到其他高校脱产学习或旁听课程。1954年学校开办了马列主义夜校，以利于全校职工学习理论课。

第二，实际调查研究。调查分两种情况，一是学校自己组织，每年都确定几个专题到基层调研；二是参加财政部有关司局组织的调查组。1955—1956学年，学校先后派出20多位教师到北京、天津、上海、沈阳等地的工厂和有关业务部门进行短期的实习和调查。1954—1957年学校共确定生产实习部门53个，生产实习地区53个。¹

第三，参加会议。一些教师以会议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每年的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和全国税务局长会议，以快速了解国家财税政策和国家经济建设情况。

第四，采取以老带新、组织教师集体备课、青年教师“火线练兵”等办法，使年轻教师在教学实践中锻炼成长。

¹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67页。

¹ 档案资料：4-XZ-1956-7-3。

据统计，1953—1957年，80名教师中有60人参加了各种学习，比例达到75%。

1953—1956年，经过培训和自己的努力，36名教师新开课，独立担任教学工作。

1953—1957年，到厂矿、企业、业务部门、农村参加生产实习和调查研究的教师总计53人。

关于这一时期学校的职称问题，不正规，也不统一，有教授、讲师、助教，还有“教员”。“教员”此一名目是特定时期的特殊产物，它不属于专业职称系列，但又具有一定的专业职称性质，名义上高于助教，享受的是行政级别待遇。

1956年6月，学校在给财政部的请示报告中提到“学校自1953年成立以来，由于缺乏师资，在助教中选拔一批人，边学、边教、边编，保证了教学任务的完成，三年来在实际教学岗位上，他们业务水平不断提高，教学效果良好，但是他们一直享受助教待遇。”1956年7月5日，财政部批示，在高教部关于学衔条例公布以前，学校以行政级别，提拔部分助教，统一名称叫“教员”，但分不同级别，如16级教员、22级教员等等。

七、教材建设

编写适合中国国情的教材，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也是一项任务艰巨的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初，各行各业向苏联学习，苏联专家在高等学校任教，许多社会科学的学科教材都是照搬苏联的。为了逐步改变这种状况，走一条中国特色的教育之路，各专业领域都在探索。中央财政干部学校成立后，胡立教就传达了陈云的指示，要编写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教材。根据这个指示精神，学校组织力量进行了新教材的编写工作。

（一）教材涉及的种类

1953—1957年，学校先后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基础、数学、语文、计算技术、财政学、会计学原理、统计学原理、现行税制、税务会计、企业经济活动分析、查账实务、保险学、保险会计、人身保险、运输保险、火灾保险、俄语、工业会计、基本建设会计、物资会计、政府预算会计、工业会计与分析、苏联国家收入、中国国家收入、体育、地方税、货物税、商品流通税、仓库管理、物资保管等等。

对以上课程，学校要求教师写出讲义，至少写出讲授提纲，对符合教材要求的，公开出版。

（二）教材编写的指导原则是中国化、干校化、社会化

干校成立之初，在教材建设方面遇到了许多问题。首先是大部分教材以讲授提纲的形式出现，内容过于简单，不能满足教学和同学的要求，由于没有完整的教材，摆脱不了“教师念讲稿，学生记笔记”的弊端。其次是许多业务课以介绍苏联的经验为主，对于中国的情况只作一些联系；有的课程稍好一点，把中国和苏联并列为两个部分，先讲苏联，后讲中国，但是基本上还是以苏联为主，这两种类型的教材都不能满足教学的要求。随着新中国财政事业的发展，在教学方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校明确了“应该编写以中国为主的教材”的思路。再次，教材建设开始，还存在着教材理论水平低的缺点，许多教材的内容只是一些现行条例的堆砌，很少作系统的理论分析和原则性的阐述，对具体业务情况说明较多，但很少总结规律、讲明道理，许多东西今天刚学过，明天形势就变了，同学们对怎样改进工作仍感茫然，为此，学校提出“把编写教材工作当做科学研究工作看待，注重理论方面的建设”。

针对以上问题，学校作了积极的探索和努力，1955年5月，由中财发起组织，财政部在学校召开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华北财政学校、西北财政

干部学校三校会议，制定统一的教学大纲。

1956年，财政部又召开三校教材编写会议。中财提出教材中国化、干校化、社会化的目标。

所谓教材中国化，就是立足中国国情，以中国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本民族的语言和表现形式，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所谓教材干校化，就是一切从校情出发，充分考虑到学员的实际状况，他们大多来自财经一线，身经百战，有的是基层业务骨干，有的是中层领导，他们是带着问题来学习的，因此，教材必须抓住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分别从理论和政策上给予阐述，而且要重点突出，不求面面俱到，但要处理好理论和业务技术内容之间的关系。

所谓教材编写社会化，就是教材编写不能闭门造车，埋头书斋，必须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和各界取得联系，尤其要与业务部门加强联系，在他们的指导和帮助下进行。

据资料显示，1955—1956学年，“经过我们的努力，‘国家预算’、‘预算会计’等课程已经向教材中国化的方向发展，新制定的财政学教学大纲已经完全改变面貌，全部内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这一学年，我们已经编写的教学大纲和教材，曾分送给全国各省市财政干部学校，有些高等财经院校和其他业务部门的干部学校也经常来索取，目前向学校索取教材的机关和学校越来越多，我们是中央一级财政方面的专业干部学校，别人对我们期望都很大，今后要加强交流，扩大合作。”¹

（三）财政部对教材编写的支持

在教材编写的过程中，财政部自始至终都给予大力的支持，特别是在提供教材编写的材料方面。教材编写必须有丰富的材料，否则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1957年4月，财政部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对部属干校

的资料供应问题，并且作出了如下决定：

- 1. 各业务单位召开的专业会议、专门问题的研究会议以及较大规模的检查工作汇报会议，均应通知学校派人参加。
- 2. 业务资料供给的范围。一般地除有关财政方针、政策、制度、办法的各项文件，包括命令、指示、通知及有关方面的答复文件等，均应发给学校外，其他有关业务资料可由学校派人与业务单位进行具体磋商，划定供给范围。
- 3. 各业务单位所拟定的制度、办法、草案需要内外征询意见时，亦应发给学校。
- 4. 建立专人联系制度。

由于财政部的支持，加上学校的努力，资料存留逐年增加（参见表2—5至表2—7）。

表2—5 1953—1957年学校自行搜集资料统计

年份	数量（份）
1953	74
1954	182
1955	341
1956	590
1957	818

表2—6 1953—1957年学校收到外来资料统计

数量（份）	来源
1398	财政部
506	中央其他各部
146	地方各级财政机关

1 档案资料：4-XZ-1956-7-3。

续表

数量（份）	来源
55	省市财政干部学校
39	中央其他各部干部学校
159	其他高等学校

表2-7 1953—1957年学校收到财政部资料统计

单位	数量（种）
农业税司	107
预 算 司	290
经建财务司	130
会计制度司	128
行政财务司	18
文教财务司	15
公 债 处	26
财政监察司	27
办 公 厅	50
税务总局	285
建设银行总行	281
交通银行	24
保险公司	17
合 计	1398

1956年底，学校图书馆开始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大事资料索引》，索引根据1949年以来几种主要报刊刊载的有关财政方面的政策、法令、论文、制度等重要文件，摘录汇编而成。

（四）教材编写资料收集的经验

总结5年来的资料收集工作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

- 1.任务明确。资料工作的任务是围绕教学和科研，为教研室和教师及时提供所需要的参考资料。
- 2.健全管理制度。有计划地培养从事资料搜集、研究的干部。在资料的组织管理方面要逐步从分散过渡到统一集中，要有专人负责。
- 3.尽量扩大资料征集面。如动员学员搜集整理资料。
- 4.典型示范。学校总结和介绍了林犹恭同志积累资料的经验。

（五）教材讲义与讲课内容的关系

学校强调教师要发给学生教材，但要求讲课不拘泥于教材，这一规定逐步得到教师认可。开始时有些教师认为发了教材讲义自己就没的可讲了，有的老师发了教材后，照本宣科。后来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深入，大家明确了要克服教条主义的教学方法，必须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地讲课。要重点突出，条理分明，运用形象的实例、科学的分析，增强讲课内容的说服力、感染力。

学生学习有教材或讲义，在今天看来是平常不过的事情，但当时学校的一份记录反映了学校在教课与学习问题上的探索和由不成熟到逐步完善的情况（参见表2-8）。

表2-8 1953—1957年学生使用讲义统计表

时 间	开设课程	不发讲义	发讲义	发讲义比例
1953—1954学年	15	5	10	66%

续表

时 间	开设课程	不发讲义	发讲义	发讲义比例
1954—1955学年	16	5	11	68%
1955—1956学年	22	4	18	82%
1956—1957学年	19	1	18	94%

八、求“用”务实编教材，向科学研究进军

中央财政干部学校时期的科研工作是以编写教材为主并结合专题研究进行的。

从1954—1955学年学校就开始组织科学研究工作，到1956年夏，就制订过三次全校性的科学研究工作计划。第一次计划所包含的科学研究任务过于庞大，有很大的盲目性，参加者有31人，项目有22个，由于选题不当，很多无法进行，计划完成得很差，主要原因是科学研究的任务是由教师提出，领导对于选题是否恰当基本上没有审查和研究讨论，学校仅仅把各教研室的计划汇总公布。财政部苏联专家认为很多题目的目的性不明确，因此这才引起学校的重视，学校专门请苏联专家介绍经验，准备成立学术委员会或科学研究委员会一类的机构，由委员会负责审查科学研究计划，定期举行会议，研究科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统一组织领导，发挥集体力量。1955—1956学年，第一学期科研计划有所收缩，但是完成情况也不是很好。第二学期，科研计划又有所增加，并且举行了学校第一次科学讨论会，讨论了8篇论文，这些论文和两年来作为科学研究工作项目编写的教材，是两年来科学研究的具体成果。通过科研工作，大部分教学人员已经认识到科学研究的重要性，认为这是提高教学质量和加强教师进修的主要手段，只有通过专题研究，才能解决讲授中不明确的一些问题。参加科学研究的教师，在收集资料和论文写作上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1954年11月8日，《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关于教研室工作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科学研究是提高教学质量与教员水平的基本环节之一，教研室必须结合当前教学需要，本着实事求是、稳步前进的方针，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首先就课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作专题报告，撰写论文，或为将来的科研工作积累材料。科研工作要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教研室要通过会议或个别的方式经常进行检查，并定期地组织科学讨论会或小型讨论会，认真展开自由讨论、大胆争辩以及友爱的批评态度，有重点地帮助若干教员，在时间上和其他条件上要予以一定的保证和便利，对每一个小小的进步和成就也要予以表扬和鼓励。”

1954—1957年学校共编写教材10种，专题研究文章44篇，发出资料41种。

1956年暑期，财政部举行了第一次科学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有7所大学和8个机关单位，中财有6位教师写了论文。其中有李文范的“我国过渡时期的民族政策”，谈通的“我国国家保险固定资产的损耗问题”，李皓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平改造的政策”，吕云鹤的“论我国粮食统购统销”，孙昌湘的“关于建筑安装企业财务状况的分析”，杨遗谟的“从研讨苏联周转税的建立原则中阐述在中国推行周转税的意义与特点”。

1957年1月24日，第一次校务会议决定，在校务委员会下设立学术指导小组，负责指导学校的科研工作、教材编写工作和向科学进军工作。学术指导小组由副校长崔敬伯负责，成员有武冠英、张伟弢、崔书香、孙邦治、李进之、张光三。

总结干校时期的科研工作，有以下几点经验。

- 1.领导比较重视，1957年还特设了由副校长牵头的“学术指导小组”，更增强了对科学研究工作的组织领导。
- 2.明确科学研究的方向和具体要求。过去学校曾强调科研工作为教学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方针，但实际做起来并不明确，有的题目过大，涉及面过于广泛；还有的是单位制订计划，并不是从教学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出发，而是为完成科研任务盲目研究，撰写论文好高骛远，为此，

学校提出应该本着由低到高的精神，开始时多研究一些具体问题，然后逐步提高。

3.选题必须结合教学或业务工作上存在的问题。会计教研室在1956—1957学年度的工作总结中说“我们编写的5种教材，《会计核算原理》、《工业会计与分析》、《基建会计与分析》、《预算会计》、《保险会计》都是结合现行会计制度编写的，教材的内容都要随着账户计划和会计报表的改变而改变，会计制度每年都修改，相应地教材也在不断变化之中。”¹

4.要从实践中去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要进行调查研究，要密切与业务部门联系和合作。过去学校的科研，一般只限于从书本和报章、杂志上收集一些现成资料，缺乏对实际事务的实地调查，因此，学校强调深入实际，仅仅以苏联和中国的书本、现成材料和规章制度为取法是不够的。

5.科学讨论会是评审科学研究成果的好方法。早在干校建立初期的1953年12月5日，学校就创办了《教与学》校刊。其办刊宗旨是：第一，组织交流和推广教学与学习的经验。第二，配合教学计划要求，及时通报有关教学进展、教学内容。第三，介绍苏联和人民大学的先进经验。到1957年，在将近四年的时间里，《教与学》共出刊52期，对教学工作特别是科学研究工作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九、规章制度建设情况

1953—1956年经校长批准执行的主要规章制度可参见表2—9。

1 档案资料：7-XZ-1966-7-1。

表2—9 1953—1956年主要规章制度一览表

年份	规章制度名称	备注
1953	《中央财政干部学校计划类报表制度》	—
	《中央财政干部学校成绩登记类报表制度》	具体规定了学习成绩的登记和报送办法，各种报表格式共计8种，规定内容均系按四级分制的要求设计的。
	《中央财政干部学校考勤类报表制度》	规定了学员出勤考查办法、报表格式和报送办法。
1954	《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关于执行教学劳动纪律的暂行办法》	具体规定了教学人员在教学中应该遵守的劳动纪律，并且规定了违反劳动纪律的各种处分办法。
	《中央财政干部学校课程考试与考查暂行办法》	具体规定了考试、考查、评分、补考等等的要求和办法。
	《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关于编著、翻译、校对教材及其它书籍、专论的稿酬和出版手续费的暂行规定》	具体规定了教职员所得稿酬的分配办法和编著、翻译、校对、出版等的手续。
	《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关于教研室工作的暂行规定》（1954年11月8日）	明确了教研室的性质和任务，规定了教研室工作的内容和要求，明确了教研室的组织领导关系。
	《中央财政干部学校校长办公室工作条例》（1954年11月8日）	—
	《中央财政干部学校教务处工作条例》（1954年11月8日）	—
	《中央财政干部学校班部工作条例》（1954年11月8日）	—

续表

年份	规章制度名称	备注
1955	《财政部直属干部学校教师教学工作量和工作日试行办法》（该办法系学校于1955年制定，1956年财政部批准颁发执行）	具体规定了教师教学工作量和工作日的范围、定额标准、计算办法以及对教师全面工作的要求和发给超额工资的办法。这是当时学习苏联经验的一项制度，主要精神在于合理使用教师力量，保证完成教学任务；提高教学质量，开展科学研究，加强行政领导，合理计算教师编制和逐步实行按劳取酬的工资制度。
1956	《中央财政干部学校教学大纲和教材的编审、印发试行办法》	—

学校历年颁行的各项教学制度，大多数是从人民大学直接学来，有些是根据中财情况稍加修改，有些是全部搬用。如计划类、成绩登记类、考勤类三种报表制度，最初从人民大学搬过来的时候，仅仅是换了一顶中央财政干部学校的帽子。有些报表格式和内容要求很细，甚至有教条化的倾向。学校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在1958年8月的教学总结中，学校提出要“大胆独创”，不要迷信苏联的“科学体系”。

在规章制度的执行方面，学校确实做到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以上规章制度都基本上得到了贯彻执行。仅1954年，因为各种原因，受到学校处分的人员达40多人，多数是因为上课迟到几分钟或因为放假晚归，即便是开车司机，因为汽车经常抛锚，也受到通报批评。现仍保存在学校档案馆里的，仅1954年一年由王绍鏊、秦穆伯签发的批评性《通报》就有14份之多，可见当时“执法”之严。

十、培训干部学员的情况统计

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在1953—1957年共培训学员4363人，其中一年制专修班结业2470人，半年制班结业1033人，其他类型的班结业852人。见表2—10至表2—12¹。

表2—10 1953—1957年一年制专修班结业人数统计表

专业班	1953—1954 学年	1954—1955 学年	1955—1956 学年	1956—1957 学年	合计
财政	—	130	149	102	381
税务	100	236	130	228	694
基建	—	—	201	238	439
保险	175	—	210	185	570
储备	80	75	90	100	345
会计	—	—	49	—	49
合计	355	441	829	853	2470

表2—11 1953—1957年半年制专训班结业人数统计表

训练班	1953—1954 学年	1954—1955 学年	1955—1956 学年	1956—1957 学年	合计
税务一期	264	—	—	—	264

1 表2—10至表2—12的数据来源于档案，4-XZ-1955-7-2，4-XZ-1957-7-3。

续表

训练班	1953—1954 学年	1954—1955 学年	1955—1956 学年	1956—1957 学年	合计
基建一期	292	—	—	—	292
税务二期	194	—	—	—	194
基建二期	194	—	—	—	194
会 计	89	—	—	—	89
合 计	1033	—	—	—	1033

表2-12 1953—1957年其他班结业人数统计表

专 业 班	学年分布				
	1953—1954 学年	1954—1955 学年	1955—1956 学年	1956—1957 学年	合计
师 资	—	—	—	35	35
二年制研究班	—	—	—	23	23
银行执行国家预算 出纳业务研究班	300	—	—	—	300
银行执行国家预算 出纳业务训练班	—	—	293	—	293
财政监察训练班	—	—	—	45	45
藏族干部班	—	—	—	12	12
文化班	—	—	142	—	142
合 计	300	—	435	117	852

第二节 中央财政干部学校的政治生活

一、政治活动日益频繁

1953—1957年的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同全国其他学校一样，政治活动越来越多（参见表2-13至表2-16）。
1954年9月份，就有六项政治活动：

表2-13 1954年9月政治活动统计表

时 间	事 件
9月4日	传达北京市张友渔副市长关于宪法解答问题的报告。
9月12日	请中国人民大学劳动模范陈树兰作学习报告。
9月14日	秦穆伯作关于棉布计划供应的报告。
9月15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全体员工收听大会的实况广播。
9月25日	何方明向全体学工人员作保密工作的报告。
9月27日	下午，收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广播后，全校师生高举毛泽东像绕校一周，欢声雷动。晚上，和人民大学联合举行营火晚会，狂欢至23时。 ¹

1955年的政治活动有：

1 当时人民大学部分学生仍使用我校部分房屋，1955年暑假，才彻底搬迁。

表2-14 1955年政治活动统计表

时 间	事 件
2月16日	上午，秦穆伯作关于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的报告；下午，向全体员工传达钱俊瑞 关于中苏友好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纪念的报告。
2月28日	学院与人民大学、农业研究所联合约请北京师范大学顾己洪教授向全体员工作关于原子能的报告。
3月30日	学院召开全体员工会议，秦穆伯作关于节约粮食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传达报告，以及关于兵役法的传达报告。
12月3日	秦穆伯作关于忠诚老实运动的动员报告，并规定从12月5—10日开始进行学习和交代问题。
12月21日	全院教职工160余人，为了配合农业合作化学习，赴郊区四季青和富强农业合作社参观。 ¹

1956年的政治活动有：

表2-15 1956年政治活动统计表

时 间	事 件
1月	请北京军区同志来学校作兵役法的报告，并召开座谈会，全校全体适龄青年纷纷表示响应祖国的号召，要求服兵役。
1月15日	学校学工人员80人参加财政部队伍，赴天安门参加了北京市各界人民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
1月17日	全体学工人员收听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关于认购公债的报告。1月23日，秦穆伯作认购公债的动员报告，到27日，学校认购30973元。

1 档案资料：4-XZ-1954-7-1，4-XZ-1955-7-1。

续表

时 间	事 件
1月11日	为了配合当时全国的“除四害”运动，学校从即日开始布置扑捉麻雀，至16日共扑捉81只。3月5日，学校布置“扑鼠运动月”的工作，成立了“扑鼠突击队”。
4月16日	胡立教副部长兼校长给全校作时事报告。
9月21日	学校党支部布置了“八大”文件学习，学员和教学人员从10月4日至9日停课5天学习；行政人员从9月26日至11月3日，每周三下午学习。
10月24日	税务总局李予昂局长来学校向全体人员作了中共“八大”的传达报告。
11月3日	学校学工人员100人赴天安门参加了抗议英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埃及的示威游行。
11月6日	学校教职员105人赴广和剧场听胡立教的时事报告。

1957年的政治活动有：

表2-16 1957年政治活动统计表

时 间	事 件
1月4日	学校传达陈云、李富春、戎子和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1月9日	传达田家英关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报告。
3月	全体人员学习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
4月15日	全体学工人员赴财政部欢迎伏罗希洛夫主席。
4月17日	学校布置关于“中苏友好月”的学习问题。
4月18日	邀请北京政法学校教授向全体学工人员作关于访问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报告。
6月28日	学校学员940人赴中南海，接受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会见。

二、政治运动中的中央财政干部学校

1953—1957年学校所经历的运动，主要是批判胡风运动、“肃反”运动和反右运动。

1955年，国内展开了一场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的批判。胡风是长期参加左翼文艺运动的进步的文艺理论家，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在进步文艺界中历来有不同意见和批评。5月，针对胡风向党中央提出的关于文艺问题的三十万言意见书，批判越来越猛烈，并且迅速演变为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揭露和镇压，完全混淆了敌我、敌友的界限，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了建国以后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大冤案。学校也开展了批判运动，凌大挺先生回忆说：

1954年还在上课，到1955年反胡风运动，胡风是文学批判家，你说咱们这学校跟他们也不相干，也搞运动，搞起来不得了！学校也揭发检举，揭发什么呢，不是文学批评方面的东西，而是不相干的。什么个人的恩怨啊，什么言论上的，反对政府的，反对共产党的，我们呢，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是在旧大学里面教过书的，对旧大学的那套制度比较熟悉。到这来之后啊，不太熟悉，又是党委制，党委领导。那么我们在教学方面呢，教材方面又遇到一些麻烦，心里就有点不习惯、不愉快，有时候就说些牢骚话，这样就成了一个“小集团”，其实它是一个工作单位啊，就把这个工作单位当成一个“小集团”了，我就算是“小集团”的头了。成了“小集团”以后，就报到了财政部党委，财政部党委说，小集团也不是个小集团，是个落后的小集团。那就把这个小集团打散了吧。原本也就没什么形式上的小集团，谁是头，干什么，这些都没有。后来就调我去图书馆了，教研室的工作就只能凑合维持，课也就没法上了，一搞运动你说还怎么上课啊。那个时候半天学习半天运动，就没法上课了。那时候教职人员的心理也不稳定，学生也在搞运动。

几乎与批判胡风运动同时，学校还进行了“肃反”运动。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就提出了“肃反”的任务。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全党必须更加提高警惕性，加强同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进行斗争的指示。从7月开始，一个全国规模的“肃反”运动，首先在省级以上的机关团体中展开，“肃反”运动经历了2年多的时间，到1957年才算基本结束。

中财干校从1956年4月到1957年2月也参加了这次运动，一部分人被抽调出来，专门搞“肃反”工作。在这场运动开始的时候，学校成立了5人小组领导这次运动。

根据上级布置，学校的“肃反”运动分三个阶段，即：思想、组织和材料的准备阶段；群众斗争阶段；专案审查阶段。

学校的档案记录显示：1956年4月14日，秦穆伯给全体教职员工作了关于“肃反”运动的政策传达报告；9月19日秦穆伯给全体行政干部作了审干动员报告，不久成立审干办公室；1956年11月27日，学校教职员120人赴大众剧场听胡立教作“肃反”运动总结报告；1957年2月16日，秦穆伯向全体教职员工作了学校“肃反”、审干的总结报告。¹

在运动中，学校组织全校教职工学习中央十人小组所制定的《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职及处理的政策界限暂行规定》，坚持“‘肃反’工作和校务工作两不误的原则”，前后召开过47次党员科长级以上干部思想见面会和9次全体党员大会，先后派出58名干部到外地调查。

这次运动的斗争策略是：“群众剥皮，专案审查，先礼后兵，攻心斗智”。

当时学校的总结提到：“根据中央指示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和‘提高警惕，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

1 档案资料：4-XZ-1956-7-4。



1957年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银行、财政等毕业生

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方针，通过运动的三个阶段，共揭露和查出反革命分子8人，对所有人员进行了处理，逮捕者2人，从宽给予行政处分者3人，免于刑事处分者1人，不予任何处分者1人，尚未处理者1人。在运动中，还组织群众进行了忠诚老实学习，有不少干部主动交代了问题，放下了包袱，有103人交待了自己过去隐瞒或未交待清楚的一般政治历史问题和社会关系问题。学校收到检举材料22件，为今后的审干工作和干部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总结最后写到：“通过这次‘肃反’运动，全体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斗争教育，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警惕性，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是今后保证各项工作完成的主要力量，学校工作出现了新气象，特别是过去在学校的自由主义小广播现象，有显著的克服。”¹政治斗争已经走入学校，这显然比建国初期的思想改造对学校的影响更大。

接下来是更加猛烈的政治风雨——整风、反右运动。从1957年5月到1958年8月，中央财政干部学校的整风、反右运动，历时一年零三个月。

运动初期，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进行“大鸣大放”。1957年5月10日，校部全体党员与部分非党干部去财政部，听戎子和副部长关于整风运动的动员报

告。15日，秦穆伯向全体学工人员作了关于整风运动的动员报告。18日，学校民主党派人士与高级知识分子等8人参加了财政部党组邀请的座谈会。20日，党总支召开了民主党派与非党负责同志的座谈会，征求对共产党整风的意见。许多同

志从帮助党整风出发，积极地提出了不少批评和建议，其内容相当广泛，涉及到方针政策、党政工作、教学工作、机构设置、领导作风、组织纪律、党群关系、工资福利、日常生活、违法乱纪等各个方面，差不多把学校及社会上存在的主要问题都提了出来。有的教师提出了许多今天看来也有积极意义的观点，如：有的教师强调要“独立思考”，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组织经济的职能；有的教师认为社会主义统计学，除了加减乘除与简单平均数外，毫无其他内容，极端枯燥，要运用资产阶级统计学中“选样理论，常态曲线，时间数列，相关系数”等等来分析社会主义的经济现象。

进入1957年6月，学校从1号开始，每日下午分别召开各种座谈会，继续参与党的整风运动。可是到了6月的26—27日，学校召开全体教职员工大会，对整风运动中的“漫画”¹和部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进行了辩论，并且以小组为单位学习文件。这应该是因为6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了毛主席亲自写的《这是为了什么？》的社论，其实毛主席在5月就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指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的最坚决最猖狂。”²“反右”斗争开始了。全国都陷入到这场政治运动之中，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完全被打乱了。7月上

1 据对当时参加运动的老同志的采访，所谓“漫画”是当时有位老师用漫画形式提的意见。

2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五卷，第424页。

1 档案资料：4-DQ-1956-1-5。

旬，连续几天下午召开全体学工人员大会或中型辩论会，对“反动漫画”和个别人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进行批判。3日，临时办公会议决定，全体学员参加“反右派”斗争，本学年延期到7月31日结业（后来，由于学员急须返回原机关整风，经过胡立教副部长批准，学员于25日结业）。

这次运动最终的结果是，由于“左倾”思想的错误，使“反右”斗争严重地扩大化了，伤害了许多爱国知识分子，对党内民主生活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在批判“极端民主化”的同时，助长了“一言堂”、“公式化”、“教条主义”的不良风气。

财政教研室是学校较大的教研室之一，在“肃反”运动和“反右”斗争中，受到的影响最大。1954—1955学年，教研室共有教师7人，后来查出所谓历史反革命分子4人，“‘肃反’运动中查出了以当时教研室主任为首的反动小集团一个，其首要分子受到撤职处分。”到了整风运动前，财政教研室增至25人，而“在整风中查出了‘右派’分子和‘右派’兼历史反革命分子8人，占教研室总人数的32%，被开除劳动教养的5人。¹从这个比例上看，中财干校也是中国“反右”扩大化的一个缩影、一个灾区。

在整风的基础上下放了三批干部。自1957年下半年到1958年底，整个学校处于运动之中，因为运动，1958年停止了招生。

本章小结

这一时期的中财虽然是“干部培训”性质，但是在教育教学和制度建设上也做了十分有益的探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除了1956年、1957年受政治运动的干扰外，中财基本上应该说是踏踏实实搞教育，认认真真谋发展。

1 档案资料：4-XZ-1960-7-1。

中央财政干部学校是当时由财政部创办的共和国第一所财政干校，曾与中央财经学院在一个校园里共存，当又一次院系调整把中央财经学院撤销后，中央财政干部学校把中财的血脉延续了下来，它又绝不只是起着一种薪火相传的作用，它以其干校的办学经验也为中财的传统融入了许多具有影响力的东西，为后来中财的办学特色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当然，教训也是有的，负面的影响也毋庸讳言，但我们不能脱开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去看，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怀疑当时的管理者与教育者为新中国培养人才、为新教育贡献力量的真诚。

这一时期有两个问题不得不说，一个是干校特点，一个是政治运动对教育的冲击。

梳理这一时期的校史，就不能不说干校特点：一是纯粹的“部门办学”体制；二是“少而精”的办学特色；三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办学思想；四是突出政治理论学习的课程设置。所谓“少而精”，表现为速成与实用，学制短，针对性强。所谓“理论联系实际”，也表述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还有一个说法是“政治与业务相结合”，前一种提法中“实际”重于“理论”；后一种说法中“政治”重于“业务”。这从培养学员有政治觉悟、有解决问题能力的角度，无疑是有效度的，但同时也削弱了学生与教师对学术的本质关怀。就像雷晓云说的：“学术性常识与日常性常识没有界限，学术研究应有的学术脉络在对社会现象的‘自觉’顺应中丧失。”¹这种办学思想无疑是受“苏联模式”影响的结果。

政治运动对大学的影响是荡涤灵魂的，是刻骨铭心的。1956—1957年，政治运动已非和风细雨，中财人在心灵上开始有了恐惧，人格上开始有了扭曲，中财人和全国知识分子一样，被迫进入了一种不得已的“异化”过程，其消极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

1 雷晓云：《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及其文化透视》，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页。

第三章 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时期 (1958年12月—1972年3月)

到了1958年底，所有战线上的群众运动高潮都暂时退去，国家开始了紧缩和反思，周恩来总理在4月份人代会上的报告中谈到教育问题时说：

“现在需要在这个大发展的基础上进行整顿、巩固、提高的工作。”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也由于经济的发展和形势的需要，根据上级指示，1958年12月1日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干部学校合并，成立了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这次合并，在中财历史上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财政、金融两大力量合拢，奠定了学校以后的学科发展方向。财政、金融这两支教学队伍，至今也是中财之劲旅。

新成立的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的主管部门是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以下简称“总行”），学校的日常工作由财政部领导。

第一节 合并前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干部学校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干部学校正式成立于1954年春。在此之前，总行干部学校不断处于调整、组合之中。

一、从一般培训到总行干部学校成立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是没收官僚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对国民政府的四大国有银行：中央、中国、交通、农业银行，人民政府实行的政策自然是无偿没收。同时，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社会稳定，人民政府对旧政府留下来的900万军政公教人员，只要他们不反抗新秩序，一律采取包下来的政策。总行在1949年接管了中央、中国、交通、农业银行以后，为了对留用人员进行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开始办政治训练班，于1949年6月至1951年8月，总共办了五期，训练1419人。¹

1952年7月，总行成立了专门培训组织：高级干部训练委员会。委员会成立后，举办了一系列训练班（见表3-1）。

表3-1 1952—1953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培训情况一览表

时间	培训说明
1952年10月—1953年4月	在私人金融业公私合营后，为了对合营银行的干部进行思想改造，总行共培训了合营银行的经理、副经理467人。

1 除了对旧银行留用人员培训外，1950年总行办了一个60人的老干部业务训练班。1951年8月至1954年7月，为了提高一般工农干部文化水平，总行举办了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初中、高小各四个班，共8个班，毕业人数172人。

续表

时间	培训说明
1953年2月—9月	为了提高高级领导干部的理论政策水平，总行办了分行行长研究班，培训49人。
1953年6月—9月	各地分行信贷科长和会计科长参加的信贷和会计班，共345人。 ¹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通过“高级干部训练委员会”的组织，举办训练班的同时，还准备建立专门的“银行学院”。1952年8月9日，总行行长南汉宸、副行长胡景联名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请示：

目前本行有干部26万余人，其中县支行行长及一等行员以上骨干有2万人以上，这些骨干中大多数是参加工作不久，政治水平不高，在政策业务上对于预算监理、集中信用及统计监督企业财务等都很生疏，担负“银行为国家总会计机关”的伟大而艰巨的任务是困难的。而我们的业务发展却突飞猛进并愈益复杂，尤其是明年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以后。因此，我们急需培养中级以上骨干，加强其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提高其理论政策及业务水平。这不但是目前的迫切任务，也是长期的工作需要，不是开办短期临时训练班所能够解决的问题，必须设立专门学院长期培养。1950年我们同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合作，分别在两校设立银行专修科，共办了4个班，学生约300人，这种办法虽然也收到一些效果，但是极不经济，更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院校合并以后所设专修科必须自行接办，我们请求筹设银行学院。参照苏联的先进经验，结合我们目前及长期的银行工作情况与需要，银行学院拟设立：综合金融、货币管理、农村金融、会计等四系，长期培养各项业务比较全面的人才，修业期限暂定为3年。附设：

1 档案资料：5-XZ-1958-7-2、3。

(一) 专修科：拟分货币管理、私人业务、农村金融、国际清算、会计等5科。(二) 训练班及研究班，修业期限为数月至一年。因为任务很艰巨，需要很迫切，请早日批准，以便进行准备工作，大约1953年上半年准备完成，下半年即可以开学。¹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总行的请示没有被批准。1954年春，为了适应新的金融形势，总行决定将高级干部训练委员会与文化补习学校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干部学校。校址在北京复兴门外真武庙。全校教职工共90人。图书馆藏书共4万余册。

总行干部学校在组织领导关系上，是属于总行内部司局机构之一，党政工作一律由总行直接领导，副行长兼任校长，另设专职校长负责日常行政工作。1954年学校刚刚成立时，行政方面设一处一室，即教务处与办公室，教务处领导6个教研组。办公室下设总务科、秘书科。党的领导方面设有党总支。

总行干部学校成立后，于1954年2月20日召开临时会议，宣布组织机构的调整、今后的任务以及人员的工作分工。

校部设校长和副校长。校长由总行副行长黄亚光兼任，副校长为何松亭、王厚溥、郑伯彬、宁嘉风、樊德志。

教务处：教务长为高文明；副教务长为黄岭松²

政治经济学教研组：负责人刘光第

货币流通与信用组：负责人郑伯彬

货币与结算组织组：负责人宁嘉风

企业经济活动分析组：负责人张玉文

1 档案资料：5-XZ-1955-7-1。

2 黄岭松，1938年入党，曾任冀鲁印刷分局秘书、石家庄人民银行直属厂副厂长，后长期在中财工作。晚年所写关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回忆录，受到大家好评。参考材料：7-DQ-1962-1-2。

银行会计核算组：负责人韦锡九

综合组（编译组）：负责人也是郑伯彬

办公室主任：陈同玉

秘书科：负责人张志坚

总务科：负责人陈玉良。

(注：1955年，教研组由校长直接领导，教务处对教研组只有教学指导关系，并且成立了政治课教研组。1956年以后撤销了综合教研组，新成



1958年11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越南实习生结业合影



1958年就读于我校的部分越南留学生与老师的合影

立外汇教研组，并且将政治课教研组划归文哲学教研组）

1954年4、5月份，总行干部学校做了开学前的准备工作。自从学校确定改组后，为使各项工作走向正规，学校进行了规章制度的起草和讨论、调整组织机构、研究职责分工、制定教学计划等工作。教研组突击写讲义和讲稿，刘光第、余宗范、张元元编写《政治经济学》，张玉文等编写《企业经济活动分析》，郑伯彬编写《货币流通与信用》，宁嘉凤编写《信贷与结算》，韦锡九编写《苏联国家银行会计核算》。讲义初稿完成后，举行了4次试讲，召开了试讲座谈会，互相提供了改进讲课的意见。同时，还周密安排了新生的接待工作。

1954年5月7日，学校举行了改组后的第一期学员开学典礼。这一期共开了二个班，其中信贷班97人，会计班92人，另有旁听生17人。总行副行长黄亚光出席会议并讲话。开学典礼后，学校进行了思想动员和纪律教育。1955年1月，训练结束。

1955年9月至1956年7月，举办第二期训练班，训练人数为：信贷班112人，会计班69人。

1956年9月至1957年7月，举办第三期训练班，训练人数为：信贷班121人，会计班73人。

除了上述三期“信贷会计训练班”外，总行干部还在1955年3月至1955年7月，开办信贷教研班，训练81人；1956年3月至1956年8月，开办农贷教研班，训练45人。

1956年总行干校接受了培养越南国家银行实习学员的任务，实习学员共37人，学习信贷的20人，学习银行会计的9人，学习外汇的8人，学习期限3年。干校为此设立了信贷、会计、外汇三年班。学员除学习政治理论和中文共同课程外，还学习三到四门专业课程，1958年底全部结业回国。

二、总行干部学校的教学工作

总行干部学校的教育方针是：“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政治教育与业务教育相结合，苏联先进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针下，培养初步理解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法则，货币流通与信用的基本原理，苏联货币与信贷工作的先进经验，并正确贯彻政策，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中等干部，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增强工作能力，以便为不断改进银行工作，贯彻总路线创造条件。”¹

这个学校的学员一般是根据训练计划，由总行、区行、分行抽调在职人员，以训练中心支行长、总区分行科长及相当程度的科员为主。

学校的教学内容，主要是业务学习，也有政治学习。1956年以前的信贷班、会计班、信贷教员班，完全或主要是讲所谓的苏联先进经验。1956年4—8月的农贷班，1956年9月—1957年6月的信贷班、会计班主要讲中国的内容，配合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当时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哲学、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货币流通与信用、货币与结算、企业经济活动分析、银行会计结算以及专题报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领导的专题报告，据不完全统计，1956年行长和司局长讲课占全部讲课总时数的18.3%；1957年行长和司局长讲课占全部业务课讲课总时数的26.8%。

表3-2 1956—1957年度专题报告情况统计表

讲课人	职务	内容	讲课时数
曹菊如	行长	当前银行政策	4
黄亚光	副行长	信用合作	8
陈 穆	行长助理	信贷计划	8

1 档案资料：5-XZ-1957-7-2。

续表

讲课人	职务	内容	讲课时数
丁冬放	行长助理	信贷工作的问题	9
李绍禹	行长助理	农业信贷	16
曾 凌	金融研究所主任	货币流通	8
姚国桐	商业信贷局局长	商业信贷与结算	14
徐里程	会计司司长	银行会计核算	20
朱 川	私人业务局副局长	私营工商业信贷	4
赵志诚	工业信贷局副局长	工业信贷	24
王伟才	私人业务局副局长	关于城市储蓄业务	4

在教学方法上，主要采取讲授、自学、小组讨论、课堂讨论、课后练习、写学习心得、个别辅导、集体辅导、测验、考试等等。教学中提倡互相帮助、互相监督、充分发挥学员的自觉性、主动性。适当加重自学时间与讨论时间，以便发挥其独立思考、联系实际达到学以致用目的。如1956年秋，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国内发生了一系列与“三大改造”有关的经济问题的争论，学校本着诱导学员联系实际，启发思考，组织了“定息的性质问题”和“农业合作化政策问题”两个专题讨论。教员预先深入各小组帮助学员搜集资料，组织持不同意见的学员准备发言提纲。通过讨论，学员对问题的认识深入了一步，大家反映开展专题讨论是干校学员学习的一种好形式。这时，正是中共“八大”召开前后，自1955年年底以来，中央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决策有着急躁冒进的倾向，1956年冒进情况愈加突出，严重脱离国情，脱离实际，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在实际工作领导第一线的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同志想方设法采取稳妥有效的措施，力图纠正急躁冒进的经济计划与经济运作，经过他们的努力，到1956年9月中共“八大”上，党中央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

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冒进”稍息，但这个“反冒进”的正确决策其实并不彻底，“反保守”和“反冒进”还是并提的，其实没有“反保守”的急于求成，也就没有全国性的大冒进，可是“反对右倾保守主义”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所以“反保守”就不可能在党的决议里去掉，尽管在严峻的经济形势面前，“反对右倾保守主义”的声音暂时弱下来，但是也为后来的“反‘反冒进’”留下了火种。中央银行干校的学员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积极讨论国家经济建设方面的问题，周恩来“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的思想，¹对学员们的讨论有着积极的影响力。

在教材建设方面，1956年以前，学校一方面把苏联的教科书在文字和结构方面重新加工一遍，一方面把其他学校的教材照搬运用。1956年起，学校对教材内容进行了较全面的改革：一方面是面向实际，密切与总行各专业司局的联系，深入各省市分行、工厂、商店、农场去了解情况，搜集资料；另一方面是讲业务结合政策，根据几年来行长和司局长给干校学员上课的材料，教员讲课的体会和经验，学员反映的问题等等，不断修订和完善教材，使教材内容符合实际。学校各业务教研组与总行各专业司局的联系方式有：向有关司局汇报教学工作情况；请有关司局主管各项业务的同志作专题介绍，调阅案卷，教员借此了解情况；由业务部门派专人与教员共同组织教材小组，讨论教学大纲和讲义；教员参加有关司局重要章则制度的讨论；写好的教材初稿送有关司局审查。

1956年12月22日，总行干部学校成立了科学研究委员会，由郑伯彬、宁嘉风、韩子文、刘光第、刘文成、韦锡九、张宣、邵德厚、胡秀豪、王厚溥等10人组成。郑伯彬和宁嘉风分别为正、副主任。

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干部学校成立后，总行仍然没有放弃申办专科学校的努力，1955年总行领导研究国内和苏联金融人才培养经验，请示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总行干部学校改组为××信贷经济学院的意见”，意见

1 1956年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作了题为《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的报告。

列举了设立专科学院的理由：(1)银行系统减员严重。1954年，银行系统调往其他机关13000余人，辞职2300多人，开除3400多人，退休3000多人，死亡500多人。1954年各银行学校毕业生只有800人。全国银行系统需要大学生2679人。(2)1955年8月19日，高教部发函，中国人民大学不仅停办银行专修科，而且停办了货币与信贷专业，这就减少了专科毕业生的来源。(3)根据苏联的经验，各部门需要的专业人才，均由各主管部门自己培训，苏联国家银行的专业人才是由莫斯科银行学院培养的。(4)根据几年来总行调训科长级干部的经验，国务院和高教部对总行干部学校改组为学院也有考虑。

为了学校改组，总行干部学校还详细拟定了培训方针、班次及人数、本科学员来源、经费来源、领导关系等具体内容，甚至还设计了改组的步骤，包括将人民大学货币与信贷专业停办后的师资力量合并过来、教研室的扩建、课程的开设、学生宿舍的建设、教学楼和研究室楼的建设等等。

但是，总行的建议和努力始终没有结果。不久，总行干部学校就被取消，与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合并为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

第二节 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时期

一、干校合并

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壮大办学力量，财政部党组和总行党组共同决定，中央财政干部学校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干部学校合并，组成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

当时，组建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也是为建立一所由财政部和总行联合管理的财政金融学院打基础。因为当时教育部主张财政部和人民银行总

行两家合办学院，这可能是人民银行总行努力求办银行学院终未获允的原因。

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校址在北京西直门外四道口，即中央财政干部学校所在地。1958年5月6日，“并校小组”提出两校并校方案，包括校名、机构设置、专业班设置、人员编制、房产问题、人员配备和处理等内容。

总行干部学校搬家到四道口后，一切准备工作就绪。1958年12月1日召开成立大会，会议明确规定，今后学校的大政方针由财政部和总行两个部门共同决定。学校党委的工作由财政部党委来领导。

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存续时间较长。1960年1月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成立后，干校和学院并存，两块牌子，一套人马，1961年后干校再没有招生。直到1969年12月同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一齐停办。1978年3月，根据国务院的决定，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又和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一齐被恢复。

二、干校性质和教育方针

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的基本任务是培训全国财政和银行系统在职省、地、县级领导干部，具有“部门办学”的干部培训性质，学制一年。

学校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以“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政治与业务相结合，提高思想水平，增强工作能力”为教学宗旨。

政治理论课是学员的必修课，以学习毛泽东的著作与中央有关文件为主，此外每周固定2小时，作为时事学习时间。

在业务理论和财政、金融政策的教学过程中，学校具有鲜明的特色：业务课由部、行长及业务部门司、局长授课或作报告，由各教研室教员负责个别辅导或集体辅导，采取单元教学和专题教学的形式进行。

干训班学员大多数是领导干部，有的经过战争的锻炼，一般有一定的

政治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经验，学校在教学上灵活机动，学员需要什么教什么，缺什么补什么。

三、干校机构设置



贝仲选

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成立时，党委书记是贝仲选¹，并且兼任校长，党委副书记是秦穆伯，并兼任副校长。1961年4月，贝仲选调离学校，从1962年3月起秦穆伯任校长，1962年9月财政部任命秦穆伯为党委书记。

干校的组织机构设置：书记、校长以下设有党、团办公室，教务处，校务处，组织处。

教学方面设有七个教研室（组），即：马列主义教研室、财政教研室、金融教研室、会统计教研室、保险教研室、基建拨款教研组、体育教研组。

1958年底干校教职工总人数153人，其中行政干部52人，教学人员55人，勤工人员46人。

1959年6月24日，为进一步适合教学工作，便于教学、行政工作顺利开展，确保训练工作质量，校党委依据精简机构精神，将校机构作了通盘的细致研究，最后将学校的处、室精简为二处三室。行政方面：把原来的

教务处、组织处合并，命名为组教处，管理教务行政工作和学员的组织管理工作；原校务处改为行政处，管理校产、伙食、福利等一系列的校务行政工作；党委办公室，管理日常党务、人事、保卫工作。教学方面：将政治理论、财政、金融、会统四个教研室，合并为政治理论、财政、金融三个教研室，原会统教研室的人员，依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分别并入上述三个教研室。

1959年6月24日，各处室负责人为：

党委办公室主任康民；组教处处长黄岭松，副处长刘维民；行政处处长陈同玉。政治理论教研室主任高文明，副主任杜晴、张光三；财政教研室主任张伟弢，副主任沈云、唐梅林、王博；金融教研室主任张焕彩。¹

当时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的人事调动和副科长以上的干部任命都由财政部直接管理，财政部对所属的司、处、科与干校的处、科干部在任免时，视同一体，使用同一种任免通知。

四、教师深入农村调查，为教学做准备

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成立后，为了更好地联系实际教学，了解当时农村“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实际情况，学校曾组织三个调查队，先后深入农村调查研究。

一个队由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秦穆伯带领，教员、干部共15人，到河南省鄆师县。一个队由党委副书记兼教务长武冠英带领，教员、干部共8人，到湖北省鄂城县和襄阳县。一队由党委委员、财政教研室主任沈云带领，教员、干部共17人，到江苏省江宁县和扬州市。

这次调查的效果是：

第一，增加了对实际情况的了解。

¹ 贝仲选（1908—1970），河北巨鹿人。1938年参加革命，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巨鹿县战委会主任、宁晋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冀南行署粮食局局长、中共华北局党校研究室副主任、中共冀鲁豫分局研究室主任。1945年后任山东临清市长、冀南区第一专署专员，皖北行署财政处处长，第二野战军运输大队政委。新中国成立后，贝仲选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第一副部长、国家保险总公司经理。1955年1月3日被任命为国家财政部部长助理。1956年3月31日，贝仲选以保险专家身份入选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

¹ 档案资料：6-XZ-1959-7-2。



沈云带领调查队在南京中山陵

第二，在调查中，发挥了财经学校的优势，学用结合。例如江苏调查组在农村人民公社重点调查研究公社的财务管理，为了帮助公社健全财务管理制度，调查结束后，根据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提出的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话，即：“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草拟了公社财务管理制度、会计制度、农民口粮按年龄合理分等定量和公共食堂管理规定。调查组将这些制度、规定草案送给了公社领导参考，受到高度好评。

第三，调查中，小组成员深感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经验，无现成的答案，很不容易；若急于求成，必适得其反；一定要按客观规律办事，不能只凭主观愿望行事。

五、“反右倾”运动中的干校一期

1959年8月，干校一期学员名单确定，学员来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岗位。他们当中，处长、专区局长、中心支行行长、县局长和支行长等领导干部605人，科员和各省、市、自治区财政和银行学校教员103人，共708人；属于财政系统的303名，属于银行系统的405名。学员中党员572人，占学员总数的80.79%。县局、行长以上领导骨干605人，还有4.1%的学员是各省、市、自治区干校的教员。¹

学员来学校前，先在各省市集中，到人民公社和厂矿企业调查研究一个月，9月中旬陆续到校。学员报到后，划分成财政6个班，共303人；金融6个班，共405人。

1959年9月21日，第一期干训班正式开学。到1960年8月8日，第一期干训班正式结束（财政班8月6日结束），时间将近一年。

由于第一期干训班开学时适逢国内掀起反右倾运动和整风运动，故第一期干训班在干校的学习分为二个阶段，以下分别叙述之。

（一）在反右倾运动中

1959年8月2—16日，八届八中全会召开，通过了反右倾决议，八届八中全会召开以后，反右倾决议逐步传达到全党，从1959年8月到1960年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批判和打击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这是“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继续与发展，毛泽东说，反右倾，鼓干劲是时候了！²全国又开始冒进，坚持高速度，否定综合平衡，不顾客观经济规律，单凭主观意愿蛮干，甚至认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周恩来们“反冒进”的思想和作为又让更大的冒进冲散了，国民经济出现了更严重的比例失调，从而使我国国民经济在1960年

1 档案资料：7-XZ-1962-7-1-3。

2 朱建华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纪事本末》，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70页。

到1961年出现了严重的困难，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反右倾”运动把党内一大批坚持实事求是的、敢于讲真话的、坚决反对“左”倾错误的党员干部，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不应有的组织处分。

“反右倾”运动在高等院校，主要是批判“党员专家”，认为他们“浸透了资产阶级世界观”，“一面以党员资格获取党内外政治信任，另一面又以专家资格同党分庭抗礼”，说他们“坚持要走反党反群众的道路”。¹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迎来了一期学员。开学后，学员们首先参加正在进行的反右倾整风运动。运动分五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学文件，听报告，片断反省。学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听财政部金明副部长、人民银行总行黄亚光副行长反右倾整风运动的动员报告，听财政部吴波副部长关于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精神的报告，根据文件和报告的精神联系自己的思想进行反省。

第二阶段，从10月12日开始，普遍交心，重点批判。学校有10个支部组织了交心大会，共计开会12次，有33人带头交心。随后在校党委的号召下，支部、小组和个人之间展开了竞赛，迅速掀起了大字报高潮。经过排队，校党委确定为重点批判的有1人，重点帮助的有3人。

第三阶段，从12月6日开始，系统批判，普遍提高。学校采取批判重点和照镜子相结合，系统批判和普遍提高相结合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同学们与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划清界限，正确认识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这三面红旗。

第四阶段，从1960年1月11日开始，专题学习，系统提高。1960年1月10日，学校的整风运动基本结束，为了巩固整风成果，提高学员政治思想水平，根据整风中暴露的错误思想、糊涂观念，归纳为11个政治理论专

1 见同上书第476页引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市委关于高等学校揭发出一批有关严重资产阶级思想党员专家的报告》的批语，1960年1月6日。

题¹，从1月11日开始学习，在这个阶段中，由学员自学、讨论、辩论，政治理论教研室教员辅导解决。当时的汇报材料认为，这一阶段的教学目的是，以毛泽东思想和总路线为纲，主要解决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认识问题和世界观的问题，从而改造思想，提高思想水平。

第五阶段，总结阶段。分为个人总结、支部和学校的工作总结。

干校一期学员一入学就赶上运动，几乎无法读书，这是“左倾”错误造成的结果，是不以学员和学校的意志为转移的，就学员参与运动的方式、方法和所作所为看，无不打上“左”倾错误的时代烙印，例如：

第一，学生入学后，首先“交心送礼”，“送礼”的内容是写大字报，据统计，短短一个月，大字报总数达到107799张，平均每人153张²。

“交心”是交代自己的问题，学校多次动员，启发教育，解除学生顾虑，积极宣传“三大（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万岁”，许多学生在当时氛围的影响下，纷纷作了自我批评。

第二，在专题学习阶段，学习的宗旨是教育学员理解“三大万岁”。

第三，学员参与了所谓“采取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进行政治理论学习，实现学习上的‘大跃进’”运动。学校在“专题学习阶段总结”中提到，“学生共提出7889个问题，党支部综合归纳为2267个问题，提出问题后，由学生进行大辩论，形成了畸形而浩繁的自我教育为主的群众运动。在提出的2267个问题中，有1086个问题是学员小组解决的，学员研究小组解决了630个，教员只解决了58个，这样就解决了教员辅导力量不足困难，使教员能够抽出时间提高讲课和辅导质量。”³

1 11个专题的题目是：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大炼钢铁问题；农业生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市场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城乡关系和工农联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阶级斗争；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和作用；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如何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反对资产阶级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

2 档案资料：7-XZ-1962-7-1-3。

3 档案资料：7-XZ-1962-7-1-3。

第四，学生被迫卷入体育、学习“大跃进”。文体活动要求“百日千分”，每人一百天至少有一千分。连评选先进也是“大跃进”，政治理论学习结束后，经过严格评选，财政、金融12个支部评选出“五好学员”292人，先进互助组17个，红旗手33人，红旗小组14个。

但是，即使在严肃的政治运动中，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也秉承了他一贯的作风，理论联系实际，比如在专题学习阶段，师生员工讨论的11个专题，结合实际，是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和理论水平的。

（二）业务学习

1960年5月2日，反右倾整风运动结束。随即转入业务和方针政策的学习。此时，学员又增加了广西师资班61人，增加了各省、市、自治区财政金融干部学校、财贸干校、财经院校教员班135人，全校学员达904人。

财政6个班业务教学从1960年5月6日开始。教学的最大特点是，教学内容联系实际，主讲人多为从事实际工作的领导干部，例如：

第一单元，学习财政预算问题，分八个专题：

财政工作如何贯彻群众路线，大搞群众运动（金明副部长）；全国预算会议精神的传达（预算司杨副司长）；财政体制问题（预算司许副司长）；国家预算的编造与执行（预算司王副司长）；综合财政计划（计委赵帛局长）；社会文教财务（文教财务司侯副司长）；十年来财政工作的基本经验（戎子和副部长）；先进单位经验介绍（四川财政厅、沈阳市财政局、北京西城区财政局等）。

第二单元，学习城市财政问题，分七个专题。主讲人分别是：财政部的王学明副部长、经济司司长、基建司司长、税务总局局长、会计司司长、统计局局长等。

第三单元，学习农村财政问题，分五个专题。主讲人有财政部吴波副部长、财政部财务司长等。

在讲课过程中，财政教研室、会统教研室负责辅导。

财政6个班业务教学8月6日结束。金融6个班业务教学从1960年5月6日开始，8月初结束。

教学过程中的最大亮点也是教学内容理论联系实际；部长、司局长亲自授课。例如：

第一单元，学习银行的任务。分五个专题：为总路线服务是银行工作的基本任务（总行陈穆局长）；关于货币、信用和银行工作的若干基本理论（金融教研室）；银行在完成国民经济计划中的作用（计委周局长）；支行工作的组织领导（江苏南通支行行长）；加强调查研究，改进工作作风（金融教研室）。

第二单元，学习农村金融，分四个专题。分别由总行副行长、总行农金局局长讲授，四川江油支行、辽宁台安支行、黑龙江克川支行作了经验介绍。

第三单元，学习工商信贷，分三个专题。除了总行局长讲授外，沈阳分行、河南新乡分行、重庆市分行分别作了经验介绍，结合实际工作讲工商信贷理论知识。

第四单元，学习储蓄、外汇、银行会计、货币流通等，分七个专题。由副行长、行长助理、局长讲授，金融教研室、会统教研室辅导。

财政、金融12个干训班在学习过程中，都到公社参加生产劳动一个月。第一期干训的教学方法，强调学员自学为主、教员辅导为辅的重点教学方法。

这主要是针对学员的实际情况，同时，也是为了实行启发式的教学，调动学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教学中，还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特别是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采取学员自己教育自己的方法；鼓励学员互相学习，互相交流学习及工作经验；在教学管理中，表扬先进以促后进，以先进带后进，注重提高学员的思想政治水平和业务理论、政策水平。在学习成绩考核上，还作过考场内开卷考试的试验。

干校一期中，“部长们、行长们与业务司、局长亲自讲课，对学员鼓舞最大，对学员更加深入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帮助最大，1958年财贸干校

工作会议强调了负责同志讲课问题，财政部、总行党组对这一方面抓得很紧，负责同志认真备课，有的负责同志不仅讲课，还亲自组织辅导，彻底解决问题，因之讲授质量高，学员普遍反映收获极大。”¹

这一期学员的学习分两个阶段，1959年9月21日—1960年5月6日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学员以参加运动为主；1960年5月6日—1960年8月8日为第二阶段，学员以业务学习为主。1960年8月8日结业，回原单位工作。仅一年的培训时间，政治运动就占去大半，这与其说是一年的专修班，毋宁说是半年专修班，可见当时虽然政治运动总体上不似此前的1956年和1957年那么轰轰烈烈，但是对教学的冲击，同样是相当严重的。

六、暂时无“运动”的干校二期

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二期干训班学员，于1960年10月10日开学。在来校以前学员先实习一个月，1960年11月6日正式入学。

第二期干训学员总人数1060人，其中财政6个班，400余人；金融6个班600余人。

第二期干训期间，因为反右倾整风运动已经结束，没有受过多的政治影响。在教学计划安排、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与第一期干训基本相同。

当时，由于国家处在严重困难时期，各地基层工作相当繁忙，领导干部学员较少，所以第二期财政和金融的干训学员提前结业，于1961年1月底，学员学习结束，回原工作单位。

1960年10月10日，同时到校学习的还有财政、金融二个师资班，共计39人，坚持到1961年7月，结业后回原单位工作。

除此之外，1960年4月—1961年1月，学校举办了广西政治理论师资

班，为广西财政、银行部门培训61名政治理论教员。

1961年，学校还为北京军区代培二年制中专性质的国防财务班130人，学制一年，1962年全体结业。

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共计培训学员2000余人，积累了一定的办学经验，为日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章小结

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单独存在的时间虽然跨越了三个年头，然而满打满算也不到两年的运行时间。中央政府部门主办的两所专门的财经类干部学校的合并，可谓是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也为探索财经干部培训的最优化路径夯实了基础。

探索是艰难的，但是这种探索并没有停歇。

对学术的追求尽管不是干校的主要志趣，但是学术研究还是在教材建设上显示出其强大的推动力。理论联系实际，是当时几乎不二的研究方法和教学方法，关键是对理论联系实际怎么理解，是所有理论都能联系所有实际呢，还是部分理论可以联系部分实际？在没有进行审慎的逻辑求证的情况下，它就成为工作中“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同样，“求真求实”在当时及以后很长时间成为一些大学办学宗旨和校训的表述内容，这在理论上说无可厚非，但通常把“求实”等同于“求真”，这就过于简单了。其实“真”和“实”并不一样，“真”是形而上的；“实”是形而下的。我们通常把两者混淆，把务实就当做求真，而现实可用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的，“真”的东西也不一定实用或敢用。我们在这一时期提出“学员需要什么教什么，缺什么补什么”，这是务实；1957年陈振汉¹等先生在《经济研

¹ 陈振汉（1912.7.3—2008.1.19），浙江诸暨人。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教育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全国第一批中国经济史专业博士生导师，是中财著名教授崔书香的丈夫。

¹ 档案资料：7-XZ-1962-7-1-3。

究》上撰文发表《我们对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说古典马克思主义著作能够解释100年以前发生的事，但不适合当前经济发展的情况，这是“求真”，但这“求真”的结果是陈先生被划为“大右派”。所以“求真务实”应该是很好的传统，但是在当时“务实”是第一位的，“务实”往往覆盖了“求真”。

这一时期的艰难表现在“天灾人祸”上。“天灾”就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人祸”就是“反右倾”运动。尽管中财的档案资料显示，这一时期的运动基本上还算有理智、有秩序地进行着，但是据一些知情人回忆，运动确实伤害了教职员工的感情，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干群关系。领导干部被误解，教职员工被误批，天下如此，人何以堪！好在后来在1962年的“广州会议”（即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周恩来、陈毅代表中央为全国知识分子“脱帽加冕”，陈毅说：“知识分子是人民的劳动者，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¹这在当时是十分鼓舞人心的。

第四章 中央财政 金融学院时期 (1960年1月—1978年3月)

1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04页。

第一节 一波三折的1960—1962年

一、本科教育的开局之年

（一）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创立

1960年初，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也是适逢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号召下，这一年中国出现了大办教育的高潮。当时任中央财贸政治部主任的姚依林¹提出，要成立一所培养财政、金融、会计专业人才的高等学校。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的校领导²听到传达后，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学校发展的良好机遇，于是，学校起草了一个关于成立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报告，报告提出：为了适应“大跃进”的新形势，满足财政、金融干部的数量增长和质量不断提高的需求，我们认为有必要成立一所在财政部和人民银行总行直接领导下的财政、金融方面的高等院校，并拟名为中央财政金融学院。

这个报告以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的名义上报财政部，并转报中国共产党中央财政贸易工作部。报告所提建议很快得到批示：同意建立一所财政、金融方面的高等院校，并定名为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意见。但不把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合并在学校，干校还存在，两个牌子，两种性质，一套教职人员。

1960年1月23日经中央财贸政治部批准，在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的

1 姚依林（1917—1994），出生于香港。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193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北平学联秘书长、党团书记。是“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国务院财贸部门的领导工作，先后任贸易部副部长、商业部副部长、中央财贸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商业部部长、中央财贸政治部主任、国务院财贸党委副书记等职务。“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严重迫害。1973年11月，任对外贸易部第一副部长。1977年3月，任国务院财贸领导小组组长。1978年8月任商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任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1979年3月，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1979年7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经济工作。

2 指当时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的领导人秦穆伯。



1960年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广西政治理论师资班毕业合影

基础上，正式创办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地址在北京西直门外学院南路。此后，学校大门两旁，一边挂着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的校牌，一边挂着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校牌。

1960年3月9日，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党组，根据中央财政金融学院2月12日提出的“关于筹建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初步方案”，联合制定了“关于筹建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初步方案（草稿）”，该文件以“60财党字第8号”和“60银组字第12号”发出，明确提出：为了加强对学院的具体领导，由财政部、人民银行党组委派5—7人组成领导小组，协助党组处理有关学院工作的一些重大事宜。文件还明确：学院将设财政系、金融系、会计系三个系（注：学院正式决定设置系级机构是在1961年5月17日）。财政系下设国家预算、企业财务、人民公社财务三个专业；金融系下设储蓄、农村金融、工商信贷、外汇管理四个专业；会计系下设预算会计、银行会计、企业会计三个专业。学制为：本科4年、预科2年、师资专

修科2年。¹值此，中央财金学院作为全日制的大学，在20世纪60年代第一个年头的初春，踏上了新的征程。

（二）大跨越，新台阶，新目标

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前身华北税务学校成立，到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挂牌，学校已经走过10多年的风雨历程，然而，在此之前，学校的主要任务是以培训财政金融干部为主。尽管学校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培养了大批合格的建设者和管理者，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但学校还没有办全日制高等学校的经验。历史发展至此，学校已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有了一个进一步发展的平台，在人才培养方面，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学校迈进了全日制高等院校的行列。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成立后，学校随即调整办学思路，明确了学校性质，按全日制高等学校的要求制定了教学目标、教学任务和教学方针：

1.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性质是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共同领导的、财政部管的财经类全日制高等学校。

2. 学校的基本任务是贯彻执行“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财政、金融、会计、保险、经济管理专门人才。

3. 本科生的培养目标是：使受教育者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学生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所学专业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所学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1 档案资料：7-XZ-1960-7-1，7-XZ-1960-7-2。

的能力，比较熟练地运用一种外国语阅读专业书刊；具有健全的体魄。

学校目前主要培养四年制本科生，待条件具备时，再培养研究生。

（三）为培养本科生做组织准备

“适千里者，三月聚粮”，新的征程，任重道远。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成为全日制高等学校后，师生员工群情振奋，院领导夜以继日，教职工全力以赴，为培养本科生做准备。

毛主席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建立起一套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是首要的问题。当时的组织机构是两个学校（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和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一套机构、一支教职工队伍。财政部部长助理贝仲选兼任两个学校的党委书记和校长，院、校党委副书记和副院长、副校长由秦穆伯、姜明远¹担任，教务长由党委委员武冠英担任。其他主要部门的负责人为：



姜明远

党委办公室和人事处：康民

教务处：黄岭松

干部训练处：刘维民

总务处：陈同玉

哲学教研室：高文明

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张光三

财政教研室：唐梅林

金融教研室：张焕彩²

1 姜明远，1938年12月入党，曾经任陕甘宁边区财政厅被服厂副厂长、察北禁烟督察局局长、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会计处副处长，中央财政部财政督察处处长、财政部督察司副司长，后长期在中财工作。

2 张焕彩，曾任枣阳县枣北区财经科长、冀南银行会计学校教员、教务主任、总行会计司科长，后长期在我校工作。参考资料：7-DQ-1962-1-2。

会计教研室：张伟弢。

这些先贤，可以说为日后中财院的发展，贡献了极大的革命热情与管理智慧。

（四）迎难而上，努力实现当年招生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税政班部分同学合影

正当全院师生为迎接本科生同心同德奋斗、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传来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1960年全国的招生计划已经下达，中财院招生没有列入教育部1960年统一高考招生录取分配名额的计划，遇到了招不来学生，无法开学的第一个大难题。

面对这种情况，学校没有灰心，知难而进，灵活地提出自己的方案，向上级申请内招，并且获得批准。

财政部和人民银行总行决定在全国财政系统和银行系统的在职干部中招生。1960年3月，财政部、总行发出联合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人民银行分行，根据分配名额，选调具有高中毕业文化程度，年龄30岁以下，有身体健康的体检证，品德好，有培养前途的在职干部，或经厅、局、分行考核、审查，挑选德、智、体全面合格的优秀高中毕业生，于8月底前报到入学。这个联合通知抄送了教育部。

1960年9月，新生按时开学。四年制本科生共计60人，其中财政60班39人、金融60班21人。

因中国人民银行急需外汇干部，总行又把其他院校招收的68名新生调来学校，组成外汇60班（因急需，学制三年）。

这样，在1960年财政、金融、外汇三个专业的学生总计有128人。¹

¹ 因为当时学生人数有一定的流动性，有中途退学者，造成学院人数统计有出入，不同的材料反映的人数有些微差异。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60级本科生入学时，校园内还有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二期干训班学员以及与干训班共同学习的师资班学员81人及干校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培训的61名政治理论教员亦同时在校。

（五）角色转换——从干校教员到高校教师，从干校管理者到高校管理者

新生入学了，困难也接踵而至，学院运作遇到的最主要困难就是干校班子的角色转换和编写本科教材与讲授新课的问题。

学院教师过去担任短期干训的教学，有些教师是部、行业务干部中选调来的，他们与业务部门联系密切，如经常参加部、行的业务会议，看部、行的业务文件、资料，有时还参加部、行的调查研究工作；他们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对与专业有关的方针、政策、规章制度有系统深入的研究，对与专业有关的实际工作情况比较了解，重视学以致用，在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上，有比较丰富的经验。

然而，本科教学毕竟不同于干训教学，本科教学具有持续性、理论性等特点。教师们转变到从事本科教学，在讲授完整科学体系、系统全面的科学方法方面，以及编写本科生使用教材方面，仍有不少困难。教师们面临角色转换问题。同时，学院还面临教师缺乏问题，特别是共同基础课如经济学说史、中国近代经济史、国民经济计划、汉语、英语、体育等新课，教师匮乏，困难更大。

为此，教师们克服重重困难，边教边学，努力适应本科教学新环境，逐步走上正规。针对教师缺乏的问题，学院鼓励老师勇挑重担，兼教其他课程。例如：当时正苦于经济学说史课、汉语课和体育课找不到教师承担，党史课的教师就勇敢地挑起了经济学说史重担。汉语课也是由勇挑重担的其他学科教师兼任的。

对学院管理者而言，也遇到类似的困难。教学管理部门有干校工作经验，但缺乏高等院校管理工作经验，对高等院校的教学计划、规章制度不



1960年中央财政金融干校西南金融支部全体同志合影

熟悉，对此，教务处长黄岭松提出：“不要闭门造车，到院外学习去！”教务处的老师们纷纷到业务领导部门和兄弟院校访问学习，先后到过教育部高教司、人民大学、北大、北师大等部门和院校。在访问学习过程中，开阔了眼界，取得了经验，并且带回来了不少教学计划、规章制度等文件和资料，对教务处工作帮助极大，教务处老师们感到虚心向兄弟院校学习是战胜困难的捷径。当时在教务处工作的邱光信老师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

为什么要提到出去学习呢，因为原来的干部培训一般是一年的，而且学员是在职的，都是些科长以上级别的干部，他们业务经验很熟悉，有工作经验，但他们的文化基础不够，要培训就是要他们的实践经验提升到理论的高度，所以我们以前的干部学校着重在这个方面给他们补习些文化基础课，补习些理论，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文化基础理论，然后业务方面给他们总结提高，以交流提高为主，理论方面着重在基础上，是短期的。后来成立财政金融学院的时候，我们提出来以后要正规化，要有一个系统性，加强基础理论，加强系统，不要有一个好像很临时的观点，即那种干部训练的临时观点，应该正规化。本科都是四年，要加强基础性，

加强理论，加强系统性，我想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断地出去和兄弟院校交流，互相学习，学校新的规章制度全都是各兄弟院校的经验互相总结出来的，我们之前干部学校哪有这些制度，干部管理不正规，干部培训一年制就开几门课，政治理论、文化方面开一两门课，然后专业课也是一段一段讲，不像一学期上好几门课，一段一段的，一两个月学一门课，段落性地学习，本科教育跟干部培训完全不一样。

（六）财政、金融专业教育的开拓者从课程设置看到的

财政金融专业是时下的热门专业，目前，国内许多高校都有与财政金融相关的院、系、专业以及开设的课程，可以说是遍地开花。实际上，无论从专业设置的时间，还是课程设置，国内财政金融专业的先锋和开拓者，非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莫属，当时天下只有中财院有金融系，从学院当时开设的课程可以发现，当时开设的许多课程，即使在今天也是引领潮流的专业。从表4-1中财政60班、金融60班和外汇60班课程设置的具体情况可见一斑：

表4-1 财政60班、金融60班和外汇60班课程设置一览表

名称	设置课程	备注
财政60班 专业课	财政学、国家预算与预算会计、国家税收、企业财务、基建财务、中国财政史、外国财政、会计原理、统计学、财政专题讲座（主要由财政部部长、司局长作专题报告）等。	1. 各专业均可设政治理论课：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每学期每周还固定安排2小时的形势政策学习或思想政治教育。
金融60班 专业课	货币信用学、工商信贷与结算、农村金融，银行计划管理、银行会计、经济活动分析、中国金融史、统计学、金融专题讲座（主要由总行行长、司局长作专题报告）等。	

续表

名称	设置课程	备注
外汇60班 专业课	货币信用学、专业英语、国际金融、国际信贷、国际结算、世界经济、国际贸易与海上运输、国际私法基础知识等。	2.各专业的共同基础课：中国近代经济史、经济学说史、国民经济计划、英语（财政60班和金融60班学习太困难的个别调干学生可以免学英语，外汇60班必修英语）、体育。

（七）1960年的教学工作

1960年是共和国历史上的特殊年份，国际上风云变幻¹，在国内，由于天灾和人祸，国家遇到了严重的困难，这一年的教学工作呈现出特有的时代特点。

1. 无论是干训学员还是本科学生，都被要求“政治挂帅”。政治学习任务繁重。那时规定学员和学生要达到的目的是：以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和分析问题，明确党的政策就是党的生命，坚决地、正确地贯彻党在各个时期的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进一步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认清美帝国主义是最大的国际剥削者，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是国际宪兵，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还要认识到现代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是资产阶级思想的维护者和传播者，是帝国主义在革命队伍中的代言人，是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这是当时政治大背景下的正常反

1 1960年的7月份，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中苏签订的几百个协定和合同，撤走了全部苏联专家。

应，尽管今天看来有些“左”得不可思议。

2. 这一年的教学工作是在物资极端匮乏的条件下进行的。学校档案显示，由于食品短缺，饥饿使得学生营养不良，1960年底许多学生患了“浮肿病”，并且引起学生们的恐慌，为此，学院采取三项措施：一是加强思想教育，要求学生树立不怕病、战胜病和重视养病的思想；二是学院提出了劳逸结合的方针，对教学计划作了调整，以保证学生的休息时间；三是学院尽量创造条件，改善生活。

3. 尽管困难重重，学院没有放松教学工作，在响应号召、狠抓政治学习，积极应对严重的物质困难的同时，学院还制定了详细的教学计划，加强教学管理，保证了教学任务的圆满完成。其他各项工作也井井有条，1960年底，学院按照惯例写了详细的工作总结，教务处也有高质量的教学总结，并且制定了1961年的教学计划，以及1960—1964年教学时间计划表。¹

二、遭遇挫折的1961年

（一）周到的关怀，宏伟的蓝图

1961年3月17日，财政部和人民银行总行亲自拟定的“关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发展规模和专业设置”的文件指出：根据全国文委书记会议精神，结合全国财政、银行部门今后工作发展的需要，提出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今后的任务、发展规模和专业设置：计划到1966年，使在校学生发展到1200人。学院现有学生136人，1961年招生100人，1962年招生200人，1963—1966年每年招生300人；提出从1962年起计划设财政、信贷、会计三个系，并附设师资专修科。

这份文件传达出了一个极富诱惑力的信息，就是部、行希望学院的工

1 档案材料：7-JX-1961-14-1，7-JX-1961-14-2，7-JX-1961-14-3。

作有新的跨越，要有办正规大学的计划与构架，要在原先专业设置的基础上设置系级机构。

当时的学院领导敏感地把握住了这次机会。1961年5月17日，学院副院长秦穆伯、姜明远签署（61）财金字第2号的请示报告，向财政部请示：调整学院机构及干部配备。

请示报告提出：设置系级机构，即财政系、金融系、会计系，原财政、金融、会计教研室分别归各系领导，系主任由原教研室主任担任，并仍兼教研室主任，沈云为财政系主任，张焕彩为金融系主任，张伟弢为会计系主任。拟增设普通课、国民经济两个教研室，直属院长领导，普通课教研室主任刘维民（注：语文、数学、逻辑学、体育四门课程，在普通课教研室成立以前，附设在教务处），国民经济教研室副主任唐梅林。¹

1961年6月6日，财政部（61）财人字第19号回文，基本同意学院的请示，同意设立财政系、金融系、普通课教研室、国民经济教研室，只是没有同意设立会计系，仍然保留会计教研室。同时任命武冠英为国民经济教研室主任。²

关于学校会计系何时正式设立，由于档案缺失，无确切记载，但最晚在1962年4月9日，学院在上报财政部的请示报告中，已经提到财政部已批准增设会计系。³

正当财政部、人民银行总行和学院上下齐努力、开创新局面，各项工作蒸蒸日上、蓬勃展开之时，不祥之云降临了。

（二）中央财金学院面临夭折

“大跃进”以来党和国家工作中的严重失误，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的废除合约，造成了工农业生产的大幅度下降，粮食、副食品以



1961年10月中财院外汇班欢送雷声老师合影



1960年下放裴坡庄全体干部合影

1 档案资料：7-XZ-1961-7-1。

2 档案资料：7-DQ-1966-1-2。

3 档案资料：7-DQ-1966-1-2。

及日用工业品供应紧张，1959—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1961年是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一年。为了克服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党中央和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1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研究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问题。为了调整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会议决定实行精简政策。陈云指出，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是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全局，并且保证农业上去。会议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办法规定：在1960年底1亿2千9百万城镇人口的基数上，3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千万人以上，本年内至少减少1000万人口。上述规定实施后，到1961年底，全国共精简职工870万人，下放城镇人口1千万，全民所有制企业下马25000个，建设工程减少406个。¹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教育界也在作着调整与整顿的工作。1960年11月24日，中央文教小组召开全国文教工作会议，检查和批判文教战线的“共产风”“浮夸风”，集中研究在教育工作中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强调要解决好教育事业过快、战线过长等问题。1961年2月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文教小组《关于1961年和今后一个时期文化教育工作安排的报告》，这个报告里提出今后几年大城市一般不再新建高等学校，新建的高校也必须调整。三个月后的5月2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教育部《关于北京地区高等学校及中等专业学校调整工作的报告》，提出对高校实行“定”“缩”“并”“迁”“放”“停”等不同方式的调整。新建的中财院，才一岁半就被叫“停”了。1961年8月11日，财政部、人民银行总行接教育部决定：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停办，大量精简教职工。这是学院成立后遭遇的第一次挫折。

当时停办一些大专院校，总的来说是抑制教育“大跃进”的举措。同时还有两个原因不得不说：一是为了大量精简城市人口，因为国家太困

难了；二是教育的发展过快，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这方面对教育发展的负面影响太大了。1961年上半年，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文教问题，他说：“科学教育水平并不决定于数量，主要是质量。”“少办些学校，把它办好。”¹

（三）为学院恢复埋下伏笔

尽管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被要求于1961年8月停办，但是，学院坚信困难是暂时的，条件成熟时，学院还是要继续办下去的，并相应采取了变通的策略。为了将来东山再起，学院对停办提出了三点要求：

1. 学院不再招生，但现有三个班继续办到毕业为止。
2. 保留干校，待将来条件允许时，再选调干部培训；干校牌子不摘。
3. 现有教职工人员320人压缩为134人。

财政部、人民银行总行领导同意了学院要求，并于1961年8月将学院停办及其要求函告了教育部。

财政部、人民银行总行给教育部发的《关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停办后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处理问题》【（61）财人字第32号、（61）银丁字第55号】函文称：

根据中央关于精简机构、压缩城市人口的指示和高等学校调整工作会议的精神，经我们研究，决定将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停办。该院现有学生332人，其中财政金融专业65人，外汇专业69人，师资班68人，国防财务班（中专性质）130人，今年暑期师资班毕业后，尚有学生264人。按照原定计划，财政金融专业（四年制）1964年暑期毕业，外汇专业（三年制）1963年毕业，国防财务班（二年制）1962年毕业。该院停办后对学生的处理问题，经与你部计划财务司研究，学生转到其他学校有困难。但如果让

1 胡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04页。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第一卷，第595页。

他们提前结业分配工作，又恐不易为学生所接受。因此，我们意见，对这部分学生的处理，必须采取稳妥的办法，即学院停办问题，暂不向学生宣布，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牌子也不摘掉，按照原计划将这部分学生维持到毕业。关于教职员工的处理问题，我们将根据这次精简的精神，除按照现在实有学生人数，留必要数量的人员外，对其余人员进行精简，并作适当的处理。在学生未全部毕业以前，该院所需经费，仍请你部按照标准拨发。¹

中财院的这次关键决策，为学院后来恢复创造了条件。这个争取时间、变通处理的办法，颇类似1954年保住四道口校园的办法。这是有意识地故技重施，还是得到过上层的某种暗示？现在已不得而知，但是抚今追昔，我们不得不佩服当时决策者的智慧与英明。但是教职员压缩了一半以上，大量师资流失，亦实有憾焉。

三、峰回路转的1962年

（一）柳暗花明，学院再生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这次大会，虽然在对形势的分析和对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的认识上，以及对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错误的估计等问题上，中央领导核心中的分歧并未解决，但在强调坚决贯彻执行“八字”方针（即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问题上，对统一全党认识起了积极的作用。

“七千人大会”后，经济的调整和政治关系的调整有了进一步的发

展，按照计划，1962年全国精简职工1000万人，减少城镇人口1200万人。然而就在此时，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起死回生，不仅在1962年恢复招生，而且教职工编制有所扩大，这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究竟奥妙何在？

首先，这是国内经济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

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一年以来，经济形势有了一定的变化，逐步向好的方面发展。城市工商业所有制结构有了调整，农村公社规模划小，商品交换范围扩大，集市贸易活跃，全国工商企业增加。与此同时，伴随着纳税单位越来越多，工商业会计核算形式的新变化，财政税收、金融工作日益繁重，而财税、金融方面的人才日显窘迫。这些都反映了一个现实，精简职工不能一刀切，必须有保、有压、有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现有的财政、金融、会计等经济领域的人才，不能适应经济形势发展的要求。

1962年初，中央听取了财政部党组关于税务机构和人员问题的汇报，极为重视。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迅速充实银行、财政和企业事业部门的计划、财务、会计、信贷、税务人员的紧急通知》，指出：为贯彻执行“八字方针”，克服目前的严重困难，争取财经的早日好转，决定在1961年底实有人员的基础上，财政部门增加4万人。¹

在上述迫切需要人才的背景下，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即着手考虑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恢复招生的问题。

其次，是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反思的结果。

1962年1月6日，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就“关于保留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并于1962年招收新生的问题”函告教育部：“最近总理²和陆定一副总理都对我们不注意培养财务会计人员，有所批评。这种批评是完全正确的。建国以来，我国企业、事业的规模和数量都有很大的发展，财务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税收史长编》（第一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468页。

2 即指周恩来总理。

1 档案资料：7-XZ-1961-7-1。

会计人员的培养本应有相应的增加。但是据最近了解全国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1960年比1949年增加了8倍多，而财会专业学生在校人数1960年比1949年则减少50%以上。这种情况，显然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高速发展的需要是不相适应的。为了满足国家建设事业的需要，不断充实与扩大财务会计人员的队伍，必须加强对财会专业人才的培养，以改变目前不合理的状况。”文件特别强调：“为了培养财务会计和金融专业人才，我部、行在北京办有财政金融学院。今年（1961年——编者注）8月，我部、行根据中央关于压缩城市人口的指示和你部关于高等学校调整的意见，曾同意停办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在看来，当时对这个问题的考虑是不够周到的。据了解全国专门培养高等财政、金融专业人才的学校仅有财政金融学院一所，并且该院有一批干部和宿舍（现有300来名学生），完全有条件继续培养高等财会人才。因此，为了加强财会人才的培养工作，我们意见，仍保留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并于1962年招收一部分新生。”¹

在得知财政部和总行的意见后，学院即开始为招收学生作准备，1962年3月12日，学院编制了《中央财政金融学院1962年组织机构人员编制方案》。

1962年3月27日，教育部函告财政部、人民银行总行：“同意保留中央财政金融学院”，²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又“起死回生”了。

1962年5月30日，学院向财政部提交《关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1962年人员编制计划的报告》，对学院发展规模、课程设置、人员编制作了说明。

在当时全国高校都在调整压缩编制的时候，1962年的8月11日，财政部却批准学院教职工编制由134人增加到207人。两周后的8月25日，财政部函告教育部，强调指出：财政部保留的唯一一所高等院校是中央财政金融学院。³

（二）初战告捷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精心准备，1962年暑期，学院第一次参加了全国高等院校的统一招生，招收了298名高中毕业生。学院自1960年成立后，当年招收调干学生128人，1961年没有招生，到1962年9月62级学生开学后，本科学生共计426人，分为财政、金融、会计3个系，5个专业（财政、金融、会计、银行会计、外汇），9个班，至此，学院初具规模，成为完全意义上的高等学校（大学）。

由于学院的发展和扩大，师资不足的问题显现出来。因此，学院首先进行了教师的调配工作，1962年下半年调进了40名教师，保证了17门课程同时开课的教师力量。

为了保证17门课程的教学质量，学院抓紧进行教材建设。学院解决教材的原则是政治理论课和文化基础课尽量选用教育部规定的统一教材和兄弟院校的高质量教材，专业课教材基本上由自己编写。在自主编写的教材中，财政学、货币信用学、会计原理和计算技术等4本教材，是在60级讲授一遍之后，又进一步加以充实修改而成的。统计学、国家预算、银行会计、工商信贷与结算、农村金融和汉语是教师抓紧时间赶编出来的。由于采取了选用和自编两种办法，所以一方面及时地解决了开课的需要，另一方面使自编的教材符合中财院的特点和专业要求，许多教材在全国也是原创的，具有开拓性的，学生对这些教材基本满意。

1962年下半年，原有任课教师一方面要修编教材，另一方面忙于上课，新调进的教师来之则战，边备课边教学，但是学院的教学工作忙而不乱，紧张而有序，教师们认真备课，虚心听取学生意见，不断充实讲课内容，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在教室内，教师们共同研究、互相帮助、交流经验，发挥了集体力量，因此各门课程都按计划完成了教学任务。

由于当时金融、会计等专业不像现在这般热门，62级新生开学后，不少同学对所学的专业不了解，不感兴趣，例如会计系有的同学就提出“学会计没有前途，整天打算盘、记账太单调，没有科学的高峰可攀”，“当

1 档案资料：7-XZ-1962-7-1-3。

2 档案资料：7-XZ-1962-7-1-3。

3 档案资料：7-XZ-1962-7-1-3。



财会62班同学合影



会计62班部分同学合影



财会62班部分女生合影



金融62班学生毕业后部分同学在天安门前合影



银会62班第5小组同学在学校四合院合影

会计没名气，短了钱赔不起，运动来了就挨批”等等。为此，学院请部、行领导作报告，院、系领导和教师们对学生反复进行热爱本专业的教育，学生们才逐步喜欢上了自己的专业。

学院这一学期还加强了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纪律教育，除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外，学院组织学生听取关于形势、政策和革命传统等方面的报告，学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印边界问题、古巴问题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文件，并组织了两周的生产劳动，据当时档案材料称：“经过这些教育，提高了学生的政治认识、思想觉悟和阶级分析的能力。”¹

（三）1962年的学院制度建设

1962年是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发展的关键年份，这一年学院第一次参加全国高等院校统一招生，完全意义上的全日制高等院校本科教学工作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学院加快了各项制度建设的步伐。这一年，学院颁布的规章制度可参见表4-2。²

表4-2 1962年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规章制度一览表

发布时间	规章制度名称
10月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关于院的领导制度的暂行规定（草案）》
10月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关于院的行政组织职责范围的暂行规定（草案）》
10月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关于教学工作的暂行规定（草案）》
10月	《关于教员进修和培养的决定》
10月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关于学生生产劳动的暂行规定（草案）》

1 档案资料：7-JX-1963-14-4。

2 以上资料：学校档案7-XZ-1962-14-1。

续表

发布时间	规章制度名称
11月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关于教师培养进修工作的暂行规定（草案）》
11月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关于科学研究工作的暂行规定（草案）》
12月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关于实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学生成绩考核暂行规程（草案）”的补充规定（草案）》
12月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学生奖惩办法（草案）》（12月发布）

从上表可以看出，这一年的制度建设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涉及面广，对行政管理、教学、科研、教师队伍建设、学生管理、学生成绩考核管理等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二是内容详尽，许多规定相当细化。三是制度建设的高速度。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连续出台一系列规定，反映了学院制度建设的紧迫感，没有制度保证，则教学、研究、管理的规范化正常运行，就不可能做到。

第二节 曲折发展，初显辉煌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1962年恢复后，直到“文革”爆发，尽管有挫折和偏差，但确是学校第一次大发展的时期。全国“大跃进”、高教“大跃进”之后，中央领导者作了深刻的反思，初步认识到国家建设不能只凭高涨的革命热情，高等教育也不能只求数量不抓质量。1961年中财院被停办，跟“大跃进”后的“大调整”有关，但是天下需要中财院，不到一年它就复生了。“复生”不如说“苏醒”，因为中财院并没有“死”，并不是停办，而只是“停招”（1961年没有招生），所以我们说1961年只是“休眠”，到1962年，我们又“苏醒”了。苏醒之后的中财院正赶上抓教

育质量，抓专业建设。自1961年以来，中央领导同志和教育部领导同志三令五申地要求“提高质量”，关于专业建设、教材建设的文件也发了许多，办教育的盲目与激进相对得到了控制。中财院于是在正规化、“大学化”上生逢发展之契机。这一时期，中财院各项工作全面展开并逐步走上正规，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经济建设 and 管理的栋梁之才。中财院初显教育辉煌，享誉财经领域，并扬名国内外¹，在中财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段历史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一、构建、强化领导体系，建立、健全组织机构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恢复后，和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一起仍由财政部和人民银行总行共同领导，财政部主管。

学院和干校仍是同一党委，同一组织机构，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学院领导体制仍是党委领导下的院长、校长负责制。由于充实了领导班子，加强了领导力量，在党委的集体领导下分工负责，发挥了党组织的核心作用。院领导分工明确，院长对行政工作全面领导，副院长除分工领导各行政处、室、系外，重点是分工抓政治理论教育、专业教育、教材建设、教学质量的提高，以及思想政治工作的深入落实。

1961年5月，学院党的组织关系先由财政部党委转到北京市委。

1962年5月23日，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讨论通过，秦穆伯任党委书记，姜明远仍任党委副书记。6月9日，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函告学院党委。6月28日，学院召开第三届党员代表大会；7月14日，选举出新的党委会成员；8月29日，北京市常委会讨论通过，并报经中央组织部批准。党委会成员是：

党委书记：秦穆伯

1 越南等国还选派留学生到我校留学。

党委副书记：姜明远

党委副书记兼监委书记：武冠英

党委委员：康民、张光三、黄岭松、高文明、张焕彩、沈云。¹

1964年11月24日，财政部通知：1964年10月30日国务院第148次全体会议通过，任命陈如龙为中央财政金融学院院长，张焕彩为副院长。²此前的1963年8月13日，中央批准秦穆伯继任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党委书记。1965年2月16日，由财政部政治部报请中央组织部批准，张建皓任学院党委副书记。³是年5月7日，中央组织部批准，由陈如龙任学院党委书记，秦穆伯任副书记。⁴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恢复后，还进行了学院组织机构建设，将过去单一的院级组织机构改为院、系两套组织机构，院系均直属院长、副院长领导。

当时的院属机构是：

党委办公室：下设秘书科、宣传科、组织科

人事处：下设人事科、保卫科

教务处：下设教务科、学生科、教材印刷科（包括打字室、铅印室）、图书馆

总务处：下设财务科、总务科、膳食科、医务室

政治理论教研室：内设哲学教研组、政治经济学教研组、党史教研组

国民经济教研室：下设国民经济教研室

普通课（文化基础课）教研室：内设汉语教研组、外语教研组、逻辑学教研组、体育教研组。

系级机构是：

1 档案资料：7-DQ-1966-1-2。

2 档案资料：7-DQ-1965-1-4。

3 档案资料：7-DQ-1965-1-4。

4 档案资料：7-DQ-1965-1-4。

财政系，下设系办公室、财政教研室

金融系，下设系办公室、金融教研室

会计系，下设系办公室、会计教研室。

此外，团委、工会、学生会也随之建立。

二、政治部的设立

1964年在院属机构中，增设了院长办公室和学生处，到1965年又撤消了学生处，增设了政治部，政治部设主任1人，由当时党委副书记张建皓兼任。政治部下设党委办公室、宣传部、组织部。

一份现仍保存的档案资料显示：1965年7月23日，学院在对北京外贸学院、经济学院、铁道学院、商业学院、航空学院和石油学院调查的基础上，写了《关于组织机构设置调查情况的报告》，认为设立政治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是大势所趋。是什么“大势”所趋呢？这须看当时国家的大背景。当时全国学习解放军，政治部原是军队的建制。自开国以来，军队继承战争年代的传统，十分重视政治思想工作，早在1960年9月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上，就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1964年，在全国范围里掀起学习解放军的高潮。高教系统学习解放军，主要表现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这一年的3月8日至4月11日，高教部在北京召开直属高等学校领导干部（扩大）会，讨论了进一步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建立政治工作机构等问题，并一致同意在高等学校建立政治部。1965年3月1日，高等教育部政治部通知各直属高等学校，迅速建立政治部，并大力充实政治工作干部队伍。¹当时高校是照着100个学生配备1个政工干部的比例来“充实政治工作干部队伍”的。中财院在这种背景下也在着手成立政治部，并事前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调查的结果显示成立政

1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2卷，第741页、第754页。

治部好处很多，如北航，成立政治部后，大力学习解放军，在职工中开展了“四好”运动，在学生中开展了“三好”运动，政治工作搞得很活跃，对师生中的政治思想工作，可以一竿子抓到底，抓得准、抓得及时，有利于推动各项工作。同时大大减少了事务性工作，过去许多事情都提交党委解决，现在政治部部务会议就可以解决了，这样党委可以集中精力考虑一些重大问题，而且解决问题也比过去及时。8月9日，学院又提出《关于组织机构讨论情况的综合报告》，报告认为：(1)我院政治干部配备不健全，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没有一个机构统一抓，各搞一摊，谁都可以管，谁都可以不管，因此，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建立政治部，配备政工人员，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势在必行，是突出政治、落实四个第一¹、学习解放军的一项重要措施。(2)关于政治机构如何设置，党委办公室提出，在党委办公室和人事、保卫部门的基础上建立政治部，由组织、宣传、武装、保卫等部门共同组成，工会、共青团由党委委托政治部领导，各系设立政治处或政治办公室，配备一定数量的专职政工人员。(3)关于学生政治思想工作问题，各单位普遍认为学生政治思想工作存在问题比较多，主要是政治干部力量薄弱，1个级主任管理几百名不同专业的学生，要把工作做细致有困难，级主任职责不明确，什么都管，既像政治干部，又像行政干部，整天忙于事务，班主任没有从头到尾管起来，一人一段，对学生思想很难系统了解。因此，大家的意见是，按每个系100名学生配备一名政治辅导员，专职负责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日常事务可以由系办公室或用其他办法解决，政治辅导员要相对固定，不要轻易调动，最好是从学生入学到毕业，一竿子到底，政治辅导员要注意政治质量。报告还提出政治部建立后，其他机构的组合问题。

这样，政治部成立了，政治思想工作有了专门机构，学生处这个主

1 1960年9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强调了毛泽东“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指出：人的因素第一，政治思想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

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部门也就没有必要了，统归政治部一体管理。这应视作高校向军事化管理的一个改革，自此，一支庞大的政工干部队伍在中财，也同样在中国高等院校迅速地建立起来了。

三、教职工队伍建设

1962年到1966年，学院加强和充实了教职工队伍，教职工人数由134人增至409人，其中教师由85人增至201人。教学计划设置的各门课都有教师担任，1962年6月学院评定教师职称，评定了副教授4人，讲师25人。¹

以下是1962年12月18日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干部、教员名册²，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前辈们生活、奋斗的足迹，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对他们为学院的发展洒下的辛勤汗水和作出的贡献，表示由衷的敬意。

1. 院长办公室

表4-3 院长办公室职名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行政级别	工资	备注
秦穆伯	男	50	副院长	10	209.88	
姜明远	男	46	副院长	11	193.54	
武冠英	男	55	教务长	11	193.54	
许汉杰	男	35	秘 书	18	98.33	
张玉玺	男	31	办事员	22	49.5	
许维根	男	28	科 员		67.5	
朱润浦	男	26	办事员	24	43	

1 名单记录在档案：7-DQ-1966-1-2。
2 名单见档案资料：7-XZ-1962-8-1。

2. 党委办公室(人事处)

表4-4 党委办公室职名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行政级别	工资	备注
康 民	男	43	主 任	高教6	148	
王万有	男	32	秘 书	17	98.5	
苑铁道	男	28	办事员	24	37.5	
李瑞和	男	34	副科长	17	98.01	
赵振合	男	35	科 员	19	78	
李风彩	女	36	副科长	18	78	
伍正国	男	25	办事员	22	56	
丁振颖	男	33	科 员		68.31	
徐文香	女	28	科 员	高教11	69	
刘光厚	男	31	副科长		78	
邓洪钦	男	34	干 事	19	70	
蒋金贵	男	27	办事员	23	49.5	
华一芦	女	36	科 员	18	87.5	
雷元成	男	28	干 事		82.5	

3. 教务处

表4-5 教务处职名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行政级别	工资	备注
黄岭松	男	44	处 长	13	153.94	

续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行政级别	工资	备注
杜天荣	男	41	副处长	14	136.62	
吕 增	男	33	科 长	18	78	
邱光信	男	30	科 长	20	62	
郭肇起	女	37	办事员	22	56	
李继熊	男	31	科 员	20	62	
李连庆	男	33	办事员	22	56	
迈士文	女	30	办事员	24	43	
李淑萍	女	51	科 员	20	62	
杨德元	男	31	科 员	20	62	
尚世如	女	33	科 员	21	62	
许瑞英	女	28	办事员	22	49.5	
王承文	男	34	办事员	23	43	
周素芳	女	27	办事员		51	
马顺卿	女	25	打字员		37.5	
张新周	男	29	科 员	21	62.5	
王 博	男	36	科 长	14	136.02	
高应节	男	33	科 员	20	62.7	
王瑞香	女	27	打字员	20	37.5	
张继光	男	22	实习生		46	大学
郭爱娥	女	21	办事员	26	33	

4. 政治理论教研室

5. 财政系

表4-6 政治理论教研室职名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行政级别	工资	备注
高文明	男	46	主任	13	153	
张光三	男	37	副主任	高教6	148	
王廷辅	男	37	讲 师	高教8	89	
刘光第	男	45	副教授	高教6	149	
吴寿慈	女	37	教 员	18	87	
刘 玮	女	34	教 员	19	78	
汤国钧	男	35	教 员	高教9	80	
王庚顺	男	29	讲 师	高教9	78	
徐忠廉	男	31	讲 师	高教9	78	
毕斯基	男	40	讲 师	高教8	104	
李 皓	男	31	讲 师	高教9	89	
郭万录	男	30	助 教	高教11	62	
宋希仁	男	26	助 教	行政22	56	
陈菊铨	男	32	讲 师	行政17	87	
陈立珠	女	27	教 员	行政22	56	
罗玉元	女	34	教 员	高教10	78	
邱远猷	男	29	讲 师	高教10	69	
徐再文	男	36	助 教	高教9	78	
汪 瑜	女	32	助 教	高教10	78	
陈福生	男	26	助 教	高教12	62	
李占德	女	28	助 教	行政22	56	

表4-7 财政系职名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行政级别	工资	备注
沈 云	男	36	主 任	13	153	
高一民	男	41	秘 书	16	105	
胡厚昌	男	31	级主任	19	79	
程本中	男	39	教 员	17	99	
赵春新	男	33	教 员	高教8	105	
姜维壮	男	37	教 员	17	98	
王子英	男	51	教 员	高教7	193	
秦元英	女	32	讲 师	18	87	
董庆铮	男	31	讲 师	18	78	
韩 璧	男	37	讲 师	高教10	70	
潘启华	男	35	讲 师	高教10	69	
叶振鹏	男	28	讲 师	高教10	69	
王 富	男	35	科级教员	17	98	
林犹恭	男	33	讲 师	高教10	69	
王云志	女	29	讲 师	高教10	69	
曲兴业	男	32	讲 师	高教10	78	
邱远猷	男	29	讲 师	高教9	78	
门 志	男	32	教 员	19	78	
崔敬伯	男	64	教 授	13	155	

续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行政级别	工资	备注
郭光耀	男	39	教 员	高教7	87	
吕启堂	男	31	级主任	19	78	
孙翊刚	男	26	见习助教		46	
刘谭彬	男	24	见习助教		46	
蒋元禄	男	25	见习助教		46	
吴忠球	男	25	见习助教		46	
何清波	男	24	见习助教		46	
邓振明	男	24	见习助教		46	
何盛明	男	22	见习助教		46	
赵宗仁	男	27	见习助教		46	
刘培金	男	28	助 教			
王 珺	男	36	教 员			

6. 金融系

表4—8 金融系职名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行政级别	工资	备注
张焕彩	男	50	主 任	12	170	
张玉文	女	42	副主任	高教6	148	副教授
黄 健	男	37	秘 书	16	98	
刘春阳	男	35	级主任	18	98	

续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行政级别	工资	备注
王秉文	男	43	教 员	15	109	
高耀深	男	33	讲 师	高教8	89	
俞天一	男	35	讲 师	16	109	
焦玉兰	女	29	讲 师	高教10	70	
王自端	男	31	讲 师	18	78	
赵廷芳	男	48	讲 师	高教8	106	
杨泽生	男	47	教 员	13	155	
吴福根	男	25	教 员	22	55	
刘焕成	男	25	见习助教		46	
李焕岭	男	25	见习助教		46	
李振德	男	25	见习助教		46	
王国泰	男	31	助 教	19	78	
王佩真	女	36	教 员	高教8	105	
李 锡	男	37	教 员	高教10	70	
黄贤镛	男	37	教 员	18	56	
卿光中	男	21	见习助教		39	
郑邦贤	男	39	教 员		46	
丁邦石	男	26	见习助教		46	
赵铁城	男	25	见习助教		46	
赵淑梅	女	23	见习助教		46	
洪淳周	男	23	见习助教		39	
王金瑞	男	29	见习助教		46	

续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行政级别	工资	备注
李元正	男	26	见习助教		46	
万长荣	男	29	助 教		46	
刘邦本	男	27	助 教		46	
佟文生	男	36	级主任	19	83	
潘金生	女	22	见习助教		46	
薄志英	女	32			56	

7. 会计系

表4-9 会计系职名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行政级别	工资	备注
张伟弢	男	53	主 任	高教4	205	教授
张金城	女	34	副主任	15	148	122
胡 兵	女	37	秘 书	17	98	
李沛时	男	30	级主任	高教9	78	
崔书香	女	48	教 授	高教5	177	
孙昌湘	男	46	副教授	高教7	106	
吴江梅	女	33	讲 师	高教9	78	
陈嘉亮	男	34	讲 师	高教8	89	
陈启昆	男	32	讲 师	高教10	69	
郭日聪	男	34	讲 师	高教9	89	

续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行政级别	工资	备注
白云广	男	30	助 教	高教11	62	
赵 智	男	30	助 教	高教11	62	
姚梅炎	男	37	教 员	高教9	89	
董孟婉	女	37	教 员	高教9	89	
陈怀康	男	35	教 员	19	78	
沈克俭	男	39	讲 师	高教9	89	
祁永彪	男	40	讲 师	高教7	106	
王仲文	男	32	教 员	19	78	
李培林	男	36	副 科	16	109	
王俊德	男	27	见习助教		46	
刘天吉	男	28	见习助教		46	
时映西	男	41	讲 师	高教9	89	
肖子镛	男	24	见习助教		46	
陆志勋	男	27	助 教			
林 源	女	33	级主任	19	70	
鲍学曾	男	35	讲 师	高教10	78	
黄秀琪	女	38	科 员	21	62	
许湘琼	女	24	见习助教		46	
何易成	男	24	见习助教		46	
王树华	女	23	见习助教		46	

8. 普通课教研室

表4-10 普通课教研室职名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行政级别	工资	备注
赵树林		29	助 教	高教12	62	
徐建人		25	助 教	22	56	
王月明	女	26	助 教		56	
徐志敬		26	助 教		56	
任宣智		31	助 教			
金瑞麒	男	52	教 员	15	124	
林珍瑜	女	25	助 教		57	
陈正英	女	30	助 教	17	62	
夏勤兆		27	助 教		56	
霍唤民		26	见习助教		46	
李步魁		34	教 员		76	
王立达		41	讲 师		79	
郑以岚	女	37	助 教	高教10	79	
叶国泉		30	助 教	21	62	
李贵如	女	27	助 教		56	
闵庚尧		28	助 教	高教12	62	
郝国华	女	35	讲 师	18	78	
徐国勋		47	讲 师	高教8	99	
乔春麟		44	科级教员	17	99	
侯 民		38	教 员	18	87	
邓钟琴	女	34	助 教	高教10	78	
高竞生		34	助 教	高教10	78	

续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行政级别	工资	备注
付杰三		31	教 员	高教9	89	
程玉英	女	26	教 员	23	49	
沈漱华	女	34	教 员	高教12	62	
袁德芳	女	33	助 教	高教10	69	

注：总务处和工勤人员(略)。

1963年4月1日学院上报财政部的统计数字是：计划260人，实有204人。¹1963年12月，学院档案提供的教师名册中，教师共127人。127名教师中，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最多，达28人，其余教师分别毕业于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兰州大学、南开大学、湖北大学、天津财经学院、河北财经学院、重庆大学、天津师大、上海财经学院、安徽财贸学院、吉林财贸学院、吉林师大、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北京体育学院等院校。1963年教职工编制是360人，实际人数并不满。档案显示：1964年教职工人数是278名（不含工勤人员），比1963年的计划人数增幅不大，比1963年的实际人数增加近百人。到了1966年2月学院教职工人数²是409人，又增长百余名。

四、一份没能实行十年的教师培养“十年规划”

1963年10月23日，学院制定了培养师资，提高教师教学科研水平的纲领性文件《培养提高师资的十年规划（草案）》。在此之前，为了提高

1 档案资料：7-XZ-1963-8-1。
2 1966年2月教职工人数统计参考资料：档案7-XZ-1966-8-1。

教师教学水平，学院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62年11月26日，学院发布《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关于教师培养进修工作的暂行规定（草案）》，明确提出教师要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注意加强思想政治锻炼，要努力培养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特别是要有计划地培养和提高青年教师，对那些有特殊才能、做出较大成绩的教师和助教，采取重点培养的方法，为他们创造条件，帮助他们迅速成长。在提高教师队伍整体水平方面，学院采取了以下措施：

1. 系和教研室根据工作需要和教师的具体情况，制定了详细的计划，明确了每个教师的进修方向。

2. 组织教师进行教材建设。当时编写专业教材困难最大，因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不久，虽然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是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经济工作是在曲折中前进的，所以，在编写专业课教材时，既要避免生搬硬套苏联的教材，也要避免现行制度加实例的简单写法。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提高到理论高度，建立完整的专业理论体系，是一项具有开拓性和创造性的工作，学院编写专业教材的教师们和院、系、室的领导，费尽心血，通过编著教材极大地提高了教师的水平。

3. 学院还充分发挥了直属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领导的优势，利用各种机会和条件让教师们了解政策，不断充实自己、提高自己。如：让教师参加财政部、总行的业务会议；财政部、总行提供文件、资料，让教师搞科研、编教材；提供条件让教师下基层调查研究，了解业务工作；邀请财政部和总行的领导讲课、作报告等。

4. 学院坚持新教师必须试讲合格后，才能正式上新课。院、系、室领导同志都很注意倾听学生对教学的反映，帮助教师提高教学质量，并有计划地听课，及时指导。

5. 要求教师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学院提倡学生以自学为主，教师采取启发式的重点教学法，要求教师重视对学生能力和素质的培养，教书育人。

在此基础上，1963年10月23日，学院又制定了《培养提高师资的十年规划（草案）》。

第一，对现有师资的基本情况作了分析和判断。当时学校有教师126人，在学术水平上能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教师并不多，所以教学、科研力量都相对薄弱。因此迅速提高教师队伍的水平，培养一支强大的、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

第二，文件详细地提出了培养和提高要达到的要求。

我们培养提高师资的方向是又“红”又“专”，因此对教师的质量提出如下要求：在“红”的方面，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进一步改造世界观，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革命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在“专”的方面：主要是在教学水平、学术水平、实际业务知识、基本技能、外语水平五方面，不断提高。具体要求是：(1)副教授、教授能深入钻研业务，总结经验，发挥专长，使自己在业务上有较高的造诣，不断提高教材和教学的质量。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在一定时期有较高水准的科学论著，并取得显著的成就，能指导青年教师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能为教师开设提高业务的讲座。(2)讲师能系统、全面掌握本专业的理论、业务知识和基本技能，能编写教材和教学资料，独立讲授一至两门课程，并应有良好的效果，能按自己的专业方向进行科学研究，担负一定科学研究任务，每学年提出一定的科学研究报告，能指导学生进行工作实习和科学研究。(3)助教着重练基本功，掌握教材内容和教学方法，过好“教学关”，能胜任一门课各个环节的教学工作，适当参加科学研究，做老教师助手，每学年提出读书报告或科学研究报告。(4)见习教师以一门课程为主，深入学习基础理论、业务知识和基本技能，参加力所能及的教学工作，每学期提出读书报告，争取早日达到助教水平。(5)教研室是培养、提高教师的基地，对不同情况的教研室要求应有区别。

第三，文件提出了培养和提高的原则、途径和方法。

根据“高教六十条”¹的要求，学院培养提高师资的原则是：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坚持以教学为主，以在职提高为主；坚持扎扎实实打好基础，练好基本功，循序渐进；坚持老、中、青结合；坚持重点培养与普遍提高相结合。

根据上述原则，拟通过如下途径，采取如下措施来实现培养提高师资的目标：(1)加强政治学习。凡是未学或未学完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或已学过而未达到一般大学程度的教师，必须订出计划，自修或跟学生一起听课，参加讨论，测验和考试，直至考试及格为止，争取在一两年内完成；有计划统一组织全院教师在5年内学习《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近年来的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及《资本论》。每个教师必须参加院党委组织的时事政策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文件的学习。(2)加强政治锻炼和劳动锻炼。每个教师必须参加一定的政治活动，参加农村整社或基层工作锻炼，参加农村社会主义阶级教育的“四清”运动。(3)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教研室党支部、行政和共青团的思想领导和作用，思想工作要深入到教学研究中去，抓活的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热情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4)充分发挥老教师的作用，在教学、科学研究、培养青年教师三方面充分发挥他们的专长。(5)经系和教研室主任提名，院委批准的骨干教师，实际重点培养，严格要求。适当减轻他们的教学工作和事务，给予进修的时间，或作为在职研究生培养；给予他们听部、行或其他部门负责同志的报告，参加部、行或其他部门会议的机会；邀请部、行、科学研究单位或其他部门负责同志和专家讲解他们缺乏的知识和解答他们的疑难问题。(6)对一般教师的培养，主要组织他们在职进修，在工作中边干边学；学习老教师的专长，分配青年教师给老教师当助手，明确指导关系，在老教师的帮助下，提高教学水平，培养科学研究的

能力，督促青年教师打好基础，练好基本功；每个教师要进行科学研究，每学年写出读书报告或科学研究报告；专业教研室缺乏实际业务工作锻炼或脱离实际业务工作较久的教师，在3年内用3个月左右的时间，参加业务部门的实际工作；青年教师初次上台讲课，一律要先进行试讲。(7)除某些学科和有特殊原因的教师外，每个教师要掌握一门外国语，特别是讲师以上的教师必须掌握一门外语，达到能顺利阅读本专业的书刊。(8)制定全院三年和五年的科学研究工作规划，及各教研室的年度科学研究计划，定期提出科学研究报告，举行全院和教研室的科学讨论会；每学期邀请部、行、科学研究单位和其他部门的负责同志或专家，定期到学院作报告、解答问题，帮助提高教师的业务和学术水平。(9)帮助教师到兄弟院校听课，参加社会上的学术活动；保证教师六分之五的工作日用在业务工作和进修上；尽可能供给图书资料；各教研室要根据全院的培养提高师资规划，制定一年的计划和五年的规划，使规划落实到教研室，并且落实到人。

第四，文件提出了检查和考核办法。系、教研室、教务处和人事处经常了解培养提高师资的情况。各教研室要每学期作一次执行培养提高师资工作情况的检查，每学年作一次总结，以便吸取经验教训，改进培养师资工作。考核教师的办法，与提升教师职务工作结合进行，实行领导、专家和群众三结合的方法。¹

这个“十年规划”是学校建校以来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是依据“高教十六条”的精神制定的一份极具建设意义的文件，是一份办社会主义大学的蓝图式的文件。如果按这个文件规划扎扎实实干上十年，中财无疑会更加辉煌。在这个文件里，政治性的表述无疑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但是党对高校的政治要求自建国以来是一以贯之的。这时的话语形式与具体要求虽然表现出了一种“极左”的倾向，但是从对学校的建设、师资培养等方面的要求来看，它还是有着一定的教育诉求和规律可遵循的。可惜这个十年的规划因“文化大革命”，只实行了两三年就夭折了。

¹ 即指1961年中共中央批准试行的《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

¹ 档案资料：7-XZ-1966-7-1。

五、实践教学，学以致用

当时学生必须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这被认为是可以达到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目的。1962年10月13日，学院发布《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关于学生生产劳动的暂行规定（草案）》，并且有计划、有组织地加以实施。这应该与当时刘少奇等领导人提出的“两种教育，两种劳动”的主张有关系。这个规定充满了人性化管理的色彩，学院规定：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的时间，每年一般为一个月至一个半月，包括社会公益劳动和院内零星劳动，各个学年的各种劳动比例和劳动时间，按教学计划的规定执行，由教务处和总务处组织实施，每学期期末要制定出下学期的生产劳动计划，没有特殊原因，未经院长批准，不得变动。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应该由系指派干部和教师带队，要同去同归，带队人和学生要服从所去生产单位负责人和技术人员的指导。对学生的生产劳动，要加强组织领导和思想工作，教育学生密切联系工农群众，吸取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知识和直接经验，理论联系实际，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应该根据学生的体质、年龄、性别特点分配劳动任务，安排劳动项目，组织劳动竞赛，严禁把生产劳动作为惩罚的手段。在劳动期间妥善安排学生的饮食、住宿和卫生医疗，注意劳逸结合，保证学生的健康，每天的劳动时间暂定6小时。学生参加公益劳动的粮食补助，暂定每人每日：重体力劳动补助粮票4两，轻体力劳动补助粮票2两，粮食补助包括带队的干部和教师，均在市教育局拨给学生的劳动补助粮内开支，在院内生产基地劳动的补助粮，由生产基地自产粮内解决。学生参加院外工农业生产所取得的报酬，院内生产基地除去成本取得的收入，均由学院支配，主要用于公共福利事业，改善生活，酌情补贴学生参加劳动的伙食费和粮食。¹

1 档案资料：7-XZ-1962-14-1。

纵观这一时期的实践教学，过多强调实践与政治的关系，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总的来看，学生通过生产劳动，能够更好地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克服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观点；参加生产劳动的单位、场所又是最好的实习单位和实习场所，取得的成效是显著的。

首先，可以在实际锻炼中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学生的思想品德和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离不开实践；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进行实际锻炼是政治理论教育的继续和运用，是对学生思想品德的检验，能够针对学生在实际锻炼中可能出现和反映出来的问题进行切实的思想政治教育，而只靠课堂教学，学生的思想问题是难于暴露和解决的。在学院的教学计划中，学生除参加学院内一定的课余公益劳动外，每学年有五周的时间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学生们到工厂、农村基层参加生产劳动，进行调查访问，向工农群众学习，可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养成劳动习惯，密切与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¹

1962年，教务处长黄岭松曾带领金融62级的同学们，到北京市中古友好人民公社参加了一个多月的生产劳动。1963年，所有62班同学均到顺义县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间达一个多月。同学们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后收获很大。黄岭松回忆说：“我记得在农村参加生产劳动后的一天晚上，举行过座谈会，由各小组推选出的同学在会上畅谈参加劳动后的心得体会，大家讲内心话，生动感人。有的同学谈，听了老农民的新旧社会对比，忆苦思甜后，深受感动，提高了自己的阶级觉悟，坚定了社会主义信念。有的同学谈到，亲眼目睹劳动人民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集体，热爱劳动，勤劳朴实，团结互助，痛恨旧社会的剥削压迫和腐败堕落现象，劳动群众的朴素阶级感情和憎爱分明的态度，使自己深受感动，决心向劳动人民学习，为劳动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献身。有的同学谈到，自己不了解社会、民情，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并对自己的错

1 档案资料：7-XZ-1962-14-1。



20世纪60年代学院学生在农场劳动



20世纪60年代学院学生参加社教在田间合影



20世纪60年代学院学生参加社教时与农民合影

误思想行为进行深入的自我剖析等。在会场上，同学们有时鸦雀无声、洗耳静听，有时阵阵笑声，有时催人泪下，最后是以热烈掌声表示赞赏。这些我至今记忆犹新。我深深体会到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好阵地。”¹

2008年5月，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的专家、研究员易仁萍校友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我于1962年考入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会计系，1966年毕业，一生难忘在中财度过的快乐殷实的时光。特别是大三时遇到的‘四清’运动，我和同学们分别在北京顺义和安徽的农村做工作。那时候，我们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撇开政治因素，这次运动加深了我们对基层农民的了解，推动了我们的成长与成熟，还增进了同学之间的友谊。”她没有对这项运动提出丝毫的抱怨，却把它看作是一个难得的实践机会，认识到深入实际对自己人生的积极作用。她还清晰地记得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中，顺义的农民把省下来的细粮给他们吃，“在顺义的3个月农民对我们很好，经常把白面拿出来给我们包饺子”，话语中不时流露出感激之情。

1964年5月8日到6月1日，63级同学299人和学院教师、干部35人，组成生产劳动大队，到双桥农场黑庄户分场万子营、四合庄、朗辛庄三个村四个生产队参加了23天的生产劳动，劳动结束后，师生共同撰写了《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生产劳动大队参加双桥农场生产劳动的工作总结报告》，报告长达12000多字。尽管报告充斥着“左”的言论和观点，有形式主义的东西，但报告明确写道：“通过劳动克服了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观点，与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增强了劳动观点和群众观点”，这应该是感情的真实流露。

其次，同学们在实践中把自己在课堂学到的知识，应用于实际，可以进一步检验学习的程度，发现不足，有利于今后有针对性地学习。1965年下半年，由学院教师俞天一和刘春阳带队，金融系62级100人开赴武汉，到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进行工商信贷课的专业实习。实习的3个月中，学生们分散到各办事处、营业所，跟随信贷员站柜台、跑工厂，亲身体验了基层信贷工作的酸甜苦辣。

再次，参加生产劳动和实践，增强了体魄，锻炼了身体。

1 黄岭松回忆录，文章见《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校史资料汇编》，1994年，第45页。

六、专业教育的现实性和时效性

专业课程设置紧紧把握时代脉搏，密切联系实际；专业教育注重效果，增强时效性，这些是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传统和办学特色。这一时期，学院大力加强专业教育，提高了专业教育的质量。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培养学生的目标是培养为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德才兼备的专门人才，专业教育是学院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在教学计划中，专业课的教学时数（不包括工作实习九周和科学研究五周）占教学总时数的56%。

关于这一时期专业教育的课程设置，1960年已基本形成较稳定的体系。财政、金融、外汇（1964年起，改名为国际金融）三个专业的课程设置前面已经述及，后来又增设一些新课，如计算技术、逻辑学等。

学院从1962年开始增设会计系，开办会计专业和银行会计专业。此外，1961年后，学院成立了国民经济教研室，开设了国民经济计划、中国近代经济史、经济学说史、经济地理。这几门课程，都是各专业的必修课。

为了适应学生的需要，在保证主要专业课的前题下，1964年起学院开设了选修课，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学生可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兴趣选修一至三门。

在教学过程中，学院极为重视教学效果，要求学生打好专业基础，学好专业理论、基本知识和技能；重视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学院特别注重学以致用，财政60班和金融60班进行了毕业实习，写毕业论文；外汇60班没有进行毕业实习，只进行了毕业考试。1964年10月14日，财政62一班、二班，会计62班全体学生以及部分教职工195人，在副院长秦穆伯带领下，到河北保定专区新城县参加“四清”运动。62级所有班都参加了毕业实习（后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

在学校的为数不多的档案中，至今还保留着财政60班的实习总结。1964年4月上旬至6月上旬，财政60班37人于毕业前夕，在叶振鹏、刘培



1964年金融系学生在唐山实习时合影

金、王富、韩璧、林犹恭老师的带领下，分别到湖北省黄石市、新洲县，以及山西省太原市、太谷县实习。实习同学分为几个实习小组，按照学院的要求和当地的工作任务，制定了具体的实习计划，到湖北省的同学分为税收、社会文教财务、企业财务等组，他们先后调查了84个单位，写了36个专题材料；到山西省太原市的同学分为总预算、文教财务、城市自筹、企业财务、农业财务等组；太谷的同学在县财政局实习预算。从为期2个月的实习情况来看，大多数同学能够结合实际，把所学的理论知识、书本知识和工作实际结合起来，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有的同学运用所学的财务成本分析方法，分析黄石市收入变化情况；有的同学运用所学流动资金定额的方法，对太原工具厂的供应间隔日数，由原来的40天，核减为10天，效果明显；有的同学根据所学的企业财务制度，审查企业报表，发现有些企业的专用基金没有专款专用，费用的摊销不够合理；有的同学认为一些企业发出商品在未取得货款时即作为销售收入的做法不妥，并专门写了材料，论证这种做法的一系列后果，送当地财政部门参考（注：当时企

业的确定收入的会计方法是收付实现制—编者）。同学们通过编制预算、汇总报表，开始明确了款、项、目之间的联系，企业平衡表各组的关系，表与表之间的关系，以及数字的来龙去脉。实习结束后，学院综合实习中遇到的问题，写了《毕业班学生实习见到的有关财政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供有关部门参考，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¹

七、文化基础课的创新

学院根据学生毕业后从事实际工作的需要，对文化基础课也进行了一些改革。如中国语文（汉语）课不再重复高中内容，改为财经应用文写作课，重点是讲实际工作所需要的公文写作方法和科学研究所需要的科学论文写作方法。这一改革曾受到兄弟院校中国语文教师的好评，毕业后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学们也感到这一改革增强了自己对实际工作的适应性。同时，学院还增设了财经古文课，对学生学习财政史和金融史都有很大帮助。当时教公文课的闵庚尧老师在接受采访时说：

我是1962年8月份调到这儿来的。我以前是搞美学的。调到这儿来，领导找我谈，让我讲写作课。我说可以，领导说，是公文写作课。我说，不会讲，没学过。领导说，可以先到财政部去学习。于是我就去财政部学习了一个月，从9月到10月，11月正式开的课。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学校之所以开这门课，是当时的财政部常务副部长吴波同志指示学校开设的，当时，全国只有我们学校开了这门课，可以说是独一份。当时，吴波同志指示，我们财经学院的学生毕业后要当干部，要写公文；要让每个学生学会写公文。实践证明，开设这门课是对的。我们刚刚退休的王柯敬校长毕业后一开始被分到车间，后来厂长调他到厂部去写公文，他基本上没怎么

1 档案资料：7-XZ-1966-7-1。

费劲，因为在学校里学过，有了基础。其他学校的学生就不知道怎么写，我们学校的学生毕竟有过这方面的训练，写的时候就不怎么费劲，不至于抓瞎。掌握了公文方面的一些知识，对学生的将来还是很有帮助的。……当时在财政部，我边学习边思考边写出讲义来，讲义是个油印的小册子，后来改成了铅印的。当时讲了不到一个学期，因为是11月份开的课嘛，所以时间比较短。后来就安排成了一个学期，一个星期上四节课。……要说创新，公文写作和财经古文都算是创新。

外语课教学方面，一般专业的学生多数学俄语，少数学英语。学院强调，为了将来从事实际工作和科学研究，同学们要多学专业词汇，增加专业外语的份量，提高阅读外文专业书刊的能力。国际金融专业和国际保险专



20世纪60年代学院女子排球队

业的同学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除要求同学能阅读专业外文书刊外，还进一步强调发音准确，增强会话能力和外语写作能力，特别是要提高外语应用文（包括外语公文）的写作能力。

体育方面，学院规定体育教研室除了教好体育课外，还要指导和组织各班学生坚持每日早操制度和课外体育活动，每年组织一次体育运动会。体育教师曾动员师生用课余时间义务劳动，在北操场的北墙内挖了一个大游泳池，却因“文化大革命”而没有进行加工装修就废弃了。

八、1960至1965年招生人数、专业概览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成立以来，每年招收专业、班级、人数，可以从表

4-11至表4-15中直观地反映出来。

表4-11 1960年招收专业、班级、人数

系别	专业	班级名称	班级数量	人数
财政	财政	财政60班	1	39
金融	金融	金融60班	1	21
	外汇	外汇60班	1	68
合计	3		3	128

表4-12 1962年招收专业、班级、人数

系别	专业	班级名称	班级数量	人数
财政	财政	财政62一班、二班	2	
金融	金融	金融62一班、二班	2	
会计	会计	会计62班	1	
	银行会计	银行会计62班	1	
合计	4		6	282

注：学生入学时人数和毕业时人数有变化，1965年9月，学院上报北京市高教局《1966年高等学校毕业生调配计划》，学院1966年毕业生（62级）：会计45人、银行会计47人、财政93人、金融95人，共计280人。¹同学们毕业时，正赶上“文革”，应届毕业生暂不分配，留校参加“文化大革命”，直到1968年6月，最终的分配方案才出来。

表4-13 1963年招收专业、班级、人数

系别	专业	班级名称	班级数量	人数
财政	财政	财政63一班、二班	2	

1 档案资料：7-JX-1970-7-1。

续表

系别	专业	班级名称	班级数量	人数
金融	金融	金融63一班、二班	2	
会计	会计	会计63班	1	
	银行会计	银行会计63班	1	
合计	4		6	315

注：学生入学时人数和毕业时人数有变化，1967年学院应届毕业生（63级）：财政106人、金融103人、银行会计50人、会计54人，共计313人。1967届毕业生应在当年分配完毕，但是，由于处在“文革”时期，根据学院档案材料记录，1968年尚在分配中。¹当时大学生的分配原则是所谓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边疆、面向矿山。



财政63二班同学在长城合影



1963年7月外交部会计班结业合影



63级学生1965年在教学楼前合影



部分63级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前合影

1 档案资料：7-JX-1970-7-1。

表4-14 1964年招收专业、班级、人数

系别	专业	班级名称	班级数量	人数
财政	财政	财政64一班、二班、三班	3	
金融	金融	金融64一班、二班	2	
	国际金融	国际金融64班	1	
	国际保险	国际金融64班（国际保险组）		
会计	会计	会计64班	1	
	银行会计	银行会计64班	1	
合计	6		8	419

注：国际金融专业系外汇专业改名而来。1968年同学们毕业即分配工作。

表4-15 1965年招收专业、班级、人数

系别	专业	班级名称	班级数量	人数
财政	财政	财政65一班、二班、三班、四班	4	
金融	金融	金融65一班、二班、三班	3	
	国际金融	国际金融65班	1	
	国际保险	国际金融65班（国际保险组）		
	国际金融法语	国际金融法语班	1	
会计	会计	会计65班	1	
	银行会计	银行会计65班	1	
合计	7		11	501

注：学生入学时人数和毕业时人数有变化，学院《1969年学生人数统计表》显示，1969年待分配的学生：财政201人、金融200人、会计100

人，合计501人，加上往年遗留10人，共计511人。¹这一届毕业生先下放到河南省淮滨五七干校，1970年8月从河南分配、离校。

由以上列表可以看出，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自1960年成立以来，到1965年底，已设立财政、金融、会计三系，开设专业有财政、金融、国际金融、国际保险、国际金融法语、会计、银行会计等7个专业。

1965年底，在校本科学生总数1579人。

1966年因“文化大革命”没有招生。

此外，1961年下半年至1963年7月，学院为外交部代培会计干部，举办过21人的会计训练班。1966年上半年，还举办了一个35人的越南留学生班，后因为发生“文化大革命”，天下渐乱，越南留学生不得不中断学习回国了。

九、小荷才露尖尖角——留学生教育

遵照中共中央和周恩来总理的批示，1965年5月23日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刘子载正式答复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同意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提出的于本年8月间派2000名高中毕业生到中国学习的要求。越南派来的这批留学生来华后，先在9个城市23所高校学习一年汉语，然后分别入有关高等学校学习专业。

学院极为重视对留学生的培养教育工作。1966年初，中财院设立了越南留学生办公室。同年5月13日，学院给上级有关部门的一份报告说：“今年下学期（指1966年上半年），我院接受越南留学生38名，还有3名研究生，按照国家有关外国留学生与教师比例的规定，35名留学生应该编制教职工28名；3名外国研究生应该编制教职工3名，合计应该增加教职工编制

1 档案资料：7-JX-1970-7-1。

31名（31名教职工分配到不同的校内单位）。”为了便于对留学生进行管理，学院成立专门办公室，由院长直接领导，设主任1人，秘书2人。¹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7月30日，学院还制定了《越南留学生外汇专业（1966—1970年）教学计划（征求意见稿）》。文件明确提出了培养目标，外汇专业的基本任务是培养社会主义国家银行外汇业务工作者，要求达到：通过对毛泽东思想的活学活用，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时时、事事、处处突出政治，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能够领会毛泽东思想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国家银行国外业务的基本理论，掌握外汇业务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够阅读国家银行外汇业务方面一般英语书刊和往来英语函电及简单英语会话，草拟一般的英语业务往来函电。文件还对课程设置和工作实习作了规定：政治理论课程开设毛泽东著作、政治经济学，教学时数394课时，占总课时22.3%；文化基础课开设汉语、体育和英语，教学时数590课时，占总课时33.4%；专业课开设计算技术、对外贸易基础知识、国际结算、外汇会计、专业英语、国际金融、专题讲座，教学时数784课时，占总课时44.3%。

到了该年9月27日，学院还为35名留学生建立了详细的情况登记表，每人一表，当时是内部资料，绝对保密，目的在于密切关注留学生的动向。该表分为基本情况、思想情况、健康情况三个主要部分。基本情况一栏中记录内容为：什么时候学的汉语，家庭成员，特别强调是越南北方人还是南方人，因为当时北越是越共统治区，南越是美国支持的所谓“伪政权”统治区。档案显示：许多学生父辈为军人，多名学生父亲在抗法斗争中牺牲，有的学生本人就参加过抗法斗争。“思想情况”一栏记录内容极为详尽，这里仅举若干例，可概其详：

“平日，对政治不关心，很少读报和收听广播”

“对我友好，不关心政治，爱面子，生活上好修饰；思想较好，经常

背主席语录”

“生活要求不够严格，好吃零食，伙食不太随心时，即到小卖部买着吃”

“对我‘文化大革命’关心，对革命师生的大字报，认为不可以理解，认为会伤了同志的团结”

“政治态度明朗，反帝坚决，曾经说，不学主席语录，即不了解中国国情”

“来我国后，患肺结核，经过治疗痊愈，非常感动地说‘这是毛主席救了我，越南人民感谢毛主席’”

“在政治上，很少发表意见，或避而不谈，有时说要有组织性，不能随便讲”。¹

据一些给这一批留学生上过课的老师回忆，他们学习很认真，与老师关系很融洽。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1966年9月的时候，高等教育部给各驻华使馆的《备忘录》中指出：“从现在起，在华外国留学生（包括大学生、研究生、进修生）回国休学一年。回国的往返旅费由我国负担。这些留学生的返华学习的具体时间，届时将另行通知。”²此后，中财这批留学生就中断学习回国了。自这一年起，中国停止接收外国留学生达7年之久；而中财再接受外国留学生则已经是1990年代的事了，中间隔断近30年。

十、教育大计，德育为本

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首位，切实加强政治理论教育、形势政策教育和

1 档案资料：7-XZ-1966-8-1。

2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第403页。

1 主任为任文仲同志。见档案资料：7-XZ-1966-8-1。

思想品德教育，是国家，也是学院办学的重要方针。

在办学中，学院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的教育方针。

学院始终认为，德育是以学生为对象的政治思想教育。德育是智育、体育的动力和方向，智育、体育是德育的基础和主要途径。学院的政治思想教育是通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理论教育、形势政策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来进行的。

德育教育要达到的目标是培养学生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道德观，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

政治理论课是德育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当时，学院的政治理论课设有哲学、政治经济学（这也是学院专业的基础理论课）、中共党史，还在各学期设有每周两学时的思想政治教育（包括形势政策教育），再加上入学教育和毕业教育各一周，各班的思想教育、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时数占教学总时数的30%，这个比例是国家规定的。同时，学院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特别注意理论联系实际。不只是联系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实际，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实际和我国历史上革命和建设经验教训的实际，还注意联系学生所学专业的实际，贯彻执行财经工作方针、政策的实际，特别是学生的思想实际，教书育人、理论育人。

学院的政治理论课的教材都是自己编写的，具有本院的特色。

学院还认为，对德育教育，只是灌输和说教，是不会收到好的效果的。形式必须灵活多样，增强德育教育的感染力、说服力，德育教育要有时效性、针对性，为此，学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学院曾请外交部等部门的专家来学院作报告，还采取阶段教育与主要环节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思想品德教育。

学生的德育教育从入学到毕业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抓住学生入学的主要环节，集中进行一周的入学教育。主要是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明确学习目的，使之热爱所学的专业，并进行文明礼貌、遵纪守法的教育。

第二阶段，是对二、三年级的学生进行深入的思想品德教育。如开展学雷锋创三好的活动，随时表扬学生中的好人好事，每学年评选一次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和先进集体。针对出现的不良倾向，随时进行批评教育。

第三阶段，抓住毕业主要环节，集中进行一周的毕业教育，把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国家利益、服从毕业分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愿为社会主义献身等，作为毕业教育的主要内容。

此外，1964年党委办的《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简报》创刊，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反映和交流信息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停刊。

曾经担任绍兴市人民银行机关党委副书记的校友王世金，1963年考入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会计系。他回忆大学时代的生活时说：

……在专业知识学习的同时，学校也较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倡导学习毛主席著作，并在学生中发展党、团员。记得在进校不久，就由我们班里的陈辉明同学（后担任过重庆市人民政府秘书长等职）发起组成了“3631班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共10人，我是其中一员，定期不定期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同时党、团组织也重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并积极发展党、团员。记得当时的班学习委员戴相龙同学（后来担任过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现任天津市市长）就是积极申请入团的一个，我和同班同学李公才就是他的入团介绍人，我自己也于1965年7月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刚进校时班里仅宋锡恩同学一名党员，到毕业分配时，班里已



1964年学院参加横渡十三陵水库活动的学生合影



20世纪60年代学院同学在排演文艺节目

有5名党员走向社会。即宋锡恩、王全诗、李公才、任宝丰和我。与此同时，母校还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的提高，积极组织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社团文化活动和文体体育活动。如：我就参加过北京市大学生1964年春节环城万米长跑赛活动，并得到一枚纪念

章（有留存）；参加了1964年北京市大学生横渡十三陵水库活动（留存有全校参加人员集体照）；1964年4月，母校还举办了“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第二届运动会”，我当时参加了“男子4×100米接力赛”，并获得奖状。不仅如此，每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国庆节，学校都组织学生到天安门唱歌跳舞，欢度节日。有时同学们到颐和园进行文艺演出，开展宣传活动。每年学校还组织学生到北京郊区农村参加劳动。¹

为了教育学生自觉地、严格地遵守学院的制度、纪律和国家法令，树立良好的学风，保证教学任务的顺利完成，学院加强了学生的政策教育工作和日常管理工作。

在干部配备上，充实了基层，实行了级主任制度。级主任在系党总支和系主任的领导下统管学生的思想工作和管理工作，使思想工作和管理工作结合起来，思想工作落到了实处。为了便于联系，级主任的办公室设学生宿舍附近。各系按年级设专职级主任，选派年龄较轻、各方面条件较好的干部担任。1962年起，还调来军队退伍转业干部担任学生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被称为“朴实的班主任”的刘春阳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例。刘春阳参加过解放战争，1960年从浙江军区转业到北京，1962年8月到中财院，是金融系62级（100多人）的级主任，主要负责学生的行政管理。此外，学生的迟到、早退、考试不及格，以及生病住院、吃饭穿衣等，他都要过问。刘春阳在军队呆了10多年，说话做事很实在，对学生的管理也有些近乎军事化。寝室里要求被子一条线，鞋一条线，毛巾一条线，面盆一条线，检查卫生时，要把抽屉拉出来，检查底下的缝有没有灰尘。每一个星期，班长要向他交一个全班的出勤表，谁迟到、早退、旷课，一目了然，他接着会对照表格找违规学生“算账”。不过据刘春阳回忆，这个班同学很齐心，班干部有号召力，学校、班里有什么活动，他向班长或书记一传达，班干部就把全班组织起来了，基本上没有让他操什么心。当时，根据北京市统一安排，学生每年至少有两个星期到北京郊区干农活。刘春阳带领全班，到顺义双桥的中古友好人民公社，帮老乡割麦子、收玉米，学生搬上自己的家当，分散在农户家里，跟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学校的后勤人员、系主任、班主任等都跟上，相当于把课堂搬到了田间。

老师关爱学生，学生尊敬老师，形成了良好的师生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学校的班主任老师都被批斗过，但金融62一班的同学对刘老师却非常好，没有为难他。刘春阳说，直到现在，如果有学生来北京，或者班上有什么事要聚一聚、聊聊天，电话就打来。1997年刘老师满

¹ 见王世金所作“中财情怀，往事追忆”一文，载“中财校友网”，2007年12月12日。



20世纪60年代我校学生在教学楼前合影



20世纪60年代同学在校门口留影

70岁，学生们非得要给他过生日，在北京的几乎全到，外地也有赶来的，挤挤地坐了三桌。刘春阳说，整个班的学生对老师都是如此尊重的，而这并不多见。¹

十一、图书馆及硬件建设

图书馆是知识宝库，丰富的图书资料是办好学院的基本条件之一。学院图书馆的宗旨是“读者第一、服务育人”，为教学、科学研究和管理工作提供一流的服务。

图书馆保存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财政部和人民银行总行在办学过程中，有关教育方面的图书资料。学院成立后，又增加了大量的图书资料。1965年，藏书共有48万册。其中财经类，特别是财政、金融、会计专业所需的图书资料相当丰富、齐全。

学院当时还保存着部分历史珍本和绝版书刊，如，盖有乾隆皇帝御玺，乾隆曾看过的历史珍本；《四部备要》一万卷（原版）；还有王云伍编的《万有文库》（原版）；《会计百科全书》（十卷）；创刊以来的《人民日报》；地方全部报刊（财政部和人民银行总行编

辑）；1840年至1911年的经济期刊；1949年至“文革”期间的剪报资料（共计52箱）等。

丰富的图书资料，对教学、科学研究和管理工作，特别是对编写财政史和金融史有重要帮助。

这一时期，学院教学设备、基本建设有了发展和改善。学院面积有228亩，1960年学院成立时，房屋总建筑面积约28000平方米，到1966年房屋总建筑面积扩大到44000平方米。增建了四层的办公大楼，一个学生大食堂，三栋五层的教职工宿舍大楼，院内的沙石路全都改修为柏油路，修缮了大礼堂等。中财有个很好的礼堂，开会、演出、放映，具备多种功能。中式建筑，堂庑式大，设备齐全，装饰谨重，在当时高校中，也算行业翘楚。“文革”前，学院拟建图书馆，已被批准，设计图已出，基础工程已开工，惜“文革”忽来，遂至废弃。

第三节 政治风云中的中央财政金融学院

从1956年至1966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十年探索中，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一个发展趋向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这就是在探索建设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以及取得的实践经验，这些都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先导。另一个发展趋向是错误的趋向，形成了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这十年中，正确的发展趋向和错误的发展趋向并不是截然分开，许多时候都是相互渗透和交织在一起的。一方面我们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成就，另一方面，又有着严重的失误，这是十年历史发展的特点。

¹ 以上内容可参考中央财经大学校友总会：《春华秋实》，第一辑，第260页。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政治局势忽左忽右，变动不居，冒进与反冒进，与反“反冒进”；对国家经济形势“光明”与“黑暗”的估计；对以往“斗争”定性的翻案与反翻案；对国家严重困难是人祸还是天灾的认定；对各行各业发展是求数量还是抓质量；对知识分子的估计是归为资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教育改革是缩短学制还是半工半读；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清理基层还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整顿工作作风还是搞阶级斗争……政治运动一波接着一波，即便是有一时的平静，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20世纪60年代前期的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处在这样一个矛盾错综复杂、经济建设曲折发展的政治大背景下，学院历史的发展不可能不受政治形势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历史无疑具有深刻的时代烙印。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十中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还指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还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单干风”（指包产到户）和“翻案风”，还严厉指责了所谓“黑暗风”（即指对当时严重困难形势作充分估计的观点）。这个讲话标志着政治思想上“左”倾错误的严重发展。但是，十中全会继续坚持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全会结束后，经济调整工作能够基本上按照原来的计划继续进行。

八届十中全会后，学院党委积极组织学习，在1962年12月1日的党委会议记录中，明确提到：

当前极端民主化思想有所发展，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党内来，当前的思想状况并不是平静的。党的建设关系到工作的成败，要认真组织党员学习十中全会文件，加强阶级教育，开展两条道路斗争教育，党员干

部要认真组织讨论，领会中央精神，在提高的基础上，自我检查，以往的工作要按照十中全会精神来检查，把时间拉长一点，每周二三次，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自觉检查，他人提醒。

12月24日，学院党委又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学习问题。今天仔细阅读当时的发言记录可以看出，尽管充满着“左”的字眼，但是有许多发言是很有政策水平和策略的。有的委员指出：“学习是为了解决问题、达到一定目的，对个别人要批判，但是要团结大多数，要解决大问题，不要纠缠个别别人的问题，要学习党的路线方针，脱离了党的路线方针，不可能有真正的团结。”有的党委委员发言说“这次学习很有必要，贯彻了中央的精神和市委的精神，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党的路线方针上来，统一到毛泽东思想上来，学习要解决大问题，如三面红旗问题、民主集中制问题，要以理服人，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右倾不能简单粗暴，更不应该随便扣帽子。”这种观点的阐述，在可能的程度上无形中保护了一些人。

八届十中全会后，党中央决定在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1963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毛泽东总结湖南、河北等地的经验，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会议决定在农村进行以“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3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县以上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这个运动。从此，“五反”运动在全国部分城市逐步展开，与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互配合。

“四清”和“五反”运动在全国开始后，学院也卷入运动当中。

学院从1963年4月至1964年5月开展了“五反”运动，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的四大方法进行，号召大家在运动中揭发、交

代、“洗手”“洗澡”。据不完全统计，运动期间共贴出大字报 1774 张。在“公物还家”口号之下，交出各类公物1315件，其中有家具 215 件，生产、生活用具409件，文体用品171件，图书255册，以及少量的粮票、布票等。

1964年5月14日，学院对本院的“五反”运动作了初步总结，总结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谈对阶级斗争的认识和“五反”运动的意义，基本上是八届十中全会的论述和当时的官方文件内容。

第二部分，是总结的具体内容，总结说：“我院‘五反’运动按照运动和教学两不误的要求，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参加这次运动的共 712 人，其中职员 90 人，教师 130 人，工勤人员 69 人，学生 423 人（党员 170 人，团员 258 人）。”

这份总结又说，这次运动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央关于“五反”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针、政策，发动群众，达到重新教育、改造思想、团结多数、共同对敌、克服和抵制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想的侵蚀、振奋精神、鼓足干劲、改进作风、改进工作的目的。根据揭发和清查，说明我院在事业方面不仅存在浪费现象，而且比较起来还相当严重，铺张浪费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严重的危害。反对铺张浪费不仅是贯彻勤俭建国、勤俭办学的教学方针问题，而且关系到能否办好社会主义大学、能否培养又红又专的干部、关系到高等学校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思想作风谁战胜谁的问题。反对铺张浪费是一次“兴无灭资”的艰苦奋斗，今后我们一定经常坚持进行克勤克俭、爱护社会主义公共财物、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教育。应当看到，我们绝大多数的同志是好的，其中部分人犯了一些大小不同的毛病，经过领导和群众的帮助是可以改好的。公私不分、多吃多占、小偷小摸等错误行为都是受到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表现，但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此，自我教育首先必须从思想入手，启发群众自我革命，达到自觉革命的目的。其次，必须采取“与人为善、

治病救人”的原则，贯彻“思想从严”的精神动员，号召群众自觉“洗手洗澡”。例如学院交代公私不分、乱抄乱拿的现象占49%，小偷小摸约占1.5%，至于利用各种关系违反制度，走后门，涂改购货证等情况也不少。通过运动，大家进一步认识到要防微杜渐，更要警惕和平演变，要挖掉产生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根子。不少人说，“这次运动震醒了我们”，“自己洗了一次温水澡”。在学校里，阶级斗争忘不得，思想改造放松不得，生活小事轻视不得。

在运动中，学院把坦白交待和专门调查“三清三查”¹结合起来，把小组说理斗争、分析批判和个别谈话结合起来。据统计，运动中，我们收到坦白和揭发检举材料123件，涉及83人（涉及校内的材料有80件，涉及到40人），已经确定属于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有3人，其余大部分检举材料内容是自我教育中已经交代过的所谓“三小问题”。

总结还对领导作风进行了分析，指出：“院领导有忙忙碌碌事务主义工作作风，不论大事小事都抓；在领导教学工作中，深入教学单位不够，布置多、检查少，决议多、措施少；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不够，不善于运用‘两分法’观察问题；有官僚主义作风。”

第三部分，是表态和决心部分。这个总结的最后这一部分中谈到：为了促进学院革命化，今后必须积极学习解放军“四个第一”、“三八作风”²，进一步推广大庆石油会战经验，提倡“三老四严”³、“四个一

1 在“五反”运动中，中央提出：要反复交代政策，号召坦白检举，把坦白检举和专案调查、三清三查（清查账目、清查仓库、清查财物）结合起来，把小组的说理斗争、分析批判和个别谈话结合起来。

2 “三八作风”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养成的优良作风。毛泽东把它概括为三句话八个字。三句话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八个字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通称“三八作风”。林彪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它，作了夸大的宣传和解释。

3 “三老四严”是大庆油田职工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提出的口号。“三老”是指对待革命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四严”是指对待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

样”¹，建立必要的管理责任制度，大抓学习毛主席著作，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大抓典型，大立标兵，领导蹲点，深入基层，推动教学改革，进一步做好学校工作。²

1964年下半年，学院就投入到“四清”运动中去了（详见后文）。1965年初，财政部和总行派来10名干部和学院抽出的13名干部，共23人组成了“四清”工作队。工作重点是在学院“五反”的基础上，深入清查处理“五反”、“四清”中揭发出来的问题，一年之后才结束。7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组织高等院校和文化单位的干部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通知指出：让知识分子参加农村“四清”运动，是对他们的思想改造，加强他们同劳动群众相结合的最重要、最有效的方式。³中财兵分几路，领导和教师带队，又深入了农村，持续到文革开始。

在“五反”和“四清”运动中，虽然有些收获，增强了教职工对大公无私、廉洁奉公的认识，查清了一些问题；但是由于“左”倾错误思想指导和使用四大的“左”的方法，给教职工灌输了“左”倾错误思想，挫伤了部分教职工的积极性。“五反”运动对一些同志处分过重，后来，工作队向他们赔礼道歉。但对一些蒙冤的同志没有给出妥善的处理，甚至有些问题一直拖到“文革”以后才得到解决。

“四清运动”连上了“文化大革命”，“四清”、“五反”之初衷，不谓无理，但以“阶级斗争”通贯其间，经济问题、思想问题、作风问题都和“阶级斗争”裹在一起，混淆是非，夸大其词，无理性地上纲上线，培育了极“左”思想，强化了斗争哲学，塑造了“革命”机器，唤起了“造反”欲

1 “四个一样”是党的优良作风和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同油田会战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大庆油田广大职工自觉坚持标准、严细成风的真实写照。其内容是：对待革命工作要做到“黑天和白天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一个样；领导不在场和领导在场一个样；没有人检查和有人检查一个样”。“四个一样”于1963年由李天照并组首创，得到周总理的高度赞扬，并与“三老四严”一同写入当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工业部工作条例（草例）》，作为工作作风的主要内容颁发。

2 档案资料：XZ-1964-7-1-2。

3 金铁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2卷，第797页。

求，把一个大中国来了一个彻底的清洗。

一、“四清”运动升级，教师学生下乡

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讨论的内容之一是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会议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在这种对现状不切实际的估计下，毛泽东提出，农村、城市搞四五年，不要急急忙忙，城市“五反”要增加划阶级的内容。根据这些精神，8月下旬，刘少奇主持会议，对当时指导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政策文件“后十条”¹作了修改，认为“四清”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也就是把基层组织和基层领导都撇到一边，提出要抽调大批工作队，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并且要采取类似土地改革运动中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的工作方法，这就使“左”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1964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各重点地区按照中央的指示，大搞群众运动，中央机关、省委、地委主要领导人亲自蹲点，组织庞大的工作团，中央机关派出了3.7万人，解放军派出3万多名干部，全国组织了100万以上的干部工作队，搞人海战术。1964年9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组织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通知指出：“我国高等学校文科脱离实际的倾向十分严重，资产阶级的和修正主义的思想影响相当普遍。有些单位的领导权不是掌握在无产阶级的和修正主义的专家正在同我们争夺青年学生。”“今后的方向，就是使文科院校附设工厂或者迁到农场，办成半工半读或者半耕半读的学校。使文科学生通过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逐步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通知

1 “后十条”指1963年11月中央通过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草案）》。

规定：“本年冬季开始，高等学校文科师生都应该分批下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是参加农村的‘四清’运动。”¹

在上述背景之下，1964年下半年，学院组织师生下乡搞“四清”运动。

8月17日，学院召开党委会议，讨论干部参加“四清”运动问题。会议制定了学院干部参加农村“四清”运动的五年规划，在五年之内每个干部参加农村“四清”运动一期或二期，并且制定了“三三制”原则：处级干部以上每年抽调1/3，科长级干部每年抽调1/3，一般干部和教师每年抽调1/4，参加农村“四清”或工厂“五反”运动，争取3—4年内，每人参加一遍。1964年，学院规定：参加农村“四清”的干部中，科、处长以上干部要占1/3，一般干部和教师占1/4。各个处室根据学院的布置，制定本单位参加“四清”运动的规划，确定当年参加“四清”的干部名单，于8月25日前上报市委大学部，并安排62级学生要在10月份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要组织安排，确定好带队人员及参加的教职员。

8月25日，学院又召开党委会，讨论干部、教员和学生参加“五反”、“四清”运动的问题，会议决定：为了坚决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今年我院干部、教员和学生全部到农村参加“四清”工作，除基建等某些部门留下少数人工作和看守以及有病者不去外，全部参加“四清”运动。为了做好全院干部、教员和学生参加农村“四清”的准备工作，党委决定，由党委办公室、人事处、学生处三个部门组成筹备小组，进行准备工作。

9月10日，学院党委会讨论下去参加“四清”和留校工作当中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会议提到，院长走了1/3（除了陈如龙副部长兼院长部里已确定留下外），这次秦穆伯先下去，带领1/3的处级干部，有黄岭松、卢峰章、张伟弢、张金城同志，其余干部同学将近400人，大体也是普通干部和学生各占1/3。这次下去参加“四清”是随部、行走，有财政部、人民银行、农业银行三个单位。到什么地方，尚未确定。离开北京的时候，



金融62班部分同学在河南四清时合影

间，可能有先有后，准备过程中，有思想动员问题、文件学习问题、个人的生活装备问题，以及编组确定名单等问题。这次下去，大家情绪很好，踊跃报名，但主要的准备还是思想准备。会议决定，秦穆伯带的这一组组成临时党支部，由卢峰章、陈菊铨、王廷辅组成。留下的师生员工，组成临时总支，支部主持日常工作。

9月23日，学院党委会讨论：去留党委工作之间的交接问题；学院如何贯彻教育改革问题。秦穆伯说：这次“四清”暂搞一年，期间，姜明远代理党委书记，学院“五反”专案由张焕彩负责，要抓紧、搞到底、彻底解决问题。姜明远传达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关于组织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

不久，会计系党总支书记李培林带领银行会计62级的学生，随同中国农业银行总行的部分干部一起到安徽省滁县专区全椒县，参加农村“四清”工作，该组成员编为1个中队，5个小队，共计党政干部、教师15人，学生47人。

1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第367页。

教务处长黄岭松带领金融62一班、金融62二班和人民银行总行会计司长带领的总行干部一起，到河南省许昌市集训后，再到郑县参加“四清”工作，该组成员编为1个大队，2个中队，12个小队，党政干部、教师25人，学生96人。

上述两队人马出发后，10月8日，学院公布《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规划》，规划指出：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指示，当前，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必须参加正在全国开展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实际的阶级斗争中接受教育和锻炼，提高社会主义觉悟，进行世界观的改造，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科生走出书斋，逐步克服长期存在的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实际的不良学风，才能有效抵制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培养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为此，学院做出了这样的安排：全院师生必须分期分批参加运动，学院现在有一、二、三年级学生（1961年未招生，没有四年级），计划从今年起，每年三年级学生下去300—500人，党政干部、教师每年随学生下去1/3，即100—150人，4—5年可以轮流一遍。当年冬天下去三年级学生学生280人，党政干部31人，教师65人，共计376人。分别随同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中国农业银行总行下去。三年级学生和部分师生在1963年冬天已经参加过两个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时，该年级的专业课程大部分排在第三、第四学年，而第三学年下去一年，因此第四学年必须学完主要业务课程。带领师生的大、中、小队长除了管理教育师生外，必须参加“四清”的蹲点工作，师生在运动中，除选定为工作队员外，其余应该做力所能及的工作，例如访贫问苦、扎根串连，配合农村知识青年编写村史、社史、家史，参加生产劳动，主要是受教育、受锻炼。

10月初第三队人马出发，由秦穆伯带领财政62一班、财政62二班和会计62班，随同财政部到河北省保定市集训后，先后到河北新城县和涿县参加农村“四清”工作。学院人员编为1个工作组，1个大队，4个中队，15

个小队，共计党政干部、教师56人，学生137人。¹

这次师生下乡搞运动，有这样几个特点：

1. 持续时间长。62级三个小组的同学在农村参加“四清”工作将近一年的时间，其中河南小组1965年5月初才同总行的同志们一起返回北京。63级各班同学参加农村“四清”工作，从1965年8月到1966年8月²，由姜明远同志带队，地点在湖南省武冈县农村，也进行了一年的时间。学生中断学习，长时间搞运动，这是与当时整个国家政治大背景紧密相连的。

1964年12月1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会上，毛泽东批评了关于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等提法，提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布这次会议讨论的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23条》）。按《23条》规定，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并把“四清”的内容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这已经和原来的“四清”不同了。《23条》虽然对1964年下半年以来“四清”运动中某些具体的“左”的偏向作了纠正，但又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更“左”的观点。《23条》下达后，各地党委对城乡“四清”运动重新作了部署，为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各地除抽调党政干部参加工作队外，在原来试点的基础上，还大规模地抽调出高等学校文科学生和理工科高年级学生参加“四清”运动。到1966年春，在全国农村，大约有1/3左右的县、社先后开展了“四清”运

1 参考《参加河北省新城县农村四清革命有点的总结》，档案资料：7-DQ-1964-1-3；档案资料：7-XZ-1964-7-1-2；档案资料：7-XZ-1964-7-3-4。

2 据中国农业银行审计局原副总经理郝震回忆，确切时间是1965年8月15日—1966年8月16日，见中央财经大学校友会编《春华秋实》，第一辑，第109页。

动。运动一直持续到“文革”中。

2. 生活艰苦。据黄岭松回忆：

到河南后，我曾向总行会计司长提出两条要求，一是要求将我院学生分散和总行干部、地方干部一起编成工作组，使学生能得到总行干部、地方干部的具体指导和帮助；二是要求我和4名学生和一位地方干部组成工作组去搞一个点。他同意我的要求后，我组到郟县只有一个生产队的小村搞“四清”工作。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年四季，一日三餐都是吃红薯。我和同学们都不适应，饭后常吐酸水，我们吃了不少胃舒平和小苏打药片。夜里睡木板。听说该县、社机关干部粮食供应，红薯占70%，原因是此地盛产烟叶，种粮食的土地很少，国家收购烟叶即给钱，每斤烟叶还给一斤粮票。所以，只能都种高产的红薯，连农民的自留地都种烟叶。虽然生活艰苦，工作繁忙，但组内同志们相处非常亲切，亲如一家。

3. 任务繁重。工作组根据县、社“四清”工作队的工作布置，经常召集生产队的全体社员开会；在大小会上反复宣传“四清”的目的和意义，反复动员群众和干部，揭发、交代“四不清”的问题，并对揭发、交代出的问题进行认真查对、核实，然后进行大小批判会，教育干部和群众。最后，将核实的问题，个别干部犯错误的事实，进行总结汇报，交县、社工作队研究处理。

二、时代特色凸显的党委会

20世纪60年代初期，共和国历史发展的脉络是成绩和失误相伴而行，交织在一起，一方面我们在实行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另一方面，八届十中全会又对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的论述。学院历史同样呈现出这样一

个曲折发展的特点，可以说是共和国历史的缩影。一方面学院的教学科研逐步走向正轨，形成了一个良好的育人环境，另一方面，学院也深受时代思潮的影响，片面强调政治挂帅，“左”的言行不乏其例。仅以现在完整保存下来的1963年学院党委会会议记录而言，有的讨论了学院工作，但是，多数是政治学习的记录，许多内容就是“左倾”年代的“左倾”言论集。如：

1963年1月份，仅现在保存的党委会议记录就有4次，内容主要是讨论政治学习的，讨论的问题是：大跃进运动的成绩和缺点什么是主要的？错误的性质问题？三年困难产生的原因；对反右倾运动的看法；对民主集中制的看法。编者发现，几次会议唯一一次讨论业务问题，是在1月14日的党委会议上，姜明远提到，1963年要开一个政治人员会议，要开一个经济人员会议，经委开了一个会，要我们参加筹备工作，这个会议的内容，我们要提出意见。

2月23日，传达、讨论北京市组织工作会议精神。讨论这一年的工作安排，大力进行增产节约，开展“五反”运动；精简人员；反修正主义学习。

3月11日，传达市委大学部的工作布置，这一学期总的任务是：全国以增产节约、“五反”运动、社会主义教育、反修正主义为纲，今年既是发展生产的一年，又是阶级斗争的一年，去年八届十中全会讲了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今年强调抓阶级斗争和阶级教育，要加强党的建设。高校要深入贯彻高教60条。向雷锋学习也是阶级教育。学院本学期工作具体分三个阶段：1. 3—4月份，“反修”教育；传达市委组织工作文件；精简人员；“五反”准备工作；调整工资的准备工作；部分毕业生鉴定。2. 5—6月份，以“五反”运动为中心。3. 7—8月份，集训党员；组织干部鉴定；毕业生分配鉴定；“五反”结尾。

3月12日，讨论关于几封人民来信的处理。

3月29日，传达中共北京市委工作会议精神。核心工作是“反修”和“五反”。

4月2日，传达王从吾¹的报告。报告主要讲阶级斗争问题，为什么要搞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被破坏，少数人不甘心灭亡，一有机会就想复辟，他们利用目前的一些困难兴风作浪。农村已走向集体化道路，但是，小生产的自发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长期存在，台湾还未解放，反动派、修正主义利用一切机会向我们进攻，阶级斗争是长期存在的。

4月5日，讨论“五反”问题。成立“五反”办公室，成员有：黄岭松、康民、曹桂芬、王万有、许汉杰、李继熊、杨春明。

4月11日，党委组织生活会（会议有争论）。讨论清产核资问题，及因为“多吃多占”形成的所谓学院事件（实际上是几斤肉、几斤米、几条烟、收玉米等等问题）。

4月24日，传达市委大学部关于在高等学校开展“五反”运动的部署。第一阶段内容着重经济上的问题，一是学习文件；二是领导干部下楼。第二阶段是反浪费，着重解决三个问题，一是领导干部下楼；二是反铺张浪费；三是反对小偷小摸。

4月27日，讨论“五反”的具体措施。

4月29日，领导自我检查，说明自己的情况。

5月15日，传达市委大学部关于“五反”运动的情况和经验。

5月31日，传达市委关于“五反”情况的意见。

6月12日，介绍清华、航空学院的经验。

6月15日，讨论中央关于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会议着重讨论了唯心主义和修正主义产生的基础。

6月18日，讨论“五反”运动的具体措施。戴上“贪污”帽子的界限，100元以上的戴帽子；100元以下，情节不严重而且态度好的不戴帽子，不给处分；100元以下，情节严重而且态度不好的不戴帽子，给处

分。关于投机倒把的界限，获利500元以下的，只补税不罚款，500元以上罚款；机关干部获利500元以上的处分，500元以下的给予罚款，不处分。

6月20日，讨论中央关于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有的委员发言说，经常考虑列宁的一句话，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讲到，不消灭差别就不会消灭阶级。地富反坏、牛鬼蛇神的经济基础不存在了，但是他们的反动思想不接受改造，他们绝不会因为经济上的被剥夺，而在政治上的阶级仇恨消失，地主分子总是教育他的子孙要报仇。八届十中全会提出阶级斗争以来，经过学习，逐渐认识到这个问题，从历史上看、从国际上看，有复辟的可能。城市里提倡一点自由，资产阶级思想就泛滥。过去认为封建迷信问题解决了，现在农村供灶王爷的现象很普遍，前几年都把庙拆掉了，现在又恢复起来了。这几年认为搞社会主义建设，阶级斗争可以放在次要地位，这种认识是错误的，这几年出现的问题，认为大量的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而忽略了敌我矛盾。

6月28日，上午讨论反官僚主义问题（北京市委大学部派人参加）。下午传达周总理在中央直属机关的报告，该报告把官僚主义归纳为20类。¹

7月29日，汇报外汇班的“五反”运动情况；外汇班学生分配情况：总行38人，西藏4人，留校2人，财政部2人。同时讨论了“五反”运动中的人民来信。

7月31日，当日市委大学部召集会议，研究对高等学校毕业生中反动分子的处理问题，学院晚上召开党委会。

8月15日，商定参加市委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人员。

8月23日，讨论62级同学参加社会主义教育问题。

8月27日，讨论63级同学“反修正主义教育”问题。决定每周教育3学时，共2个学期。

9月5日，开学后工作安排。“五反”从9月9日开始，到10月中旬，

¹ 王从吾（1910—2001年），河南内黄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先后担任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等。新中国成立以后，在20世纪60年代，兼任中共中央党校书记、校长，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

¹ 1963年5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的报告。

共5个星期，其中2个星期进行自我教育和公物还家；2个星期进行反对贪污、盗窃；1个星期进行教育总结。

这个梳理说明这一年党委会议几乎不讨论专业教育问题，这与当时的政治大背景密切相关。

三、参与政治运动的得与失

中财院62级和63级同学参加了一年的农村“四清”，是特定年代的特定结果，对此不能一概否定，其收获在于同学们了解了农村的实际情况，也可以说是了解了当时的国情，密切了同劳动人民的感情，用当时的话语来说，加强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和阶级立场，学会了做农民群众工作的方法。金融系63级校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副主席史纪良回忆说：

63级同学1965年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编制在湖南武岗的中央财贸社教总团，当时的社教成员来自人民银行、财政部以及地方干部和中财的大学生，当时一个大学生大体上负责一个大队，从教育农民、学习文件，到对乡村干部进行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事无巨细，面面俱到，一年的时间对我们锻炼很大，尽管专业课的学习受到了影响，但我觉得这次活动对我人生的锻炼及加深对社会的了解，有很大帮助。¹

但是，在“左”倾思想泛滥的年代，不可避免地接受了深刻的“左”倾思想的教育，特别是中断学习搞运动，时间长达一年，冲击了教学计划，致使62级和63级同学少学了一学年的课程。四年制的本科实际变成了三年。“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左”倾指导方针，严重干扰了正常的教



我校教工在湖南武岗参加四清时合影



1965年武冈社教留念

学秩序，否定了学生以学习为主、学校教育以教学为中心、教学以课堂教学为主的教育原则。不能说对教员与学生没有一点益处，但那与其说是对人学问上的益处，不如说是对人生经验的益处。于大学教育，乏善可陈。

四、半工半读

“文革”前夕，与搞“四清”几乎同步进行的是国家大搞“半工半读”教育模式的探索。

1965年3月31日，刘少奇对教育部长何伟、副部长刘季平说：“一切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都会产生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包括我们国家在内，问题是如何防止。现在我们想到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发动群众搞‘四清’；一个是改革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我们办半工半读学校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¹

教育工作中的两种教育制度是刘少奇在总结国内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于1958年5月30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来的。所谓两种教育制度，是指全日制的学校制度，和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制度。它的本

¹ 中央财经大学校友会编：《春华秋实》，第一辑，第80页。

¹ 金铁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2卷，第784页。

来涵义是两种教育制度同时推行，互相补充，互相促进，半工半读、半农半读，通过劳动，获得适当收入，解决了个人生活问题，减少了国家和家庭的负担；通过学习，满足了个人升学深造的愿望。1964年5—6月间，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工作会议上肯定了两教育制度的意见。但是，后来这一新型制度在贯彻实施过程中，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违反了它的初衷，主要表现是：

1.把这一制度政治化。1965年10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城市半工半读教育会议。会议指出：在我国逐步推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措施之一。此后，有的学校提出走半工半读的建校之路，要求联系生产实际，使“知识分子劳动化”，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和生活方式，防止知识分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和平演变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这就使这一制度被涂上浓厚的政治色彩。

2.把半工半读、勤工助学理解为单纯劳动、改造思想。中财院在实行半工半读的过程中，也同样出现了一些偏差。1966年春，根据教育部试行半工半读的方针，学院在财政65级四个班中，试行所谓的半工半读。由财政系赵春新副主任带领财政65一班和财政65二班的同学到北京市毛巾厂半工半读；由黄岭松带领财政65三班和财政65四班的同学，到北京市染厂半工半读。同学们与厂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在毛巾厂的同学有不少分配到主要车间劳动。一位校友回忆：

1966年春天，我们65级学生作为教改实验班，驻进了北京毛巾厂。我被分到织造车间，一位22岁的工人年丽珠是我师傅，我跟着她倒班。我们看8台机器，在8个小时的上班时间内，我们要不停地走巡回，在走巡回中要换梭子、接线头，一个班下来很累。尤其是大夜班，又累又困。那时候政治学习抓得很紧，班前班后还要进行学习，一个班下来往往要10个小时，感受到当一个工人的确不容易。

那个时候在高校搞的半工半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勤工助学，因为这种半工半读是无偿的义务劳动，而勤工助学是有偿劳动。我们的半工半读是工读并重，而勤工助学是以学为主，课余工作。由于受到“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没有办真正的勤工助学班，或另外招收半工半读的班，而是把全日制的班，硬改为义务劳动的半工半读的半日制，这无疑是一次失误。但是国家让这么办，各大学都这么办，中财院自然没有理由不这么办。

五、桃李芬芳

前已述及，1960年，学校更名为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在保留干部培训学校的同时，开始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但实质上是从1962年起通过高考在全国招生，1966年因“文化大革命”停招。在20世纪60年代，学校培养的正规毕业生有四届，共1579人。但就是这四届学生，竟在后来出了众多中国财政、金融领域的高官。对母校而言，可谓桃李芬芳，硕果盈枝。

限于篇幅，我们不可能一一列举众多优秀校友的名字，让我们把关注的目光聚焦在一个特殊的群体——金融62一班。

在2003年9月的《经济》杂志上，记者王信川作了细心的统计和精心的研究，发表了文章“中国财金黄埔报道”。¹这是一篇令无数中财人为之自豪的文章，信息传播发达的时下，这篇文章在网上广为流传，让我们在这里摘录其中的一些文字，重温昔日辉煌的岁月，分享学校的荣耀：

40多年前，一个班级的50名新生兴奋地面对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他们没有想到，后来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会成为领导中国经济的中坚力量。这个50人的班级出现了30多位司局级以上干部，且大多身处经济重

1 可参考中央财经大学校友会编《春华秋实》，第一辑，第238页。

要部门，包括国家审计长李金华、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行长钱中涛、中国再保险有限公司总经理戴凤举、原光大银行副行长王希坤、原华夏证券董事长邵淳等等。这个班级就是中央财经大学金融系62级1班。不仅如此，他们的同届或者下届校友也出现了不少政府高官，包括现任财政部长金人庆和原央行行长、现天津市市长戴相龙。这是一个令人艳美的集体。1962年9月，考进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学生有50人被分到金融系62级1班，在兴奋地面对即将展开的新生活的同时，“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他们肯定没有想到若干年后，他们会经历“四清”运动、目睹“文化大革命”，而且最终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将成为中国金融业主要部门的领导者和改革推动者。

又据金融系62一班班主任、现已76岁高龄的刘春阳老师回忆说：



20世纪60年代我校学生在校园合影

当时中财院60级为特殊本科生，1961年因自然灾害，中财院停招本科生，62级实际上是中财招收的第一届正规大学本科生，也是建国以来最难考的一届，该班的同学主要来自北京、上海、河北和江苏，都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农村学生占2/3之多。他们毕业后到过农村、去过工厂、下过基层，然而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却成为优秀的领导群体，堪称“中国金融黄埔系”。¹

为了直观地反映这个集体在改革开放后的辉煌，我们特列下表以标示之。
中财金融62级1班部分同学曾任和现任最高职务²：

表4-16 中财金融62级1班部分同学情况表

姓名	曾任和现任最高职务
丁国喜	国家审计署金融司副司长
冯寒松	中央财大保险系党总支书记
李金华	国家审计署审计长
邵 淳	华夏证券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亦兴	中国银行信托投资公司董事
姚 遂	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
钱中涛	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行长
姚得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沈若雷	上海市工商银行行长、香港上海商业银行执行董事
庄惠春	浙江绍兴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曾广宇	民建北京市委员会副主委

1 可参考中央财经大学校友会编《春华秋实》，第一辑，第239页。
2 可参考中央财经大学校友会编《春华秋实》，第一辑，第245页。

续表

姓名	曾任和现任最高职务
杜 炜	中国农业银行甘肃省分行行长
杨志宏	中国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总会计师
王希坤	中国光大银行副行长
樊晔生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党委书记
张永革	中国农业银行青海省分行行长
杨任远	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厅长
戴凤举	中国再保险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谭纯喜	中国审计报社社长
陈永达	青海省工商银行副行长、现杭州工商干部管理学院

中财的学子，朴实廉能，不善张扬。但他们的成绩，却为后来天下的莘莘学子引领出一条令人向往的实现之路。毫无疑问，我们赞美和羡慕他们的成就，但更吸引我们的是他们的经历、他们成功的奥秘。

（一）热爱专业

受教于计划经济时代，与现在火爆的金融专业相比，当时的金融系可谓门庭冷落。当时国家重视重工业发展，机械、动力、水电等专业比较吃香，人们对金融甚为陌生，对于银行也只知道与信用社有关，大多数同学“毫不情愿”、“稀里糊涂”地报考中财院，以至于入校时有人还认为金融就是“冶炼黄金”。尽管系里组织了系列专业思想教育，一些同学仍然“专业思想不稳”，后来，经过教育，发生了变化，他们越来越喜欢上了金融专业。

据校友曾广宇说，当时其他什么都可以抛开，但对自己的专业念念不忘。1968年6月，62级的同学分配后，许多同学到基层工作，并且专业和工作不对口，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放弃从事本专业的努力。1970年抽到县

文艺宣传队的曾广宇找到县委宣传部，提出希望调到银行工作，但宣传部长以“我们县里找银行干部容易，找一个宣传骨干很难”为由拒绝。邵淳上班的县文化馆对面就是一家银行，但县文化局领导也没有同意他的调动申请。¹

（二）中财老师以苏联为鉴戒，走出自己的教育之路

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原因，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惟一“蓝本”是苏联老大哥，中国培养建设人才的模式也不例外。当时的一些专业课程，特别是基础理论方面，受苏联的影响很大。金融系王佩真教授是1952年7月毕业于人民大学的新中国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20世纪60年代任金融系教师，据王佩真回忆，当时人民大学金融专业的导师都是苏联专家，专业课程基本上是苏联那一套，以至于在上研究生之前还不得不集中强化俄文。王佩真主讲的是基础理论课——货币银行学，其中资本主义部分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则依照苏联的那一套来讲授，另有一些就是当时自己摸索出来的。

王佩真回忆刚入中财时的情况时说：“我是1961年报到，1962年正式来咱们学校的，我主要是搞教学，那个时候，在金融理论方面，有不同的争论。我来了以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学院有人提出一种看法，认为现在我们的货币信用，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就是说人民币变成一个分配凭证，不是一个货币。我首先从理论上感觉到有一点问题，就提出我自己的观点，人民币，还是货币。”

俞天一老师当时主要讲授工商信贷与结算，这是一门业务主干课程。因为当时银行有三大中心：信贷中心、结算中心及现金出纳中心。俞天一解放前就在上海私人钱庄工作，解放后考进中国人民银行，一直搞信贷工作。期间，他几乎是一边工作，一边在人民大学学习，但学习的课程全部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黄皮书”。据俞天一介绍，1957年反右时，中财院的一些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好多人被下放到广西、云南等边疆地

1 中央财经大学校友会编《春华秋实》，第一辑，第242页



1966年学院学生在鞍钢实习时与工人师傅合影

区。1959年，人民银行总行便调他和其他几个党员去充实教师队伍。兼有“土办法和洋办法”的俞天一比较重视业务实践，他讲课时也简单介绍苏联的东西，但主要讲中国当时怎么做，苏联的东西在中国怎样实行，中国为什么要这么做。

俞天一老师回忆说：

20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金融工作基本上处于摸索之中，因为苏联的有些东西明显不适合中国，在那种情况下，关于新中国金融业的前瞻性的东西很难讲，所以常常往银行跑，尽可能把当前最新的东西传授给学生。当时讲课不用教案，而是先发一份提纲给学生，将每一堂课所讲的内容铅印成单篇发给他们，现发现讲，学生到期末钉上就成了一本教材。对这帮学生而言，比专业知识更重要的，应该是讲课中从头到尾给他们灌输的一个思想，即要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看问题、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因为银行、企业都是国家的，只是分工不同，不能只站在银行或企业单方的立场看问题。

俞老师说：

现在的商业银行是有收益就贷款，不赚钱就不贷，但过去不这样，企业如果符合国家的计划，那赔钱也得干，银行就得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贷



我校参加农村金融现场教学课的同学在大寨合影

给它。当然，信贷员要深入企业，了解企业的实情，分析问题，从而帮助企业用好资金，这就要求教师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味照抄照搬。

这些教育对学生的影响是深远的。

（三）实践出真知

理论要和实际相结合，这是众所周知的大道理，但要真正做到这点也并非易事，中财一直在实践教学方面搞得有声有色。例如：1965年下半年，由俞天一和刘春阳带领金融系62级100人开赴武汉，到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进行工商信贷课的专业实习。实习的3个月中，学生们分散到各办事处、营业所，跟随信贷员站柜台、跑工厂，亲身体验了基层信贷工作的酸甜苦辣。更重要的是检验了自己的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

王佩真教授在接受采访时，也谈到当时教师同学一起调研实习的

情况：

“我们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说每上完一门课，都跟实际部门结合起来。有的甚至是一边上课一边实习。因为那个时候，金融学院归财政和银行管，有这个条件。金融专业是银行管的，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要到银行去实习或者我们去银行去搞一些大的调查，银行要我们参加，教师同学也充分利用了这个条件。所以那个时候呢，上一门课，比如说，课堂里讲点理论知识，然后教师就带学生到部门实习，所以主要从理论和实际结合这方面教学。比如说讲农村金融，我们就到信阳去。那个时候的信阳跟现在不太一样。搞工商信贷呢就到武汉，到工厂里去。另外呢我们每一次实习，都和学生一起同住同吃，比如现在的审计署署长就跟我们一起到农村去过。”

校友李金华在一次回答学生的提问时说：

“我可以告诉同学，我的世界观及一些看问题的方法和一些知识，除了中学以外，大学里面对我影响是很大的。我上学的时候有一个特点，很多老师都是从财政部、银行过来的，他们有充分的实践经验，所以我们这一批学生毕业以后实务能力很强。因此，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注重实践，注重正确的世界观的形成。我曾经说过，上了这么多的学校，从小学到大学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两门课，一门课是语文，教我认字和写作；第二门是哲学，教我怎么思考问题。

（四）良好的社会风尚和纯朴的育人环境

当时的学生生活非常清苦，学校70%的同学靠国家每月12元左右的助学金生活，校园里清一色的补丁衣服，许多人从进校到毕业工作期间没穿过一件新衣服。宿舍里没有开水瓶，只有用大铁壶打开水，常常喝凉开

水。尽管如此，当时大家却满怀热情。李金华接受《经济》杂志采访时回忆说，这与当时的整个社会氛围有很大的关系，国家在遭遇自然灾害之后，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学先进人物的活动频繁开展，1962—1966年期间整个形势比较稳定，社会风气很好。王希坤回忆说，当时大家争学雷锋做好事，看到谁的被子脏了，就趁他不注意给他拆了洗了、缝好叠好。王希坤还学会理发，免费为同学们服务。那时的学生很单纯、很理想化，没有想过今后要当什么官挣多少钱。邵淳回忆说，当时校园里流行一句口号：

“我们要为党工作50年”，为锻炼身体，他每天早上跑10圈，然后再玩半个钟头杠铃；为锻炼意志，在酷热的夏天，在楼中间满是碎石子的平台上，跟同学光着脚比跑步，看谁先趴下，身上晒得冒烟也咬牙挺住。邵淳说，这也使他们这帮人都养成了一个特点：干事特认真，几十年如此。¹

（五）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62级同学临近写毕业论文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6年4月1日，学校正式停课，学习《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及《红旗》杂志。两个月后，毕业分配的初步方案出来，除了部分留校任教，大都分到财政、银行系统。但随着工宣队、军宣队²进驻学校，分配方案反反复复改动7次，在“砸烂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方针指引下，原来65%留京的分配方案也“砸烂”了，毕业分配彻底遵循“面向基层、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原则。金融62一班，无一人留京，大都被分配到新疆、宁夏、甘肃、青海、广西、陕西、云南等艰苦地区，并且多数人直接到村里报到，跟当地社员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邵淳介绍说，当时他们年级100人中，有一半的人到二十几个省的县人事局报到，一半是留中央各部委，但在各部委报到后又一个派遣证把他们送

1 中央财经大学校友会编《春华秋实》，第一辑，第241页。

2 工宣队，即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派往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领导学校工作的工作队。军宣队，即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派往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领导学校工作的工作队。

到县以下的更基层单位，只有一个同学留在北京密云县。邵淳是1968年8月到河北省衡水地区故城县报到的，然后就到村里种地，一同去村里的还有其他6个大学生。从北京到了僻远的乡镇，他们所学的金融知识也一下子没了用武之地。同时还得克服物质匮乏带来的种种不便。据不完全统计，金融62一班的同学在县以下基层大都工作了10年以上，都在当地组建了家庭。二三十岁的时候是人生非常美好的一段，这群人都是在默默无闻中度过这段艰苦岁月的。谭纯喜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从积极的角度说，这是非常宝贵的财富，一方面了解了基层、了解了国情，另一方面还培养出一种韧性，以后再吃什么苦都没什么了。

（六）财政部和央行的特别关照

20世纪60年代的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人才辈出，教学踏踏实实、注重经世致用，赢得良好的社会声誉。

退休前为中国银行计划部总经理、20世纪60年代时在中财任金融系教师的丁凝回忆说：“1964年，因中财院缺人，我从东北分行国外业务处调到学校，分到金融系的工商信贷与结算教研组。来学校后，边学习边实习、硬着头皮上讲台。当时，对业务课教学帮助最大的是财政部和总行，由于学校当时由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合办，银行像学校，学校、银行是一家。首先是财政部、人民银行的文件、资料，尤其有关教学的，他们都可以看到；其次，财政部及银行的重要会议，像一年一度的地方分行行长会议，一般教员都可以去旁听；再次，重要的业务调研活动也邀请老师加入。”他就曾参加过刘少奇下达的“煤炭行业托拉斯改革”调研课题，到过东北、华北的许多煤矿，接触过各厂的财务人员，对充实教学内容很有帮助。此外，他还深入商业部门、银行信贷部门，了解到一些最新的情况。现在的财经院校在当时差不多都已建成，也招收金融专业学生，但特点各异。中财院当时的优势在于是由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合办，部、行一些领导兼任学校领导，不少教师从部、行调来，部级、司级领导来学校讲课，由财政部、人民银行出面、安排实习，毕业生大都到财政部、人民

银行系统。”

（七）夫子循循善诱

名师出高徒，20世纪60年代中财院的辉煌，首先应归功于学院拥有一支作风严谨、知识丰富、埋头苦干、与时俱进的教师队伍，而一批具有极高学术造诣、学贯中西的教授们，更使这支队伍锦上添花。比如1963年12月，学院的127名教师中，有许多知名教授和学者，比如：崔敬伯、崔书香、高文明、张光三、刘光第、沈云、张焕彩、张玉文、张伟弢、孙昌湘、王子英等；海外留学归国人员6人，他们是崔敬伯（1932年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张伟弢（1936年毕业于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商学院，商学硕士）、崔书香（1940年毕业于美国瑞德克利夫大学研究院，硕士学位）、陈菊铨（1958年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财经学院）、姜维壮（1957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财政学院）、曲兴业（1960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财政学院）。¹

20世纪60年代，学院规模尚小，教授也不多，但是教授及教师队伍不谓不精，且中财的教师们与学生的关系十分和谐，授课重讨论，活动如一体，教师循循善诱，学生敏而好学，这种传统一直流传至今。

六、那个时代中财的科研

教师的科研工作高等院校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在成立之初就十分重视科研工作。

在会计研究方面：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60年代，中国会计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1 档案资料：7-XZ-1963-8-2。

（一）引进和学习阶段（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60年代初）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适应党和国家提出的恢复国民经济、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任务，中国会计学界借鉴了苏联计划经济下的会计模式，开始清除西方近代会计理论、方法，试图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会计体系。其主要思路是强调会计活动的阶级性，将会计作为经济管理的工具。其主要特征是：1.通过比较、分析英美会计模式与苏联会计模式，确定通过消化、吸收前苏联的会计理论和方法，建立适应当时中国高度计划经济导向的会计理论和方法体系的思路。在这一阶段，会计学界有代表性的理论之争是关于会计属性的大讨论，即会计的属性是阶级性还是技术性，这场讨论是以章乃器1950年在《大公报》上发表的《以收付记账法取代借贷记账法》的文章为起点，以1951年1月刑宗江、黄寿宸的论文《怎样建立新中国会计理论基础》为中心，以苏联专家马卡洛夫“会计具有阶级性”的观点获得广泛赞同而告结束。2.排斥一切来自国外的会计理论和方法，极力建立一套纯中国化的会计理论和方法。当时成为争论焦点的记账方法有收付记账法、借贷记账法和增减记账法三种。在20世纪50年代初，经过一段时间的“收付与借贷”之争论，结果大多数学者认为，借贷记账法比较科学，因而借贷记账法成为当时最为广泛采用的记账方法。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结合会计等式人们又重新讨论记账方法，最终导致了增减记账法的提出和应用。3.在1957年前后，针对当时中国借鉴苏联会计模式中出现的生搬硬套、过于繁琐、不便理解、管理权限过于集中等问题，在会计工作中进行了以“放权、简化”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在理论上对此进行了分析、说明。

中财院教师积极参加了讨论，并且注意把最新的研究成果贯彻到教学之中。新中国会计事业，呈现出鲜明的特点，以教材建设促进会计理论建设。1953年5月，通过院系调整实现了以中南、上海、辽宁、四川四所财经学院与中央财政学院为主干的财经院校体系。至60年代，各类商学院的建立及中等财经专业学校的发展，已形成了一定的财经人才培养规模，在

促进经济建设事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课程设置与教材建设方面，中财院既向苏联学习，构建了会计专业的主干课程，又结合中国实际，自己撰写了原创性的教科书。许多会计教材不仅在国内是开山之作，而且是权威教材。

（二）波折阶段（20世纪60年代初至60年代中）

随着党中央1961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及“工业七十条”等法规的颁布，会计工作有了一定的起色，如在吸取1958年会计改革中“彻底放权”、“大力简化”教训的基础上，1964年财政部和各地区、部门对会计报表作了一些精简。在“反对繁琐哲学，提倡通俗易懂”、“算要有用，管要合理”思想的指导下，1965年4月和8月财政部分别提出了《企业会计工作改革纲要（试行）》和《预算会计改革纲要》，使实际部门的会计工作有了一定的起色。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这种起色很快就夭折了。这一阶段的主要成果一是理论界提出了会计具有两重性的观点（应当说，这种观点的提出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二是提出会计对象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运动”；三是将会计分为会计核算、会计分析和会计检查三部分。在研究和讨论中，中财院都是积极的参与者和身在前沿的践行者。

在1961年9月会计教研室张伟弢写的“会计教研室1960—1961学年工作总结”中提到，“在编写教材方面，我们打破了原来的体系，建立了新体系，《会计核算原理》原来是以会计核算方法为体系的，而我们是会计工作程序为体系的。我们从会计实际工作出发，进行编写工作，并且改变了过去少数人编写的做法，集体讨论，广泛吸收，因此教材质量有很大的提高。”¹

1.在财政研究方面：中财院教师积极参与了两个问题的讨论。

(1)我国财政理论界早在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就已提出了财政属性问

1 档案资料：7-XZ-1966-7-1。

题。而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财政本质大争论中,则成为热门话题之一。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学者积极参加了这次大讨论。

在关于财政本质的讨论中,各方争论的焦点为财政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其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财政是一种上层建筑。

一种观点认为,不论社会性质如何,财政只能是经济基础。

一种观点认为,财政具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两种属性。中财院姜维壮先生的《社会主义财政基本上属于经济基础,私有制社会的财政是上层建筑》和叶振鹏先生的《国家预算既属于经济基础,又从属于上层建筑》等文章,阐述了这种观点。

5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问到姜维壮教授那时的事时,先生回忆说:

因为当时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咱们财政呢,争论比较大,对财政属于经济基础还是属于上层建筑意见都不太一样,有一些老师呢,认为财政基本上应该属于经济基础,因为它是分配关系。但有些人认为,它是属于上层建筑,因为政策是以国家为主体的,这个看法不太一样。我的想法呢,当时根据苏联的经验,特别是对照马列原著考虑一下呢,因为不同国家的财政应该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国家财政大部分钱都用在经济建设方面,像为老百姓谋福利,发展经济,保证存贷,主要它是个经济关系,所以基本上它属于经济基础,尽管它也有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内容,比如财政政策、财政制度,就从属于上层建筑。从那时候我们就有以经济基础为主,上层建筑为辅,这么一个观点。在西方国家呢,钱主要是花在生产领域,社会福利啊,劳保,这一方面。它基本上不是属于经济基础,而是在上层建筑领域,它也有经济基础的问题,但总的来说它基本上属于上层建筑,这样就把社会主义国家财政政策和资本主义国家财政政策分开了,就是区别对待了。虽然都是分配关系,但是领域不一样。……我现在想,这个话还是没有错。当时我强调这么一种观点。

(2)财政范围或者说财政体系的问题,是与财政本质直接相关联的财政基础理论之一,也是争论的焦点之一。在大连财政学讨论会上,几乎每篇论文都涉及了财政范围问题,并且在当时就形成了“大财政”、“中财政”和“小财政”三大类的看法。

在讨论过程中,较多学者的观点介于“大财政”和“中财政”之间,但根本上则属于“中财政”。中财院的沈云教授认为,“国家财政范围主要应该包括:国家预算、国家财政信用、国营企业财务、国家税收、其他财政资金等五个环节”。“其他财政资金”则大致上指的是预算外资金。

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由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主编了《财政学问题讨论集——1964年财政学讨论会论文选辑》一书,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65年公开出版。

2. 在科研的组织管理方面:

1962年11月26日,学院公布了《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关于科学研究工作的暂行规定(草案)》。1963年3月29日,学院召开院务会议,专门讨论了学院“科学研究中的科研规划和学术活动问题”。会议提出:

(1)要积极参加全国经济学会召开的学术讨论会,对提高教师水平和教学质量大有益处。

(2)为保证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的正常开展,学院对资料翻译、图书资料提供、印刷工作提出具体要求,高竞生负责俄文翻译工作,郝国华负责英文翻译工作,在图书馆及图书购置方面,尽量提供帮助。

(3)科学研究委员会拟在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成立。

(4)全校师生开展读书学习报告会,为科研打基础。

1963年3月,学院制定了《中央财政金融学院1963年度科学研究

工作计划》。计划指出，根据《高等教育工作条例》和我院《关于科学研究工作的暂行规定（草案）》的原则和要求，在目前教学和教材建设任务很重、教师不足的情况下，本年度的科学研究应该首先满足教学的需要，结合教学工作来进行，把编著教材和教学参考书作为主要的科学研究任务，并且要结合教学内容进行一些专题研究和教学方法的研究。

档案资料显示，1963年度各教研室拟定了详细的科学研究计划（见表4-17至表4-20）。¹

表4-17 政治理论教研室研究计划

研究题目	作 者
关于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和农轻重序列的几个问题	张光三、王廷辅
列宁《读书笔记》一书的读书笔记	李 皓
论阶级概念的基本标志	宋希仁
太平天国的财政制度	邱远猷、徐在文
我国人民币的几个问题	刘光第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研究	汤国钧
我国革命战争时期的财政问题	邱远猷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几个问题研究	王庚舜

表4-18 财政教研室研究计划

研究题目	作 者
国家财政与社会主义再生产关系	沈 云

1 档案资料：7-XZ-1966-7-1。

续表

研究题目	作 者
关于我国国家财政体系问题	王 博
夏商周三代财政研究	王子英
分配关系与财政范围	赵春新
国家财政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潘启华
鸦片战争与财政	崔敬伯
反人民反民主的典范—美国预算管理制度	姜维壮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几个问题研究	王庚舜
关于企业财务本质问题	林犹恭、程本中、秦元英、 王云志
财务部门在企业生产中的作用	门 志
论企业经济核算的条件	叶振鹏
税收的本质及在不同时期的作用	王 富
从税收的产生发展论税收的本质	董庆铮
预算外资金问题	韩 壁

表4-19 金融教研室研究计划

研究题目	作 者
对马克思“货币不是东西，而是一种社会关系”的理解	张焕彩
社会主义货币流通的特点	张玉文
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统一平衡和货币流通规律	高耀深
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统一平衡、全面安排和分口管理、分别使用	焦玉兰
社会主义再生产中的货币流通	王佩真

续表

研究题目	作 者
信用量问题初探	俞天一
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的关系	李振德
货币流通规律与银行信贷工作	赵廷芳
现金计划的作用	王秉文
人民币的作用	李锡樑
我国国民经济中信贷资金的计划管理	李焕岭
对敌货币比价斗争	杨泽生
凯因斯“信用调节”论的反动本质	王国泰
社会主义农业信贷的实质	王自端
论“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支援为辅”的方针	吴福根
马克思关于货币本质理论的体会	刘焕成

表4-20 会计教研室研究计划

研究题目	作 者
财政预算资金和银行信贷资金同物资之间平衡统计中的一些问题	崔书香
从会计核算的任务谈会计人员的职权	祁永彪
伙食会计	陈启昆

3. 在随后的实践中，学院认真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积极开展了科研工作，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科研之路。表现为：

(1)学院当时开设的财政、金融、保险等本科教育课程，有许多在全国高等院校中是首创，可以说是填补了财经高等教育的空白。由于当时没有教材和参考书，学院不得不把教材和教学参考书的编著，当作一项重要的

科学研究工作。

- (2)由院长组织，遴选若干科研能力强的教师，经院务会议讨论通过，组成科学研究工作委员会，院长担任主任委员，设秘书1人，办理具体工作。委员会的任务是：研究确定全院科学研究的方向，制定年度计划和长远规划；分配各教研室科研任务；举办全院性的科研活动；组织科研成果的公布、出版、奖励。
- (3)学院特别强调科研计划要落实到人、题目、时间和讨论范围（教研室讨论、学院讨论、学院外讨论）。这种计划落实、责任到位、集体讨论，应该说这是一项有重要借鉴意义的探索。
- (4)集体研究，集体协作。毫无疑问，科研工作的基础是个人钻研，但是学院教师在发扬团队精神，团结协作方面，尤为突出。经过院长批准，可以抽调出少量教师在一定时间内集中进行科研工作。学院经常召开小型的学术讨论会。这一时期的许多教材、论著、参考书等都是集体努力的结晶。
- (5)举全校之力、集中全体教师之智慧，推出精品论文。比如1963年的全国经济学年会召开前，学院推出的文章：《社会主义盈利问题》（沈云）；《会计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孙昌湘），分别在3月30日和4月1日由教务处负责组织全院教师讨论。5月初，又组织了一次《人民币的本质与职能》（刘光第）的讨论。除此之外，1963年6月，全院讨论《财政预算资金和银行信贷资金同物资之间平衡统计中的几个问题》（崔书香）。1963年10月，全院讨论《关于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和农轻重序列的几个问题》（张光三、王廷辅）。1963年11月，全院讨论《关于企业财务本质问题》（林犹恭、程本中、秦元英、王云志）。1963年12月，全院讨论《关于货币流通方面的若干问题》（金融教研室）。通过较频繁的讨论，教师交流了学术思想，促进了科研水平的提高，从而使学院的论文水平日臻提高。
- (6)依靠部、行搞科研。学院在科学研究中，利用与财政部和总行的特



财政系青年教师1964年在校门前合影

殊关系，邀请部、行的领导和业务部门的负责人以及专家，定期到学院作报告，提供科研信息，交流研究成果，而且能够很快付诸实践，检验科研成果。

路漫漫其修远，学术研究是无法停歇的。学术乃大学之命脉，学问之道，在于沉潜执着于一己之追求，保有不为外界所移的笃定心志。最初中财的治学史进展略觉缓慢，但是尚有沉潜静定的特质，求真求实，不以数量论高下，唯以务实为本。学校对教师的学术研究也没有做硬性规定，学术研究也是务求严谨，不敢妄说。且教学需要研究作助力，而并不只是用发表论文作助力。当时中财的学术研究，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学院抓得紧，教师跟得上。国内学界，常有中财人的发言；国家政策，更时时有中财人的建议。中财正以自己的学术研究实践形成自己的学术传统。风之积也不厚，则负大翼也无力，中财学人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那个虽非风平浪静，但还未至险象环生的环境里，积极地培风蓄势，以冀扶摇而上，以向万里之遥！可是一场无情的、旷日持久的政治风暴把天下学人的学术梦想完全中止了，中财学人们自然也躲不过这场厄运。

第四节 “文革”岁月 ——风波里的中央财政金融学院

一、政治大气候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¹一文。文章的发表，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²于1966年2月3日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³，阐述了学术批判中的一些根本问题。2月12日，“二月提纲”作为中央文件发出。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当时在外地，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彭真、罗瑞

1 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在1959年4月毛泽东提倡学习海瑞之后开始写作，于1960年年底完成的。姚文元的这篇点名批判文章，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硬说“‘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毛泽东批准发表这篇文章，并示意全国报刊转载。这篇文章的发表，以及随之而来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2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早在1964年的五六月间，在“批判资产阶级”和“扫除一切害人虫”的战略日益成熟和趋于白热化之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的隶属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1966年2月3日，小组就批判吴晗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7日，写成“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拟向中共中央汇报。

3 “二月提纲”：面对由《海瑞罢官》而引起的改造批判运动，需要中共中央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方针，1966年2月3日，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人民大会堂讨论关于批判吴晗的问题，根据会议讨论，拟订了一个“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提出学术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地以势压人。“二月提纲”主要是为了把已开始的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限制在学术范围内，但不久，这一提纲受到毛泽东的批判。

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16日，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停止执行《二月提纲》，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任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因为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些从“左”的观点出发，混淆敌我，严重脱离实际的要求和估计，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召开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公布了毛泽东8月1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和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自6月上旬派工作组以来的“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虽未点名，但明显地主要针对刘少奇。8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16条》）。《16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

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刘少奇的名字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的名单中由原来的第二位改到了第八位。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个会议相继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以及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文化大革命”的“左”倾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这些错误决定，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二、“文革”前夕的中财院

1966年元旦过后，从1月13日开始，学院全体教职工严肃认真地对过去一年的工作进行总结，并且对新的一年的前景作了美好的描绘。

阅读《1965年工作总结和1966年的工作安排》（简称《总结》），我们发现，在1965年，学院做了大量的有实际意义的工作：改进了领导作风，各级领导干部开始注意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党委各部门也开始走出办公室，面向基层，到各单位了解情况；教学秩序稳定有序，教师教书育人，各教研室都重视教材建设工作，对没有教材或教材内容不很成熟的课程，着手组织人力编写或修改；上半年会计系一个班试办了现场教学，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为今后实现现场教学打下了基础；教学方面改进了教学方法，在教学环节中注意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改变了单纯的考试方法；过去的一年，学院重点抓了基建工作，本着节约的原则，逐步改善了学院的教学设备和群众生活条件，等等。同时，我们发现，在新的一年里，学院也准备继续做一些实际工作：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科学设置课程，搞好教

材建设，在教学内容上，坚决贯彻“少而精”的原则，教研室要加强集体研究，鼓励教师敢于试验，探索教学方法，教师要调查研究，向业务部门学习，不断补充讲课内容；继续探索现场教学、半工半读、工作实习等教学形式；新的一年，要改进领导作风，精简会议、明确职责、深入一线，等等。

然而，阅读《1965年工作总结和1966年的工作安排》，更加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通篇文字充斥着“左”的言论和口号，《总结》显示：1965年，在财政部党组和中共北京市委的领导下，开展了“四清”运动，促进了教职工的思想革命化和学院的各项工作，同时，按照2月份中央财贸政治工作会议的决议，结合“四清”运动，大学毛主席著作，加强了对教职工的阶级教育，抓活了思想，由于全体教职工大学毛主席著作，进行思想革命，……政治摆到了一定的位置；通过“四清”运动，领导和群众认识到政治挂帅的重要性。大家认识到，突出政治，以政治为统帅，业务是根本性、方向性的问题，但不是权宜之计。一年来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特点是强调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财政、金融教研室采取“小整风”的方法学习《矛盾论》。图书馆学习《为人民服务》，明确了为教师、为学生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发挥了“人的因素第一”的精神。把“去年一年采购、分编、加工图书、报刊2.7万多册，相当于1964年的4倍”这种工作成绩归功于学习毛主席著作；并且说膳食科，他们通过学习，认识到一切工作都是为了革命，解决了一些干部不安心膳食工作的思想。被称之为学习毛主席著作“显著的成效”。总结中还提到开展了学习王杰¹的活动，注意抓活思想。自从报

纸上刊登了王杰的事迹和日记后，全体师生员工开展了学习运动，强调学习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学习王杰事迹的效果，被表述为“进一步推动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教职工的思想革命”。同时还特别提到：“在教学过程中，开始注意突出政治，用毛主席的立场、观点、方法教育学生。”说明政治与思想的内容已经进入专业教育之中。

《总结》对1966年的工作作出安排。1966年的工作，要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突出政治作为一切工作的纲，把毛主席著作当作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具体工作如下：

1. 大抓突出政治，坚定不移地突出政治，今年突出，明年突出、永远突出，不突出政治，就是违反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

2. 大抓学习主席著作，落实四个第一。1966年学习著作，要求贯彻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重点学习人民战争的4篇文章，加强阶级斗争观念，深刻领会人民战争的精神实质；学习著作的根本方法，是活学活用，带着问题，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学得好，用得好，必须有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3. 落实四个第一，主要抓好三个环节。第一，摆好政治工作的位置，坚持“政治第一，政治统帅业务，思想领先”的原则。政治第一，就是要抓兴无灭资的斗争，离开了阶级斗争，就无所谓政治，在国内就是要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国际上就是要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作坚决的斗争，无产阶级政治，就是搞阶级斗争，搞革命就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集中地体现了无产阶级政治。思想领先就是革命精神领先，革命道理领先。政治统帅业务，就是要把政治工作渗透到业务工作中，把毛泽东思想贯彻到教学工作中去，贯彻到业务行政工作中去，树立一心为革命、一切为革命的思想，并在行动中表现出来。第二，抓好活思想。就是

1 王杰（1942—1965），1942年10月出生于呼伦贝尔市阿荣旗，19岁入伍成为某装甲师工兵营一连的一名战士。不久后，王杰因为表现突出被任命为班长，并且连续3年被评为“五好”战士，两次荣立三等功，被授予“模范共青团员”和“一级技术能手”称号。1965年7月14日，为保护12名民兵和人武干部的安全，他毅然扑向即将爆炸的炸药包，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牺牲时年仅23岁。提起王杰，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可能会觉得非常陌生，而在40多年前，王杰是和雷锋齐名的英雄。

抓好两头，一头是党的方针政策、毛泽东思想，一头是现实思想，党的方针政策要及时传达，要及时了解和掌握普遍性的大量存在的现实思想问题。第三，组织发动广大职工，人人做政治思想工作。

4. 继续深入地宣传和学习王杰精神。

5. 关于备战和民兵工作。备战，要立足于早打、大打的基础上，首先要做好思想上的备战，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武装起来，树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思想，对美帝国主义不抱幻想，树立必胜的信念，思想备战，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政治思想工作来解决；其次是做好物质上或行动上的准备，加强民兵训练，学生民兵训练，采取军体结合的形式，把军事课和体育课结合起来上，一年级每周3小时，二年级每周2小时，军事课占军体课总时数的73%；教职工的民兵训练，每周1小时，暂定周四下午；根据防空指挥部的指示，防空壕要在6月底以前完成，平均每20个人挖一个防空壕。¹

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些大而空的政治语言，到底预示着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前景？中财要向何处走？中国要向何处走？当时可能没有人想到一场天翻地覆的政治风暴即将到来。

三、财政部、总行工作组进、出中财院

“五·一六通知”后，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同日，康生授意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诬陷、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张大字报，经毛泽东批准，向全国广播。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的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加以配合。4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同

时发表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派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北大七人大字报的发表和《人民日报》社论的煽动，立即在北京的50多所高等院校中引起极大混乱，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也自然卷入其中。从6月初开始，在毛巾厂和印染厂半工半读的财政65级4个班、参加农村“四清”的63级6个班、进行毕业实习的62级6个班，都陆续返回学院搞“文化大革命”。

在混乱的局势中，各校都有一部分人起而“造反”，攻击揪斗党委领导干部，各校党委相继瘫痪，很多领导干部遭到殴打和人身侮辱，接着，“横扫”的风暴席卷全国，发生了许多混乱现象。各个学校的形势发展大都是以轰动性的事件为标志的，当时，在全国政治大气候的影响下，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发生了所谓“十人事件”，颇显于当时的北京高校。这是指6月10日，金融系十名青年教师和系里的一部分学生组织群众集会，揭发院系领导的问题，同时，部分学生帖出大字报，全院停课，造反派打着“造反有理”的旗号，冲乱了学校的正常秩序，领导靠边站，党组织瘫痪。

鉴于全国开始的大动乱，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考虑到许多高等院校的领导陷于瘫痪，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向北京市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此后，许多省、市相继向大专院校(包括部分中学)派出工作组。1966年6月3日，中共中央拟定了“八条指示”，提出对党委的揭发批判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要求，力图使混乱局面得到一定控制。

在此背景下，根据中央有关决定，财政部和人民银行总行共同组成工作组，进驻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协助领导学院的“文化大革命”。

然而，事情远远没有结束，运动逐步升级。6月16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南京大学发生的所谓“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反革命事件”，并发表社论。宣称“文化大革命”对于一些部门和单位来说，“是一个夺权的斗争，是一个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号召“必须采取彻

1 档案资料：7-XZ-1966-7-1。

底革命的办法，必须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了揪斗40多名党团干部、教师、学生的乱打乱斗事件。20日，刘少奇将北京大学工作组制止乱打乱斗事件的简报转发全国，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以后，转发简报这件事被江青说成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事件。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他在听取有关工作组的汇报后，于25日在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29日，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在这次会上，宣布撤销所有工作组。稍后，工作组被毛泽东指责为犯方向、路线错误，派出工作组被指责为“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1966年9月，财政部、总行工作组撤离中财院。

四、“全国动乱”中的中财院

八届十一中全会及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后，“文化大革命”这场内乱像烈火燎原，不可遏制，像江河横溢，祸及全国，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并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同时，毛泽东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从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18日，毛泽东等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事后，红卫兵以破“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名，盲目地焚烧古典文献，捣毁文物字画，破坏名胜古迹。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在1966年8月，出现了“八八队”和“八一八”群众造反组织，进行所谓破“四旧”，搜集黑材料，查抄了许多干部和教师的办公室、宿舍，把几十名干部、教师打入“劳改队”，搞批斗，剃阴阳头，进行人身侮辱。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随即开始全国性的大串连。到11月下旬，毛泽东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了1100多万师生和红卫兵。红卫兵在全国到处鼓动“造反”，揪斗所谓“走资派”，搞乱了地方各级党委。关于这时的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情况，据时任教务处长的黄岭松回忆说：

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泛滥成灾，横扫、火烧、炮打之风乱遍全国，我院群众中有一部分人（主要是缺少政治阅历的青年）自称“革命造反派”，把不同意他们意见和做法的人，称为“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顽固派”、“保皇派”，对不表态的人，则称为“逍遥派”，派系斗争愈演愈烈，自我院“踢开党委闹革命”后，所谓，“保皇派”消失，造反派又分为两派，两派斗争更加激烈，几乎武斗。¹



1966年金融63—1班在毛主席故居前合影



1966年财政63级学生在湖南参加社教时参观毛主席故居

¹ 黄岭松：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回忆录，见1994年《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校史资料汇编》，第50页。

一位财政系65级校友回忆1966年时的情况说：

6月份，“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里出现了大字报。工作组进了财院，给我们介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又组织我们回校看大字报。学校里的大字报很多，有批判学校领导的，有批判教师的，也有批判学生的，还有批判工作组的。当时中央的声音是号召革命的同志站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保卫毛主席，我们感觉到一场暴风骤雨式的革命即将来临。同学们都是热血青年，纷纷要求回校闹革命。我们65级同学大约在6月底从毛巾厂回到了学校，开始了长达4年的“文革”生活。不久，学校里围绕工作组问题形成两派，一派是肯定工作组，一派是否定工作组，我当初还没有观点，觉得自己不了解情况。这场争论很快就有了结果，中央表了态，说工作组束缚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很快把工作组撤掉了。1966年12月，当时的权威杂志《红旗》发表社论，公开支持少数派，号召革命小将煽风点火。

在1966年的革命大串联中，我曾两次南下，一次是8月份，随北京红卫兵一司去湖南长沙，支持那里的造反派，我们在湖南大学住了一周，天天上街游行，还在省政府门前集会。……第二次是国庆节后，我与几个同学南下广州，后来我们又去了杭州、上海、南京。走了25天。

1966年10月5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根据林彪建议发出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中共中央把这一紧急指示转发全党。从这以后，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部队以外，各级党委陷于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也深受其害，黄岭松回忆说：

“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泛滥后，我院何止“踢开党委闹革命”，

而是“打倒党委闹革命”，我眼看党委书记、院长、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党委委员，处、室、系领导干部不断被批斗、打入劳改队。有一天，院里贴满了批判、打倒我的大字报。第二天，造反派的头头来找我，要我立刻交出自己办公桌和文件柜的钥匙，并通知我，明天带上行李到劳改队报到，我要求留下一本《教育规章制度汇编》，他们说：“修正主义的东西，留下干什么？”因此，造成到今天写院史回忆录有很大的困难。¹

许多身陷逆境的同志，仍然坚信党，坚信群众，黄岭松回忆说：

到劳改队后，因为我过去不怕死才参加地下党。才自愿到敌后根据地工作，而且是出生入死中的幸存者，我死都不怕，还怕什么！我痛心的是自己人侮辱自己人，我始终相信党、相信群众，将来是可以澄清是非的，当时我内心很赞成陈毅同志挨批斗时说的一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若不报，时候未到。”²

五、“夺权风暴”和“军宣队”派驻中财院

1967年1月首先在上海，然后在全国掀起一场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狂暴行动，号称“一月风暴”，“文化大革命”由此进入“全面夺权”的新阶段。这个阶段比前一阶段，造成更为严重的社会动乱和社会灾难。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宣布“1967年将

1 黄岭松：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回忆录，见1994年《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校史资料汇编》，第50页。

2 黄岭松：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回忆录，见1994年《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校史资料汇编》，第50页。



1967年学校教工认真参加理论学习



1967年部分师生合影

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指挥下，以王洪文为头头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一月革命”的风暴。对此，毛泽东于8日赞扬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¹ 11日，经毛泽东授意，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发出贺电。《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党政领导机关先后被所谓“造反派”夺权，建立了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夺权之风刮遍全国，更加剧了混乱的局面。

在“全面夺权”造成的大动乱中，大批党政领导干部被揪斗迫害，党的领导机关和各级组织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纪国法被弃置不顾，国家的司法公安机关无法行使职权。在夺权者同倾向于支持原党政领导的群众之间，在这一派夺权者同那一派夺权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

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大肆泛滥，全国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

北京各大专院校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纷纷卷入了这场“全面夺权”的斗争。在“夺权”这场闹剧中，各种组织和人物纷纷登台亮相，竞相表演，同时也将北京高校造反派红卫兵内部的种种矛盾暴露无遗。“夺权”是上面号召下面闻风而动，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面的号召简单笼统，下面按照各自的理解和认识各行其是。因为没有任何统一部署和关于“夺权”范围的划分和界定，就难免出现各种混乱局面。一般说来各大专院校的造反派除了要在自己学校里“夺权”外，还要到其所归属的上级单位或和本校有关的上级单位去“夺权”。当时著名的“夺权”事件有：1967年1月12日、14日，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公社”联合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些人，两次夺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权，并在电台播出他们的《夺权宣言》；1月15日，北京轻工业学院“红色造反委员会”的“井冈山战斗兵团”到轻工业部“夺权”，发表了《关于接管第一轻工业部的通告》；1月17日，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在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的支持下夺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权；而1月20日，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八八战斗队”也夺了财政部的权。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被深深卷入这场“夺权”风暴中，并名噪一时。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八八队”夺取了学校的党政大权，并且到财贸口和财政部去夺权。在对待所谓“二月逆流”¹的问题

1 二月逆流：1967年2月11日至1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因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又称“怀仁堂碰头会”。在这次会议和稍前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上，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对与会的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大义凛然、针锋相对的面对面斗争。他们提出了三个重大原则问题：运动要不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应不应该将老干部都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这场斗争被诬称为“二月逆流”。1971年11月，毛泽东给在所谓“二月逆流”中受到诬陷的老同志平了反。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决定，宣布为“二月逆流”平反。

1 《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465页。



1968年8月1日毕业合影



在天安门前的毕业留影



1968年12月中财院法语班合影



1968年财政系部分老师在人民大会堂前合影

上，“八八队”又分裂成“四一”和“四三”两派，各据一方，修筑工事，进行武斗，学校的档案材料、物资财产在打斗中遭到极大破坏，图书资料损失几万册。

毛泽东虽然表示支持“天下大乱”，但是对于这种严重混乱状况也不能不加以约束，当时的报刊反复宣传毛泽东关于“夺权”的指导方针，主要是“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的三结合”，在“夺权”后组成的临时权力机构，称为“革命委员会”，为了实现这种“大联合”和“三结合”，中央发布了一系列通知和指示，要求学校师生停止大串联、复课闹革命，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决定派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1月23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

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黄岭松回忆说：“1967年3月，派来军训团和工宣队进驻我院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解散了劳改队，但是领导干部仍然靠边站，等待审查。”

解放军“支左”，对于稳定当时的局势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很难避免支持这一派或者那一派，于是在造反派组织同“支左”部队之间也发生了许多纠纷和冲突，反而造成许多地方武斗升级。面对日益严重的、几乎失去控制的动乱局势，毛泽东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加以控制，所以从1967年冬天到1968年春天，社会动乱局势才相对地趋于缓和。

然而，1968年3月下旬开始，在林彪、江青反对“右倾翻案风”的煽动下，前一个时期有所收敛的无政府主义狂潮，再度掀起，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和武斗流血事件重新加剧，若干地区的局势再度恶化，一些高等院校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武斗升级，出现人员伤亡的惨案，毛泽东不得不再次采取紧急措施加以制止。7月27日，北京60多个工厂，组成3万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当时派性斗争激烈的清华大学，整顿秩序，制止武斗。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要求“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的，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入各学校”。26日，《人民日报》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截至8月底，首都59所大专院校全部进驻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此后，派遣“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的办法，不仅遍及教育单位，而且扩大到除军队以外的各级党政机关。工人和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后，开始进行恢复学校秩序的工作。此时，有关部门派来“军宣队”进驻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进行“大联合”和“三结合”的工作。随后，中财院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形势才略趋于稳定。

六、林彪“一号令”与学校的迁徙

1969年3月，苏联军队4次侵入黑龙江省的珍宝岛地区，打死打伤我边防人员，制造严重流血事件。我边防部队被迫还击。我国外交部3次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这一边境武装冲突事件，加重了党内存在的国际形势日益严重，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左”的估计。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着重谈了准备打仗的问题。

10月17日，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林彪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抓紧武器的生产，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18日，黄永胜¹等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这个“紧急指示”，并且把大批干部和家属动员疏散到中小城市或者送到五七干校，引起了各方面的极大震动。

1969年11月，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全院教职工及其家属和65级学生大搬家到河南省淮滨县马集公社农村（只有留守处部分人员看守学院财产未去）。

一位居住在江苏连云港的中央财政金融学院65级校友在她的博客中写道：

1969年是建国二十周年，当时国际形势相当紧张，尤其是中苏边境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时中央决定北京高校向外疏散。为了迎接二十年大庆，我们的离京日程排到国庆节之后。那段日子，同学们无所事事，男同学装收音机，女同学打毛线衣，我们戏称在做“路线斗争”。1969年11月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我们离开北京来到河南省淮滨县总行干校。财政系住马集公社，我们一班、二班女生住在一个大屋子里。我们到淮滨的第二天，淮滨下了一场大雪，气温急骤下降，这里又没有暖气，我们感到冷极了。

1 黄永胜(1910—1983)湖北咸宁人，汉族。1927年参加了湘赣边秋收起义，编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随部上井冈山。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同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文化大革命”期间，于1968年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参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971年9月，在“九一三事件”后被撤职、开除党籍。

我们到干校后开始劳动，先是盖房子，后来干农活。淮滨县位于河南省最南部，在淮河岸边，地势低洼，是淮河水患侵袭的重灾区。这里的农民生活很苦，我们曾到村子里农家去看，他们家里什么也没有，屋子是用土坯盖的，留了个小小的窗户，家里只有竹床、灶台，屋子里光线很暗。

七、学校真的“下马”了

事实上，在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全院教职员下放河南前夕，1969年9月，国务院已经决定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停办撤销，1970年7月，学院财产也交给北京市一轻局。但是，撤销命令下达三年之后，1972年12月18日学校才正式接到停办的通知。1972年12月27日学校才正式向师生公布国务院的决定，这真是荒唐岁月的荒唐事。

国务院办公厅给财政部《关于停办财金学院的问题》的文件是这样写的：

你部所属财金学院停办，是1969年9月经国务院讨论决定的，如果有的同志对此有疑问，可以向他们宣布。

行文时间是1972年12月17日。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为何停办？有不同的说法，我们经过考证，当时决定中央财政学院撤销，可能有下列原因：

首先，早在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对《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这篇调查报告作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调查报告和编者按语。编者按语说，这个调查报

告“提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此后，全国各地纷纷办起了以毛泽东对这一调查报告的批示日期为名的“七·二一”大学。中财这类文科大学就被放在了一个可办可不办的位置上。

其次，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发表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各地普遍开办五七干校，把原党政机关、高等学校的绝大部分干部和教师，送到干校劳动、学习。可以想见，毛泽东向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发出了总动员令，天下能不积极响应？可以说中央财政学院被撤销是时代背景的产物。

第三，中央财政学院撤销与全国高等教育形势密切相关。1969年，北京及全国其他地区也有部分高等院校被撤销或合并，并不是只有财院一家。1969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简称《通知》）。《通知》说：为了“认真搞好斗、批、改，加强对中央各部门所属高等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的领导”，决定国务院各部门所属的高等院校，凡设在外地或迁往外地的，交由当地省、市、自治区领导；与厂矿结合办校的，交由厂矿领导。教育部所属的高等院校，全部交给所在省、市、自治区领导。《通知》下发后，中央部门所属的高等院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全部下放地方管理。在下放的同时，也伴随着撤销和合并。据1971年7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材料，原中央部属学校176所，经调整后，保留下来131所。¹

在这种背景下，中财院被撤销，其实是很容易解释的事。又兼当时的院领导基本上“靠边站”了，自身难保，也不可能像1961年那样采取变通方式力保财院，他们就是有心也无力了，那个时候的财院已在刀俎之上，也只能“任人宰割”了。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被停办撤销后，学校财产很快被瓜分，1970年7月13号，遵李先念副总理批示，经财政部研究同意，财院的校舍和仪器设备拨与北京市一轻局使用。²

1 金铁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2卷，第886页。

2 档案资料：7-XZ-1973-7-1。

王万有老师回忆说：

到了1969年，因为有林彪的“一号令”，战备疏散，这样，学校全部教职工加上65级的学生都到了河南去了，河南的淮滨县，分散的四五个点吧，一个学校都下放了，学生也都走了，校舍也都腾出来了。北京市一轻局看到这个机会了，就向国务院报告，要这个校舍，这样的话呢，国务院就批准把这个校舍给了烟厂了。当时北京市没有烟叶厂，要办个烟厂，正好有学校的校舍可以用，因为一轻局有几个干部当时住在咱们学校里，知道这个情况，赶快向北京市报告，向国务院报告，很快就批准了，这样就把校舍给烟厂了。教学和其他设备也都交出去了，大批图书资料送进了造纸厂。

黄岭松也回忆说：

我院财产毁于一旦。不动产（土地、房屋）除了留守处住的友谊楼（现在医务室住的楼）外，全移交北京市一轻局办的烟厂了。其中的宿舍也大部分移交烟厂了。动产除财政部要了一点，北京市财贸学校要了一些外，也全部交给烟厂了。图书馆共有图书48万册，我院复校时，只剩下18万册。报刊、资料全部送造纸厂销毁了。各处、系、教研室的资料、图书也全部毁于一旦，真是人财两空。

八、在河南“五七干校”的日子里

中财响应党的号召，集体迁徙到河南省淮滨县，在这个淮河边上的贫困地区安营扎寨，继续着一所大学政治性的运转，而不是教育性的运转。实际上这个时候作为一所文科大学，它已经失去了教育的权利、职能，也失去了教育的意义。1970年的1月，《红旗》杂志第一期就发表了一篇题为《文科大学一定要搞大批判》，指出“革命大批判既是社

会主义文科大学的基本任务，又是当前改造旧文科大学的迫切的战斗任务”。1月8日，《解放日报》甚至以《文科就是要办成写作组》为题发表评论说：“工农兵写作组才是社会主义文科大学的好样子。”¹在他们看来，文科大学就培养点“刀笔吏”就行了。那么像中财这样的经济类大学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下放不过是解散的“缓刑期”而已。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师生到河南后，在“军宣队”的领导下，一方面参加生产劳动，一方面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势进行学习和参与政治运动。

1970年8月26日，院革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取消了部、处、系、室的建制，按军队建制建立了几个连队。一连：由原财政系、政治教研室、教务处组成，按顺序遍为一、二、三排。二连：由原金融系、普通课教研室组成，按顺序遍为一、二排。三连：由原会计系、政治部、总务处组成，按顺序遍为一、二、三排。各连连长和政治指导员分别是：沈云、邓洪钦，高竞生、王自端，顾有章、于金富。

1970年8月28日，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整党建党领导小组制定了《整党建党工作计划》，计划出台的背景是中共中央召开了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就计划显示的内容看，当时学校仍然有驻院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组织，计划提到：“我院现有党员152人。我院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得到了进一步巩固，经过清队，特别是经过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一打三反’等斗争，阶级阵线基本划清，资产阶级派性基本克服，初步形成了党的领导核心，这就为整党建党创造了条件。”²

这次整党建党的时间，计划一个半月，具体分为三个阶段：学习文件，提高认识、掌握思想武器；³党员斗私批修，群众评论，党内通

过，分批恢复组织生活，建立新的党支部；搞好组织上的吐故纳新。

8月29日，全院召开整党建党动员大会，军代表孙海波作了讲话。实际上，这次整党建党运动大大超过了原来一个半月的计划，到1971年1月3日，在《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整党建党工作报告》中提到：经过4个月的时间，基本完成了整党建党第一、二两个阶段的任务，正在进行第三阶段“吐故纳新”的工作。第一阶段从1970年8月29日开始，用时40多天。这一阶段，结合政治学习，学院对“五·一六分子”¹进行了大揭发、大检举、大批判。9月25日，学院做出继续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

1 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文革”时期北京一度存在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人数很少的极左小组织。他们打着贯彻“五·一六通知”的旗号，建立秘密组织，进行秘密活动。散发题为“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等传单和标语。北京广大群众对这些人攻击周恩来的行径表示极大愤慨，纷纷自发进行反击，要求严惩这批“歹徒”。毛泽东在1967年9月8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了一段话，指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作者，是一个“用貌似极左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没用多长时间，这个反动组织就被清查出来，为首的分子被公安机关逮捕，问题基本上解决。可是林彪、江青一伙接过清查“五·一六”的口号，极力夸大这个反动小组织的力量和活动，任意扩大范围，千方百计地混淆和转移清查目标，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1968年中共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时，陈伯达毛遂自荐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他们一方面扩大清查范围，另一方面，又借机把许多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打成“五·一六”分子。由于所谓“五·一六”的标准不明确，因此，有些地方或单位的两派组织乘机互相攻击、互指对方为“五·一六分子”；也有恢复工作的领导干部或军队“支左”人员，把他们认为是攻击周恩来，反对党中央，反对解放军的狂热极左派，当作“五·一六分子”加以打击，情况颇为复杂。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这个通知要求纠正扩大化倾向，制止搞逼供信和采取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手段，并提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但是，通知又提出：“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实际上是促使人们去抓更多的“反革命秘密组织”。这个通知还错误地把遭到诬陷打击的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等，同原中央文革成员，帮助林彪、江青一伙干了很多坏事、当时已被隔离审查的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混在一起，都说成是“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作者。由此可见，“五·一六分子”是一项被滥用的、打击报复对手的、莫须有的“罪名”。它使数以百万计的干部和群众，经受了一场莫名其妙的痛苦和灾难。

1 金铁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2卷，第890页。

2 档案资料：7-DQ-1971-1-5。

3 1970年8月学习的文件主要有：毛泽东的整党建党“五十字”方针；林彪九大政治报告；新党章；“六厂二校”整党建党经验；两报一刊社论《改造世界观》、《共产党员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批判刘少奇的“黑修养”、“黑六论”。

众运动的决议，1970年10月初，学院召开了第一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¹。第二阶段又用时40多天，在党员斗私批修、群众评论、党员鉴定、党内通过后，恢复了绝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在全院152名党员中，有129名第一批恢复了组织生活。同时在三个连队普遍建立了党支部，各排建立了党小组，“批查”运动学习班和北京留守办公室分别建立了临时党支部。²

1970年的政治口号之一是“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学院在政治学习和参与政治运动的同时，建立和健全了生产组、基建组、后勤组等机构。

生产组成员：温玺、赵树林、秦其昌、侯秉恕、王铁臣、丁振颖、李皓

基建组成员：田世平、李展才、苏福章、刘佳璐、麦履康

后勤组成员：李连山、胡霞亭、申永富、刘和民、叶承俊

后勤组下设财务组、医务室、饮食管理组、炊事班、仓库。其中，炊事班由崔时川、张赞明、刘光第、姚梅炎、赵棕仁、杨倩如、王仲文、潘启华、姜黎明、王仲春、乔春麟、张玉文、沈漱华、任文仲、高一民、刘邦本组成。

此外，学院还有牲畜饲养组、养猪组、养鸭组。一时间这些高等教育工作者，这些大学教员被“顺理成章”地组合成了体力劳动者，崔书香、刘光第、张玉文、姜维壮等教授们的学问也只能束之高阁了。

1971年，学院的主要领导机构是学院整建党领导小组和学院革委会。

1 “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是“文革”期间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一种组织形式，1964—1965年间最先由部队发明，后来通过宣传和组织系统向地方推广。当时林彪提出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一整套方法：“要带着问题学”、“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工夫”。讲用就是对这套方法的具体落实。由学习中有突出表现的先进分子，讲说自己如何把毛泽东教导和实际（工作、学习、个人情况）相结合，解决问题、取得成效的过程和心得体会。讲用会就是以讲用为主体内容的会议。通过讲用会，见证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英明、正确，放之四海而皆准，增进与会者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崇敬的感情。

2 档案资料：7-XZ-1972-7-1。

1971年4月30日、5月1日，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整建党领导小组和革命委员会常委召开会议对今后的任务和工作作了安排，决定成立院中心学习小组，组长是“军宣队”代表孙海波，副组长是原党委书记陈如龙。会议决定进一步调整组织机构，把院整建党办公室与院革委会办事组、政工组合并，建立统一的院办公室，陈如龙任办公室主任；建立直属连队，即第三连，连队党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由张建皓担任，温玺任连长，马计任副连长；因一连连长沈云需长期疗养，由张光三担任一连连长。会议决定今后一段时期学院的主要工作仍然是：继续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开展创造“四好连队”运动；清查“五·一六”分子；组织机构的调整；安置、分配干部以及生产等。

为了配合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落实学院上述会议精神，学院档案记录记载：“从1971年5月份开始，根据上级指示，将已经毕业离校的、敖本立的重要同案人于守宝等调到北京举办学习班进行审查。我们抽调了几十名同志，和外单位的同志协同作战。5月31日，财贸系统在北京召开了批斗大会，对敖本立进行了批判斗争，并将其逮捕，狠狠打击了我院‘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由于坚决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审干9条方针和中共中央13号文件，我院清查‘五·一六’的斗争在各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争取了失足者，分化瓦解了财院‘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进一步揭露和打击了‘五·一六’的坏头头、主谋者、幕后操纵者，取得了不少人证、物证、旁证，核实和清查了一些重要事件和关键情节，为几个重大案件的结案工作和被审查对象的定性、处理工作打下了基础。”¹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其实就是子虚乌有的政治虚幻，可是在那时却耗费了大量宝贵的时光！1971年下半年，“九一三事件”²后，学院开展了批修整风的群众运动，全院学习毛主席《我的一

1 档案资料：7-XZ-1972-7-1。

2 “九一三事件”指林彪携妻、子等，于1971年9月13日乘飞机逃往苏联，途中在蒙古国温都尔汉机毁人亡的事件，又称“林彪叛逃事件”。

点意见》和中央《关于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问题》的一系列文件。”¹

除了政治学习以外，主要开展了大批判运动，批判所谓林彪鼓吹的“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唯生产力论”、“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阶级斗争熄灭论”，特别是逐条批判了所谓林彪反党集团炮制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

1971年，学院开展了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定案、处理工作，有5人过去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后改为按敌我矛盾处理；有2人过去按敌我矛盾处理，后改为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1971年，在农业生产方面：耕种土地305亩（最高峰时耕地1200亩），在耕地面积减少3/4，人员不断减少，先涝后旱的情况下，粮食总产量超过1970年，达到10.6万多斤，水稻平均亩产700斤，小麦平均亩产147斤，棉花平均亩产74斤皮棉，花生平均亩产321斤，并且较好地完成了养猪、养鸭和种植蔬菜等副业生产任务。²这成为评价成绩的一项依据，真是到了师将不师，学将不学的地步了。

黄岭松回忆说：

我院搬到河南淮滨马集后，我就抱着不说、少说，多干实事、多学习的态度。我班被分配种菜，后来还参加种植水稻比赛。班长要我任技术指导。我读了好几本如何种菜、种水稻的书，积极向当地农民请教种菜技术，还到淮滨县蔬菜大队参观学习如何种菜。开始有一些同志说我是搬着书本种菜的教条主义者，后来，我们学会了种菜和种水稻，大家开玩笑，说我是‘种菜技术员’，我班基本保证了教职工食堂的蔬菜供应，也获得了‘水稻种植高产班’的称号。同时，我挤时间读完了马恩选集、列宁选

集、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收获不少。后来，领导干部快解放完了，我向军宣队的领导提出要求解放自己，他们召开大会叫我做检查后，不但不解放我，反而批了我一通，还叫我交代莫须有的问题，我看见他们没有解放自己的意思，只好说，让我下去，再想想，我就再不提解放自己的事了，一直到我院搬回北京，他们最后才主动地解放了我，1973年8月11日，我才过上了党组织生活。所有这些都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十年浩劫的事实。

到了1972年，学院仍在继续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深入开展“批修整风”运动。继续进行斗、批、改。年初，学院还制定计划从4月中旬开始，在全院进一步开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群众运动，先向群众介绍9个月来专案工作的进展情况，然后发动群众开展大揭发、大批判，对重大事件和关键情节，进行清查和核实，争取在6月底以前，做好结案工作，对于审查对象，在问题搞清楚以后，也要争取在6月底以前定性、处理一批。年底，学院的总结报告说“我们搞清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财院犯下的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篡夺中央财政大权，抄赶住院军训团和盗取党和国家机密等主要罪行，写出了案情报告。11个被审查对象，7个人已经结案处理；其余4人正在抓紧结案处理。”

1972年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在年底统计，39名被审查对象中，已有31人的问题审查清楚，有4人的问题已经报财政部，尚有4人的问题正在继续审查中。

九、在“文革”中离别母校

1965年9月，65级新生入学，加上尚未毕业的62级、63级、64级同

1 档案资料：7-XZ-1972-7-1。

2 档案资料：7-XZ-1972-7-1。

学，中财的学生人数达到了“文革”前夕的最高峰，1965年9月，学院共有在校生1529人。人数统计见附表。¹

表4-21 1965年9月13日在校学生人数统计表

系别	级	班	人数	系别	级	班	人数	系别	级	班	人数	总计	
												人数	总计班数
财政	62	1	48	金融	62	1	49	会计	62		45		
财政	62	2	45	金融	62	2	48	会计	63		54		
财政	63	1	54	金融	63	1	53	会计	65		50		
财政	63	2	53	金融	63	2	50	小计			149		
财政	64	1	53	金融	64	1	53	银会	62		47		
财政	64	2	53	金融	64	2	51	银会	63		51		
财政	64	3	52	金融	65	1	50	银会	64		56		
财政	65	1	50	金融	65	2	50	银会	65		50		
财政	65	2	51	金融	65	3	50	小计			204		
财政	65	3	50	小计			454						
财政	65	4	49	国金	64	1	51						
				金融	65	1	51						
				小计			102						
				法语		1	62						
合计	4	11	558	合计	4	12	618	合计	4	7	353	1529	30

1 学校档案专门说明只有人数统计，缺1966年、1967年、1968年毕业生名册。档案材料 7-JX-1970-7-1。

62级同学1966年7月毕业时，正赶上“文革”，应届毕业生暂不分配，留校参加“文化大革命”，直到1968年6月，最终的分配方案才出来。

63级同学1967年7月毕业时，应在当年分配完毕，但是，由于处在“文革”时期，根据学院档案材料记录，1968年7月基本分配了。¹当时大学生的分配原则是所谓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边疆、面向矿山。

64级同学1968年7月毕业，即分配工作。

65级同学1969年11月到河南，在度过一段艰苦岁月后，1970年8月，65级学生毕业分配。虽然没有真正完成四年的学业，也只能含恨而去。

1970年9月5日，驻中央财金学院“军宣队”和中央财金学院革命委员会联合写了《关于1969届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总结报告》，报告提到：遵照《中共中央关于1969、1970、1971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的通知》精神，我院自1970年7月10日—8月13日，举办了毕业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经过动员教育，大学习、大批判；个人总结、组织鉴定；落实方案、派遣离校三个阶段的紧张工作，我院最后一届毕业生分配任务已经胜利完成。目前，在506名毕业生中，除1人在押、1人留校劳动改造、1人因病缓派、5人涉及“五·一六”问题待查清后处理外，其余498名毕业生已经走上工作岗位。学生离校前，8月10日，学院召开了欢送毕业生大会，当地驻军首长、淮滨县革委、总行五七干校、马集公社负责人参加了大会。驻中央财金学院军宣队和中央财金学院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在大会上讲了话，财政部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革委会副主任也讲了话。8月11日和13日，毕业生分两批离校时，驻院“军宣队”、院革委会及系分配小组负责同志同车专程送行270里，直至送毕业生上火车全部离开信阳。留校的教职工、当地驻军、公社干部数百人也在马集刷标语、设饮水站、敲锣打鼓、

1 档案资料：7-JX-1970-7-1。



60年代同学毕业在北京火车站送别时的合影

夹道欢送¹。

在那个热烈而畸形的年代，有一个这样热烈的送行，而一些学生没有毕业，却是那畸形的政治造成的，可是那个时代对那种政治的畸形，却是集体不意识的。可以说自有大学以来，那样的毕业，也唯有在那个时代的中国所独有。

十、自古多情伤别离——教职工陆续离开学校

中财院的405名教师，因为学院停办，部分教师迅速调动了工作。但是，最初大部分教职工仍然在河南茫然等待。1970年6月22日，学院作了统计，总计教职工尚有359名等待分配。

1 档案材料：7-JX-1970-7-1。

1970年6月学院教职工人数统计见下表：

表4-22 1970年6月干部教师情况

单位	淮滨	信阳	北京	合计
院级机构	5		1	6
政治部	17	5	6	28
教务处	21	1	8	30
总务处	28	1	9	38
政 教	22	5	1	28
普通课	25	7	2	34
财政系	31	2	2	35
金融系	30	4	6	40
会计系	29	3	2	34
合 计	208	28	37	273

注：编者制表

表4-23 1970年6月工人情况

单位	淮滨	北京	合计
教务处	4	6	10
总务处	20	41	60
合 计	24	47	71

另有外单位代管人员15名。

1971年学院开始大规模分配、安置教职工。学院1971年的总结提到：“由于我院是撤销单位，干部的分配安置任务很重，根据财政部党的核心

小组的批示，我们成立了干部分配、安置小组，具体负责此项工作，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分配干部71人，安置退休干部2人，另有代管干部3人随同爱人一起调出。在分配、安置干部时，我们从思想教育入手，采取办学习班广泛开展谈心活动等方式，组织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忆苦思甜，开讲用会，开展革命大批判，向英雄人物学习，要求大家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正确处理个人和组织的关系，坚决服从革命需要，基本上做到了调走的干部愉快接受分配，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其余干部坚持工作、学习、劳动，完成组织上交给自己的各项任务。”¹

1972年年底统计，该年先后分配、安置了近百名干部和工人，年底尚有待分配、安置干部112名，工人4名。“在分配过程中，我们认真执行党的干部政策，根据干部的历史、思想、业务专长和家庭情况等，作出比较恰当的安排，对有实际困难的，如夫妇双方长期不在一起的，也尽可能地予以帮助解决，这样，绝大多数同志心情舒畅，对所去单位比较满意。”²

1972年12月18日上午，学院接到了财政部转来的迟到了三年的学院停办通知。

1973年3月15日，学院接到了财政部党的核心小组就此前中财院的请示所作的批示，同意中财院把马集干校的摊子撤回北京，并且指示要认真做好这项工作，把善后工作处理好。

3月17日，学院整建党领导小组开会指出，我院是1969年11月战备疏散到马集去的，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财政部党的核心小组的领导下，在淮滨县和马集公社的支持下，一面搞斗批改，一面搞农业生产劳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大家在思想锻炼和世界观改造上也有很大提高。几年过去了，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前的情况要求我们必须集中人力，统一领导，因此，再继续分成两摊子，确有不少困难，影响批修整



撤校后学校部分教工在河南淮滨县委的合影

风和撤销工作的顺利进行，这次财政部党的核心小组批准我们把马集的摊子撤回北京，可以使我们把“批修整风”这项头等大事抓好，带动各项工作，加速我院撤销工作的进程。

会议对各项具体工作作出安排：组织撤点工作负责班子，由温玺、李连山负责组织15人左右的班子，最晚于3月25日前离京去马集，争取4月中旬结束此项工作；撤回北京后，建立两个支部，干部分配组、清队组、批清组、行政组（留守处）和长期病号，组成一个支部，支部委员为曹桂芬、秦穆伯、李凤彩；其余同志为第二支部，支部委员为沈云、温玺、高文明等，两个支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划分若干小组，整建党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具体工作。第一支部坚持正常学习、工作，第二支部半日制，每日下午为工作、学习时间，每周2、4、6下午集体学习，每周1、3、5下午由支部安排，自学或开会。在马集时，超假扣工资的规定停止执行，3月份就不再扣了。

1 档案资料：7-XZ-1972-7-1。

2 档案资料：7-XZ-1973-7-1。

1973年4月25日，学院给财政部党的核心小组写了请示报告，中心内容是请示教职工的安排问题。请示报告提到：

我院对教职工的分配曾经提出两种设想，一是同北京市联系集中解决，统一输送到北京市需要干部的单位；二是广泛联系，适当搭配，零散分配。后一种方案一直在实行，最近我们到北京市有关部门和单位做了一些了解，又对我院教职工的情况作了一次全面的分析，研究了今后如何分配的问题。我们认为，随着形势的发展，过去采用的广泛联系，适当搭配，零散分配的办法，已不适应当前情况，今后分配宜采取同北京市联系，集中解决，统一输送的办法。我院原有教职工405名，从1969年确定撤销以来，已经分配、安置289人，现有教职工116人，其中党团员74人，占64%，教学人员58人，占50%，青壮年67人，占60%。最近一段时间，从分配干部的接触情况看，北京市不少单位来我院要干部，并且一商局、煤建公司等5个单位来同我们联系，提出将我院现有教职工全部或大部接收过去，希望能支援他们，但由于市领导机关不批或其它原因，均未办成。我们认为，我院是财政部和北京市双重领导的院校，党的组织关系仍然在北京市，从国务院确定我院撤销后，校舍和绝大部分设备、物资都移交给了北京市，根据这一情况，北京市同意所属单位接收我院现有教职工的可能是存在的，我们建议，请部领导同北京市领导商定，争取将我院现有教职工统一输送到北京市。¹

4月27日，财政部作出批示，随后，加快了干部的分配工作。

1973年9月25日，学院给财政部党的核心小组写的请示报告中显示：

关于我院104名教职工干部的分配问题，经与北京市领导以及市财贸组联系、协商，已经确定调入北京市财贸组80人（包括代管的干部1

人），北京市委组织组已于9月21日下达调令，限10月15日前报到。学院将统一把行政介绍信、组织关系、工资关系以及档案材料，一起转到北京市。与此同时，宣布学院停办工作已经结束，留下的24人，将于11月起转由财政部政治部负责安置。学院现有汽车、医疗器械、家具等物资，除留下少量必须的随同结尾工作结束后上交财政部以外，在原则上，绝大部分拨给北京市财经学校，至于图书，建议也给予财经学校一部分。¹

报告所说“留下的24人”，是指没有分派工作的行政级别较高的院系领导、年龄较大者或当时所谓有问题待处理的老师，他们是：陈如龙、秦穆伯、张建皓、姜明远、张焕彩、沈云、高文明、任文仲、黄岭松、芦峰章、武冠英、崔敬伯、杨泽生、崔书香、高峰、吴英华、苏福章、王立达、陈福生、陆志勋、胡万荣、王金瑞、叶国泉、田世平。

关于这段历史，黄岭松回忆说：“1971年秋，有关部门才开始安置分配人员到外单位、外地工作。教职工虽然受过极‘左’思潮的冲击，但是他们对我院有深厚的感情，特别是在学院辛苦学习、工作多年的教职工，更是难舍难分。一直到1973年2月，剩下的教职工全部搬回北京，继续进行安置分配工作。”²

王万有也有回忆：“1971年教职工就开始疏散派遣了，第一批到辽宁财经学院，去了将近百人。我是1972年随第二批派遣到北京航空学院的。这样的话学校就彻底解散了，教职工被分散到了全国各地。最后一批有100多人派给了北京市财经学校，另有一批十三级干部，财政部接收了。连校舍加人员，全部撤了。真正地说下马就是这一次。”³

从1969年9月国务院决定我院停办，到1973年9月解散工作结束，时间长达四年。

1 档案资料：7-XZ-1973-7-1。

2 参见《黄岭松回忆录》。

3 参见《王万有回忆录》。

1 档案资料：7-XZ-1973-7-1。

学院现在仍然保留一份1973年10月20日的教职工名册，实际上是400多名教职工的分配、安置去向。当年，400多名教职工来自五湖四海，如今，神州大地，到处都有中财院教职工的影子，中财人散落祖国各地，中财精神在他们身上仍然延续着、传承着。

十一、复活的种子——友谊楼留守处办公室

1973年9月，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停办工作结束了，然而，曲终人不散，扫尾工作始终没有完成，部分老同志回忆说：尽管学院工作表面停止了，但是学院的不间断活动，让人们还不能把中财彻底忘却，部分老同志的心里，始终没有彻底放弃财院重建的希望。正是这重建的希望，成为中财复校的条件之一。

至迟在1974年4月，财政部还与中财院有文书往来。

设在友谊楼的留守处，成为中财院的一个“火种”，到了“文革”后期，也就湮灭不闻了。

本章小结

中财院在这个时期，真是起起落落，一个大学在政治风雨中飘摇，终至败灭，又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几年里，学校在当时“大跃进”之后相对政治宽松的时候，还是探索了正规化和“大学化”发展的路径，无论在制度建设还是教材建设上，都做出了非常出色的成绩，为今天的大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也形成了中财求真务实的良好传统。

中国的大学，自1949年以来贯穿着一个主要的办学思想就是破旧立

新，这个“旧”，在建国初期主要是指向民国时期的办学传统。把澡盆里的洗澡水倒掉这没问题，但是把里面的孩子一起倒掉就太绝对化了，比如学科自主性与独立性逐渐消失，办学模式的多样化逐渐被一体化、单一化取代，而教育的独立意识与学术的自由精神也逐渐被一个“唯一的”“中心”所控制。在民国时期逐渐建立起来的大学制度以及逐渐形成的大学精神，被当作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腐朽的制度与思想被彻底改造了。破了“旧”就要立“新”，所谓“新”归结起来就是“政治挂帅”与“求用务实”。“政治挂帅”就是为了改造“旧”思想、统一“新”思想，其路径表现为思想改造（政治运动不断洗礼高校）；后来的“与工农相结合”是思想改造路径的延展。“求用务实”不是新东西，这是延安经验，又与苏联模式相加，成为一种极端的实用主义，所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都几乎排在“科学”之外。在这样背景下的中财，政治第一、实用第一就当然地成为一种办学的模式，这很难说是中财的特色。

中财的老师和学生们，和所有高校的师生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真真诚诚、老老实实在地跟党走，因为办学自主性的缺失，所以上面的命令下来，他们几乎不加思索地执行，从来不问合不合理，应不应该；即便认为不可行，也只有自己转弯子，绝不会认为党有问题。所以当他们用智慧和汗水砌成了一个大学的基础，当他们在计划中要让万丈高楼平地起的时候，一场浩劫扫荡了他们的宏伟蓝图，一纸命令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一所大学扼杀了，而他们只有顺从，无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没有据理力争的可能性。一代甚至几代知识分子因为那个“文化大革命”竟不敢再有文化的梦想；大学的知识理性竟荡然无存。看着他们在种粮种菜，看着他们无休止地斗私反省，真是有一种历史的凄凉。

他们离开了，但是他们不甘心，就像杜甫诗句所云，“每依北斗望京华”，一些老同志回忆说，总好像有一种朦胧的信念萦于心际，那就是中财还会复兴，我们还会回去。

附录

【一】史实考论

一、中财建校源头考

中财人被告知，中央财经大学起源于1949年成立的华北税务学校，1950年更名为中央税务学校。那么在它之前是否还有办学的端倪？中财的本源是否还可以再往前追溯呢？

原人事处领导吴焕智老师撰文说中财的渊源应在1943年创建的晋冀鲁豫边区建业会计学校。其文曰：



吴焕智老师1948年在建业会计学校(前右一)

一直以来，关于中央财经大学的前身，说法众多。就此问题，访问了知情人，得出如下结论：晋冀鲁豫边区建业会计学校——华北财经学院，是学校的真正渊源。

我访问了原建业会计学校的同学和原晋冀鲁豫边区工作人员共10人，据他们回忆，晋冀鲁豫边区建业会计学校建于1943年，校长王风来。因当时是抗战时期，校址随边区政府地址变动而变动。开始在太行山武安，日本投降后搬到邯郸。解放战争开始，

搬到太行山涉县北郭口村。1948年5月搬到石家庄，改名为华北建业会计学校（因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边区合并为华北政府）。1948年12月华北建业会计学校改为华北财经学院，院长王学文，原建业会计学校校长王风来任会计系主任。

该校开始隶属于边区工商管理局，之后改隶边区财政厅。领导人是戎子和，他当时担任边区政府副主席，分管财经工作。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区合并后，戎老任财政部长。1948年5月学校改为华北建业会计学校时，曾由财政、银行两家领导。

1949年7月学校人员都到了北京国家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当时缺干部，各部都抢这批干部。很多人到了人事部、财政部、人民银行、财委等部门工作。以后这些部门都陆续成立了干部学校。部分原来的干部教员又分派到干校工作。逐步形成了华北税务学校、财政学院、银行干校等。

从人事安排上，也可以看出学校与建业会计学校的传承关系。原建业会计学校管教务工作并兼教员的张焕彩，后来担任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原建业会计学校的总支支部书记高文明任党办主任，后来戎老任财政部常务副部长，兼任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党委书记。

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工作重点转移为经济建设。此时学历开始受到重视，故原建业会计学校的学生纷纷来中财要补学籍学历。戎老和张焕彩副院长研究决定：建业会计学校为中专、华北财政学院为大专（见开出的学籍证明）。张焕彩、高文明两人委托马旭光负责这部分人的学籍审查并出具学历证明。马旭光同志是建业会计学校队长、学生会副主席、华北财院会计系班主任，我本人是建业会计学校学生。

据原财大校长王柯敬同志回忆，确定1949年11月6日为学校成立时间，是请示过财政部的。陈如龙副部长说：“华北财院既然让人民大学占去了，我们就从税校算起吧。”据我了解人大校史是从1938年陕北公校算起，华北财院另有源头，两者是有差别的。陈副部长是从西北来的，对华北的情况，可能不太了解。

本校原文化基础课教学部主任闵庚尧同志，三年前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专家说：“中央财经大学前身是华北建业会计学校。”中财校史如从晋冀鲁豫边区建业会计学校算起，则比此前说法提前了七个年头，跨越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两个革命时期，是一所有着革命传统的优秀大学。

如果领导认为以上材料有参考价值，希望尽早取证，有些人年事已高，时间长了不便取证。

后来，吴老师在接受采访时，又补充了两点意见：

一是原财政部常务副部长、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党委书记戎子和同志一贯认为建业会计学校就是中财院的前身，并于20世纪80年代初决定由中财院为原建业会计学校和华北财经学院的学生出具学籍和学历证明。

二是原财政部副部长陈如龙认为，本来中财的历史应从华北财院算起。他说既然华北财院被中国人民大学占去了，中财的历史只好从税校算起了。事实是，中国人民大学并未将华北财院算入其校史。如果陈如龙了解详情，他就会同意华北财院是中财的前身了。

从吴老师的文章看，华北财经学院应是中财的源头，华北财经学院的前身是华北建业会计学校，而华北建业会计学校是由晋冀鲁豫边区建业会计学校改名而来的，则晋冀鲁豫边区建业会计学校可看作是中财最早的源头。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1948年5月，建业会计学校从太行山涉县北郭口村步行8天搬到石家庄市，校址设于原日本军用医院，与华北财委一墙之隔。

7月学校遭国民党飞机轰炸，损失很大，人员亦颇有伤残（财政部人防处长刘阳忠就是那次被炸掉腿的），于是学校被迫迁至郊区的尖领村和防北村。

10月傅作义部偷袭石家庄。学校夜里又暂回山里的赞皇县。当解放军杨成武部队从240里外一天一夜急行军赶到石家庄地区附近后，学校才又

回到原来的村庄。

12月，财政部、人民银行为扩大办学即决定将建业会计学校扩建并改名为华北财经学院。

1948年12月16日，华北税务总局曾委托华北财经学院成立税务系，并进行了第一期训练班入学式，有学员100余人，派李涉同志为税务系副主任，王世贻等为班主任，学员1949年3月中旬毕业。1949年7月，华北财经学院随中央财委搬到北京，干部学员由中央财委安排。但是华北财经学院从建制上没有材料证明与中财是何种关系，但是从人员上看，无论是戎子和、李涉、张焕彩等领导，还是一些教员，都使华北财经学院与中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言之，中财从建制上说，溯源到中央税务学校，应无异议；而从办学者和教学者来源的角度说，华北财经学院也为中财提供了众多人才。

如果有更详实的史料可证华北财经学院与中财的渊源，则可认定华北财经学院及晋冀鲁豫边区建业会计学校是中财的“前身”。既是“前身”，就可以建业会计学校的建校日期，作为中财的校庆日。而中财之建校能推到1943年，其意义诚如吴老所说：“中财校史如从晋冀鲁豫边区建业会计学校算起，则比此前说法提前了七个年头，跨越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两个革命时期，是一所有着革命传统的优秀大学。”

二、中财“文革”停办时间考

中财在历史上确实被停办，只有“文化大革命”时这一次。尽管常有人说“文革”时学校停办是“第三次下马”，但这并不确切。之所以说是“第三次”，是因为1953年中央财经学院并入人民大学被认为是第一次“下马”；1961年困难时期教育部叫停办算第二次“下马”。其实，第一次只是财经学院走了，中财并没“下马”，而是由中央财政干部学校接续

下来；第二次是险些“下马”，当时是中财领导接到“下马”通知后，只是停招一年生，转过年来“下马令”就撤销了，中财又继续招生了。所以所谓第一次“下马”和第二次“下马”都不是实际意义的停办，只有“文革”这次是真的停办，真的“下马”了。

今查档案，1969年9月国务院决定学院停办，到1973年9月解散工作结束，时间长达四年。

事实上，在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全院教职职工下放河南前夕，1969年9月，国务院已经决定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停办撤销，只是当时没有向全体教职职工宣布。1970年7月，学院的财产也交给北京市一轻局了。因为那是学院北京留守处经办的，河南干校的中财人并不甚知晓。下干校3年之后的1972年12月18日，学校才正式接到中财停办的通知。12月27日学校才正式向师生公布国务院的文件。国务院办公厅1972年12月17日给财政部《关于停办财金学院的问题》的文件是这样写的：

你部所属财金学院停办，是1969年9月经国务院讨论决定的，如果有同志对此有疑问，可以向他们宣布。

这应该是中财人通过正式渠道获知中财停办的确切消息。所以在中财人的记忆中，停办的时间就有两个，一个是1969年；一个是1972年。1969年是国务院决定中财停办的时间，1972年是宣布中财停办的时间。

其实，停办令宣布之后，中财并不是立即消失了，它还在运转，因为至迟在1974年4月，财政部还与中财院有文书往来。

学校档案显示：

1974年1月15日，学院向财政部汇报工作。

1974年4月10日，学院仍然以“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党的领导小组”的名义请示财政部党的核心小组，请示“在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中，

对7个人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在这份请示中发现，军宣队的工作人员张金树仍然在财院工作，请求撤回部队。

4月10日的请示特别提出，鉴于财院已停办，但有关清查“五·一六”和清队的事情及其他事情，一时结束不了，希望财政部从财院抽出1—2人，留财政部政治部工作，处理后续事务。

4月12日，财政部答复，“财院在清队和清查中的档案和问题，需要有1人留政治部，以便将来处理一些问题，具体人员可请政治部与财院商洽。档案可以暂交文书科入库。（江东平签字）”¹

1969年9月，中央财金学院在国务院其“名”已不存，但中财人尚不得知。至1972年中财人才知道自己的学校“名”已不存，“实”亦将亡。而其“实”尽去之时，则在1974年矣。所以可以这样说，中央财金学院被停办是在1969年9月；全体师生知道停办是在1972年12月底；而以“中央财金学院”名义停止运转，是在1974年4月。但是中财的“留守处”，还工作到更晚。

1 档案资料：7-XZ-1975-7-1。

【二】校长小传



李予昂



李予昂书法作品

李予昂(1901—1985)，山西平遥人。幼时家教严格，熟读古籍。1919年考入北京国立美术专门学校。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开阔了眼界，接受了新思想。1927年在太原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利用关系打入国民党天津市公安局任督察员。并化名李幕苏，担任地下党主办的《天津好报》社名誉社长。又同曹景周、张友渔等在天津法租界内创办“北方书店”，经常将出版的马列主义读物和进步书刊介绍给读者。1930年4月，他因在天津参加纪念“四·一二”殉难烈士集会被捕入狱。同年冬，在蒋、冯、阎大战中，东北军进入天津，趁时局混乱得以脱险回到平遥。1938年春，他偕同全家到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历任延安中央直属财政经济处副处长、陕甘宁边区税务总局副局长、陕甘宁边区贸易总局副局长、察哈尔省禁烟督察局局长、华北财办经济组组员、华北税务总局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院财政部税务总局局长兼党委书记，财政部部长助理、党组成员。1949年11月至1950年2月兼任华北税务学校校长，1950年2月至1952年6月兼任中央税务学校校长。

1956年，李予昂当选为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58年7月，调山东省工作，先后任中共山东省委财贸部部长、省委常委、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在1962年5月至1967年1月曾任山东财经学院院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和山东的几位诗友组织成立了“历山诗社”，并任社长，办有不定期刊物《历山诗刊》，出版诗集《拾贝集》。先生雅好书法，其书有汉魏气骨，晚年用力弥笃，享誉齐鲁。



戎子和

戎子和，1906年出生于山西省平鲁县一个农民家庭，又名伍胜。1936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发起成立“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任执委、常委。1937年，他参与了抗日武装山西新军的组织创建工作，任山西新军决死三纵队政治委员，同年6月兼任山西长治五专署专员、牺盟中心区党团书记，年底兼任专署保安司令，后任决死三纵队司令员。1941年7月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党组副书记。1948年9月任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部长。1948年底至1949年春北平解放前夕，他作为中共三人代表之一（陶铸、徐冰、戎子和），参加了北平的和平谈判，并在同年12月任北平军事接管委员会委员，兼物资接管委员会副主任，协助叶剑英同志主持了北平的财政经济部门的接管和恢复。

新中国成立后，戎子和历任财政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书记，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1952年10月至1953年8月任财政部代部长。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财贸办公室主任。

1978年5月任财政部顾问，同年7月兼任中央财政金融学院院长、党委书记，1979年1月任财政部党组纪检组组长。戎子和是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曾任中国财政学会会长、名誉会长。1988年离休。1999年3月2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戎子和是一名财经战线的老战士，从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从事财经工作。40年代初，他担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兼财办副主任，和当时担任边区政府主席的杨秀峰和担任副主席的薄一波密切配合，财经工作搞得有声有色。20世纪40年代末，戎子和担任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长，同当时担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董必武密切合作。全国解放以后，戎子和担任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并主持财政部日常工作，这一时期的财政工作，得到毛泽东、周恩来和陈云同志支持和肯定，当时凡涉及财经方面的重大事项，都是由戎子和领导的财政部先提出意见，向负责中财委工作的陈云和薄一波汇报，中财委研究同意后，再送请周恩来和毛泽东批准。建国之初，一方面要继续肃清残敌，巩固人民政权；另一方面对旧政府留下来的数百万军政文教人员要收养；此外还要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尽快恢复残破不堪的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开支都十分浩大，我们面临的财政经济困难是十分严重的。戎子和领导的财政部遵照毛泽东关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的指示，在财政经济工作中处理着各种棘手的矛盾。在当时十分艰难的条件下，财政工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取得了平衡收支、稳定市场物价、克服通货膨胀以及统一财经的一个又一个成就，并为财政经济的全面好转奠定了基础。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充分肯定了财政经济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他说：“我们现在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的一批胜利，例如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停止膨胀和物价趋向稳定等等，表现了财经经济情况的开始好转”。

1952年初，有一次戎子和到中南海开会，会后，在怀仁堂后面的食堂吃饭。当时，许多同志都觉得毛泽东很威严，不太敢坐近。戎子和则是个初生牛犊，什么也不考虑，就坐到了毛泽东的身边。毛泽东看戎子和坐过来，便风趣地说：“子和，我们今天吃的饭可全是靠你征收来的。”戎子和当时年轻，脑子也反映快，随即回答说：“我们还不是执行主席财经方针和征收政策吗？所以，说到底还是吃主席的饭嘛！”毛泽东听后笑了起

来。这一件小事，反映出毛泽东对戎子和的器重。¹

1953年夏季财经会议，重点是批判修正新税制工作中的问题。戎子和也受到批评，但仍保留副部长职务。事件的起因是，1952年下半年，财政部提出修正税制的具体方案，为了赶在1953年元旦前公布，没有来得及征求地方财政、税务部门的意见，也没有同地方党政领导打招呼，甚至到新税制公布，都没有向毛泽东汇报，听取指导。195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毛泽东看到报纸后才得知消息。因此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很生气地批评了薄一波和戎子和。戎子和后来说：“制定新税制，我没有直接参与，只是新税制最后定稿时送给我看过，我没有看出问题。但我当时是财政部代部长、党组书记，是负有领导责任的。”²新税制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这个提法在当时是有些毛病、不太妥当的，出台也是比较草率的，但是高岗利用这一缺点发难，演出了一场“批薄射刘”的闹剧，企图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1953年9月，邓小平接替薄一波担任了财政部长，戎子和虽然在1953年夏季财经会议以后受了处分，但保留副部长职务，在部里仍然分工负责预算工作。在研究1954年预算的政治局会议上，当时争论激烈，高岗对戎子和主持制定的预算表示反对意见。戎子和坚定地向毛泽东表示预算“靠得住”，毛泽东见戎子和这样有把握，表示同意，政治局会议也通过了。后来预算执行的结果，国家财政收入262.37亿元，比上年增长17.7%；国家财政支出246.32亿元，收支相抵，结余16.05亿元。不仅完成了预算任务，而且还超额完成了任务。

戎子和还是一名教育工作者，早在抗战时期的1938年，他就担任山西长治民族革命中学的校长。1953年4月—1953年12月，在他担任财政部代部长时，兼任中央财政干部学校校长。1978年7月，他72岁时又担任中央财政金融学院院长，为中财的复校和各项工作走向正规，做出了贡献，直

1 戎子和文章“怀念毛主席”，《缅怀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2 戎子和文章“怀念毛主席”，《缅怀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到1983年8月卸去院长职务。同时，从1978年11月—1985年11月，他一直担任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党委书记。



贝仲选

贝仲选，（1908—1970），河北巨鹿人。1938年参加革命，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巨鹿县战委会主任、宁晋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冀南行署粮食局局长、中共华北局党校研究室副主任、中共冀鲁豫分局研究室主任。1945年后任山东临清市长、冀南区第一专署专员，曾领导打响安平县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第一枪。转任皖北行署财政处处长，第二野战军运输大队政委。

新中国成立后，贝仲选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第一副部长、国家保险总公司经理。1955年1月3日被任命为国家财政部部长助理。

1956年3月31日，根据政务院的决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简称贸促会)举行的第四次委员会会议，会上通过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程序暂行规则》，选任21位委员组成第一届委员会，并兼任仲裁员。贝仲选以保险专家身份入选。入选的委员中有贸促会主席南汉宸、贸促会委员卢绪章、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李烛尘，有许涤新、冀朝鼎、马寅初、陈翰笙等知名人士。

1958年12月1日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成立，贝仲选以财政部部长处理兼任校长。后兼任中央财政金融学院院长，直至1961年4月。

陈如龙，广东文昌（今属海南）人。1938年入安吴青训班学习并参加西北青年工作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财经部科员，陕甘宁边区农业统一累进税研究室研究员、主任，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秘书室主任。建国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办公室主任，西北财政



陈如龙

管理局局长，财政部办公厅主任、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财政部副部长，中央财政金融学院院长，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社长，财政部纪检组组长，中国财政学会第一、第二届副会长，中国珠算协会第一、第二届名誉会长，中纪委委员。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6月出版了《陈如龙文选》。

1964年10月—1966年5月陈如龙任中央财政金融学院院长，1965年5月—1970年任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党委书记。陈如龙任财政部副部长兼中财院院长未及两年，天下大乱，挨整挨斗，在所难免，身心创痛，亦为惨烈。革委会三结合时，虽结合进领导班子，亦属摆设而已。后随中财院下放河南，务农劳作，虽为党的高级干部，也降为“劳力者”受制于人。中财院解散后归为财政部，“文革”后于财政部复职，虽未回中财，然亦时时关注中财发展，亦尝为中财收复校舍而以财政部副部长身份与北京市谈判。



秦穆伯

秦穆伯，生于1910年，山西省夏县人。秦穆伯早年在山西运城第二师范读书，读书期间担任二师学生会主席，追求进步，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28年和1931年两次带领同学驱逐二师的校长（国民党人）。1933年8月，他参加山西河东地区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教联”。1934年在河东党的组织被破坏的情况下，他领导“教联”成员和进步青年仍然秘密活动，1936年春做了迎接红军东渡黄河的工作。

1937年抗战爆发后，秦穆伯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为河东特委的恢复和组建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且担任了运城市第一届市委委员、河东特委秘书。1937年秋，他在中共北方局党员训练班学习后，留在北方局机关任总务科科长。1938年春，临汾失陷后，北方局机关转移驻地，他为保护党的

机密文件和重要物资，身负重担，徒步数十里。1939年秦穆伯担任晋西南区党委的总务科科长。1939年12月“晋西事变”后，晋西南区党委和晋西北区党委合并为晋西区党委，后改为晋绥分局，他先后担任总务处长、副秘书长等职，直到日寇投降。晋绥抗日根据地是个很贫瘠的地区，加上日寇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频繁的扫荡，环境十分艰苦，在历次反日寇扫荡中，秦穆伯亲自组织机关转移，每次都化险为夷，同时在保障机关供应等方面，他赢得大家和领导的好评。

解放战争时期，秦穆伯先后担任吕梁行署财政处副处长兼督察处处长，晋绥九专署专员等职，正确执行党的土地政策，组织群众发展生产、参军参战，并亲自带领同蒲铁路南段的支前大军，有力地支援了解放临汾、太原、运城等战役。

1950年1月9日，中共临汾地区委员会、临汾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县城成立，地委书记是彭德，专员是秦穆伯。1950年6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三十五次政务会议通过任命案，其中的一项内容为：秦穆伯为山西临汾专员区专员。

1952年8月，秦穆伯担任中央财经学院党总支书记，在随后长达20年的时间里，直到“文革”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被停办，虽然领导职务名称多次变化，他一直是中财的主要领导，担任院领导时间最长，中财院的历史与他密切相连。1952年8月—1953年8月，任中央财经学院党总支书记；1953年4月—1958年12月，任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党总支书记、党委书记（党总支隶属财政部机关党委，1957年11月设党委）；1958年12月—1962年，担任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1960年9月—1966年5月，担任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党委副书记、书记、副院长。

秦穆伯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工作者，早在来中财以前，他就有教育者的经历，“七·七”事变后，山西运城各学校停办，许多儿童流浪街头，秦穆伯创办少年抗日小学，在日军侵入运城前夕，被迫西迁。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对干部的培养，把吸收和培养知识分子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晋绥一

中就是中共晋绥分局、晋绥边区政府成立后创办最早、影响最大的一所重点学校，秦穆伯担任过校长。

秦穆伯1952年来中财后，呕心沥血、埋头苦干、任劳任怨，和广大师生一起，在财政部的领导下，艰苦奋斗，从无到有，使中财逐步正规，为我国财政、金融战线培养和输送了一批又一批骨干力量和优秀人才。可以说，秦穆伯是中央财经大学的创始人和奠基人之一。

秦穆伯在“四清”中受到不公正待遇，在“文化大革命”中，右腿被打伤致残，但在逆境中，他仍然相信党、相信群众。“文革”结束后，1977年9月，秦穆伯任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筹备领导小组副组长，1978年4月任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北京）副院长、党的领导小组成员（副部级待遇），1984年离休。1989年10月在北京逝世。

【三】校史访谈录

中财60年，风雨走过。30年以前事，知之者多过古稀，为修校史，一方面查勘史料，一方面访问耆宿，史料与口述结合，相与互见，以期丰满。数年之间，幸访得各个阶段知情人若干，所访老人，皆热情介绍所知史实，常于史料之外，增广见闻，滋其灵动。然口述史实亦有与史料档案不合者，或诸老记忆有误，或史料疏略不实，一时难以考校，并存于此，略可互勘，冀日后能有匡正，稍近情实。

今辑录几家与校史重要时期相关者列于下。访问人数颇多，多有重复者，恕不一一逐录于此。另有访谈录若干，附于下编之后。

一、凌大珽访谈录



凌大珽（1912—2008）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财税专家。

访问者：请凌老谈谈我们学校的建校源头吧。

凌大珽：那我就谈谈吧。1947—1948年那会儿，那时还没有税务学校，也没有财政学院，但是已经开始酝酿了，有这个事实上的需要了。石家庄解放以后，华北人民政府就成立了。那时候是杨秀峰和薄一波等同志是领导。华北人民政府成立了以后

啊，还接收了许多国民党的官兵，一下子就有好几百万人，要等着吃饭，还要往南方去打国民党军队，需要钱用啊。那时候有个口号，就是推翻一切苛捐杂税，这个口号一出来以后老百姓很拥护。可是呢，这一推翻，就是取消所有的税收，这钱从哪儿来呢？政府就临时简单地收了一点税。后来就成立了华北税务总局，准备制定税种、税率、税制，研究怎么来办税务。后来，商量以后，也没定出一个办法来，政府就筹了点钱先支应着财政上的需要。

到了1948年，北平就要解放了，还有天津也都快解放了。北平解放以后，纳税的情形就比石家庄扩大很多了。当时有直接税税局，有货物税税局，还有地方税，感觉这个头绪太复杂了。城市里头呢还贴出这样的布告，布告中说税收还是必须要用的，但是，后面却附了许多杂七杂八的税。举例来说，有这个城防税，防守城墙用的；马杆税，就是服务于军队的马的。这些税种太多了。我们看了，这个不像话啊。当时我已经在几个大学里教财政学。我给华北局交了一封意见书，说了说当时的赋税哪些应该是保留的，哪些应该是取消的。我们都感觉到，税收制度和税务人员是最要紧的。后来听说华北局把这个意见书打了六份给财政部了。

这个时候，税务总局开了一个临时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马寅初、千家驹还有我，那个时候都叫民主人士，就是民主党派的和在各个学校里面教课的人。大家提议成立一个税务学校，找一些税务人员和那些在学校不上课的，还有私立大学的人，成立一个税务学校，由华北税务总局办。这就是学校最初的一点雏形。

刚刚开办的税务学校，在西皇城根儿那个地方。马寅初、千家驹等几个人还有税务总局的人来上大课。课主要是上新民主主义论政治课，另外还有业务课，主要是税务，起先是地方税、营业税、货物税。财政部就临时安排我来讲地方税。这就是税务学校刚刚成立时候的样子。当时学生的来源呢，有的是停办了的私立大学的学生，有的是旧公务人员投奔来参加革命的，所以很复杂，就在西皇城根那儿上课。这时候已经是1950年了。

访问者：税务学校建起来了，那财政学院这方面呢？

凌大斑：1950年，税务学校成立一段时间以后，财政部就开始筹备财政学院了。当时的财政部是管财政行政的，它的上级是华北局的财政经济委员会。里面有陈云，薄一波，李富春，马寅初四个人。薄一波是我们的财政部部长。实际上薄一波就在财委办公，他很少到财政部来。副部长戎子和选了三个人，一个叫李涉，他是军需学校毕业的，一个叫张靖，好像在中国大学学过几门课，一个就是我。我们组织了一个三人小组，就开始筹备财政学院。

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开小会，地点就在财政部里头。他们两个人对我说，你不是在学校里面呆的时间长吗，那你就起草一个计划吧。我想那就只好先列一个组织结构吧。我的脑子里就只有旧大学的办法。学校有校长、教务长、总务长，大概齐就这么一个组织构架吧。

这个时候，国家开始搞全国性的土改。受财政部和政协的委派，我就去了广西，这一去就是一年……

1952年，军管会掌握着北京的整个情形。军管会财政组有个钱俊瑞当时是教育部副部长，他虽然是老解放区来的，但对教育的情形还是比较注意的，已经对北平许多学校都摸了底。钱俊瑞组织北大、清华、燕京、辅仁，还有税务学校这么几个单位召开了第一次院系调整会议。会议的意思就是这些学校的经济系都要重新改组，改组成一个中央财政经济学院。当时那个地址就选在西皇城根税务学校里面。这样，财经学院可就是人才济济呢，清华大学的陈岱孙先生，燕京大学的郑林庄先生，辅仁大学的张中一先生、魏重庆先生。

光有这么一个计划了，可是开完会以后啊，人们也不愿意来，一看这税务学校也不像个学校。那怎么办呢？那就先成立一个教育机构吧。这样就成立了中央财经学院，没有正院长，只有两个副院长，一个是罗青，管行政。他是财政部的一个局长。第二个就是陈岱孙先生，他好像是管教学方面的。

当时我们没法开展也没个地方开展工作。但成立了学院以后你总得活动啊，不工作也不像话啊。于是我们就按照计划，分成财政系、税务系、统计系、会计系、政治经济系这几个方面把人凑一凑，分担工作。这些人当时是很复杂的，有几个改组大学原来的人，也有各个停办了的私立大学财经方面的人。这样，学校就成立起来了。

学校在成立以前还有个插曲。那就是北京大学有一批老年银行专修班的学员，人称“老银专”。这些人呢，是从前老解放区的银行工作人员，都是处长级，但是文化程度不太高。政府把他们招到北京大学来，在业务方面进行进修提高。可是他们始终跟普通学生不一样。这些“老银专”呢，等要毕业后是要回到工作岗位上去的。学校请了北大过去的经济学教授给“老银专”们代课，他们不满意。他们过去所接触的那一套都是用来解决问题的。你来给他们讲理论，什么美国说什么，英国说什么，他们没兴趣听这个，就要求财政部再派人。财政部想了半天，就派我去了。因为我了解他们干部的心理，所以我给这些“老银专”上课就先拿财政上的问题来说，配合着一点财政上的简单理论。这样他们对我也还不错，举例来说吧，上课时候我一出汗，他们就立刻拿一盆凉水给我擦脸，很有人情味。跟着，这些“老银专”就要毕业了。毕业得考试吧，怎么考？笔试写不出来，那就口试吧。我们出了一些题目，大家挑一挑，挑完就口试。最后，这批老干部都毕业了。

财经学院成立后，就建系，成立别的系我不知道，成立财政系我还稍微知道一点。财政系的人比较多，教学人员也多，有财政部的，有留英留美的，有留日的，有税收干部等等，所以就先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吧。陈岱孙先生当时是清华的财政系主任，也是教财政课的。他分到我们财政教研室来了。我们开过一次会，决定分开教学方面和行政方面两部分开展工作。行政方面是财政系，教学方面就是财政系的财政教研室。那么我呢，既在系里管事又在财政教研室教书。我们这个系当时在学校里面算大系，因为在中央财经学院，财政应该是主要的吧。成立了

财政系，学生来源是什么呢？一是调干，二是原来北大、清华、燕京、辅仁这些学校学经济的，三是当时的干部需要加强一点业务知识的，还有就是新生。就这四部分人组成了财政系的学生。财政系还挑了一些人做班主任什么的。

我在财政系虽然是教书，但学生的具体事务也得管，这最成问题了。特别是“干部学生”（调干生）们找到系里，认为应该是属于财政系解决的一些问题，什么婚姻问题，离婚问题，待遇问题，住房问题全都来了。但我们解决不了，一个学校刚成立，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后来我就要求上财政教研室专职教书去了。

访问者：当时的财政系都讲些什么课呢？

凌大珽：当时的财政系就有刚才我说的那些个留英留美的，还有财政干部、税收干部，组织起来有十几个人。我们这个阵容呢当时在学校里面是最完整最整齐的。

但是上课也没教材啊。那时候新中国刚成立，财政部也没什么规章制度。财政部有苏联专家，库都佐夫、维诺库夫，还有一个拉乌罗夫。我们找到财政部，请他们给讲讲，因为那个时候政府号召学习苏联。结果库都佐夫他们讲的都是苏联实行的工作制度，我们拿这个也没办法跟学生讲。后来听说苏联有个亚历山大诺夫是搞财政学的，我们就跟上面要了他的财政学资料来。

要回来以后得翻译啊，财政部的翻译只能帮着解决财政部的问题，要再进行财政学的翻译就很困难了，没时间。后来我们听说人民大学有一个专家，他是从苏联来人民大学工作的。他把那个亚历山大诺夫的东西拿去人民大学给翻译了出来。我们就把他们的翻译材料拿过来了。我们这么凑合着就成立了一个财政系的课程体系，此外还有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等，内容都差不多，都是苏联一套制度的演变。这样，我们就开始上财政课了。

那个时候，学校有财政、会计、统计、税务和政治课。1954年学校还

在上课，到1955年就开始了“反胡风”运动。胡风是文学批评家，你说咱们这学校跟他也不相干，也搞起运动来了，搞起来就不得了。

访问者：我们学校具体是怎么搞这次运动的？

凌大珽：学校就这么着揭发检举啊。揭发什么呢？不是文学批评方面的东西，而是不相干的。个人的恩怨啊，什么言论上的，反对政府的，反对共产党的。我们这些人都是在旧大学里面教过书的，对旧大学的那套习惯制度觉得很熟悉。到这来之后啊，就不太熟悉了，我们当时在教学、教材方面又遇到了一些麻烦，心里就有点不愉快，有时候就说些牢骚话。这样，我们就成了一个小集团，我就算是小集团的头。

访问者：那会儿您多大年龄？

凌大珽：我44岁。成了个小集团，他们后来研究研究就报到了财政部党委。财政部党委说，是个落后的小集团，那就给打散了吧，后来就调我去图书馆了。这个财政教研室就凑合着维持，课也就没法上了。一搞运动你说还怎么上课啊。那个时候半天学习半天运动，没法上课了。教职人员的心理也不稳定，学生也搞运动。

这就是“反胡风”，接着就到了反右运动。1957年，反右就比这“反胡风”规模更大了。让你检举揭发，不认识的人也检举揭发。所以这个学校也就没法办了，我也就离开了这个学校。关于建校的历史到这我也就没得可说了。

访问者：那么反右是不是还波及到您了？

凌大珽：当然波及到了。刚才聊到第一次院系调整，那我给你说说第二次院系调整。第二次院系调整与第一次相差一年。第二次调整也是钱俊瑞同志召开了大会，让财政干校和财经学院合并。当时财政系的许多同志都不愿意到干校来。有一部分教职员去了人民大学。学校财政系、经济系的一部分学生也转到那去了。当时说人民大学将来是一个学术性的机构，对学生都还有些学术上的要求。咱们这个地方就变成了财政干部学校，所以叫“财干学校”。我记不住了，一般口头上是叫“财干校”。这就是第

二次院系调整，所以这里就真正地变成干部学校了，像保险系什么的，就被人民大学拿走了。剩下的就是财政、税务、会计和统计、政治课。各单位成立了党总支，学校变成这么一个学校了。反“右”的时候我不就离开这了么。

访问者：您离开到哪去了？

凌大珽：河北省那边有个茶淀农场，我就到那儿劳动去了。

访问者：为什么呢？是有人说您有什么问题吗？

凌大珽：他们说我是“右派”。

访问者：为什么说您是“右派”？

凌大珽：我的言论中对学校很不满意，因为这学校不是办学的那种姿态，是一种干部训练班那样子。我们这样的人在这儿用不上，也没用处。我对这些制度有好些不满意的地方，尤其是搞运动，搞小报告，啰里啰嗦的。一条马路上都是批判我的标语，不看不成还得看，看了半天没有一个正经问题，都是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都给你安上这些，说你不满意学校制度，这学校是党办的，所以你就是反党。就给你联系到这一地步了，所以我就给算成“右派”了。到了农场干什么？改造思想。怎么改造思想？就是劳动，劳动去了。

访问者：都干什么活？

凌大珽：就是挖荒地啊，挖土啊，挖成沟。挖上下水道啊，就干这个。也没有什么思想教育，也没有什么体格锻炼或者是思想改造的项目，没有，就是整天劳动，劳动完了，吃饭，睡觉。

访问者：您几点起床？

凌大珽：大概六七点钟，天一亮了就起床。

访问者：起床了就劳动？

凌大珽：起床就洗脸、漱嘴、吃早点，吃完饭就劳动。劳动到中午就回来吃午饭、睡觉，下午又去劳动，没意义，对思想也没改造。那就是让你认识劳动创造世界，可是我们弄了半天这个地啊，什么东西也没创造。

访问者：不是挖了下水道吗？

凌大珽：挖水道的目的是为了上下水把这个土给滋润。但是因为那儿是沙荒地啊，没法儿滋润啊。

访问者：那时候您还看书学习吗？

凌大珽：可以看书，可是没时间啊。一劳动回来累得要命，还看什么书啊。

访问者：那什么书都能看吗？

凌大珽：也有带小说的，什么书都让看，也让读报。在那儿的这些人里面不完全是“右派”，也有历史反革命的，也有小偷、流氓，什么都有。

访问者：那刑事犯呢？

凌大珽：刑事犯倒没有。刑事犯在另外一个农场，那个农场是劳改的。这儿就是劳动。

访问者：您在那个农场不光是学校的人，还有社会上的是吧？

凌大珽：是的，也有国民党留下的公务员。什么样的人都有，解放前后银行界的，各个学校的，还有各个机关的，甚至还有公安局的。

访问者：大部分是“右派”？

凌大珽：一部分是“右派”，一部分不是。

访问者：这劳动是多长时间？

凌大珽：那不就是早晨，跟普通上课时间差不多吧，到12点。下午从两点钟到五六点钟，看着天气说话。

访问者：您在那儿劳动了几年？

凌大珽：4年，我是1961年“五一”回来的。

访问者：回来后到哪儿了？

凌大珽：我原来是财政部的干部，就找到了财政部。财政部说：“现在不好给你安排工作。”我说：“那我这生活问题怎么办啊？”财政部说很了解我的，知道我能够写点东西，就把我介绍到商务印书馆或中华书局去吧。怎么个方式介绍的我不知道。反正他们就是通知我到商务印书馆或

中华书局去了。商务印书馆让我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编写缩略语的字典，每完成一部分就拿一次报酬。中华书局呢就是做一些古典的东西比较多了。

访问者：那您当时家里几口人？

凌大珽：家里有3个儿子，就5口人。

访问者：都是等着您挣钱养家？

凌大珽：3个儿子都读书呢，我爱人也没有工作。

访问者：那时候您上商务印书馆或是中华书局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呢？

凌大珽：很难说，工作性质不一样，平均来说吧，一个月六七十块钱。

访问者：那六七十块钱养这家人够花吗？

凌大珽：那时候物价很便宜，什么东西都凭证，所以你有钱也买不到东西。

访问者：您劳动改造的那时候，您爱人还在北京么？

凌大珽：是啊。

访问者：那时候她的生活来源是什么呢？

凌大珽：那时候儿子他们都小。我的爱人也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她就给人整理资料，编点索引什么的。

访问者：那个时候您劳动不挣钱是吗？

凌大珽：我有工资，他们也叫工资，都是18块钱一个月吧。

访问者：这很低的。

凌大珽：很低，这就是劳动所得。

访问者：回来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又呆了多长时间？

凌大珽：一直干到1966年6月。

访问者：5年呢是吧？

凌大珽：“文化大革命”，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一律停业了，文化事业都停了。

访问者：停了您又干嘛呢？

凌大珽：还是劳动，我盖房子。那个时候最多的事儿，说出来你们都觉得可笑，红卫兵到北京来，全国的红卫兵都可以随便跑来跑去。

访问者：我知道。

凌大珽：知道这事？他们来了住哪儿啊，就住在中学、小学的学校里头。吃饭呢？这些学校原来的食堂都不够用了，于是就得把厨房扩大，一扩大就得弄炉灶，于是就把原来的那些灶打毁了，重新造炉灶。我就给他们干这个——修炉灶，这地方没修完那地方又找，来回做这种杂事。

访问者：您是在学校的食堂做这些事是吗？

凌大珽：给学校的食堂做，也不一定是学校，主要还有街道。西城区街道办事处找人，有好些人呢，不只是我一个人。好些人都没工作，一搞“文化大革命”啊全停了，就搞这些玩意，我们就是去跟人家盘炉灶。

访问者：那个能挣钱吗？

凌大珽：能挣钱，一天1块5毛钱。

访问者：那养家够吗？

凌大珽：不够的。我爱人再搞一点别的，画画什么的。

访问者：您爱人会画画？

凌大珽：可以画一点画。当时画是很便宜的，不是几分钱，是几厘钱。因为收画的那些人啊也停业了。所以就是不相干的那点画，卖点画。

访问者：那在哪卖呢？

凌大珽：有绢花厂。

访问者：卖给工厂？

凌大珽：不是，是工厂拿纸来指定你画什么画，让你画，他收走。

访问者：整个这样的日子过了多长时间？

凌大珽：就是1966年至1967年。到1968年的时候，我给一个政协委员做秘书工作，没名义的，就是写信啊写发言稿的。

访问者：您讲点学术上的事吧，就是您研究的那个领域。

凌大珽：你是说在燕京以前的？

访问者：都包括进去。

凌大珽：在燕京的那个很早。我在燕京大学工作，写的东西都发表在院报上。燕京院报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抄了，家里也没有了。后来在财政部工作，我就没有工夫写这些东西了。在财干校我也没法写，要上课，时间很紧张。到复校以后啊，我就没到财经系去了。坦白说吧，我自己觉得耽误了这些年啊，我就不配再担任财政教研室的工作了。自己理论上和学术上的东西都陈旧了。学校就让我上研究所，在研究所我就想再写点东西。但当时我也不在财政部，情形我也不熟悉。那么写些什么呢？从前我也教过财政史，我就写财政史这东西吧。在咱们学校的这个院报、学报上有我写的几篇东西，关于商鞅、王安石的。还有那个管仲，管仲我写得是比较多一点。这些历史人物在财政工作和财政思想上都是有点造诣的。得空的时候我就想写几个税史，也写了个财政史，还有一个好像是酒税，另外还有两三种，就送给财经出版社了。财经出版社说接纳我的稿子，可是得我自己付印刷费。我说我哪有钱给你付印刷费啊。后来出版社说先给我出一本，就出的这个《中国茶税简史》，还有两稿在那儿压下了。出版社说现在外面卖的都是大众的、流行的书，像我这种学术性的、方向又很偏的，没人买。后来我就说你就把稿子给我吧，他就把稿子还我了，所以那两个稿子就没出。学术上我也没什么造诣，就是咱们学报上有一些文章。还有我参加了《中国财政史》这本书的编写。这本书的主编是咱们学校崔敬伯教授，过去财干校时他当过副校长。

访问者：给各个学校整炉灶之后呢？你又干了些什么？

凌大珽：之后呢就是写点东西。实在不行在小报上写点杂文。

访问者：然后一直到复校，1978年回学校？

凌大珽：在这个时期，内蒙古大学让我在北京给他们整理一些特别的资料。我老去的地方是北京图书馆，民族学院图书馆，在这些地方给内蒙古大学写过很多东西。

访问者：您回学校之后是哪年退休的。

凌大珽：1985年吧。

访问者：就是在研究所退休的吧。

凌大珽：是在研究所。

访问者：您再给我们说一下您在税校之前，就是您出生到您到税校这段时间的事情吧。

凌大珽：那就太多了。

访问者：那您就挑主要的说，您出生在哪，您的家乡，您的家庭是什么样的。

凌大珽：我原籍是安徽人，可是我出生在天津，生在华北了。到北京来以后，我主要是在家里读书。

访问者：家里有私塾吗？

凌大珽：有，请了教师。反正都是读中国古书吧，《论语》、《孟子》、《左传》，还有就是世界历史的书，读历史我还有兴趣。后来我就入了跳班，上的交通部办的福伦小学五年级。福伦小学是个很好的学校。我在福伦小学毕业，又跳班跳到后来的平民中学，那个时候叫教会学校，是英国人办的。我从那个中学考到了北平大学华商学院。那里没有财政系，是经济系。1934年，我从那个地方毕业以后就到了北京市政府专搞统计工作。后来我就到庐山去了。五七训练班，是被市政府派过去的。我们是“七·七”事变以后去的，冒着很大的危险，日本兵在丰台那个地方检查，坐火车走是不行的。所以我把证件都扔到了天津，空着手走，所以没检查，一路到了庐山。庐山正好赶上“八·一三”开始被轰炸了，我们就被解散了。我就从庐山这个地方上的南京。到了南京，那里正在拉壮丁守城，也没法呆。我就又坐火车上了上海，在上海搞了点文艺工作。

访问者：那个时候多大年龄？

凌大珽：1937年二十七八岁。从那儿回来就上燕京大学了，在燕京大学做点文史方面的工作。

访问者：一直在燕京大学呆到哪年？

凌大珽：一直呆到太平洋战争起来，是1941年。

访问者：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您到哪儿了？

凌大珽：又回上海了，上海有亲戚。

访问者：就没有工作了？

凌大珽：没工作。那时候上海也很乱的，各个学校也都没法开门。

访问者：您是从上海到的财政部？

凌大珽：从上海回到北京，是1949年了，我在铁道管理学院教书，也给中国大学、华北文法学院上课，还给几个报馆写点文章。你知道1949年各个学院都停办了，但铁道管理学院没停办，就是现在的北京交大。就是在那时候我说的为税收方面提出意见来了。

访问者：就开始酝酿成立税务学校了。

凌大珽：嗯，这就连上了。当时我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想到会成立税收学校，只是对北京市的税收提出点意见而已。

访问者：这么说您对税务学校的成立起码是起到了推动作用的。

二、王万有访谈录



王万有（1930年3月— ）：原中央财金学院党委常委、党委办公室主任。现离休。是中央税务学校第一期学生。

我们学校前身是1949年建立的中央税务学校，当时是建国初期，建立中央税务学是因为全国的解放战争发展很快，解放了许多新的城市，当时我们的财政经济也比较困难，主要的靠税收，需要大批的税收干部，所以为了培养税收干部，中央决定办

这么一所税务学校。这所学校的创办是在建国以前就开始筹备了，那时候可能叫华北税务学校，查档案也许会有这个记载，但是我记得华北税务学校就是中央税务学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我们党在华北地区有华北人民政府，以华北人民政府的基础，因此就以华北的名义创办这个学校。因为等到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就有了我们这个中央政府了，财政部就成立了，税务总局也就成立了，我们就改名为中央税务学校。

中央税务学校在1949年初就开始筹备了，北平和平解放是2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就彻底解放了。解放以后就筹备办这个学校，办一个学校起码得有校舍呀，教师呀，主要是筹备房子吧。到了1949年11月份，正式成立了，我们现在认定的日期是11月6号，也不一定很准确，但是我记得是在11月份开的学，我是这个学校的第一期学员。中央税务学校第一期的学员来源主要是华北大学的学生，当时华北大学的学生毕业以后一个是南下，一个是到军队里去，人民大学要了一部分学生，中央税务学校要了一部分学生，当时我们来的时候一共是400人，华北大学来的学生是400人，那就是中央税务学校的第一期学员。第一期学员还有一部分是税务干部，就是全国税务部门的在职干部。中央税务学校开学以后，一共办了四期，我们那期很短，因为我们在华北大学学习了一段时间，来到中央税务学校主要是学业务。那个时候各个大区都需要税务干部，税务总局开各大区税务局长会议，华北区的、东北区的、华南区的等等这些税务局长都到学校去号召学生毕业后到他们地区，他们需要大量的税务干部。这样的话，我们就学了三个月，1949年11月入学，1950年2月就毕业了。后来学制就延长了，在社会上招收高中毕业生，一共办了四期，学制为一年。到了1950年，财政部又决定筹备中央财政学院，建一个高等学校，因为中央税务学校算一个专科学校。1951年筹备中央财政学院，中央财政学院主要还是建校舍，中央财政学院的校舍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中央税务学校的校舍是在城里，西城区西皇城根22号，现在已

经改成了西皇城根南街45号，中央财政学院筹备时也在那地方开始筹备，建的这个地方是作为将来中央财政学院的校舍，1951年奠基并开始建设，到了1953年，这个地方才初步建成。到了1952年的时候，中央决定进行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这样的话，就把中央财政学院、中央税务学校和原来北大、清华、燕京、辅仁四所高校的财经系科合并成立了一个学校，这个学校的名字就叫中央财经学院。是1952年的暑假开始筹备的，1952年秋季合并开学，叫中央财经学院。

中央税务学校当时的校长是李予昂，李予昂是当时税务总局的局长、财政部的部长助理，他兼任校长。主持工作的副校长是李永江，后来他调走了，换成了张靖，张靖同志担任副校长。李予昂始终兼任校长，很少到学校来，重大的事情来学校，主要的工作由主持工作的副校长来主持。当时的中央财经学院没有任命院长，不知什么原因，有两个副院长，主持全面工作的副院长叫罗青，他当时还是财政部物资局的局长，实际上是兼职也不是专职，他也很少到学校来。主持日常工作的是陈岱孙，后来到北大财政系当主任，他经常在学校里，主要就是管理教学方面的工作。因为当时的学校，建国初期，还沿袭了过去旧学校的三长制，除了院长以外，还有秘书长、总务长、教务长，在过去旧学校里面都是这么设置的，解放初期我们延续了这种制度。当时没有秘书长，秦穆伯同志是总务长，何方明同志是教务长，同时秦穆伯同志还是兼任党的总支书记，还不是党委，因为当时学校党员人数少还不够成立党委的条件。成立的是党总支，他担任的是总支书记，实际工作呢，应该是由陈岱孙同志管理全面工作，他的学术研究方向主要在财政学方面，但是具体的行政工作都是由秦穆伯同志和何方明同志他们来主持。当时主要是学苏联，学苏联学得特呆板，特教条。到了1953年暑期，中央又决定把财经学院撤销了，可能是因为这个学校不好办，那么多的学校合并在一起，人员、学生、专业都非常多，要办这么一个学校也很困难。中央财经学院就把一部分教职工给了人民大学，还有一部分，就给了财政部了，财政部让这些同志成立了中央财政干部学

校，中央财政干部学校的校舍就在这个地方。1953年这个地方已经建起来了，当时建的四个宿舍楼。那个时候的建筑思想还是四合院的一个想法，东西南北四个二层楼组成了一个四合院，以我们升旗的那个地方为中心，这个四合院很大，院子很大，那时候布置得也很好，1954年的时候，《北京日报》用了两个版的篇幅刊登了四合院的全景，在《北京日报》的副刊上，作为高校的一个景观。当时四合院建得挺好的，1953年，就把财经学院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教职工给人大，而学生全部交给人大，另一部分教职工给了财政部，财政部就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当时校舍这个地方还不是我们一家用，是跟人民大学一家一半，一家两个楼，当时有礼堂、食堂，现在的友谊楼也是在那个时候建的，后来财政部给人民大学建了两栋楼，这样他们就把全部的校舍交给我们了，就是我们用的现在这个校舍。中央财经学院的校舍有两部分，校部是在东城区南河沿大街，对着北大的红楼，现在叫做南河沿大街19号，现在还在，但已不是原来那个样子了，已经被好几家给分了，有一部分人民大会堂盖了宿舍，还有一部分是北京市财政学校用了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原来是北京大学的文学院，也叫做北大三院。西皇城根22号那个地方作为中央财经学院的分部，专科在那上课，后来西皇城根22号撤了以后，我们交给国务院了，国务院国家事务管理局接收了，现在已盖成宿舍了，作为国务院的宿舍了。

1953年中央财政干部学校成立以后这一段时期就是干校时期了，任务是培养、提高在职干部，就是县财政局长以上的财政干部。学制也是一年，办了有十来期，培养的学生也不少，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当时主持工作的是秦穆伯，他是副校长，校长都是财政部副部长兼的，胡立教副部长兼过，王绍鳌副部长也兼过，后来贝仲选也兼过，他是财政部部长助理，财政金融学院成立以后他还是院长，1959年担任校长，秦穆伯1953年后就担任副校长，兼党委书记，主要工作由秦穆伯来主持。当时从税务总局调来一个副局长就是崔敬伯，崔敬伯在1957年以前也是副校长了，姜明远

是1959年以后当副校长的。1953年到1960年这一段时间主要是培训在职干部，在这个期间应该说也奠定了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成立的一个基础吧。从教师的成长到教材的建设，当时许多教材都自己编的，因为当时建国初期许多学校都把苏联的教材搬到中国来，实际不符合中国的情况。1953年的时候，陈云同志就提出这个问题，要编写我们自己的教材，按照我们的实际情况，来编写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教材。从那以后，中央财政干部学校的老师们在这个精神指导下，编写各种教材了。这段时间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成立奠定了一个基础。

到了1958年，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和银行干部学校合并，1958年12月1日正式合并的，成立了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它的体制是这样，这个学校由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两家领导，日常工作由财政部管，大事情两家商量。在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的基础上，1960年成立了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成立也是一个偶然的機會。1960年年初，大概是1月10日左右的样子，当时的中央财贸政治部召开了一个财贸系统的高级干部会议，总结1958年以来，就是我国“大跃进”、“公社化”以来，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当时姚依林同志是中央财贸政治部的主任，他在这个会上提出来为了加强财政金融工作需要成立一所财政金融方面的高等学校。姚依林同志他是原来老清华的了，“一二·九”运动的时候就是清华地下党的支部书记。他受过高等教育，对高等学校培养人才方面体会得比较深一些，所以他提出来这个问题。当时秦穆伯同志参加会了，他回来的时候快要下班了，五点多钟了，他找到我说姚依林同志要成立一个财政金融方面的高等学校，我们争取办这所学校，叫我起草一个报告。当时我就连夜起草了一个报告。我当时在党委办公室当秘书，报告不长，因为比较急，我就从两个方面来讲这个问题：一个从大局来讲，全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有一所财政金融方面的高等学校；另一方面就是可能性，我们有这个条件。教师方面、校舍方面，办高等学校的条件都具备。就是又有必要性，又有可能性，不需要国家大量投资，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学校建起来。第二

天我把这个报告给了秦穆伯同志，他当时就召开了党委会，讨论这个报告，当天就把这个报告送出去了，没想到送出去以后过了两个礼拜，批下来了。当时我们想像要办一所高等学校相当困难呀，都没有想到这么快批下来，都出乎大家的意料。成立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不是教育部批准成立的，而是中央财贸政治部批准成立的。中央财贸政治部有这个权利，批准成立一个高等学校。当时毛主席不是号召学习解放军吗，学习解放军，当时财贸、工业、农业各个系统都成立政治部，政治部主任实际上是副总理。

1960年1月23日，这个文件就下来了，财政部通知学校，批下来了。当时我们挺高兴的，成立一个高等学校，这么快就批下来了，批下来之后就遇到一个问题，给教育部打报告，成立了一个学校，要招生啊，1960年暑假就要招生。教育部说招生计划都已经下达了，不可能再给你们扩招。当时强调计划非常（强），学苏联吗，计划就是命令，计划定了在一般情况下不好改动。人民银行总行当时考虑，我们也提出建议，说不行的话，在内部招，就是在财政系统和全国的金融系统招生，不在社会上招生。这样的话财政部和人民银行总行就同意了我们的这个意见，就决定在全国财政系统和金融系统招收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第一期的学生，当时规定的条件呢，就是30岁以内，高中文化程度。当时不经过考试，说实在的，高中文化程度也有点（不一致），高中毕业的，高中未毕业的都有。当时在全国招收了60个人，分两个班，一个财政班，一个金融班，财政班人多，是39个人，金融班人少，21个人，一共是60个人，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成立当年招生60个人，在财政和金融系统内部招的。这是1960年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成立之后的主要工作，就是招生工作。

到了1961年，就遇到全国经济困难时期了，当时中央决定精简城市人口2000万，因为当时养不起，城市里面没粮食，没那么多粮食供应啊，所以中央决定精简城市人口下放。这样的话你就不能招生了，因为招生的话你就要增加城市人口，最后中央决定1961年暂不招生，不可能再给你们扩

招。当时有的同志说“下马”了，实际上我理解当时也不是“下马”，只是暂时停止招生了。保留1960年我们招收的这一部分学生，培养四年到毕业。另外还保留了中央财政干部学校这个名义，这个牌子，实际上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牌子也没有摘，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不叫“下马”。但是教职员大量地精简了，要精简城市人口，我们主要的是要支援边疆，精简一部分同志到边疆去，所以那个时候去了一批同志到新疆去，到青海去，宁夏去，包括炊事员在内学校人员还剩下130多人。但是我们把主要的教学方面的骨干给保留下来了，这些同志成为后来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发展的一个基础。当时精简为了完成任务不得不精简，那个时候学校除了60班（当时没分系了，一个财政班，一个金融班，我们叫它“60班”），还有一个外汇班，外汇班是1960年中国人民银行向教育部要了一个班的名额，专门培养外汇人才，所以这一部分学生呢，得经过高考的，由教育部批的，预留的，就是中央财政学院成立以后呢，这一部分学生就到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来学习了，叫做外汇班，定的学制是四年，后来因为工作需要，没学完四年，银行等部门都需要外汇干部，三年以后就毕业了，就分配工作了。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成立以后，实际上还不止这三个班，还有为别的单位培训的班，比如干训班；还有国防财务班，给部队培训的。财政金融干部学校的学生正赶上1960年吃不饱，浮肿，最后没有学完，都回去了。1960年初就都回去了，实在是没办法了，吃不饱，都浮肿得很厉害。当时粮食定量，城市定量28斤，都是小伙子，根本吃不饱。

1962年，国家经济形势发生好转，当时我们提出来要招生，学校报招生计划，当时教育部同意。1962年开始就在全中国招生了，62级招了300多人，从这一年开始每年都正常招生了。原来学校设计的发展规模就是2000人，因为当时的校舍最多容纳2000人，每年最多招500名学生。1962年招了300多人，1963年招了400多人，1965年招了500多人，这样的话62级、63级、64级、65级四届学生，四届学生将近2000人，这样就达到了学校计划的规模。当时设计的就是2000人的规模，没想那么大，因为当时有一种

说法，就是学校规模太大了不好管理，现在看来不是那么回事，学校没有一定规模不行。

这个期间，学校的工作主要是由秦穆伯同志主持，1962年的时候，财政部曾任命他为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的校长，但是在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还是副院长，两块牌子一套机构。到了1964年，为了加强学校的工作，财政部就派陈如龙同志到学校工作。1964年暑期，财政部派陈如龙同志到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专职任院长、党委书记，另外派了一个副书记，张建皓同志。原来的学校领导人就开始下去搞“四清”去了，秦穆伯同志、姜明远都带队下去搞“四清”了，实际工作就由陈如龙同志和张建皓同志来管了。陈如龙同志到学校以后呢，他后来跟我说当时财政部让他来，既然来了，就要为学校办实事，学校当时各个方面需要加强一下。这样他就向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要求要给学校拨一部分基建费。在基本建设方面，校舍方面改善一下。当时教职工宿舍很困难，1953年到1964年12年期间没有什么基建项目，属于收缩那么一个情况。陈如龙提出这个建议，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就同意了。1964年时经济也比较困难，当时困难时期刚过，刚刚开始好转，当时学校的基建经费也比较困难，人民银行就决定从行长基金里拨了一部分钱给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当时就建了3个宿舍楼，就是现在的1、2、3号楼。那是陈如龙同志来的时候开始建的，1965年开始施工，1966年建成了。还建了一个办公楼，现在改成学生宿舍了。一个办公楼，3个宿舍楼，1965年开始建，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就建成了。另外准备再建几个项目，一个图书馆，一个留学生楼，地基都挖好了，1965年就开始挖地基了，图书馆地基也挖了，留学生楼也挖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停建了，地基也毁了，整个都填了。

从学校的发展来说，1960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这段时期在学校历史上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期，发展比较快的时期。在学校的校舍建设方面，在教师的培养方面，在学生的培养方面，都作出了很大的成绩。赶上“文化大革命”这一段，十年缺人才，十年断档，过去的62

级、63级、64级、甚至是65级的学生，在各个工作岗位上都得到了重用吧。这一时期在教材建设、教师培养、培养学生这些方面，是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应该说是我们学校发展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吧。是第一个黄金时期。

当然不是说干校那一段没有成绩，干校那一段是干校那一段，培养在职干部，为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打下了基础，比如教材建设，很多教材到了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时候都用的是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的，实际上都用的那个时候的教材。后来当然慢慢发展了，自己编了一些教材。

后来就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了，“文化大革命”十年，这十年当中，学校停课，到了1969年，不是有“林彪的一号令”吗，战备疏散，这样学校全部教职工加上65级的学生都到了河南去了。河南的淮滨县，分散的四五个点吧，一个学校都放下了，学生也都走了，校舍也都腾出来了，北京市一轻局看到这个机会了，他就向国务院报告，要这个校舍。当时北京市没有烟叶厂，要办个烟厂，正好有咱们学校的校舍可以用。因为一轻局有几个干部住在咱们学校里面，知道这个情况，赶快向北京市报告，向国务院报告，很快就批准了，把校舍给了烟厂了。

我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就撤销了。真正地说“下马”就是这一次，其他那几次都是名义上“下马”了，实际上还是在前进当中。由于国家形势的发展，暂时的困难，暂时停止招生，这么个情况。实际上真正“下马”的就是“文化大革命”这一次，那些都是一些过渡阶段，中央财政学院到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到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到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还是逐步发展的，不是“下马”的问题。

下面讲复校问题吧。“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呢，财政部就考虑学校还得恢复，这样1978年初财政部向国务院写了个报告，要恢复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这个报告很快国务院就批准了，我看过批件，当时有十几个副总理都划圈了，同意。批的文件上说，在原址上复校。1978年3月16日，批下来的，国务院1978年165号文件，批准恢复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批准恢

复以后呢，就遇到很多问题，最困难的问题就是校舍的问题。恢复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在什么地方恢复呢？国务院批的是在原址，这样的话就要跟烟厂打交道了，烟厂得搬家，把校舍腾出来。复校以后，这是我校经历的最困难的一个阶段。困难到什么程度呢？当时复校的时候只有一间房子，在友谊楼，烟厂给了一间房子，一部电话，友谊楼的二层，现在的校医院，原来叫友谊楼，因为原来越南留学生在那个楼住过，因此得名为友谊楼。就在二楼有一间房子，一部电话，当时就筹备复校，当时的困难是相当大的。具体就不用说了，既没教师，又没校舍，所以全国招兵买马，要求烟厂给腾校舍，主要的任务就是这个。因为1978年复校以后，不招生，还是等于虚设呀，所以说必须招生，有了学生，才有了学校，所以当时在很困难的情况下还是决定招生。因此在1978年暑期就开始招生，招生当时没有宿舍，就在北京招，78级的就在北京招的学生。当时没有教室，临时在四合院里建了一些木板房，所以当时学生也好，教职工也好都非常困难。后来不是要调干部吗，这个时候财政部报请中央给批了进京名额，批了200人的进京名额，因为当时来北京办不了户口也不行呀！在北京找这么多人呀，找不来了，特别是教师，所以尽量把原来学校的教师找回来，这样就调了一些教师进来。

持续了十年，当然困难是逐步改善了，逐步有了一些资金又建了些房子，原来不是1、2、3号宿舍楼吗，后来又建了个4、5号楼，再后来又建了个6号楼，自己建了三个宿舍楼，这样才有地方住，一部分教师才解决了住房问题。开始困难到什么程度？从辽宁财经学院调回来的教师很多同志都没地方住呀，住在周围农民的家里，在那租房子，而且好几家都住在澡堂子里面。

当时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烟厂搬家，还是财院新建，这个问题看起来简单说起来就比较复杂了。有一部分同志认为自己再建一个校舍可能更好一些，但是当时多数同志不这样认为，因为当时新建校舍的话，没有根据地呀，学校是被烟厂占了的，那个时候新建校舍和现在在沙河建校可根本

不一样啊，因为那个时候要另建校舍就等于说要放弃这个校舍了，烟厂就不搬了，给你另建成校舍。另建校舍给你批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建，在建设当中遇到哪些问题是很难预料的。这样的话就放弃根据地了，把这块地就丢了。现在在沙河新建校舍是另外一事情，因为现在有根据地，有这块根据地作为基础。因为烟厂是北京市的一个交税大户，北京市较重视烟厂，所以这个谈判就相当困难了，关于谁走的问题就谈了很长时间，定不下来。我们坚持在原址复校，北京市说我们给你另找个地方，另建不更好吗，所以就谁走的问题，争论了好几年。

复校以后戎子和是院长，主持工作的副院长是赵秀山和姜明远。参加房子谈判的北京市代表是张百发副市长，财政部代表是陈如龙副部长，因为当时陈如龙同志是主管学校的，他出面跟北京市谈房子问题。戎子和同志调来以后呢，他说好解决，他跑了几个地方，跑了国务院，跑了国家事务管理局，都不行，最后也没谈成。没办法，烟厂轰轰烈烈的，学生没法上课呀，学生上街、罢课，结果就闹得大了，去请愿。这样的话呢，新华社也了解这个情况，新华社写了一个内参，报给中央，当时中央主持工作的是胡耀邦同志。胡耀邦同志看了这个报告之后就批了，说烟厂应该搬家。从这以后，烟厂才说同意搬家，这个问题扯了两三年，到1981年，谁走的问题才定下来。当时在和烟厂争这个校舍的问题上呢，舆论界是支持我们的，包括《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发表了很多长篇文章，烟厂应该搬家，教育应该发展，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应该在原地恢复。《北京日报》在我们复校不久，就在第一版登了一个消息，中央财政金融学校在原址复校，因为那个时候我写了一篇稿子，通过我们原来学校的一个教师，在第一版上登出来了。这个时间大概是在1978年的六七月份。

烟厂1988年才彻底搬走，抗战八年，我们校舍却要了十年。从学校的发展来讲，十年时间当然是影响了学校的发展的，校舍没有，规模就不能扩大，规模不能扩大，对教师的培养各个方面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现在看来坚持在原址复校不动我觉得还是上策，当然这里面也有很

多传说，有的同志说人家北京市给你那么多好的条件，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在谈判当中北京市确实提出来玉渊潭这个地方大概是五六十亩地吧，我没去看过，有的同志去看过。他说你们可以在那建，看了以后呢，当时是一个垃圾填埋场，没办法，五六十亩地建一个学校。现在我们是200多亩地这个地方，虽然是周边被人侵蚀了一些去，起码还有200亩地吧，五六十亩地怎么能建起一个学校呢？当时有这个说法，当时财政部有些副部长也这么考虑，财院也可以重建嘛。后来财政部还是张劲夫同志拍的板，张劲夫当时是财政部部长，他说就在原址复校，争取烟厂搬家。这样1988年烟厂彻底搬走以后，学校才重新得到恢复吧。在这个问题上，王丙乾部长，当时王丙乾是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了，对财金学院的校舍问题也非常重视，当时他亲自给批了一部分钱，改善学校的校舍。用这部分钱呢，学校就扩建了校舍，盖了一部分教学楼，这样这个学校就开始发展了，一直到现在。

三、俞天一访谈录



俞天一（1927年8月— ）：原中央财金学院金融系主任、教授。后调任中国金融学院副院长。现退休。

访问者：您能先谈一下您当时是怎么样来到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吗？当时是个什么情况？

俞天一：我到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当时还不叫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我是1959年的2月份来的，是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调过来的。那个时候我们这里叫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就是这个财政部的干部学校同人民银行总行的干部学校合并，合并以后不久我就调过来了。我原来在人民银行总

行商业信贷局，当时是当科长，后来1958年的“大跃进”，我到下面劳动锻炼。劳动锻炼回来以后呢，因为这里成立了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我就调到这来了，调这来搞教学。说实话来的时候很胆怯，哈哈，没教过书，我当过学生，没教过书，所以也不知道能不能干得好，很担心的。1959年刚来的这一年呢没有搞教学，也没招生，连干部……干训班也没招生。干什么了？那个时候整顿人民公社，1958年不成立人民公社吗，人民公社应该怎么搞大家都没有底儿，因此有一些制度上啊什么的都比较混乱，所以我们来了以后呢，就去参加整社。那个时候就叫整社。我在北京的丰台区，叫花乡的一个地方参加整社。那个时候带我们去的是金融教研室主任张焕彩，也是人民银行总行调来的，他比我来得早一些。我们在那边整社，那一年总的来说没有搞教学。整社回来1958年呢就搞反“右倾”。因为1958年搞“大跃进”的时候啊，好多事情做得过头了，什么深翻地啊，要翻得一米深啊，秋收的时候说“大家都不用收了，大家深翻地去”，老乡说我不收我明年怎么办啊，是不是啊。所以有的地方没有很好地搞秋收。当时有一些问题大家是有看法的。这些看法呢主要就是说不搞秋收你明年怎么过啊，当地干部就说：“唉，不要紧，明年有的是粮食，深翻地以后粮食多着了。”呵呵，又是大炼钢铁啊，等等，就像这些情况，大家都有一些意见。有意见就是“右”啊，所以就反“右倾”。1959年反“右倾”，整个一年基本就是搞运动。不是整社就是反“右倾”啊，基本这一年没有搞业务，也没搞教学，也没学生。

到1960年初吧，就有干训班了。当时都是在职干部来培训。在职干部培训的时候呢，我们这些教师啊也没有搞教学，因为都是请这个财政部啊请总行的这些领导来给大家讲课，我们做一些辅导，做一些管理工作。大概就是这种情况。

1960年第一次招本科生，第一次招来的60级是什么本科生呢，是在职干部，是年轻的在职干部，但是有的年纪也比较大了，有的年龄当时跟我差不多，哈哈。在职干部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很好，有的是高中

毕业的。到1961年初，招了一个外汇班，那都是年轻学生，但都是在银行工作的，都是高中毕业的，叫外汇班。当时三年是大专，后来承认他们是本科了。1960年的时候发生了当时的三年经济困难，1959年已经开始了。1959年经济开始比较困难了，到1960年经济相当困难，大家连饭都吃不饱了，这个大概你们都知道吧，1959年到1962年这一段，咱们的经济是非常困难的。当时虽有天灾，但是许多也是由于我们政策上不适当造成的。我记得当时刘少奇同志讲过，这个有天灾也有人祸，而且人祸是比较主要的。当时1958年是浮夸啊，做得过头了。所以在1960年开始招第一批本科生，到1961年就停止招生了，为什么停止招生，因为经济困难，连吃饱饭都困难，大家也都浮肿了，当时作为老师、作为干部，还有一些补助，什么补助呢，食物补助，13级以上大概一个月有两斤肉、两斤鸡蛋。我是16级，就补助两斤黄豆、两斤白糖，所以我们叫“糖豆干部”，再高一些13级以上就叫“肉蛋干部”，大家戏称啊。所以1961年就没有招生。1962年情况有所好转，正式恢复招生，因为最困难的是1959—1961年，这三年是最困难的，1962年呢，经济有所恢复。1962年招的都是高中毕业的，就是按照现在的这种形式来招生了，第一届真正的本科生是1962年开始招收的，是62级。当时三个系，财政系，金融系，会计系，每个系大概是100个人，两个班。我开始教学是从60级开始的，62级我和他们的接触是最多的，李金华、钱中涛啊这些都是62级的。我开始的时候是教货币信用学的，在60级我就给他们讲货币信用学的一部分。当时货币信用学是分三大块，货币、信用、银行。我是金融系的，是信贷组的组长。我给他们讲课开始讲货币信用学的时候，我讲银行，王佩真老师可能你们都知道，她讲货币，已经过世的张玉文老师讲信用。那个时候的信贷课叫信贷组织与计算，这个名称是从苏联翻过来的，当时苏联就叫这个名称，我们也叫这个名称。我讲这个信贷课，还要编教材，因为没有教材。从中央财经大学来讲，我们值得自豪的就是金融专业，金融系，我们全国是第一个，首创，过去没有。人民大学有财政系，有一部分呢也学金融，但是叫金融系的当

时只有我们学校，就是从我们这里开始的，有金融系。其他学校都没有这个系，这个专业，一般的我们就是边写教材边讲课，很忙很紧张的。我们编教材，写一章去校印刷厂马上去印，发给学生，实际上还只是一种讲义，还不是正式教材，教材一下弄不出来啊，所以我基本上是写一章讲一章，白天黑夜的这么忙活。当时来了几个其他学校毕业的学生，还不是专学金融的，这些个学生呢后来当助教。我很紧张，紧张在什么地方呢，这些助教他也没有学过金融专业的课程，因为其他院校没有这个专业，所以他们虽然是助教去听了我的课以后去做辅导，做辅导时学生有问题叫他们回答他们也回答不上来，所以他们把问题带回来，晚上我把他们一块找来，看有什么问题，什么问题你们回答了，什么问题没有回答，回答不了，那么我还得给他们讲一遍，然后他们回去再给学生去辅导去，去讲。所以很紧张。

访问者：听说您当时还在办公室搭过行军床。

俞天一：不是行军床，那是正式的床，木头床。我就在办公室住，办公室离我的家只有不到30米，我们就在南楼办公，南楼出去隔壁就是我们家属楼，从办公室走到我家也不过30米，我平常是不回家的，没有时间回家，经常晚上都搞到一两点钟，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要准备去讲课了，时间很紧迫。所以根本就不回家了，就是那么近的路我都没时间回家。家里就撂给我爱人，小孩就在我们学校的幼儿园，这里有个幼儿园。幼儿园晚上还得接回去，当时是日托。就是这样，相当的紧张，人手也少，后来慢慢来一些人也是比较生疏，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毕业生，他们没有经过银行实习工作，银行实习工作怎么回事他们都不清楚，而且一个困难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银行的做法都是在不断的变化。当时我们的主流是学习苏联，而且是计划经济那个时候啊，我们首要的东西都是向苏联学习，一切按照苏联来。我在总行的时候设计一些规章制度啊，写完了以后我都要去请教苏联专家，这样行不行那样行不行。因为当时周总理有指示啊，一定要尊重苏联专家。周总理对苏联专家是很重视的，因为我们没有经验，

人家1917年革命成功以后，已经很有经验了，特别是我们计划经济都要按照苏联的模式来做。曾经有一次，我在总行的时候要设计一个叫商品流通贷款的一个制度。当时有苏联翻译过来的东西啊，我也念过一点俄文，但是学得不好，看不懂，要看人家的翻译，人家翻译得也不准确，翻译的东西真是看不懂，得琢磨。后来就按照我们自己的理解写了一个贷款办法，草稿草案发下去，下面都有意见，这太繁杂了，后来就没用。实际上苏联来的东西就是繁杂的，就是这样。到这里来以后有一段，工作得紧赶慢赶，62级我除了给他们讲两门课的大部分，一门课是银行部分，然后讲信贷课，讲信贷与计算组织。最后这个班的毕业实习，也是我带着去的，在武汉的银行。毕业论文呢基本上也都是我看的。62级我几乎是全程跟着他们。金融63级金融65级我都给他们讲课。1966年就“文化大革命”了。金融62级呢是按照教学计划全部学完了的，63级、64级、65级呢都没有学完，“文化大革命”了，课就停了。

访问者：您看62级您又讲课、又带着实习、又辅导毕业论文，应该是说这个班是您特别熟悉的一个班。

俞天一：嗯，这个班是我比较熟悉的。

访问者：而且这个班好像现在在社会上都已经是中坚力量，金融界中坚力量。

俞天一：嗯，现在基本上都退休了吧。就是李金华同志还在当政协副主席，是不是，其他基本上可能都退休了，因为中央还要用他，还要他发挥作用，而且他呢在社会上影响也比较大，他是当审计署审计长的时候工作得很好，李金华当时就是班长，戴凤举是当时他们年级的党支部书记，刘春阳刘老师是书记，杨大亮呢也是班长。因为他们不同班嘛。杨大亮同志最后当什么了我不清楚了，曾经是江苏南通市的市长。戴凤举是再保险公司的总经理，后来又当过什么我也不太清楚了，因为长时间没有联系了，他们忙他们的，我已经退休了。

访问者：他们班之所以能出这么多人才，社会影响力这么大，您作为

他们的老师觉得这其中有哪些原因呢？

俞天一：我觉得有那么几条啊，一个是那时候，大家革命的意识比较浓，这个应该肯定，当时的环境啊，大家要努力参加革命、做好工作这个意识是相当浓的，学生们表现都挺好。当时都很苦啊，学生连个暖瓶都没有啊，就是打个大铁壶。衣服也都穿的很旧，大部分都是拿补助的，大概是一个月12块钱吧，连吃饭，一共12块钱。有的12块钱连买衣服都不行，穿补丁衣服的也有的是，当时很艰苦。那个时候风气比较好，虽然很艰苦但都很努力，这个是学生。我们的教学呢，也比较注意政治，有政治辅导员，像刘春阳老师啊，他家也在这里，住在班上，晚上也是跟同学一块，有什么事啊跟他谈啊，谈谈心啊做做工作。所以这个班的班干部啊凝聚力非常好，可以把班里的同学都凝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几个班干部在这方面是比较突出的，凝聚力很强。这个班上干部一号召，大家就去做，该做什么做什么，风气很正，革命意识很强。我们教学的时候也注意这个，比如说我讲信贷课吧，我特别强调，国家利益是第一的，企业不管你怎么做，国家利益必须是第一的。另外，国家的计划是首要的，按照国家计划办事，国家计划定下来，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当然现在看起来这个方法不一定多对啊，因为什么呢？国家计划也是人编出来的，不会像市场那么活跃，计划经济它是比较死的，我今天叫你做这么个东西你就做这么个东西，比如国家说要做一个咱们家庭用的电表，国家定了做什么样的电表你就做什么样的电表，有新的发明也不行，有些电表可以改进，改进也不行，这些问题都会有的。所以国家完全的计划经济虽有很多好处也有很多缺点，为什么我们现在不完全搞国家计划，因为那样按国家计划，动不动就很死。现在的商品是多样化的，今天出这个明天出那个，按照国家计划来就不行啊，那很死，那都是规定好的，要改进得先申报，改变计划以后你才能改，否则不能改。但是有一条，国家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人们的思想也是这样，党号召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国家计划规定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就是这种情况。

访问者：您觉得您教的课程内容，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就是以国家利益为重吧。

俞天一：国家利益为重，大家至少有一条呗，就是在做工作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要按国家的利益出发，我在教学上所有的内容里都要贯彻这种精神。去检查企业的生产情况也好，资金使用情况也好，看它使用得合理不合理，用什么来衡量，并不是企业赚钱多就一定合理，而是你对国家有没有好处，对国家计划能不能遵守，以此为标准。当然这个标准也不是没有缺点，实际上按照国家计划做，有时候人家有新的发明创造，可能受到一些压抑，可能不好做，没法做。有时候要搞个新产品，希望借点贷款，那银行就不借，你计划里没有，就是这样。因为这是从苏联学来的，苏联有一条，计划就是命令，我在学习的时候也强调这一条，这句话在我的印象里是很深的。我在人民银行总行也是这样，下级银行报来的东西，我来看，第一个我看你是不是完成了计划，是不是执行了计划，评价你的工作好坏，我首先看这一条，这是当时的情况所决定的。

访问者：在您看来，当时金融系里的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关系怎么样？

俞天一：学生和老师的关系还是蛮好的，学生对老师很尊重。

访问者：当时对这个班里的学生谁的印象比较深？

俞天一：对62级那个班来讲，我觉得没有什么感觉不好的同学，这是我总体的感觉。学习不好的基本上没有，在我记忆里没有这样的人。整个班整个年级来讲我觉得都很好。当然有的活泼一些，吹吹打打的，玩一玩闹一闹的，这个有，这个不是问题，有的比较活跃，搞体育活动啊，唱唱歌啊，搞搞乐器啊，我们四合院中间有一个花池子，这个花池里边有时候没有水，大家就在里面又吹又打的，搞乐器，就去玩。

访问者：李金华是这样的学生吗？

俞天一：李金华不是这样的学生，李金华是非常庄重的一个人。李金华、戴凤举这些人都比较稳当，不是经常闹着玩的。学习上很认真，工作也很认真的，他为什么有凝聚力啊？他就是什么都自己带头做，而且做

得很认真。不仅李金华，像我刚才说的戴凤举这些人都挺好，当时像戴凤举这样的人在我脑子里印象是很深的，工作很认真，学习也很好，一点不浮夸，在同学之间的关系也很好，我刚才说了，他们这些人啊，能够把同学凝聚起来，他们这几个同学是他们班上的核心，是班上的核心人物。这个印象比较深的。

访问者：您刚才谈了第一点就是说政治方面大家觉悟比较高，这是他们成功的一条原因。

俞天一：还有一条，他们毕业以后啊基本上都分配到农村和边疆去了，大部分不在北京，基本上也不在银行。学财政的不在财政，学银行的不在银行。毕业以后都到农村去劳动锻炼。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啊这些人基本上都是默默无闻的。到什么时候呢？后来到改革开放，这个时候开始市场、金融的重要性就表现出来了，这个时候就要找金融的人才。找金融人才呢，找来找去一发现，呦，中央财金学院有金融专业的一些学生，各个省市基本上把这些人都找出来了，找出来就是去搞金融啊财政啊。戴相龙同志是学会计的，金人庆这些都是财政的，他们是63级的。就把这些人都找出来，尽量用他们，一个是他们学的是这个专业，另外一个是在农村锻炼了比较长时间，基本都在基层啊。所以把这些人就找出来了，找出来之后加以重用。重用以后效果还都不错，因为他们这个专业都是学过的。这些人又年轻，又懂得专业，又经过农村的锻炼，而且原来教学啊政治这方面也比较重视。所以一般的作风也比较正派。当然啦，个别出问题也是有啊，这个我也听说了一些，但是毕竟是个别的，多数都是表现很不错的，所以后来大部分都得到重用。这个年级得到重用的人比例比较大，据说好像是有70%是司局级以上干部，我当时没统计，70%这个比例是相当大的。一个是主观因素，他们个人的主观因素，他们整个的经历；另一个是客观条件的变化，没有改革开放，金融的发展，这些人可能也得不到重用。我们的经济改革开放发展主客观双方面的因素都有，并非完全是主观努力的结果、是教学的成果，不能这么说。教学成果也有，个人努力也

很重要，另外呢客观形势的变化也是很大的因素。因为他们学的东西用得上啊，否则有的东西用不上啊。这样的话这部分人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大量地被使用，比如说农村的弄到城里来，在基层的提拔到上边来。

访问者：那您现在回头来看，您们这些老师们对他们的教育有什么成功的地方？有什么值得现在借鉴的地方？

俞天一：老师们在那个时期是很努力的，像我这样的吧，别人当时有的是教学经验，我刚来的时候没有教学经验，但是我自己感觉到我的优势是，我干过业务工作，干过基层的银行工作也干过中央银行工作，从基层的具体操作到领导行的这些业务上的东西啊我都比较熟悉。我觉得熟悉业务对于教师来讲很重要，特别是讲业务课的，甚至于包括专业理论课的这些教师。我是希望将来的老师经常到业务部门去，多了解业务部门的实际操作，实际问题，这一点很有用。我其他没有什么长处，只是我对业务还比较熟悉，有这么个经历。所以我讲课讲出去的东西比较具体，讲到理论的时候有具体的例子给他们讲，所以同学一般的对我讲课还是比较感兴趣的。这个也许是我自己的估计啊，哈哈。而且我举的例子都是总行来的，我经常去总行，人民银行，北京分行，有空就到银行去。我是从人民银行总行出来的啊，人比较熟悉，所以到银行去我是比较有条件的。后来我当系主任的时候，希望一些老师能经常到实际部门去，但确实有一些老师不愿意去的，就在家坐着，家里坐着翻一些书啊。我说你们要去啊，我可以给你们介绍，有的人就不愿意去，就不去，结果讲课的效果很不好。特别是讲业务课，你不到实际部门去不行，这是我的体会。我有时候讲课呢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同学们都很喜欢听，一听就明白了。

访问者：我们学校后来被撤销好像是上边有指示，您能给我们说一说那一段学校、学生和老师的情况吗？

俞天一：我们学校撤销是什么情况呢？1966年不“文化大革命”么，刚开始革命是5月份，“五·一六”通知开始的，5月16日，这个时候呢学生的论文基本上快写完了，所有毕业论文我也都看过了，所以62级的学生

基本上是正式学完了四年，就是比较完整的学完了四年，他们的学业基本上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到后来全部停课了，1965年刚入学的上了不到一年的课，就停课了，大家都搞“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我就不讲了，因为这个一讲题目太大了。学校是什么时候撤销的呢？“文化大革命”1966年一直到1969年，打砸抢什么都有，学校里两大派，对打。我们那个大烟囱，上面是喇叭，房顶上都是喇叭，这种事情都过去了。大家也没心思上课了，当时的政治气氛就是这样，这好像是毛主席讲过的，原话我记不清了，反正就是这个意思，“文化大革命”就是主课，都搞“文化大革命”。一直到1969年，我们就到五七干校去了，为什么到五七干校去呢，毛主席讲的，前面后面的话我都记不住了，就是说理工科院校还是要办的，但是我在文件上没有看见过文科院校不要办了，这句话没有，但是言外之意，大家都领会了，文科院校就不用办了。所以包括人民大学都停办了，都撤销了。我们财经类院校中没有被撤销的有大连的辽宁财经学院，因为当时省里主管财贸的领导干部坚持，就不能撤，但是学校也不能上课，他们怎么办呢？教师就到各个地方去办班，就是给银行这些干部办班，给他们上理论课，这样才勉强维持下来了。还有一所院校，湖北财经学院，降格为大专，就这两所院校基本上还保持着，像我们这些院校就撤销了。1969年我们下去到五七干校以后，大家就劳动，种地啊，养猪啊，干农活吧。学生们去劳动，老师也劳动，我们那个姜明远副院长，老同志，他去养猪了。

我干什么呢，我当司务长，管伙食。我们自己宰猪啊买菜啊做饭啊，做饭的都是老师和学生，老师有的是烧火的，学生年轻揉馒头啊什么的，学生干得都是挺好的，干得挺努力的。我当司务长呢当得还算可以，因为有个比较，几个连嘛，我们这个连花钱是最省的，而且花钱省吧还比别人吃得好，最后粮票还有剩余，我们那时候凭粮票买粮食啊，粮票还有剩余。

访问者：这就是金融教授当司务长的好处，哈哈。

俞天一：当时我们的老师也很辛苦，有的老师烧火，现在有个90岁的老师当时就是火头军，烧火的，叫王炳文。现在我们还经常有来往。后来到淮滨县集中，集训了一段时间以后，学生就分配了。学生走以后有一段时间我在那边搞运动。因为当时有个所谓“五·一六”黑集团，到最后也没有这个东西，但当时抓“五·一六”抓得很厉害。当时军宣队在那个地方，学生分配毕业以后呢，军宣队把我找去一块搞调查去了，我跟军宣队的队长到西北啊什么的去调查，实际上最后调查结果也没有什么“五·一六”，实际上所谓的“五·一六”分子都不是。到1971年的7月份左右，我们就要分配了，我就到辽宁财经学院去了。辽宁财经学院要去了34个老师，我老伴跟我一块走的。到大连以后，我开始还是搞运动，也查“五·一六”，那边也在查，全国性的查啊。那个时候是工宣队，不是军宣队，它那边是工宣队，工人师傅。我到那边又去搞了一段运动。搞完以后，基本上定案也没有什么“五·一六”，那这个事情后来都定下来了，给有些打击错了的人平了反。

访问者：那是什麼情况下又回中财的？

俞天一：1976年打倒“四人帮”，大家都非常高兴。说实话我一辈子为国家的大事高兴，一个是日本人投降，日本人投降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真的是从里到外地高兴；一个是打倒“四人帮”，也是从里到外高兴。我那个时候在大连。到1978年，咱们中央财金学院决定复校，我是1978年的11月末回来的，我跟我老伴一块回来的。我老伴本来是电力学院的，回来以后就到这来了。1978年11月末回到这，回到这也没有房子，房子被烟厂给占了。我们回来的时候所有的房子，都是烟厂占着，我们没有地方。最后给我们一个第一教室，就是现在校医院旁边一个四四方方的房子，当时叫第一教室，这个四方的教室可以坐150个学生。我给63级，65级上课都是在那个教室上的，因为三个班一块上要坐150个人，都在那个屋子上的。回来复校的时候很艰苦，烟厂不给房子，房子不腾出来，我回来的时候住在澡堂子里边，隔了一个地方，墙全是湿的。我住的房子是

六七平方米吧，第二天起床被子都是湿的，被子褥子翻起来以后里面都是湿的，拍拍都是有水啊。没地方住，烟厂不让，不肯走。我们学生在什么地方上课呢，1978年复校招生以后，已经很晚了，78级就是在第二年的春季才正式入学，已经晚了半年了。没有教室怎么办，就在四合院的中间，搭临时的工棚，像现在的防震棚似的，一个个板房子，就在那里上课。姜明远院长，复校的时候他来主持工作，他办公就是小凳子一坐，包往前面一垫就开始办公了。我们也没有地方备课。刚回来的时候还没有我的课，我就去做了一些调查，就是调查过去我们中财院毕业的学生大家的评价怎么样，我们的教学效果怎么样。我们派了四五个小组出去，我带了一个小组去跑了几个省，出去以后，回来感觉评价还不错，就是出去的学生都挺好，太坏的反映没有，说他们学的东西比较务实，最近我也听到一些，就是中财大出去的学生，出去比较得用。也许咱们中财有这种传统吧，比较得用。我的儿媳妇就在银行，银行有好多咱们中财出去的学生，在她的手下工作，她说中财来的学生都不错，可能这是我们的传统吧，比较务实。后来给我一间房子，在友谊楼三楼。但是那个房间住着相当受罪，受什么罪呢？就是我们现在校医院外面不是有一排平房嘛，里边有大油桶，很大的两个油桶，这个油啊散发出一股苯的味道，很浓，哎呀简直在房间里呆不住，我们把窗户都关上也不行，有的人就到外面去租房子住了。所以当时我们跟烟厂闹矛盾闹得很厉害，学生去请愿，都受不了，它就是坚决不想搬。市里曾经提议让我们另外找地方，我们姜院长就是坚决不同意，说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我们这个学校本来就不应该撤，我们现在回来了应该把这个地方腾给我们。当然他们进来的时候也是经过同意的，也不是随便搬过来的，因为当时整个政策就是学校不办了。我们想在原地复校，最后坚持下来以后财政部给了烟厂不少钱，最后他们就搬到东郊去了，那一段相当艰苦。复校以后呢，我们又重新开始编教材，因为几年都没上课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我到1978年回来大概十几年，就断档了。回来以后就重新编写教材，了解情况，重来。因为在辽财没有搞教学，搞了

一段运动以后我就到了苏联经济研究所，这个是辽宁省里定的，他说我们这个地方离苏联比较近，比较了解，搞苏联经济，指定辽宁财经学院搞了个苏联经济研究所，我当时当副所长。我们搞苏联经济研究，当时也写了一些东西，也写了一些书，在辽宁就出版了，最后一个很遗憾的书我没出，就是我写的《苏联国民经济军事化》这么一本书，找了很多材料，还没有完，还要修改，我就回北京了。1978年在原地复校，当然物质条件很艰苦，但是大家还是在艰苦的环境中慢慢奋斗，为复校创造更好的条件作努力。当时我回来的时候是金融系副主任，张玉文老师是系主任，后来她退休以后我才担任金融系系主任。

访问者：那么您在中财大做了这么多年的老师，您看着金融系和中财慢慢的发展，您有什么感想？

俞天一：那当然是很高兴了，中财的发展我心里是高兴的，我希望中财越搞越好，毕竟是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是有感情的。特别是现在有一些学校的领导，像王广谦校长啊，那都是我的学生，你们做好了我心里当然高兴。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校园范围太小了一点，现在不是在沙河建新校嘛，我觉得搞得挺好，挺不错的，发展得也很好，我是希望中财能够越搞越好，这是我的心里话。

访问者：您作为一个老教师，现在我们中财有这么多学生，您有没有想对他们说的话？

俞天一：我是这样觉得，这个金融啊，对整个经济的影响是相当大的。确实是现在对我来讲，搞金融还要从全局出发，不能把金融看成一个孤独的企业，金融搞得好坏，是影响全局的，在金融方面，从理论到实际，一定要从全局出发去考虑的。现在学生也这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是这样，那个金融一弄不好影响全局，所以大家还是要有一个全局观念，搞金融、搞财政都要有全局观念，咱们是以财政金融为主的，因为这是老底子啊。你这个金融搞不好是影响全局的，所以有些东西不能仅从一个企业的角度看，比如说一个银行自己搞好就行了，那是不行的。财政金融这两

个系特色就是这样，不是搞微观经济的，它基本上就是宏观的东西，财政金融基本上是要考虑宏观的，从宏观的角度考虑你应该怎么做。搞金融搞财政一定要考虑全局，这是我干了一辈子金融的人的体会。所以希望同学们也要有这种想法，在思想上也要有这种准备，不要光考虑我这个企业搞好了就行了，你这个银行赚钱最多，对国民经济不利也是不行的。当然，赚钱多也可能是经济好的一种表现，但是不完全是这样。

四、钱中涛访谈录



钱中涛（1943年9月— ）：原中央财金学院副院长，后调任财政部农业税征收管理局局长、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行长。

访问者：您是什么时候到中财的？

钱中涛：那就早啦。我是1962年考大学的时候，考到咱们中央财金学院的。

访问者：那时候学的是什么专业？

钱中涛：金融专业。那个时候全国还没有几个高校有金融专业。为什么在我们国家的银行界、金融界有很多中财的学生呢？这就是因为当时在全国很多高等院校里很少有开设金融专业的。从1962年开始，我们是中财院第一批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的学生呢。后来学校每年都有招生，一直到“文革”，学校“下马”之前。我们这批“文革”前的学生，后来在我们国家的金融战线上都在挑大梁了。这也就是它的历史背景啊。当时其他的高等学校，比如北大，它没有专门的金融专业。人大也只是在财政系里设有金融专业，而我们是专门有一个金融系。

访问者：您现在还能记起1962年入学的时候招了多少学生吗？

钱中涛：我们那一年一共招了300个学生，三个系，那是老三系，财政、金融、会计系。每个系招了100个学生，分成两个班，每班大概50人。以后从63级、64级开始招生陆续就多了，有招300人也有招400人。我们第一届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的就是300个，主要是来自上海、江苏、北京、河北（含天津）4个考区。所以我要算到中财就是从1962年开始，一直到1968年离开中财。其实我们应该是1966年就毕业了。但这个时候正好赶上“文革”，我们就留在学校推迟分配了两年，一直到1968年才分配。

访问者：在学校1966年就毕业了，1968年才分配。这两年干什么呢？

钱中涛：在学校念书啊。

访问者：还继续念书啊？

钱中涛：1966年以后就没有事干了。学校也在搞“文革”运动嘛，你们可能都不太知道。1966年闹得比较热闹，以后就开始打派仗，没人管了。到最后两年过去了，再不毕业就不行了，那就毕业吧，把大家都分出去了。后来学校就“下马”了，解散了。

访问者：1966年到1968年之间都没有上课了吗？

钱中涛：对，没有上。

访问者：那你们在学校就天天跟着运动跑？

钱中涛：对呀，我们这一届的学生到1966年6月1日北大第一张大字报开始的时候，已经把课基本上都学完了。我们的毕业论文也开始要写了，准备要毕业了。但经过“文革”一闹，我们也没毕业得了，就只能接着等，所以那个时候根本就谈不上上课了。我们后面的63、64、65届也都停课闹“革命”了，咱们学校“文革”前招收的最后一届就是65届，这些学生基本上就没怎么学了，到1966年就停止招生了。1965年进校的学生到1966年7月份全面停课为止就只学了一年。

访问者：学了一年，那他们也和你们一起毕业的吗？

钱中涛：没有。他们毕业更晚一点，因为后来他们有一部分被发到农

场劳动锻炼去了。后面的情况我就不是很了解了。这些学生是在劳动锻炼完了以后再分配的，1970年以后他们就都分配完了。到这里就是中财历史上的第一阶段。

访问者：还有一个说法是中财曾经两次“下马”，1961年好像停过一次课，是吗？

钱中涛：学校1960年招过一次学生，但是招的都是调干生，是从干部中招而不是从应届毕业生中招的。这些学生招来以后又正赶上国家困难时期，吃不饱饭。那个时候就没有再招生了，这也不能算停。到1962年，学校又开始招生了。所以说学校当时不算停办。

访问者：您入校的时候我们学校是什么样子？那个时候的校址是现在的地址吗？

钱中涛：对，对，就是这个。学校现在这个地方只留下来了几个教室是我们原来上课的地方。一个就是现在的礼堂，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的校医院，那个时候叫做友谊楼。这座楼最开始叫单干楼，也就是单身宿舍，后来留学生来了以后就改成了友谊楼。现在大部分人都知道这叫友谊楼，因为是越南留学生住的。再后来这里就改成了校医院。我刚开始当学院副院长时就是在这友谊楼里面办公的，烟厂搬走了以后，我再搬到现在校门口的一个四层办公楼里。此外，学校里还有两个平房，就是现在的南平房和北平房，这也是历史的遗迹。现在学校里剩下的当时的建筑也就这几个了。

原来的学校不大，但很有特色，四个楼东南西北围着构成了四合院，中间是个小花园。学生宿舍的主体就是这样的。三个系都分在三个楼里面，南楼则是老师办公的地方。现在的专家宾馆那儿，就是女生宿舍那里，原来有个老的教学楼，学生上课都在那边。现在的校医院旁边过去有个大教室，合班上大课都在那里。那个时候的校园总体上来说不大，比较安静，比较有特色，因为是文科院校嘛。

“文革”前国家对财经类院校的发展也不是很重视，所以我们能招几

百个学生就算不错了。要是按照原来最早的规划，我们学校就大了，规划中校址一直到后面的三环路。那一片地全是我们中财的！刚开始，当国家还比较重视经济建设的时候，对培养财经人才也比较重视，那时学校还规划的比较好，据说是按照苏联列宁格勒财经学院的模式规划的。后来国家以搞阶级斗争为纲，不重视经济建设，不重视价值规律了，对财经类人才的培养也就越来越少。学校给你划了这么大块儿地你老不发展，农民就在那儿种地了。时间长了以后，这些地就成了人家公社的地了，就不是中财的地了。

所以你看现在我们学校要盖房子不够地儿了，得跑到沙河去盖，就是这个问题。什么时候国家重视财经工作了，我们学校就有了好转；一不重视了，我们也就下去了。所以说1962年我们学校为什么从社会上公开招生呢？就是因为经过困难时期后我们都知道了不重视价值规律是不行的。尽管当时还是在搞计划经济，但对经济管理已经开始予以重视了。所以国务院觉得要办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吧，并且要公开招生。以前学校都是从干部中招生，有点干校性质。从我们这届开始学校就招本科生了。“文革”中学校干脆就下马了。“文革”以后国家开始改革开放，党的基本路线和工作重点都发生了转移，大家又开始重视经济工作了，所以中财又开始恢复了，国家也越来越重视了。我们中财的发展也就越来越好了。还有一个是从学校本身来讲，学校上下都很努力，认真抓教学，培养的人才在社会上知名度越来越高啊，这也和学校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访问者：也就是说，最开始我们的校址，国家给我们批的地是很大的。只不过后来我们学校没发展起来，是吗？

钱中涛：是的，没有发展起来，还是不重视嘛，认为没有必要搞那么大。原来我们从那个老校门进去，有一条林荫大道，很深的，很漂亮。当时在做整体规划的时候，学校前面都是空的，用来建运动场啊什么的。后面才慢慢开始盖楼，也都是往后面盖。到后来要盖房就不行了，后面的地都被农民占了。我们就只能往前挤了，这样，房子就盖到校门口了。现在

我们的教学楼都挤在前面这一块儿。原来后面那一大块儿地都是我们中财的。我们原来有一个老主任，张玉文主任，是一个老教授。她是中财的老人，知道的也多，常常开玩笑地跟我们说：“我就像个地主婆似的，到处说这块儿地就是我们的！那块儿地也是我们中财的！”这很有意思。咱们中财原来就是很大一块儿地，但是就因为国家不重视啊，都丢了。

这个当然也跟党的工作重点有关系。只有到改革开放以后，中财的发展才获得了一个比较好的条件。不然的话呢，学校老是处在关停并转上。历史上我们也知道，开始是中央税校，后来北大、清华、辅仁经济系过来，组成了中央财经学院。中央财经学院后来又改成了中央财政干校，有一部分人被分到人大去了。在1960年之后，财政干校才又正式挂上了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牌子。但那个时候的招生也是从干部中调来的一批调干生。学校一直到1962年才开始招收第一届本科生，但是好景也不常，招了4届学生以后，就开始了“文革”，学校就“下马”了。一直到后来，学校从1978年才又开始招生。从1978年到现在，咱们学校中间就只有1981年没有招生，因为那时学校的校舍被烟厂占了，实在没地方。学生招进来以后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最后我们打报告，停招了一年。这样社会影响就大了，说大家都想上中央财金学院，怎么就不招生了呢？最后财政部顶不住压力，说第二年还得招。到1982年，学校接着又招收学生了。那时尽管办学条件很艰苦，但是学校名声在外，当时考中财院的话，分数不高是考不进来的。

访问者：1968年您毕业时分配到哪儿了？

钱中涛：分得远啦。你猜猜我分到哪里了？

访问者：那个时候是全国分配的吧？

钱中涛：嗯，我分到了祖国的最西边啦。

访问者：新疆？

钱中涛：对，就是新疆。在“文革”还没有开始之前呢，我们就已经有了一个毕业分配方案了。那时候计划把我留校，当老师。但“文革”

一搞呢，原来的分配方案就废弃了。那就走四个面向嘛，面向边疆，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厂矿。我们去的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银行。那个时候学校里面也乱哄哄的，是军代表来主持分配的。因为边疆地区怕人不去，他们就提出，共产党员去吧。当时我们是学生中的党员嘛，那时带头吧。我和我爱人两个就被分派到那儿去了。在那儿呆了5年多，后来才调回来。

访问者：1968年那时分配，是不是大部分都是面向全国的？

钱中涛：对！咱们学校本来就是面向全国招生，面向全国分配，历来都是如此。不像地方院校，省里的院校，省里招生，省里分配。

访问者：而且当时分配一般是不是都分到比较艰苦的地方去了？

钱中涛：对，很少有分到大城市的。我们分得还不错，去的专业还对口。分到了银行，学金融的嘛。尽管是在最基层，一个营业所，但总的来说，和专业还能对上。像咱们学校好多人分到下面去挖煤的，戴相龙就去挖过煤嘛。金人庆被分到粮站，做了卖粮的。还有几个被分到食堂卖饭票的，反正和经济沾点边嘛，卖饭票也算。那个年代很荒唐。

好多大学生都和我们一样给分到新疆去了。一个青岛海洋学院的海洋捕捞专业的同学也分到新疆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他的专业名称里有“捕捞”两个字，他最后被分到了那里的大水库。水库里还养了几条鱼，那就算是专业对口了。那个时候不重视知识，国家花了很多钱培养学生，实际上到最后全给糟蹋了，你说是不是？

访问者：您那时候毕业，咱们学校有多少被分配到新疆去的？

钱中涛：我们系就我们两个。会计系也有，就是现在的王柯敬院长，他也曾分到那儿了。他分得比我好，分到乌鲁木齐。我们到了南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团场里面去。

我们那一届大概只有这几个，后面还有。也还有比我们更艰苦一点的，两个会计系的男同志被分到西藏去了。现在校友会的王志泰，他当时就是被分到西藏去的，还有后来江苏省建行的行长周锦伦也是。他们两个

是被分到西藏的阿里地区，但是干了几年就都调回来了。王志泰干了几年到财政部，周锦伦就分到江苏去了。

访问者：1968年的时候是62届、63届、64届这几届学生一起分配的吗？

钱中涛：没有。我们62届的先分配。我们大概是5月就分配完了，63届的是下半年分的。

访问者：他们也是1968年分的吗？

钱中涛：对，对。大概64届的可能晚一点。64届他们可能就去五七干校锻炼了，他们是1969年还是1970年分配的就不太清楚了。

访问者：5年之后，您才从新疆回来的吗？

钱中涛：嗯，但没有回北京。

访问者：那您到我们中财是哪一年？

钱中涛：1979年底。咱们学校是1978年复校的，我的关系大概是1979年底办来的。我真正来上班是1980年，那个时候也是因为偶然的的关系。我当时在东北工作，后来学校复校的时候，它得找原来留校的那些学生哪儿去了。“文革”开始前，分配时我是留校的啊，学校找来找去总算是找到了，找到之后就发了个商调函。但是东北的单位不肯放啊，也算业务骨干啊。后来，学校做了好多工作，拖拖拉拉的一直到1979年底，说户口再不办的话，北京的户口就进不来啦，年底就截止了。东北的单位一看也留不住了，就放人了。

访问者：好像1979年复校时，我们学校就从各地找当时留校的学生，也希望我们有的到别的学校的老师能陆续办回来，是这样吗？

钱中涛：是。原来学校“下马”的时候，有两批老师是比较集中地分配出去了，一部分到了辽宁财经学院，也就是现在的东财，这是比较多的一批。还有一批老师到了厦大经济系。所以一说要回来，这两批老师首先就回来了。然后又有陆陆续续分散到全国各地的老师回来，再后来学生也陆陆续续地回来了。

访问者：您回校后，先是去哪儿工作了？

钱中涛：就在金融系当老师，我一直是在金融系。我在调到院里工作之前就一直在金融系，开始时当老师，后来当教研室主任，然后到系里面做了总支副书记，再后来就到学院当了副院长。

访问者：您做副院长是哪一年？

钱中涛：1985年11月份吧。那时候学校没有院长，就是副院长主持工作。应该说我也没有什么经验，因为我没有在院里工作过。一上来就把我推到主持工作的位置上了，担子很大，压力很大。按年龄来讲我当时也不算大，42岁，在全国高校校长里来讲应该算年轻的。就是时代把我们这些人推上去了，当时我们班子里面应该也就是我年龄最小的了。

访问者：您那个时期的中财有什么重大的举措对后来中财产生很大的影响呢？

钱中涛：我们那一段应该是中财最艰苦的时候。现在在讲改革开放30年了。中财是1978年复校，到现在也是30年。实际上在前面一段时间跟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初期是一样的。整个的形势啊也不是那么顺利。我们面临的困难很多啊。首先是校舍问题，咱们学校一“下马”后就给卷烟厂给占了。1978年国务院批的是在原址复校，但是卷烟厂始终也不肯走。学校招生了，学生没地方住。78级进校的时候，他们都坐着小马扎开开学典礼，就在外面露天地开。学生上课就在板房里面，也就是现在的活动房。现在抗震救灾的活动房比我们那时候的可高级多了。那个时候的活动房就是个板房，就是你们有时候在建筑工地能看到的那种。学生就在那里面上课、住宿。78级那一届都是在北京招生的。刚恢复高考以后学校基本上没在外地招生。因此他们大部分都可以回家住，问题还不大。79级开始就不行了，全国招生以后学生都要住校啊，宿舍也很少。一直到1980年的时候学校的校舍问题就非常突出了，学生都住在大礼堂里，几百个人住在一起，很困难很困难。当时的学生也是考分很高的，所以学生的心理都特别的不平衡。不仅学生不平衡，家长也不平衡。我在学校当副院长的时候，经常收到家长的来信，就问学生宿舍怎么办。那时候招生很少啊，全国就招

二三百个人，一个省摊过去也就五六个人。北京再多招一点，江苏啊、浙江啊也就是招上七八个人，有的时候就一个城市都摊不到一个人了。有的家长出差啊，来北京看看孩子，看看学校，都觉得委屈。

哎呀！我们当时跟北京卷烟厂打交道，让他们腾退校舍，他们从思想上根本就不想搬，这块地方当然很好啊。他们的家属都在这地方住。学生们也是一会儿跑到中南海去上访、去静坐，一会儿跑到北京市委、市政府去静坐，闹得很凶。我们也找财政部，跟北京市也谈，但始终也是拖拖拉拉的。他不是不给你解决，他老是不给你彻底地解决，老是找借口，一会儿是投资不够啦，一会儿是地方选址不好啦。最后一直闹到了什么时候呢？一直到学生罢课。那是1986年，在全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那次中财的罢课超过了7天。这个事情闹得比较大。后来卷烟厂给搬到定福庄，搬到东郊去了。

访问者：所有的中财学生参加罢课了吗？

钱中涛：对、对。那时候有个班长联席会，很有意思的。班长联席会来主持这个事儿。最后把烟厂的木牌子也给烧了，闹得很凶。但那次闹了以后呢，中央政治局啊，书记处啊，都知道了。北京市也感到了这个事的压力很大，最后才下决心定了时间表。原来老不给我们定时间表。什么时候搬？搬哪儿？腾出来哪几个楼？经过很艰难的谈判，虽然卷烟厂真正彻底地搬走要等到1988年，但总算是有希望了。

从1978年到1988年，10年时间。前8年“抗战”是把烟厂搬迁的时间表要下来了，基本上算是明朗了。卷烟厂真正搬走，学校全部恢复要到1988年。卷烟车间搬走，我们把教学楼恢复起来，这个10年应该说是非常艰苦的。老师很艰苦，学生很艰苦，领导压力也很大。

作为我们来讲，有时候我们还要理解同学们的情绪。学生们的高中同学一起考到北京来的，说到学校来坐坐都没个地方，脸上肯定是很没面子，所以说学生当时的情绪也很大。我们得要理解学生的那种情绪是吧？不能挫伤他们的积极性。人家的要求是合理的嘛，对不对？是我们的工作

没有做好嘛。我们要理解他们，但是还得要做他们的工作，不能让他们闹事儿。

从当时的整个政治形势来看，社会上对党的改革开放的认识不是很一致的，极“左”极“右”的东西在思想上也都还是有的。高校也是始终不稳定，经常不是这个学校游行，就是那个学校游行。那个时期高校的思想工作也是非常难做。北京的反正就看四所学校：清华、北大、师大、人大。像我们学校肯定也是跟着动，经常到“一二·九”啊，“五四”啊这些敏感期，我们就得到学校各个系去做工作，防止学生走出来。一直到最后1989年的政治风波，那个时候就已经到高潮了。从那以后就好一点，但在那之前，我们这些领导年年就像坐在火山口上。这还不像我们学校说是为校舍的问题，那样我们还好做工作。这都是社会上的一些问题，一会儿反腐败啦，一会儿要民主啊，一会儿要自由啊，这些东西我们就控制不了了。清华、北大、人大、师大这四个学校一动，我们这儿离得也近。反正年轻人骨子里就喜欢冲动，一看这个出去游行啦大家就一窝蜂地都出去了。

其实你说青年学生在思想上有多少人要反党反社会主义？1989年有的人给学生扣好多帽子，我们就不同意这样。学生嘛，毕竟是年轻人，到国庆节的时候，在天安门广场组织庆祝活动，又唱又跳的也是这些学生，去联欢、去狂欢，不也是挺好的吗？因为年轻嘛！但是从工作上来讲，我们的压力又非常大。再加上学校工作的另一个压力，师资队伍也不稳定。那时候不像现在大家都愿意留校，要调到学校来不是博士生还不行呢！那个时候是留不住人啊。因为那时候知识分子的待遇是最低的，连课酬都没有，后来才有了课酬，每小时补一点钱。这当然也是很可怜的，比起社会上那些经商下海的差得远了。

办个学校没有好的教师队伍是不行的。中国金融学院有的老师条件不错，学校牌子也挺好，但在当时，这个学校始终也形不成一个好的师资队伍，因为这个学校太小，内部矛盾也很大，大家都不愿意到那里去。学

校想办法调一些有名的教授，人家也是呆了一年半年又调回去了，始终发展不起来。我们那时候压力就很大。学校有一批“文革”前的老教师，也都是不错的。但是学校的师资队伍要有一个梯队啊，那就需要大量的年轻教师。老教师年龄越来越大，相对来讲知识也有一个不断更新的问题。特别是在当时碰到一个改革开放的阶段，党的经济方针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弯。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老教师的知识要更新的就太多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培养年轻人，但年轻老师思想最活跃，也最容易受引诱。怎么才能够牢牢吸引住年轻的人才呢？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对一些年轻教师破格提拔，只要这些年轻教师有能耐，我们就应该支持他们，给他们创造条件，能破格提拔就破格提拔，有条件出国进修就让他们出国进修。有的人公派出国进修不回来了，不回来就不回来，公派还是要派，大部分还是要回来的。就这样的话，我们还是留住了一批骨干，像王广谦啊，李俊生啊。后来因为中财在社会上的声誉、知名度都比较高了，也吸引了一些老师到中财来。

还有我刚才不是说了，我们国家当时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因此，我们学校教学内容的改革任务相当重，也正好落在我们这一届领导班子的肩上。教材的更新、课程的设置、专业的布局、师资队伍的培养、科研等等，这些任务都很重。这些地方如果跟不上去，这个学校也是要被淘汰的，在教学上面没有什么突破，在科研上没有什么建树，这个学校慢慢慢慢也就完了。

北京市每年都要申请社科课题，申请完了评奖。每年我们学校都能申请到项目，最后成果出来后也能评奖，每年一等奖二等奖都有。所以经过这么多年大家的不断努力，中财院现在发展的越来越好。现在缺的还是校舍，在沙河那边开始建新校区了嘛，但总之还是比较远一点。我们可以想像一下，如果当时三环以内都是我们的话，我们就不用跑沙河去盖房子了。当时我们和烟厂闹的时候，北京市给我们出了一个主意，让我们和政法大学一样搬到昌平去。政法大学当时没有顶住，搬到了昌平，学校搬过

去就受了很大的影响。北京市在昌平也给我们中央财经学院规划了一块儿地。后来是我说的我们不去，如果搬到那儿去，相当一部分老师就不去了，就调到其他学校去了。当时搬到昌平的也就是政法大学，其他学校也只是放了一些校区在那儿。开始呢他们也提出过让我们搬到玉渊潭那边去，那是我还没有当院长之前。那个地方不错，但是听说财政部不同意。玉渊潭那个地儿比较低，要盖起来，回填土的量很大，投资也大，下不了决心，于是就一直拖了下来。

现在我看这个结果也还行，沙河嘛，相比昌平来说还是比较近，近一半路吧。这次我们搬到沙河后学校上规模大了，将来可以好好发展一下了。还有一件事我当时考虑学生的体育锻炼问题，年轻人起码得有个运动的地方，总得要打个篮球，打个排球，打个羽毛球吧，你得要个场地给学生啊。学生还是要德智体全面发展。现在那个运动场以前是没有的，尽管学校用地非常紧张，但我与其他领导商量，说不管怎么样，咱们不干其他事儿，咬咬牙得把个运动场先给弄起来。那个时候标准的体育场是400米6道，我们只开了4个跑道。尽管我们学校体育锻炼条件不好，但是在高校里我们的体育成绩并不落后。我们中财的学生是经过艰苦锻炼的，而且挺以中财为荣的。

我在任期间的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压力：第一是校舍，收复失地，这是一大任务；第二个是稳定队伍；第三个推动改革。这如三座大山压在我们身上，哪一步做不好都不行。现在你再反过头来回去看，我们这届班子的任务是什么？能够把这三件事儿做下来，能把学校稳住，并且有所发展。我们应该说任务算是完成了，使命还算是完成得不错，虽然不是特别好，但是应该说是完成了。所以我1992年离开中财调到财政部去的时候，回想起来应该说还是无愧的。人嘛，总是有点压力好，这样才能做得更好，但是水平有限，也只能做到这样程度了。

访问者：您再给我们讲一下您刚回学校时金融系的状况及其发展吧。

钱中涛：我们到院里时又成立了税务系和保险系，按照计划经济体

制来讲，金融系是商品经济的产物，也不是特别受重视。在学校里的话，第一个系是财政系，第二个才排金融系，会计系是老三。实际上，从复校以后的发展来看，当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银行、金融的作用就凸显出来，这时候金融系的发展相对来讲比财政系的发展环境要好一些。那时候银行发展很快，最早全国就一家人民银行，后来把农行、建行、中行分出去，最后把工行分出去，以后又成立了许多股份制银行，光大、民生、交通，它们需要的人很多。它们需要学生，也需要一些老师去给他们培养干部。所以从当时来讲，金融系应该是在学校中发展比较好的。

访问者：您到中财的时候金融系就开始发展了吗？

钱中涛：开始的时候各个系力量差不多，招生也差不多，但是从发展来讲，大家就感觉金融系可以研究的东西、可以发展扩充的东西比较多。财政就是国家机关比较固定的东西，当然财政到后来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相比起来，它的发展还是受到了一些限制。

访问者：能不能将我们学校教学内容改革和科研的变化分开谈一下？

钱中涛：这个内容就很广啦。比如说原来的教材，肯定都不能用了。组织教授重新编写。这就要开一些研讨会，大家统一一些认识。课程设置上原来有些课程能砍掉的就砍掉，要开设的就开设，各个系都有一些讨论。新系的设置，比如保险系，“文革”前是没有的。那么我们看到改革开放后保险的作用是越来越大，在当时来讲，我们要成立保险系，这也是全国第一个保险系。再比如税务系，原来财政主要收入是靠企业上缴利润，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以后，税收的作用就越来越大，大家也说必须把税务系建立起来。于是学校就从财政系里把税务系分出来，从金融系里把保险系分出来。

像这样的调整都是适应整个改革的大的方面，要说细了就包括很多实际操作的内容了。拿银行来讲，银行贷款原来在计划经济时代是一种模式，到了市场经济以后，贷款的方式、原则都会有变化。这不是我们学校自己说了算的，你得到银行去，和人家银行的同志一起参与改革，这样你

才知道改革的内容和具体形式是怎么样的，然后回来才能改教材等等。这些都是和改革开放30年相关的。我觉得中财的发展就是靠国家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

访问者：在学科建设方面，在教学内容方面，在科研方面，我们都是跟着改革的步子来走的。

钱中涛：对。必须要这样！如果我们当初跟不上的话，那就只能被淘汰。如果我们培养的学生出去后净说一些计划经济的话，那单位肯定不要你啊。考验我们学校到底教学改革成不成功，就要看我们的学生到社会上能不能有所建树。事实证明，我们的学生到社会上以后确实也是表现不错的，这就说明了我们在教学改革上面是有所成绩的。并且这也是不断努力的过程，改革也是不断深化的。我们在职的时候是1992年以前，1992年以后就是后面的领导在做了，当然也做得不错，越来越好。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中财不断地发展，知名度不断地提高。任何一个学校的发展都有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任务。不同历史阶段领导肩上扛着不同的使命，必须把它完成好。

访问者：您印象中还有没有在中财发生的大事情？

钱中涛：学校的校风，“忠诚，团结，求实，创新”，这个是在我们学校40周年校庆时候提出的。那时我们讲，一个学校总得要有它的灵魂，要有一个校风吧。我们学校40年了，总该形成了这样一个东西了吧，大家应该总结总结了。最后大家讨论了一下，得出这么八个字，后来请王丙乾部长认可，他也同意了。然后王部长给我们题了词，现在王部长的题词还在一块大石头上刻着呢。当时来讲，大家讨论，一个就是要“忠诚”。那个时候学校培养财经干部，现在培养的对象范围更宽了，但起码要有忠诚啊，现在可以叫诚信吧。不以诚信为本的话做人就做不好，更别说是做事儿了。“团结”，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的学生分配到哪儿都必须团结，团结才有力量，团结才能进步。你老跟人家闹矛盾也进步不了，要学会团结大家，跟同事们一起工作。“求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咱们的

学生就是实在、踏实。

那个时候中组部提到过，说中财的知名度并不高，但培养的学生为什么就有那么多司局级以上的干部？为什么那么集中？这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是其中有一条我们感到很深刻的原因就是我们中财毕业出去的学生很踏实，不是好高骛远。在学校的时候老师就是这么教他们的，到岗位上要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工作。任何一个单位的领导都是喜欢你的部下踏踏实实地工作，不是光耍嘴皮子，不好好干活。那么这些同志出去以后，很自然就发展得快。所以我们在讨论的时候认为“求实”这个校风一定要写在上面，一定要有求实的态度，不要搞虚头巴脑的东西。我们的课程设置方面，也特别注重操作技能，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特点。学生毕业出去以后很快就能上手、能干活。包括我们这些在单位上当领导的老校友就能感觉，每一届从这个大学那个大学分配来很多大学生，但真正能干活的还是中财的学生。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务实、实干的态度。当然“创新”也是必须要有的。当时来讲，这就是培养学生的目标，这是个大事儿。

访问者：这是1989年是吧？建校40周年。

钱中涛：对对。建校40周年。因为校风的认定都需要经过上级，自己给自己认定也不行啊，所以我就找王部长去了。王部长说不错啊，挺好。我说那你就给题个词吧，写上吧。

《中央财经大学六十年史》表格目录

表1-1	全国税务干部训练分工表	22
表1-2	中央税务学校毕业生人数表	25
表1-3	1951年中央税务学校课程设置情况一览表	34
表1-4	中央财经学院本科设置情况一览表	51
表1-5	中央财经学院专修科设置情况一览表	52
表1-6	1952年12月教职工人数统计	55
表2-1	1953—1958年行政领导一览表	71
表2-2	1953—1958年党务领导一览表	72
表2-3	1954年1月教职工统计表	74
表2-4	1953—1954年课程规定一览表	80
表2-5	1953—1957年学校自行搜集资料统计	95
表2-6	1953—1957年学校收到外来资料统计	95
表2-7	1953—1957年学校收到财政部资料统计	96
表2-8	1953—1957年学生使用讲义统计表	97
表2-9	1953—1956年主要规章制度一览表	101
表2-10	1953—1957年一年制专修班结业人数统计表	103
表2-11	1953—1957年半年制专训班结业人数统计表	103
表2-12	1953—1957年其他班结业人数统计表	104
表2-13	1954年9月政治活动统计表	105
表2-14	1955年政治活动统计表	106
表2-15	1956年政治活动统计表	106
表2-16	1957年政治活动统计表	107
表3-1	1952—1953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培训情况一览表	116
表3-2	1956—1957年度专题报告情况统计表	121

表4-1	财政60班、金融60班和外汇60班课程设置一览表	145
表4-2	1962年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规章制度一览表	157
表4-3	院长办公室职名表	163
表4-4	党委办公室职名表	164
表4-5	教务处职名表	164
表4-6	政治理论教研室职名表	166
表4-7	财政系职名表	167
表4-8	金融系职名表	168
表4-9	会计系职名表	170
表4-10	普通课教研室职名表	172
表4-11	1960年招收专业、班级、人数	186
表4-12	1962年招收专业、班级、人数	186
表4-13	1963年招收专业、班级、人数	186
表4-14	1964年招收专业、班级、人数	188
表4-15	1965年招收专业、班级、人数	188
表4-16	中财金融62级1班部分同学情况表	217
表4-17	政治理论教研室研究计划	230
表4-18	财政教研室研究计划	230
表4-19	金融教研室研究计划	231
表4-20	会计教研室研究计划	232
表4-21	1965年9月13日在校学生人数统计表	260
表4-22	1970年6月干部教师情况	263
表4-23	1970年6月工人情况	263

中央财经大学六十年史上编编后记

历时两年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这部校史的上编终于定稿了。

60年没有一部较详尽的校史，为了迎接60年校庆，学校要求写一部校史，总结经验，以求更好地发展。

2006年10月26日，李玉书副书记、陈明副校长召集了编写校史的动员会之后，成立了校史编写组，由我负责组织编写提纲、搜集材料、采访老同志，并负责总纂工作。至2008年8月，经过一年半时间的努力，除了2008年上半年迎接教育部评估的几个月，校史编写组的老师平均每个月召开两到三次碰头会，采访了几十位校史知情人，搜集了大量的史料，并在此基础上拟写出校史编写大纲，并撰写了近10万字的部分初稿。当时初步拟出撰写宗旨：

要写一部信史；要写一部对得起共和国财经教育的校史；要写一部中财人满意的校史；要写一部让读者能看、爱看并可以常看的校史；要写一部有特色、有个性的校史。

并且提出了框架性的建议，以及总体撰写上的基本路径，呈送校领导审阅提纲时，作了进一步的编写思路的说明，其中有：

通过对中财大60年历史的描述，突出中财大的特色与成就，总结经

验，汲取教训，使读此校史的中财人，对中财既不要自尊大，亦不要自卑薄，并在修撰中财大校史的同时，更进一步研究中国共产党办自己的大学的探索历程和自我提升的历史。我们中财大的60年史，与共和国的命运休戚相关，也最能体现共和国办教育办大学的得失。所以在述史时，以中财为点，以共和国高等教育发展为背景，点面结合，高等教育大背景是我校发展变化的依据，我校的发展变化又是共和国政治文化背景下高等教育事业的具体显现。把这段历史总结好，就不只是一部中财大的校史，更是我们共和国自己办教育的一个个案研究。这个意义就十分大了，这个特色就十分鲜明了，这就会比现在通行的一些校史更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这种编写思路与撰写宗旨，基本得到允准，只是撰写提纲经过多方建议，又做了不少修改。是年9月，框架既定，同志们投入到紧张的编撰工作中。初稿完成后，征询领导意见，觉得这种撰写方式未如编年体好，所以又用编年体写了一遍，还觉差强人意，所以决定先出版上编，即“文革”前这一段历史，待复校后这段历史（即下卷）修的较满意后再出版。在校史的修撰当中，档案馆、校友会、人事处给与了大力协助，档案馆王琨馆长、人事处孙殿明副处长调动很多老师帮助整理提供了大量史料和统计数据。发展规划处的吕世彦处长把他自存的大量宝贵资料提供给我们，并对校史修撰提出非常中肯的建议和意见。

修史期间又蒙原中文系霍唤民教授邀集退休老同志数人来我这里讲述了很多史情，匡正了很多史实，解除了很多迷惑。同时编写组其他老师也通过当面询问、电话咨询等方式请教了许多老同志。我觉得应该记下这些老同志的名字，他们是：赵秀山、陈菊銓、王万有、邱光信、李瑞和、胡兵、马计、闵庚尧、潘宝山、王铁臣、侯仰春、刘佳璐、赵英豪。在这最后两个多月的工作中，我要特别感谢的是三方面的人，一是领导的关怀，陈明副校长多次询问，且驱车50公里来慰问我们。李玉书等老一辈校领导与王广谦校长、倪海东副书记、梁勇副校长等现任校领导也对校史的修撰

给予了极大的关怀与支持。第二是我的研究生龙阳、彭欢、陈妮娜，还有我的助教、李俊生副校长的博士生刘飒，和我一起校勘初稿，搜集史料，构筑框架，整理图表。第三是文化与传媒学院的老师们的帮助，总支书记刘晓勤同志、副院长莫林虎、李志军同志、院长助理王晓乐同志替我分担了绝大部分院内的工作，办公室主任许晓娟老师经常远途来探问，并在学校调度学生，奔走于各个部门，搜集资料，传递信息。这也是我十分感激的。

再有就是采访组的老师们，非常敬业也非常辛苦，张辉、胡郁、吴艳芳三位老师，带领数名学生，有王传照、徐伟华、王若兰、陈柏龙、周鸿飞等。他们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基本上是利用业余时间，采访了学校的老同志和现在当任的校级和院级领导。采访后将采访稿整理出来供编写组使用，同时还要编辑出校史专访的专题片，劳动强度非常大，但是他们以对校史的尊重、对工作的尽心，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这里也要提出，无论是退休的老教师、老领导，还是现任的领导和教授们，对我们的采访都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很多老同志都和我们采访组的老师、同学成了朋友，这些前辈们对史料的甄别、史实的回忆、史象的评价，就像给我们讲述着一堂一堂的历史课，让我们深受教育，加深了我们对党和国家的敬意、对学校的敬意、对一代代教育者的敬意。

回忆近三年的修史历程，也是感慨系之。始吾受命，心甚忐忑，生怕有辱使命，辜负领导期望。我想学校之所以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大抵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来我是学古代文学出身，略知文史之事；二来我是中财子弟，先母尝为金融系教员，因而我对中财有一种特别的感情；三是我来中财任教几近30年，也亲身经历了中财建校以来一半的历史，还算有一点发言权。

接受了这个任务就要把它完成好，我们迅速地组成了两套班子，一个是文字编写组，一个是电视采访组。后面有档案馆、校友会作支持。大家都在为修出一个“像样的校史”而努力地工作。但是我们才疏学浅，固然

尽力，可结果未必尽如人意。如果还能看，我们就十分欣慰了。期望着百年校庆时，能有一本更让人满意的校史。我辈抛砖，冀其引玉焉！

2009年5月15日 王强记于昌平香堂文化村一区七排二号寄庐

补记

校史征求意见稿印了一百份，请相关人员，特别是老同志和原、现任校领导审阅，在十数天的时间里，大家都阅读得非常仔细，并提出了详细的修改建议，王广谦校长还特别召集开了一个会，把他的意见逐条与修撰者讨论；李玉书同志亦与撰写者详校文字，订正史实；赵秀山同志特别邀请校史组老师去府上谈了他的建议；陈菊铨、钱中涛、姜维壮、王万有、于滔、李瑞和、潘宝山等老领导、老同志不但在送审稿上逐段修订，还写来书信，或打来电话，或亲临编写组，热情鼓励，辞意殷殷，为这部校史的最后定稿费尽心血，其诚可感，其心可敬。

2009年9月10日 王强补记于新文化街寓所

图片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央财经大学六十年史. 上编/中央财经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 10

ISBN 978-7-5095-1826-7

I. 中… II. 中… III. 中央财经大学—校史 IV. G649.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74829号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

URL: <http://www.cfeph.cn>

E-mail: cfeph@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 邮政编码：100142

发行处电话：88190406 财经书店电话：64033436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16开 22.25印张 298 000字

2009年10月第1版 200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35.00元

ISBN 978-7-5059-1826-7/F·1528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本社质量投诉电话：010-88190744

责任编辑：陆宗祥 高波

责任校对：胡永立

装帧设计：中央财经大学文化创意工作室 秦颖

ISBN 978-7-5095-1826-7



定价：35.00元